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 AMI 综合评价核心期刊扩展版
RCCSE 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全国高校精品社科期刊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CNKI) 全文收录期刊

东方论坛

EASTERN FORUM

1988 年创刊 双月刊
2025 年第 2 期
(总第 192 期)

编辑委员会

主 任：胡金焱

委 员：（按姓氏音序排列）

卞建华	蔡颖雯	陈德球	陈洪连	陈瑞华
董志勇	窦秀艳	方 雷	何云峰	侯传文
胡金焱	黄速建	姜异新	姜振昌	刘东方
刘京希	刘喜华	刘跃进	吕周聚	马斗成
孟天运	孙百才	孙继国	谭好哲	王立胜
王庆金	王绍波	王兆胜	王子今	尉利工
魏 建	吴义勤	肖建红	钟永光	周 潇

主 编：孙继国

副主编：侯德彤

1988 年创刊

2025

东方论坛

2

双月刊

总第 192 期

□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六个必须坚持”的内生逻辑、世界观要义与方法论要求 王增福 李智超 · 1 ·

以党的自我革命破解大党独有难题：内在依据、作用机理和实践进路

肖凯强 祝介梅 · 10 ·

□ 东方文化 · 中国智慧

周代“从道不从君”的“臣道”论 祁志祥 · 22 ·

《老子》之“道”的隐喻思维新探 廖 雪 · 30 ·

□ 新时代中国金融学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前沿进展 汪 勇 · 43 ·

金融科技对中小企业融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赵金国 刘文雯 · 54 ·

□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传承·新变·融合：当代现实题材长篇小说乡村聚落空间书写嬗变论

张 欢·67·

女性精神困境的探源式书写

——张爱玲、苏青、梅娘现代长篇小说论 董卉川 于欣琪·77·

□ 经济研究

数字技术应用与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 詹新宇 赵 昊 姜佳彤·86·

数字技术赋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效应与机制研究

——来自中国 277 个城市的经验数据 克 魁 滕彦琼·103·

□ 国家建设与社会治理

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多重堕距：生成、表征与破解路径

曹现强 李 琼·123·

联结融合：驻村工作队助力乡村治理的实践机理

——基于 IAD 框架的实证研究 王晓灵 王俐晶 田 亚·133·

智慧城市建设的影响因素与生成机理研究

——基于 24 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杨秀勇 滕云飞·145·

THE EASTERN FORUM

The Contents of the 2nd Issue for 2025

The Endogenous Logic, Worldview Essence, and Methodological Requirements of the "Six Commitments"	Wang Zengfu Li Zhichao(1)
Resolving the Unique Challenges of a Major Party through Its Self-Revolution: Internal Logic, Mechanisms,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Xiao Kaiqiang Zhu Jiemei(10)
Theory of the "Way of Ministers" in the Zhou Dynasty: "Follow the Way Instead of the Ruler"	Qi Zhixiang(22)
A New Exploration of the Metaphorical Thinking of the "Tao" in <i>Laozi</i>	Liao Xue(30)
Cutting-edge Advances in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Finance	Wang Yong(43)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on the Financing Efficiency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Zhao Jinguo Liu Wenwen(54)
Inheritance, New Change and Integration: The Evol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 Spatial Narrative in Contemporary Realist Novels	Zhang Huan(67)
Root-Cause Narrative of Women's Psychological Dilemmas: A Study of Modern Novels by Eileen Chang, Su Qing, and Mei Niang	Dong Huichuan Yu Xinqi(77)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Upgrading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Zhan Xinyu Zhao Hao Jiang Jiatong(86)
Research on the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Digital Technology Empowering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Based on Empirical Data from 277 Chinese Cities	Ke Han Teng Yanqiong(103)
Multi-dimensional Lags in Public Service Capacity of Township Governments: Generation, Manifestations, and Resolution Pathways	Cao Xianqiang Li Qiong(123)
Connection and Integration as the Practice Mechanism of Village Work Teams in Facilitating Rural Governance: A Case Study Based on the IAD Framework	Wang Xiaoling Wang Lijing Tian Ya(133)
Research on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s of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A Fuzzy -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Based on 24 Cases	Yang Xiuyong Teng Yunfei(145)

英文翻译：岳玉庆

“六个必须坚持”的内生逻辑、世界观 要义与方法论要求

王增福 李智超

山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济南 250358

摘要:“六个必须坚持”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凝练,又是其立场和观点的精确表达。“六个必须坚持”深刻回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集中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提供了具有原则性高度的方法论遵循。

关键词:“六个必须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 D261; D26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 (2025) 02-0001-09

深刻领会与科学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在实现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新征程上持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基本前提。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六个必须坚持”,即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品格和鲜明特质,高度凝练了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彰显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精髓要义。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必须以高度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精准把握“六个必须坚持”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主动践行“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求,以此不断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向更高水平迈进。

一、科学理解“六个必须坚持”的内生逻辑

“六个必须坚持”作为内在统一、相互关联、整体自洽的话语体系,其中所深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两个结合’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24&ZD013)和泰山学者工程专项经费资助课题(tsqn2022111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增福,男,山东潍坊人,哲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李智超(通信作者),男,山东泰安人,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研究。

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①“六个必须坚持”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呈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

(一) 蕴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逻辑

“六个必须坚持”是一个逻辑严密、脉络鲜明、层次清晰的有机整体,是自觉坚持和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形成的重要理论成果。其中,“坚持人民至上”与“坚持胸怀天下”前后呼应,分别继承发展了唯物史观的人民主体思想和世界历史理论,揭示出马克思主义“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②的立足点和“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③的价值旨归,为“六个必须坚持”锚定了价值方向、拓展了全球视野。“坚持自信自立”与“坚持守正创新”充分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客体辩证法,既立足于自身客观实际,又重视主观能动作用;既强调坚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又力求在实践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此外,“坚持自信自立”与“坚持守正创新”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在思维深层具有高度的逻辑同构性,为“六个必须坚持”注入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丰富的民族内涵。“坚持问题导向”与“坚持系统观念”则体现了矛盾分析法,强调从矛盾的对立统一中把握理论创新的基本规律,明确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作为理论探索的根本任务,力求用联系的、发展的、系统的观点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方法论指导,为“六个必须坚持”确立了科学的思维原则和辩证视野。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根本在于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这一新境界的开辟,根源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身的思想伟力和实践伟力,得益于对“六个必须坚持”的矢志坚守,诠释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使命担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六个必须坚持”为精髓要义与核心要求,立足新的历史起点和新的国情实际提出治国理政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推进新时代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深邃的思想方法,为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确立了科学的实践指南。

(二) 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逻辑

“六个必须坚持”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之生成发展的历史逻辑。在探索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进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除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倾向、消解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等错误话语,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广泛深入地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创立了以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为活的灵魂的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又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二次结合”,开启了“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④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尽快使人民生活实

①《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17页。

④《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57页。

现由温饱向小康的跨越,坚决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果断实行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思想、激发了活力。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形势下更加强调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特色,创造性地提出了“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①的新命题。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突出马克思主义之“求真务实”的理论品质,并将其确立为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涵”^②。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与发展,揭示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一条基本经验,这便是必须结合时代的主题、中国的实际、历史的任务,以大无畏的历史主动精神,将在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转化为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面对波诡云谲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胸怀“国之大者”,深度回应新时代之问、认真书写新时代答卷,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一个结合”推进至“两个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深厚土壤,又充分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营养,是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实现民族复兴的“思想总纲”。作为其立场观点方法的集中表达,“六个必须坚持”简洁有力地呈现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逻辑通道,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更为厚重和鲜明的中国底色,以深沉的历史自信、笃定的文化自觉展现中国共产党人把握历史大势、破解中国问题的卓越能力。

(三) 确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逻辑

“六个必须坚持”不仅应从各自的基本内涵、学理特质和方法要求等理论维度来理解,更要立足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百余年奋斗史从总体上把握其实践内涵。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应当做到“九个必须”^③。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在总结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时概括提出了“十个坚持”^④。我们可以看到,从“九个必须”到“十个坚持”再到“六个必须坚持”,虽然内容上自成体系、表述上各有特色,但结构上相互印证、逻辑上彼此呼应。比如,它们都凸显人民至上、理论创新的重要性,都彰显独立自主、胸怀天下的辩证观念,都强调从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经验中汲取实践智慧。

“六个必须坚持”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逻辑可以从如下方面来理解。其一,坚持人民至上是永葆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内在要求。党自成立以来,就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缔造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直至开创形成了“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由积贫积弱一步步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其二,坚持自信自立是实现民族

①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37页。

② 《胡锦涛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51页。

③ 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8—14页。

④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5—71页。

复兴的必要条件。在团结带领人民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独立自主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历史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推进党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成功找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中国道路,民族复兴日益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其三,坚持守正创新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基本路径。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是与时俱进,而马克思主义要随着时代不断发展,就要以守正为前提和基础,以创新为路径和抓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在面向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中永葆马克思主义的生机活力。其四,坚持问题导向是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①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新思想,这是破解新征程上各类问题的精神底盘。其五,坚持系统观念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应对各种战略性风险挑战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百余年的“创业史”中处变不惊、临危不惧、化险为夷、转危为机,始终经受住各种大风大浪的冲击和考验,根本原因在于党能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系统观念即长远眼光、全局视野和整体思维。因此,继续牢牢坚持这一观念也必将是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制胜思想法宝。其六,坚持胸怀天下是彰显中国共产党国际担当的生动写照。不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发展,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唯物辩证法的关联性思维将中国置于全球时空坐标之中,主张各国人民不仅共存于地球之上,更共生于世界之中,谋求“在既有世界秩序中发展自己”和“以发展自己推动世界秩序持续优化”的动态统一。我们过去提出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霸权主义是谋求这种统一的具体体现,今天我们反对零和博弈、强权政治,大力建设“一带一路”、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谋求这种统一的新时代体现。

二、充分认识“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要义

世界观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前置性立场和预设性观念,决定了世界向我们呈现和打开的方式。人不仅生活在世界之中,更生活在世界观之中。正是在世界观的组织之下,对象才成为为人而在并向人涌现的“世界”,离开一定的世界观,对象将是杂乱无章的一团混沌,我们对其无话可说,也无事可做。只有拥有科学的世界观,人才会形成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认知范式,才能形成理解世界的正确思维方式,找到改造世界的恰当方法。科学世界观的“科学性”具有历史性、社会性和时代性,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之所以科学,是因为它踏着旧世界的台阶而站在了新世界的地平线上,反映了新生产力、新生产关系以及作为其代表的新阶级的理论要求,必将淘汰日益丧失历史合理性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六个必须坚持”遵循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本精神,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把握世界发展的必然联系,进一步深化了对“三大规律”的认识,为我们创造新的历史伟

^①《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17页。

业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

（一）凸显人民价值立场，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

“六个必须坚持”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坚持“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①以及“执政为民”的基本立场之上，深入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党治国理政的一系列重大实践课题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出发点、立足点和落脚点，“人民至上”既强调了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心中的最高位置，又凸显出人民的历史主体作用，解答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为谁工作”的问题，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为谁执政、为谁用权、为谁谋利问题上的高度政治自觉。只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才能确保人民的根本利益不受损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六个必须坚持”秉持立党为公的执政要义，深刻阐释了“三个为什么”^②，给出了中国共产党何以赢得人民衷心拥护并长期执政的最好答案。百余年来，党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领导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雄辩地证明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引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③。

“六个必须坚持”深刻揭示了只有依靠人民推进党的主体性建设才能确保长期执政这一基本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④人民的期盼是党的奋斗目标，人民的拥护是党的力量之源，只有立足人民、扎根人民、融入人民、服务人民，中国共产党才能在与人民风雨同舟、与人民心心相印、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嘱的初心实践中铸就“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的铮铮铁骨，才能真正不被任何利益集团、权势团体和特权阶层绑架而真正做到自立自信，才能真正敢于进行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才能长期为人民执好政、用好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持续对全党进行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勇敢面对“四大考验”，积极克服“四种危险”，着重抓好“关键少数”，全力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孜孜求解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时代答案。经过全党共同努力，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地位更加牢固、执政基础更加深厚、执政能力更加强大、执政方式更加科学，为实现长期执政积累了宝贵经验，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执政规律的认识。

（二）立足当代中国实践，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

“六个必须坚持”始终秉承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与时代之问，透彻把握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实际，进一步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①《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482页。

②2021年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时首次提出“三个为什么”，他指出：“要通过在全社会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弄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基本道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伟大实践中建功立业。”

③《高举旗帜团结一致锐意进取 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不懈奋进》，《人民日报》2019年9月24日，第1版。

④习近平：《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求是》2024年第7期。

复兴的必由之路”^①等规律性认识。“六个必须坚持”是新时代理论守正创新的又一典范。“守正”蕴含着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坚守以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承继。守正不等于守旧,不是固守传统、不敢越雷池一步或走封闭僵化的老路,而“是有旗帜、方向、道路的高度自觉”^②,是对未来发展前景的笃信不疑。“创新”基于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是在传承中实现对原有理论的更新和超越。创新不是无原则、无底线地推倒重来,不是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不能在根本问题上犯“无法挽回、无法弥补”的颠覆性错误。通过回答“建设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具体之问,“六个必须坚持”为更好地回答“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普遍之问指引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立足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自觉将“六个必须坚持”贯穿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诸领域、各环节,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发展新型举国体制、牢牢把握机遇和挑战均有新变化的战略机遇期、建设总体国家安全、走高质量发展之路、“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新质生产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战略性命题与举措,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发生了一系列历史性变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些成就和变革的取得,正是“六个必须坚持”在实践领域结出的累累硕果,充分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转化为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的行动创造力,以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区域经验提升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性认知的理论创造力。同时也说明,中国共产党不是基于某种先验的意识形态立场去空谈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而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从而以“做中学、做中知”的方式生动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认识论。

(三) 顺应世界发展大势,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认识

“六个必须坚持”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世界情怀,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注入了中国智慧,深化了“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③等规律性认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运动是贯穿于人类社会发

展过程中的基本规律。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物质生活资料的极大丰富是人的精神世界富足和精神境界提升的必要前提。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接续出台一揽子重大改革和发展措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了更加辉煌的物质文明成就;我们推动中国市场更加主动地融入世界经济海洋,扩大贸易规模、提升贸易质量,量力而行地开展对外经济技术援助,为处于低迷期的全球经济复苏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和能量,为解决全球贫困问题作出了卓越贡献。另一方面,党领导人民通过“两个结合”推动更高水平的实事求是和思想解放,在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积极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西方之外的路径参考,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遵循“六个必须坚持”的原则要求,积极回应事关人类共同命运的

① 习近平:《新时代党和人民奋进的必由之路》,《求是》2023年第5期。

② 梅荣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若干问题探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3年第2期。

③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19页。

普遍关切,带头倡导并积极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持续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①,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责任与世界担当。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认为,随着生产力持续发展、全球性分工不断深化以及人类交往日益普遍化,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原始的封闭状态将被彻底打破,“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②。“地球村”的形成成为人类的携手发展和共同繁荣提供了技术前提,但同时也容易使问题和矛盾“世界化”。当前,冷战思维、零和博弈、逆全球化等暗流涌动,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百年变局中的时代之问亟待全人类的共同回应,人类又一次站在了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面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挑战和新任务,中国共产党坚持用系统观念和全局思维研判世界历史发展的新脉搏、新态势,坚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③的双赢共赢和美美与共理念,摒弃零和博弈和本国优先思维,从全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出发,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跳出全球治理中的“集体行动的困境”和“短期行为的专制”从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交出了中国答卷,为进一步深化对人类发展规律的认识作出了中国贡献。

三、准确把握“六个必须坚持”的方法论要求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已经开启,我们要在准确把握“六个必须坚持”所揭示的“三大规律”基础上,深刻认识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自觉贯彻好“六个必须坚持”所蕴含的方法论要求,持续推进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聚焦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打开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新天地。

(一) 坚守“六个必须坚持”的价值追求与精神品格

坚持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价值追求。坚持人民至上不是言之无物的空洞口号,必须将其贯穿于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全过程。其一,站稳人民立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其二,把握人民愿望,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好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其三,鼓励人民创造,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人民群众的实践主体地位,全面激发人民群众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将人民的首创精神化作实现民族复兴的物质力量。其四,集中人民智慧,充分激发人民创新创造活力。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广泛听取人民群众意见建议,实现理论创新与问计于民辩证统一,使党的创新理论始终为人民群众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科学的思想指导。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1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68页。

③ 习近平:《建设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23年10月19日,第1版。

坚持自信自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精神品格。一方面,我们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立足新的时代方位,锚定新的中心任务,以高度的理论自信引领更为笃定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我们党的理论自信来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真理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的科学性。要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开展常态化的主题学习教育活动,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另一方面,我们要坚定历史自信、做到自立自强,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要从党和人民的百年奋斗中总结经验智慧、汲取奋进力量,让历史映照现实、启迪未来。要从新时代中国发展实际出发,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宝库,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持续夯实党的理论创新的思想基础。

(二)秉承“六个必须坚持”的理论特质与鲜明指向

坚持守正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特质。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框架组织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新时代叙事,在新的实践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坚持守正创新,不能陷入抱残守缺、故步自封的思想窠臼,而要“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①。面对当前的复杂形势和新的目标任务,我们既要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正”、社会主义道路方向之“正”,还要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以党的创新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走向纵深。

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鲜明指向。一方面,我们要增强问题意识,以科学理论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解决了许多以往想解决却没有解决的问题,但还有许多新的挑战、矛盾和问题亟待处理。我们要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着眼于现代化强国建设和全面深化改革中遇到的现实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②,加大理论创新力度,在着力解决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中创新理论、检验理论、发展理论。另一方面,我们要以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法积极应对未来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进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我们要为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是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作好充分准备。为此,我们必须开展广泛的社会调查与科学研究,深入把握理论创新规律,在实践中提出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以理论上的清醒赢得未来发展的主动权。

(三)彰显“六个必须坚持”的思想方法与全球视野

坚持系统观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思想方法。面向未来,一方面,我们要着眼整体、统筹全局。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当前,我国很多领域的工作都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各种重大关系盘根错节,调整利益关系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我们要系统把握国内国际两方面大局,既要不断优化顶层设计,又要高度重视实践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从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利益出发谋篇布局、推进工作。另一方面,我们要着眼

^①《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17页。

^②《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81页。

长远、系统谋划。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①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将长期存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任重道远。我们要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战略长远考量,运用系统思维、坚持系统谋划,进一步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以大历史观为指导把握历史规律、掌握发展主动,持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引向新的胜利。

坚持胸怀天下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全球视野。一方面,我们要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化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为人类妥善应对全球性挑战、世界性难题作出新贡献。当今世界,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加深,不稳定、不确定、难预料成为常态,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挑战。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又一个转折点上,我们要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坚持用对话协商来缓和矛盾、凝聚共识;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坚定不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国际社会公平正义。另一方面,我们要致力于为人民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彰显中国国际风范与大国担当。“只有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应变,主动求变,才能与时代同行。”^②我们要顺应历史发展大势,积极倡导并奉行多边主义,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与国际社会一道反对搞“脱钩断链”“小院高墙”,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要尊重文明的多样性,通过高层对话、政党交流、学者互访、民间旅游等加强文明交流互鉴,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贡献新的力量。

责任编辑:潘文竹

The Endogenous Logic, Worldview Essence, and Methodological Requirements of the "Six Commitments"

Wang Zengfu Li Zhichao

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358, China

Abstract: The "Six Commitments" is not only the high condensation of Xi Jinping's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new era, but also the precise expression of his stance and viewpoint. It profoundly addresses China's questions, the world's questions, the people's questions, and the questions of our times. It collectively demonstrates the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logic behind the loc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Marxism, significantly enriching and deepen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governance law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the laws of building socialism, and the evolutionary laws of human society. The commitments provide a principled and elevated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for achieving the Second Centenary Goal and pioneering new frontiers in the loc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Marxism.

Key words: "Six Commitments";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worldview; methodology

①《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96页。

②《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第222页。

以党的自我革命破解大党独有难题： 内在依据、作用机理和实践进路

肖凯强¹ 祝介梅^{2,3}

1.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071; 2. 山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3. 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山东师范大学“四史”教育研究基地, 山东 济南 250358

摘 要: 大党独有难题是影响党长期执政的根本性问题。自我革命作为中国共产党最鲜明品格和最大优势,是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根本之策。以党的自我革命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源于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继承与创新、对党自身历史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反思、对防范化解执政风险挑战的现实思考,归因于自我净化能够为破解大党独有难题营造良好政治生态、自我完善能够为破解大党独有难题奠定坚实制度保障、自我革新能够为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提供充足活力因子、自我提高能够为破解大党独有难题锻造强大能力本领。在新征程上,必须要坚守自我革命的政治方向、淬炼自我革命的思想武器、完善自我革命的制度规范体系、锻造勇于自我革命的干部队伍,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实现大党独有难题的有效破解。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自我革命; 大党独有难题; 长期执政

中图分类号: D26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 (2025)02-0010-12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中不仅面临着同一般政党一样的“共有难题”,也面临着许多其他政党未曾遭遇的“独有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号召全体党员“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①;并在党的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明确指出,“六个如何始终”就是“我们这个党必须解决的独有难题”^②。这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居安思危的思想自觉和管党治党的责任担当。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的鲜明特质,是党能够始终永葆生机与活力的力量源泉,更是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行动指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必然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这就决定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毛泽东关于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20BKS020)和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山东革命根据地卫生防疫史料整理与研究”(24DDJJ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肖凯强,男,山东滨州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党的建设研究;祝介梅,女,山东威海人,历史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山东师范大学“四史”教育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研究。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3页。

②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18页。

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① 在新征程上,深刻理解以党的自我革命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内在依据和作用机理,探究以党的自我革命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实践进路,对于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有着重要意义。

一、新时代以党的自我革命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内在依据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党的领导和建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敢于刀刃向内破除顽瘴痼疾,以党的自我革命着力增强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历史主动和政治能力,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继承与创新,也是对党自身历史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反思,更是对防范化解执政风险挑战的现实思考。

(一)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继承与创新

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后来经过各国无产阶级政党不断发展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国家、社会和提高自身生机与活力的学说。^② 强调党的建设的革命性和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壮大动力源泉,而这种革命性和批判性,突出表现为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始终的自我革命精神品质。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其革命活动中通过“经常自我批判”以及时发现自身“行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③,在自我反思、自我纠正中实现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这种自我批判的精神在马克思主义政党改造主观世界的过程中铸就了其勇于自我革命的政治品格。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缔造者,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自我革命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中的作用,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④。列宁同样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勇于自我批判,他认为“共产党人的责任不是隐讳自己运动中的弱点,而是公开地批评这些弱点,以便迅速而彻底地克服它们”^⑤,并且进一步指出“不怕承认自己的错误,不怕三番五次地做出努力来改正错误,这样,我们就会登上山顶”^⑥。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显著标志就是勇于自我革命,善于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锐利武器来实现自我净化和自我革新,在及时破除各种弊病的过程中实现发展和壮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向党内的顽瘴痼疾开刀,提出了一系列以党的自我革命着力解决党内突出问题的新理念、新论断,将彻底的批判和革命辩证法精神贯彻于党建思想之中,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创新发展。

(二)对党自身历史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反思

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史和执政史,在本质上就是一部不断通过自我革命破解各种困难挫折而走向

① 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354页。

② 韩强、樊淑珍:《习近平党建思想: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发展的新阶段》,《党政研究》2023年第6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7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71页。

⑤ 《列宁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35页。

⑥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66页。

成熟和强大的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历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曾出现过很多的错误和失误,遭受过惨重的损失,但是,中国共产党能够一次又一次地战胜困难和挫折,实现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党“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大革命的失败,中国共产党紧急召开“八七会议”,不仅及时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而且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基础上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②,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地位,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③;为彻底肃清党内存在的“左”倾和右倾错误思想,中国共产党依靠自身力量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这既是一场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又是一场思想上的自我革命运动,实现了对党内以往一系列错误思想的彻底清算,为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由局部执政的党变为全国执政的党,骄傲自满的情绪、官僚主义的作风、思想不纯等问题在党内表现突出,为此,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先后开展了整风整党运动、“三反”运动等,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来革除自身弊病,巩固和强化了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针对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思想以及“两个凡是”思想的禁锢,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展了一场思想路线上的“革命”运动,通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以自我革命的自觉意识和政治勇气,拉开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序幕。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的自我革命,他号召全党要“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④,这一科学认识正是基于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实践经验深刻反思而形成的。

(三)对防范化解执政风险挑战的现实思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然而,前进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随着世情、国情和党情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从世情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继续发生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泛起,地区冲突、粮食安全、气候变化、能源危机等全球性问题进一步加剧,世界正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个别国家妄图通过各种手段遏制我国的发展,来自外部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从国情看,经过长期的努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非常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科技创新能力不能完全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和社会治理还存在短板弱项,我们正处在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的关键阶段。从党情看,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从根本上扭转了管党治党宽松软的状况,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使党在革命性锻

① 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第325页。

② 本书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第37—38页。

③ 本书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简史》,第60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43页。

造中更加坚强有力、更加充满活力,但是这一时期党执政所面临的“四大考验”日益严峻复杂、“四种危险”更加尖锐凸显,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性解决,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依然存在,新问题新情况不断出现。这些重大风险挑战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必须迈过的一道坎,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必须要“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永远吹冲锋号,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①,才能使党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把中国式现代化宏伟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二、新时代以党的自我革命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作用机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②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品格和最大的优势,也是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活力的动力源泉和根本保障,而“四个自我”作为党的自我革命的核心内涵和实践指向,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及时发现并纠正问题、在变革和超越中实现执政能力整体性提升提供了全新思路和科学路径。这“四个自我”是既各有侧重又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既有破又有立,既有施药动刀的治病之法又有固本培元的强身之举”^③,是新时代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关键所在。

(一)自我净化为破解大党独有难题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

自我净化就是通过过滤杂质、清除毒素、割除毒瘤,不断提升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切实增强党排毒杀菌的政治免疫力,有效抵制各种风险挑战、错误思潮和不良风气的侵蚀,为党革除自身弊病、解决自身难题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从内容上来看,自我净化主要包括政治净化、思想净化、组织净化、作风净化四个方面。

政治净化是为了确保广大党员对正确政治路线的认同和支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被实践证明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路线,这条路线不能偏离、不能动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基本路线是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我们要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兴国之要、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国之路,不能有丝毫动摇”^④,明确了新时代坚持和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加强党的基本路线的学习教育,不仅是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开展的重要保障,更是排除各种错误倾向干扰,实现大党思想、意志和行动统一的根本所在。

思想净化是为了确保广大党员能够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柱,也是保持党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

① 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第354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14页。

③ 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第276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37页。

就会得“软骨病”^①,明确了坚定理想信念是广大党员安身立命的根本。因此,加强党的理论学习,进行有效的党性教育,防止各种腐朽思想和不正之风的侵蚀,使广大党员自觉成为理想信念的坚定信仰者和忠诚实践者,成为确保大党能够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有效途径。

组织净化是为了不断增强党的干部队伍的纯洁性。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新征程上,必须要有一支理想信念坚定、能力素质过硬的干部队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应变局、育新机、开新局、谋复兴,关键是要把党的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好、建设强”^②,明确了一支坚强有力的干部队伍的重要作用。因此,选拔出真正优秀的人才,建立起对腐败变质分子的清理机制,塑造具有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干部队伍,是大党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重要保障。

作风净化是为了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的作风是观察党群关系、人心向背的晴雨表,党的作风正,党和人民就能够同甘共苦,否则就会离心离德。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③,表明了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意义。因此,要以钉钉子精神贯彻中央八项规定,持续整治“四风”,构建党的作风建设的长效机制,切实推动党的作风转变,以优良作风取信于民,确保大党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

通过自我净化,能够切实有效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为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扫清一系列阻碍,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

(二)自我完善为破解大党独有难题奠定坚实的制度保障

自我完善就是通过不断构建系统完备、科学有效的制度体系,健全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运行机制,在补齐短板、强化弱项、固本强基的过程中实现受损肌体的修复,在筑牢制度屏障的过程中提升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推动党的自我革命不断深化,实现大党独有难题的有效破解。自我完善主要侧重于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和党内权力运行机制的完善。

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的根本保障。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并不是各种党内法规文本的简单叠加,而是由各领域各层级党内法规制度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④。这就意味着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特点,是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坚强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形成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机制”^⑤,明确了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完善对于党的自身建设所具有的重大现实意义。因此,努力提升党内法规体系的完整性和整体性,推动党的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成为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重要制度基础。

① 习近平:《坚定理想信念 补足精神之钙》,《求是》2021年第21期。

② 习近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不断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求是》2020年第15期。

③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年,第8页。

④ 《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人民日报》2017年6月26日,第1版。

⑤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65—66页。

党内权力运行机制的加强和完善是防范权力滥用、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有效途径。权力是把“双刃剑”，运用得好可以造福人民，滥用则会危害党和人民的事业，如何保障党内权力的良好运行成为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所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①，明确了要通过完善党内权力运行监督机制来确保权力在法治轨道上有效运行。因此，不断完善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对于确保大党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提升大党的执政能力发挥着巨大作用。

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和权力运行机制的完善，是以制度治党、管权的根本之策，也是密切党群关系的重要方式，在肃清党内腐败现象、强化权力约束的过程中，为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三）自我革新为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提供充足的活力因子

自我革新就是通过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的弊端，革故鼎新、守正创新，推进理论、实践、制度、文化等各方面的创新，激发党的肌体活力，使党能够始终保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良好精神状态，为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提供充足的活力因子。自我革新作为自我革命的重要能力，不仅突出强调推陈出新，还始终要求守望初心，是“守正”与“创新”的统一。

守正即为坚持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始终恪守初心使命。自我革新所革除的是不合时宜、落后腐朽的思想和制度，而对于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必须要始终坚持和弘扬，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②。这就是强调要以守正思维严守共产党人的政治立场和道德底线。自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承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良品格，始终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带领人民群众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巨大成就。在新时代推进党的自我革新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确保大党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筑牢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思想之基。

创新即为用新的理念和手段来解决党内所存在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的历程中，通过自我批判、自我反省提出新思想和新方法以破除各种不合时宜的观念和行为，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关键因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③，明确了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在推动党的建设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理论创新上注重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过程中，创造出新的思想和观念，用以应对复杂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在实践创新中勇于实践、善于实践，在实践中积极纠正各种错误的观念和行为、革除自身弊病，用实践创新的成果回答新问题、解决新矛盾、开拓新境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为新时代破解大党独有难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36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84页。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0页。

题提供了新思路、新途径、新动能,推动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发展进步。

知常明变者赢,守正创新者进。守正与创新作为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思维方式,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新的集中体现,以守正凝心聚魂,以创新激发活力,为新时代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筑牢思想之基、提供强大动力。

(四)自我提高为破解大党独有难题锻造强大的能力本领

自我提高就是要在学习研究和实践磨炼中历练品格、增长才干,克服各种消极思想态度和能力不足状况,不断提升政治境界、思想境界和道德境界,实现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全面增强,从而确保大党能够始终经受住各种风险挑战的考验、沉着应对各种困难挫折的磨炼。党的自我提高集中表现在学习能力的提升和执政能力的增强两个方面。

学习能力的提升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增强大党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前提和基础。善于学习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总是能够根据不同的时代特点和任务要求,努力倡导和鼓励全党上下开展学习,通过不断完善全党学习的制度机制,确保全体党员学习能力和积极性的稳步提升,不断增强党服务人民、干事创业的能力本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自我提高上下功夫,自觉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①,指明了新时代提升党的学习能力的方式和方法。要自觉向书本学习,重点是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努力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提升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和素养;要自觉向实践学习,坚持在干中学、学中干,尤其要用好调查研究的传家宝,将调查研究的成果转化为务实举措,提升党的实践能力和水平;要自觉向人民群众学习,从人民群众的丰富思想中汲取营养,从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中总结经验,以不断完善和提升自己。在向书本、实践和人民群众的学习中不断增强党的学习能力,是大党永葆生机活力、开创伟大事业的重要依托。

执政能力的增强是党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现实要求,也是提升党的领导力和组织力和号召力的必然要求。一个政党的执政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执政的具体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实现不断增强。自新中国成立起,如何增强党的执政能力便被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从建国初期着重解决干部队伍中的“本领恐慌”到改革开放后着力应对党员领导干部的“能力不足”,锻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干部队伍被视为增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关键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有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②,明确了高素质干部队伍在保障党的长期执政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强化政治理论学习、创新实践锻炼模式和机制,锻造一支素质高、能力强、勇担当的干部队伍,是切实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以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根本组织保障。

以学习能力的提升和执政能力的增强推动党的自我提高,不断提升党长期执政的能力和本领,推动党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向纵深发展,使党的干部队伍的政治素养和能力水平不断得以强化,能够切实提高新时代大党破解独有难题的能力本领。

^① 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第277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66页。

三、新时代以党的自我革命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实践进路

“六个如何始终”作为新时代大党独有难题的集中体现,是党领导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啃下的硬骨头,也是新征程上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努力方向。自我革命作为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是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重要法宝。在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必须要坚守自我革命的政治方向、淬炼自我革命的思想武器、完善自我革命的制度规范体系、锻造勇于自我革命的干部队伍,以党的自我革命这一锐利武器推进大党独有难题的有效破解。

(一) 坚守自我革命的政治方向确保大党团结统一

旗帜鲜明讲政治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政治优势。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表明,只有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才能确保党的团结统一。在继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中,必须要始终坚持根本政治方向,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确保全党始终保持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为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指明实践导向。

坚守自我革命根本政治方向,必须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①。党中央作为全党的大脑和中枢,是否具有权威、能否实现集中统一领导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只有坚定不移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才能使党牢牢把握对各项事业、各方面工作的领导权,充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在新时代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一方面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树立“四个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全体党员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将党的坚强领导作为持续深化自我革命、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坚实政治保证。另一方面,要健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机制,在贯彻党中央的重大方针和决策部署的过程中,各级各部门必须要制定责任清单、建立落实情况报告制度等,形成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工作体系,克服在落实党的决策部署中存在的形式主义、随意变通、阳奉阴违等问题,使党的重大决策部署切实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良方妙药。

坚守自我革命根本政治方向,必须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党最根本、最重要的纪律,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基础。”^②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作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在政治生活中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是党的建设特别是纪律建设的重要抓手,也是坚持党的领导的根本保证。在新时代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一方面要加强党章党规党纪的教育学习,利用“三会一课”、党日活动等组织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学习党章党规党纪的内容,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深刻把握党章党规党纪的深刻内涵,树立起维护党章党规党纪的意识,以铁的纪律和规矩约束自己的言行。另一方面,要狠抓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执行力

^① 习近平:《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求是》2020年第14期。

^②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458页。

度,如果执行党的政治纪律和规矩不严格,就会造成党规党纪成为纸老虎和稻草人,不能对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形成强大的威慑,因此,各级纪检监察部门要坚决落实党规党纪的规定和要求,在巡视和派驻监督的过程中要坚决查处“七个有之”等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突出问题,通过严格执纪让铁的纪律和规矩真正发力生威。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确保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在政治立场、方向和行为等方面始终保持与党中央的高度一致,使自我革命能够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深入推进,为维护大党的团结统一提供了根本保证。

(二)淬炼自我革命的思想武器提升大党思想引领

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升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关键所在,也是淬炼党的自我革命锐利思想武器的重要举措。在新时代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中必须要以思想建设作为先导,以党内集中教育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在不断夯实自我革命思想根基的过程中为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引。

淬炼自我革命的思想武器,必须要以党内集中教育来坚定理想信念。党内集中教育作为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中积累的宝贵经验,是塑造党员干部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法宝,也是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的重要举措。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先后组织开展了六次党内集中教育。虽然每一次的主题和形式有所差异,但都将坚定理想信念作为重要的教育内容,使广大党员干部经受了思想的洗礼,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在新征程上,为淬炼自我革命的锐利思想武器,要继续将加强党内集中教育作为坚定理想信念的关键之举,为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筑牢理想根基。首先,要注重将问题整改与主题教育相结合,党的集中教育要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和全党工作的大局开展,切实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不断检查审视自身工作,切实做到边学边查边改,在不断解决自身问题的过程中使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其次,要着力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围绕理想信念教育加强建章立制工作,不断完善教育领导管理、教育运行和预警以及教育保障激励等机制,为长期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最后,要进一步丰富和创新理想信念的教育形式,发挥新媒体学习平台、红色教育基地等的优势和作用,不断增强理想信念教育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淬炼自我革命的思想武器,必须要以创新理论武装全党。坚持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科学理论。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在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形成了一系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且不断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确保了党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战斗力。在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推进党和国家伟大事业的根本理论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①在新时代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伟大实践中,一方面,广大党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65页。

员干部要加强理论学习,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全面领会新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在学习理论中不断感悟思想指引、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另一方面,广大党员干部要加强理论实践,要把握好新思想中所蕴含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自觉运用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新形势、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切实将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为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和思想引领力。

(三)完善自我革命的制度规范体系强化大党自我约束

制度是管根本、管长远、管大局的,具有全局性、稳定性的特征。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作为实现党的自我革命程序化、科学化和长效化的根本之策,为固化党的自我革命实践经验提供了制度载体,为增强管党治党意识与执纪问责能力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提供了制度支撑。要充分发挥党的自我革命的作用,必须要将自我革命纳入到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上,强化党的自我革命制度保障,健全党内监督制度机制,构建完备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以提升党的自我约束能力,为破解大党独有难题奠定坚实制度基础。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必须要加强党的自我革命制度建设。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初就十分重视自我革命的制度建设,并且将其运用于党内治理之中,这成为中国共产党能够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充满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新时代加强党的自我革命制度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一方面,要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要以建立健全“六大制度”为核心,完善党领导人大、政府、政协等机关团体的制度安排,确保党在各种组织中的领导核心地位,通过修订工作条例不断优化和完善各级党委(党组)的领导制度和工作制度,构建从中央到地方层级分明、职责明确、科学有效的领导体制机制,确保党的领导能够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切实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另一方面,要着力加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坚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抓牢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组织原则,着力加强党的组织法规制度、党的领导法规制度、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制度、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制度等建设,依据实践发展的变化和要求对党内法规中的内容进行及时的修订,尤其注重对其中存在的制度薄弱点进行充实和完善,确保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能够与时俱进、科学规范,真正发挥其规范引导、控制约束、警示告诫、惩治威慑等的重要作用。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必须要健全党内监督制度机制。党内监督是有效遏制权力滥用、贪污腐败等影响党长期执政诸多问题的关键之举,也是保障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稳步发展的重要环节。纵观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建设理论与实践,不断完善党内监督体制机制、与时俱进加强党内监督,是保障党的自我革命的“关键一招”^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要深刻认识到,党内监督是永葆党的肌体健康的生命之源,要不断增强向体内病灶开刀的自觉性,使积极开展监督、主动接受监督成为全党的自觉行动。”^②面对党的历史方位和任务的深刻变化,健全党内监督制度机制对于党在长期执政下深入推进以自我革命破解大党独有难题具有重要意义。一是要坚持和贯彻民主集中制这一加强党内监督的根本制度原则,各级党委(党组)必须要坚持集体领导,落实民主集中制,广泛发扬民

^① 刘红凇、王贺宇:《以党内监督保障党的自我革命》,《理论探索》2022年第3期。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185—186页。

主,防止领导干部独断专行、家长制、一言堂等问题的出现,切实保障广大党员的民主权利。二是完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制度规范,“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清除党内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有力武器”^①,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敢于批评、善于批评,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让党员干部在相互监督中不断清洗思想和行为上的污垢。三是健全党内巡视制度,党内巡视是维护党的纪律、加强党内监督的重要手段,要立足中央、省、市、县四级巡视巡察工作体系,健全上下联动的工作格局,不断创新巡视制度的运行机制,将巡视巡察一体化和多种监督方式相结合,构建起立体监督网络格局,让巡视利剑高悬、震慑常在。

(四)锻造勇于自我革命的干部队伍提高大党治理效能

为政之要,唯在得人。干部队伍作为党的方针路线的具体执行者,其是否具有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品质直接关系到党的自我革命的成效,也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的提高。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是新时代党所面临的重大考验,必须要坚持不懈抓好干部队伍建设,树立起选人用人的正确导向,不断锤炼党员干部过硬的思想作风和能力本领,锻造一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勇于自我革命的干部队伍,才能为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提供坚实的组织基础。

锻造勇于自我革命的干部队伍,必须要树立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从源头上把好干部的质量关,选拔和任用德才兼备的党员干部,是锻造勇于自我革命干部队伍的前提和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五湖四海、任人唯贤,把新时代好干部标准落到实处”^②,明确了新时代选人用人的标准和方向。首先要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在选人用人的过程中,将是否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标准,对存在政治立场不坚定、政治态度不端正等问题的干部实行一票否决,真正把信念坚定、对党忠诚、为民服务、清正廉洁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其次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不断完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健全管思想、管工作、管纪律的从严管理机制,建立干部担当作为的激励和保护机制,推动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使干部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的奋斗精神。最后要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建立经常化、制度化、全覆盖的考核机制,不断优化考核内容,增强考核的针对性,改进考核的手段和方法,以全面准确的考核结果量才选用干部,引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局面。

锻造勇于自我革命的干部队伍,必须要锤炼干部过硬的思想作风和能力本领。政治过硬、本领超强的干部队伍是确保党能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关键所在,也是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重要力量保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是我们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③在新征程上,锤炼干部过硬的思想作风和能力本领以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首先要提高政治素养,狠抓思想教育这个根本,强化政治理论学习,不断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

①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2021年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92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66页。

③ 习近平:《深化改革发挥优势创新思路统筹兼顾 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人民日报》2014年5月11日,第1版。

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和情感认同,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信念上的坚定。其次要完善知识结构,党员干部只有不断优化知识结构、完善知识体系,才能够从容应对当前所出现的一系列具有专业性、关联性等特征的社会问题,因此,党员干部必须要通过提高学习层次、拓展学习领域、增加学习深度,实现自身知识的不断丰富和更新,以更好地胜任领导工作。最后要增强斗争本领,党员干部要敢于直面社会治理中的热点、痛点和难点问题,勇于到困难大、矛盾多的地方打硬仗、啃硬骨头,在重大斗争中练胆魄、磨意志、长才干,增强干部防范化解风险的能力和本领。

“大党独有难题”是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程中所作出的重大科学论断,表明其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管党治党规律和社会建设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把握,揭示了超大规模政党在巩固长期执政地位中提升执政能力所面临的深层次风险和挑战。党的自我革命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的重要历史经验,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识,也是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为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提供了科学思路与行动路径。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要始终坚持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以党的自我革命逐一破解大党独有难题,不仅对于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本领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世界其他大党解决自身难题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责任编辑:潘文竹

Resolving the Unique Challenges of a Major Party through Its Self-Revolution: Internal Logic, Mechanisms,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Xiao Kaiqiang¹ Zhu Jiemei^{2,3}

1. School of Marxism,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2.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3. Research Base for "Four Histories" Education of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Shandong Provincial Research Center for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Jinan 250358, China

Abstract: The unique challenges faced by a major party are fundamental issues affecting its long-term governance. Self-revolution, as the most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 and greatest strength of the CPC, serves as the fundamental solution to those challenges. This approach stems from its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Marxist party-building theory, its summary and reflection on the Party's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s, and its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on preventing and addressing governance risks and challenges. It is attributed to the fact that self-purification creates a healthy political ecosystem to resolve challenges; self-improvement establishes institutional safeguards; self-innovation injects vitality into governance practices; and self-enhancement strengthens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Along the new journey, we must adhere to the political direction of self-revolution, temper the ideological weapons of self-revolution, improve the institutional standard system of self-revolution, and forge a cadre team with the courage to carry out self-revolution so as to maintain the Party's advanced nature and purity, enhance the Party's governing ability and level, and effectively solve the unique problems facing a major party.

Key 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elf-revolution; unique challenges of a major party; long-term governance

周代“从道不从君”的“臣道”论

祁志祥

海南师范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海南 海口 571158

摘要:周代“外王之道”探讨的一个专题是“臣道”。“臣”是协助君主平定天下、为天下苍生服务的“辅翼”,既有“君令臣共”、事君以忠的责任,又有“从道不从君”的权利。周代并未出现“君为臣纲”的单向要求,而是设置了“君义臣忠”的互为因果契约。如果君主失去“仁义”之道,臣子就应当“逆命而利君”;如果君主一意孤行,成为独夫民贼,臣子就有“革命”的权利把他推翻。周代的“臣道”学说从辅君为民的发生机制论及君臣的各自职责,强调匡君之邪、“纳善于君”的谏诤之道才是真正的“忠臣”之道。其核心主张是:“忠臣”所忠,应是国泰民安之道;明君行道,就从道忠君;昏君悖道,就从道逆君。周代的“臣道”学说奠定了中国古代外王之道中的民本基石和对君主的制衡机制,为现代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思想资源。

关键词:周代;外王之道;臣道;从道不从君;逆命而利君

中图分类号:B221;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25)02-0022-08

周人讨论的“外王之道”,首先是“君道”,其次是“臣道”。“君道”已在另文中探讨^①,本文探讨周代的“臣道”。“臣”是适应君主“为民治乱”、兴利除害的需求设立的,“臣道”是“君道”的延伸,二者具有一致性。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周代的君臣关系是“五伦”中重要的一伦,其伦理关系是君尊臣卑、君令臣共。“臣事君”如同“子事父,妻事夫”一样,是“天下之常道”(《韩非子·忠孝》)。不过,在君尊臣卑的关系中,“臣道”是对君命的绝对遵从吗?不。周人的普遍共识是,对于君主之命只知一味听从,不敢有一点异议,是“谄臣”“谀臣”,骨子里是一心维护私利的“逆臣”。相反,不顾个人安危,对于君主之过失敢于发表批评意见,那才是真正的“忠臣”“良臣”。于是,“从道不从君”,“逆命而立君”,成为周人所论“臣道”的核心思想。

一、周代臣道的产生机制与君臣关系

忠臣所守之“道”,是社稷稳固、生民安康之道。这个崇高的道义,是伴随着“立君以为民”的君主发生机制产生的。《文子·自然》指出:“为天下之民强陵弱,众暴寡,诈者欺愚,勇者侵怯,又为其怀智诈不以相教,积财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齐一之。为一人之明不能遍照海内,故立三公九卿以辅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人的觉醒’:周代思想的启蒙景观”(21FZXB02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祁志祥,男,江苏大丰人,文学博士,海南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主要从事美学、中国思想史研究。

^①祁志祥:《“立天子以为天下”——周代“立君为民”学说的现代性观照》,《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1期。

翼之。”适应生民除暴安良、平均分配生活财富、实现天下安康的需要,君主被民众推选产生了;适应“辅翼”天子“齐一”天下、平定天下的需求,“三公九卿”的大臣又相伴而生。墨子进一步分析说:天子被天下人推举出来后,由于仅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无法治理得了天下,不得不选贤为臣、分封诸侯,共治天下:“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辩,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墨子·尚同上》)“天子既以立矣,以为唯其耳目之请不能独一同天下之义,是故选择天下赞阅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置以为三公,与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天子三公既已立矣,以为天下博大,山林远土之民,不可得而一也,是故靡分天下,设以为万诸侯国君,使从事乎一同其国之义。”(《墨子·尚同中》)诸侯国君对于天子来说是臣子,对于国内民众来说又是君主。国家之大,也是国君一人无法治理的,所以国君又必须设立官长,帮助国君管理国家。“诸侯国君既已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墨子·尚同上》)“国君既已立矣,又以为唯其耳目之请,不能一同其国之义,是故择其国之贤者,置以为左右将军大夫,以至乎乡里之长,与从事乎一同其国之义。”(《墨子·尚同中》)慎到也指出:君主既不可能全知全能,也不可能有三头六臂,任贤为官、借助群臣的力量辅佐自己共同治理天下,是实现天下安康的唯一选择。“廊庙之材,盖非一木之枝也;粹白之裘,盖非一狐之皮也。治乱安危,存亡荣辱之施,非一人之力也。”“治国之君,非一人之力也。”“将治乱,在乎贤使任职。”(《慎子·知忠》)由于官长是君主从为民治乱兴利的大义出发设立的,自然要求官长的一切作为符合、服从君主为民兴利治乱的大义,所以从三公群臣到诸侯大夫,在向天子认可的“义”看齐、“从事乎一同其国之义”这个大方向上是一致的、统一的。

大臣适应君主为民治乱、安定天下的需求而产生,对于芸芸众生而言,他们都是为民做主的“民之主”,君臣关系是一种共治民众的同盟关系。但在君臣之间,又存在着上下级的尊卑关系。“臣”对于“君”而言又是“民”,“君”为“臣”之主。周代形成、出现了“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它以“礼”教的形式规定下来,要求全社会的人各司其职,共同遵守。其中,对君臣关系的要求是:“君君,臣臣。”(《论语·颜渊》,孔子语)君有君道,臣有臣道。一方面,君有发号施令的尊严,臣有执行君命的职责。这就叫“君令臣共”(《左传·隐公三年》)。另一方面,君有仁义的要求,这是“臣忠”“臣行”的前提,所谓“君仁臣忠”(《礼记·礼运》)、“君义臣行”(《左传·隐公三年》)。“君待臣有礼,臣事上以忠。”(《论语·八佾》)如果君主昏庸暴虐,有失仁义之君道,大臣就有权利“从道不从君”(《荀子·臣道》),对君命之过实施谏议。如果君主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大臣可以辞官而去,甚至可以走上“革命”的道路,把君主推翻。这就叫“君不君则臣不臣……上失其位则下逾其节”。(《管子·形势》)“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周代虽然承认君主的权威和“君令臣共”的人伦、礼教法则,出现了“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的“常道”(《韩非子·忠孝》),但并未出现“君为臣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要求。“三纲”的说法直到汉代董仲舒才开始出现。而后班固《白虎通·三纲六纪》云:“三纲者,何谓也?君臣、父子、夫妇也。”《礼纬·含文嘉》云:“三纲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是汉承秦制、进一步加强君主集权的产物。而在封建分权的周代,君臣关系总体来说是健康的、正常的,没有出现大臣无条件服从君主的不合理要

求。正如子可“从义不从父”,臣也可“从道不从君”,这在周代被视为“人之大行也”(《荀子·臣道》)。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

正是在周代这样一种正常、健康的君臣关系中,东周时期诞生了诸子对“为臣之道”,主要是“忠臣之道”的丰富探讨,以及对“佞臣之道”的批判。

二、春秋诸子论“和而不同”的“谏臣”之道

(一)管子

《史记·管晏列传》记载管仲为齐相时,“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齐桓公曾向管子咨询为政“勿失”之道。管子提出向古代圣王学习,虚心听取群臣谏议,建立“啧室之议”制度,鼓励臣民议论政治得失,进而引以为戒:“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于朝,而备讯矣;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诽也;武王有灵台之复,而贤者进也。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通亡)者也。”“人有非上之所过,谓之正士,内(纳)于啧室之议。”“毋以私好恶害公正,察民所恶,以自为戒。”(《管子·桓公问》)齐桓公最终采纳了管子的建议,集思广益,顺应民意,励精图治,成为春秋第一霸主。管子还警示君主:“为人君而不明君臣之义以正其臣,则臣不知于为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则臣不臣。”(《管子·形势解》)

(二)晏子

管子在齐国开辟的这个传统,得到了晏子的继承。管子将如实指出君主过失的人称为“正士”,晏子则称之为“忠臣”。史载景公问晏子“忠臣之行”是怎样的。晏子的回答是:“不掩君过,谏乎前,不华(哗)乎外;选贤进能,不私乎内;称身就位,计能定禄;睹贤不居其上,受禄不过其量……不掩贤以隐长,不刻下以谀上;君在不事太子,国危不交诸侯;顺则进,否则退,不与君行邪也。”(《晏子春秋·内篇问上》之二十)“故忠臣也者,能纳善于君,不能与君陷于难。”(《晏子春秋·内篇问上》之十九)真正的“忠臣”不是“刻下谀上”,掩饰君过,“与君行邪”,而是能从“为民治乱”、天下安康的道义出发,“不掩君过”,“纳善于君”,“顺则行,否则退”,决不与错误的君命或一意孤行的君主同流合污。

首先,“忠臣之道”是与君主“和而不同”之道。“和”不是“同”。不论是非,事事附和君主的意见,与君主保持绝对的同一,这叫“同”。这不是真正的“忠臣”之道。真正的忠臣,与君主的关系是“和”而不是“同”。什么叫“和”呢?“和”是在维护国泰民安这个大方向上与君主保持和谐,但在君命出现错误时能够及时提出不同意见补缺纠偏。“‘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晏子春秋·外篇第七》之五)君臣的关系也应这样处理。“所谓‘和’者,君甘则臣酸,君淡则臣咸”(《晏子春秋·内篇谏上》之十八)。“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晏子春秋·外篇第七》之五)如果“君所谓可”臣“亦曰可”,“君所谓否”臣“亦曰否”,君主的失误就不能得到及时纠正。大臣与君主总是用一个声音说话,就如同“以水济水,谁能食之”?又如同“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晏子由此得出结论说:“‘同’之不可也如是。”(《晏子

春秋·外篇第七》之五)易言之,真正的为臣之道应是“和”而不是“同”。正如美味是各种味道的调和、美妙的音乐是各种音符的组合,和谐的政治也应当是各种意见的综合。

其次,在厘定“和”是忠臣之道的同时,晏子指出:事事附和君主的“同”是“谀臣”之道。“谀臣”表面上附和君主,好像是“忠臣”,实际上陷君于不义,是“逆臣”,晏子明确指出:“君僻臣从谓之逆。”(《晏子春秋·内篇谏上》之七)这些逆臣、谀臣“观上之所欲,而微为之偶;求君逼迹,而阴为之与”,“求上采听,而幸以求进”(《晏子春秋·内篇问上》之二十一),乃是陷君不义、危害国家的“社鼠猛狗”(《晏子春秋·内篇问上》之九),晏子对此给予尖锐批评。晏子批评的“谀臣”,有梁丘据、裔款、会遣、艾孔等人。齐景公游牛山,感叹生命无常,潸然泪下,梁丘据、艾孔也陪着哭泣。景公久病不愈,要杀太史、太祝取悦上帝,梁丘据、会遣就附和说好。景公好色,梁丘据就送去能歌善舞的歌伎。景公爱玩,梁丘据、裔款就给他造出奢靡的宫室。景公嗜酒,梁丘据就深夜陪盏。在所有谀臣中,梁丘据做得最地道,正如景公所感叹:“吾有喜于玩好,有司未能我具也,则据以其所有共我”,“每有风雨,暮夜求必存”(《晏子春秋·内篇谏下》之二十二),夸赞他“忠且爱我”(《晏子春秋·内篇谏下》之二十二)。晏子则不以为然。他提醒齐景公:梁丘据“营君以邪”,何不去除?(《晏子春秋·内篇谏下》之十五)“臣专其君,谓之不忠”,“今四封之民,皆君之臣也,而维据尽力以爱君,何爱者之少邪?四封之货,皆君之有也,而维据也以其私财忠于君,何忠者之寡邪?据之防塞群臣,拥蔽君,无乃甚乎?”(《晏子春秋·内篇谏下》之二十二)庄子也指出:“孝子不谀其亲,忠臣不谄其君”。(《庄子·天地》)

再次,忠臣应当“进不失忠,退不失行”(《晏子春秋·内篇问下》之十八),“不怀暴君之禄,不处乱国之位”(《晏子春秋·内篇问下》之十)。如果与君主“和而不同”的忠心能够为君主所理解,就不顾私利,建言献策,直言君过,纳善于君。如果君主不能理解和接受自己“和而不同”的忠心,就不恋栈位,辞官退隐,守住君子的一份清高。晏子屡言:“士逢有道之君,则顺其令;逢无道之君,则争其不义。”(《晏子春秋·内篇问上》之二十八)“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没其身,行不逮则退,不以诬(欺)持禄;事惰君者,优游其身以没其世,力不能则去,不以谀持危。”“君子之事君也,进不失忠,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隐忠,可谓不失忠;不持利以伤廉,可谓不失行。”(《晏子春秋·内篇问下》之十八)“正士……通则事上,使恤其下,穷则教下,使顺其上;事君尽礼行忠,不求爵禄,不用则去而不议。”(《晏子春秋·内篇问下》之十九)“君子有力于民,则进爵禄,不辞富贵;无力于民而旅食,不恶贫贱。”(《晏子春秋·内篇杂上》之一)“君子怀不逆之君,居治国之位。……不怀暴君之禄,不处乱国之位。”(《晏子春秋·内篇问下》之十)晏子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庄公“众而无义,强而无礼,好勇而恶贤”,“婴言不用,愿请身去”。于是“徒行而东,耕于海滨”(《晏子春秋·内篇杂上》之一),直到庄公被杀。晏子说:“言不用者,不受其禄……吾于庄公行之矣。”(《晏子春秋·外篇第七》之十九)景公时,有人打晏子的小报告,景公信以为真,晏子辞而不为臣,隐退东耕于海滨。直到七年后景公认错恳请,才重新回来任职。景公晚年,为及时享乐,“春夏游猎,又起大台之役”。晏子谏而无果,本着“顺则行,否则退”的理念,又提出辞官:“臣闻忠臣不避死,谏不违罪。君不听臣,臣将逝矣。”景公只好收回成命,改弦更张。(《晏子春秋·内篇谏下》之八)

复次,主张忠臣保持臣子的人格和尊严,“不与乱国俱灭,不与暴君偕亡”(《晏子春秋·外篇第七》之十九)。晏子一方面承认君主有主宰、支配大臣的权力,另一方面,在诸侯争霸的春秋末期,晏子也

强调大臣有“择君而事”、择主而栖的权利。“君者,择臣而使之。臣虽贱,亦得择君而事之。”(《晏子春秋·内篇问上》之二十二)臣子的选择权就是:“君顺怀之,政治(和也、安也)归之”,“见兆则退,不与乱国俱灭,不与暴君偕亡”(《晏子春秋·外篇第七》之十九)。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庄公尚武好色,不听劝告,我行我素,最后被崔杼等人杀害。晏子并不赞成崔杼弑君的做法,但也没有陪同庄公一起死,而是庆幸自己有先见之明,早早离开庄公,远避了灾祸。崔杼杀死庄公后,晏子立崔杼之门,有从者问:是不是跟着庄公一块死呢?晏子的回答是:“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君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孰能任之?”崔杼见到晏子后也羞辱他:“子何不死?”晏子毫无愧色:“祸始,吾不在也;祸终,吾不知也,吾何为死?且吾闻之,以亡为行者,不足以存君;以死为义者,不足以立功。婴岂其婢子也哉?其缢而从之也?”(《晏子春秋·内篇杂上》之二)臣子不是君主的奴婢,君主由于自己的原因而死,咎由自取,臣子不必陪死,完全可以过自己的生活。齐景公曾问晏子忠臣如何事君,晏子明确回答:“有难不死,出亡不送。”景公很不高兴:“君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贵之,君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可谓忠乎?”晏子答:国君“有难”“出亡”,是不采纳大臣善言的结果,大臣如果陪死,那是“妄死”;如果陪亡,那是欺君。“言而见用,终身无难,臣奚死焉?谋而见从,终身不出,臣奚送焉?若言不用,有难而死之,是妄死也;谋而不从,出亡而送之,是诈伪也。”(《晏子春秋·内篇问上》之十九)由此出发,晏子产生了一个革命性的思想:“汤、武用兵而不为逆,并国而不为贪,仁义之理也。”“勇力之立也,以行其礼义也。”(《晏子春秋·内篇谏上》之十六)如果君主失道,臣子高举“仁义”“礼义”的大旗,运用武力手段讨伐、推翻他,不仅不是“逆”,而是正义之举。《晏子春秋》还记载了这样的故事:景公游于麦丘,见到守边的老人,与之攀谈起来,让他说几句祝辞,老人竟然说:“使君无得罪于民。”景公大怒,说:“诚有鄙民得罪于君则可,安有君得罪于民者乎?”晏子谏曰:“君过矣!……敢问:桀纣,君诛乎,民诛乎?”(《晏子春秋·内篇谏上》之十三)君主如果得罪了臣民,臣民就有权利诛杀君主,这是周代“革命”思想的最早记载。

晏子一生辅佐过齐灵公、庄公、景公三朝,辅政长达50余年,其中辅佐景公的时间最长。他在辅佐君主的过程中一直保持“从道不从君”的独立人格,敢谏、智谏、善谏,谏议行则留,谏议废则退,不仅对“忠臣”之道作出了深刻论述,而且很好地践行了这个“忠臣”之道。

(三)其他春秋诸子

晏子提出的“和而不同”的为臣之道,稍后在《墨子》一书记载的墨子与鲁阳文君的一段对话中也可以看到。鲁阳文君请教墨子:“有语我以‘忠臣’者,令之俯则俯,令之仰则仰,处则静,呼则应,可谓忠臣乎?”这与齐景公把事事处处与自己保持绝对同一的梁丘据视为“忠臣”是一个思路。但墨子却说:“令之俯则俯,令之仰则仰,是似景(影也)也;处则静,呼则应,是似响(回声)也。君将何得于景与响哉?若以翟之所谓忠臣者,上有过,则微之以谏;己有善(好的意见),则访之上,而无敢以告(告知他人)。外匡其邪,而入其善。……此翟之谓忠臣者也。”(《墨子·鲁问》)

春秋时期的晋国大夫史黯在辩论什么是“良臣”时也提出了与晏子几乎相同的见解:“夫事君者,谏过而赏善,荐可而替否,献能而进贤,择材而荐之,朝夕诵善败而纳之(早晚讲述善恶成败的事迹给君主听)。道之以文,行之以顺,勤之以力,致之以死。听则进,否则退。”(《国语·晋语九》)

春秋末期,孔子提出“争臣”之道。《孝经·谏诤章》记述说:曾子曰:“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

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则子不可以不爭于父，臣不可以不爭于君。故当不义，则爭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大臣对于君主虽应尽忠，但如果发现君主有“无道”之过，则应当加以谏诤。谏诤不但与忠臣的角色不矛盾，而且是忠臣的应尽职责，而且这也是古往今来的一贯传统。天子身边设有七位诤臣，诸侯身边设有五位诤臣，卿大夫身边设有三位诤臣，这就保证了天子、诸侯、大夫即使失道，也不会失去自己的天下、国家、家园。这是很了不起的思想。它直接开启了荀子的“从道不从君”的“臣道”论。

春秋时期老子有个弟子叫庚桑楚，留下了一部《亢仓子》。此书虽然普遍认为是唐人整理假托，但可参看。《亢仓子》有一篇为《臣道》，将“和而不同”、放言无忌、“纳谏于君”作为国家兴盛时期的“臣道”：“夫国之将兴也，朝廷百吏，或短或长，或丑或美，或怡或厉，或是或非。虽听其言，观其貌，有似不同，然察其志、征其心，尽于为国，所以刚诤不怨，黜退不愕，得其中无违乎理。”反之，如果“朝廷百吏姿貌多美，颜色谐和，词气华柔，动止详润，虽观其貌、听其言有若欢洽，然察其志、征其心，尽在竞位。所以闻奇则怪，见异必愕”，这种朝堂之上群臣为了晋升权位众口一词、唯唯诺诺、谐和同一的气象，恰恰是“国之将亡”的表征。所以说：“荣名而臣人者，心莫若公，貌莫若和，言莫若正。”

三、战国荀子论“逆命而利君”的“忠臣”之道

到了战国后期，《荀子》一书专辟《臣道》篇，对“忠臣之道”作了集大成式的总结。荀子指出：“人臣”总体上分“贤不肖”“吉凶”两大类。“人臣之论也，吉凶、贤不肖之极也。”每一大类中又分几个层次。“不肖”之臣有“态臣”“谄臣”“篡臣”之分。“态臣”即“谄臣”。“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内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难，百姓不亲，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说，善取宠乎上，是态臣者也。”如“齐之苏秦、楚之州侯、秦之张仪，可谓态臣者也”。“态臣”即平庸无能、只懂得献媚取宠的“谄谀之臣”。“逆命而不利君谓之‘篡’。”“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誉乎民，不恤公道通义，朋党比周，以环主图私为务，是篡臣者也。”如“韩之张去疾、赵之奉阳、齐之孟尝，可谓篡臣也”。“篡臣”即不知忠君为公、一心结党营私之臣。“用篡臣者危，用态臣者亡。”所以“不肖”之臣是“凶臣”。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贤臣”。“贤臣”有“功臣”“圣臣”“顺臣”“忠臣”之别。“功臣”即忠君爱民、治国安邦之臣：“内足使以一民，外足使以距难，民亲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爱百姓而不倦，是功臣者也。”如“齐之管仲、晋之咎犯、楚之孙叔敖，可谓功臣矣”。“圣臣”是比“功臣”更高一级的境界：“上则能尊君，下则能爱民，政令教化，刑下如影，应卒遇变，齐给如响，推类接誉，以待无方，曲成制象，是圣臣者也。”“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谓圣臣矣。”又从“从君”与“利君”的不同关系上看，“从命而利君”，谓之“顺臣”；“逆命而利君”，谓之“忠臣”。用“圣臣”“忠臣”者王，用“顺臣”“功臣”者强。所以“贤臣”是“吉臣”。

基于“逆命而利君谓之‘忠’”的认识，荀子将大臣对君主的“忠”解释为“从道不从君”。“忠臣”的表现形态又分别表现为“谏臣”“争臣”“辅臣”“拂臣”。所谏之言“用则可，不用则去”，这叫“谏臣”。“用则可，不用则死”，这叫“争臣”。“率群臣百吏而相与强君矫君，君虽不安，不能不听，遂以解国之

大患,除国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国”,这叫“辅臣”。“能抗君之命,窃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国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国之大利”,叫“拂臣”。“谏臣”“争臣”“辅臣”“拂臣”,是“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与“谏”“争”“辅”“拂”相反的是“谄”“篡”。“谄臣”“篡臣”“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而已耳”,其实是“国贼”。“正义之臣设,则朝廷不颇;谏争辅拂之人信,则君过不犯。”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明主好同,而暗主好独,明主尚贤使能而飡其盛,暗主妒贤畏能而灭其功。”“谏臣”“争臣”“辅臣”“拂臣”只为“明君之所尊厚”,但“暗主惑君以为己贼也”;而那些“偷合苟容”的“谀臣”“国贼”倒很可能被昏君视为国宝。“罚其忠,赏其贼,夫是之谓至暗。”(以上均见《荀子·臣道》)桀、纣就是这样的“暗主惑君”。“桀纣者,其志虑至险也,其志意至暗也,其行为至乱也;亲者疏之,贤者贱之,生民怨之。……身死国亡,为天下之大僇(辱)。”(《荀子·正论》)“汤武之诛桀纣也,拱挹指麾,而强暴之国莫不趋使,诛桀纣若诛独夫。”(《荀子·议兵》)由于汤、武原来是桀、纣的臣子,所以对于汤武取代桀纣,当时有一种“篡位”“弑君”的说法,荀子明确否定这种说法。他指出:“汤、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义,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归之也。桀纣非去天下也,反禹汤之德,乱礼义之分,禽兽之行,积其凶,全其恶,而天下去之也。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故桀纣无天下,汤武不弑君,由此效之也。”“汤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纣者,民之怨贼也。今世俗之为说者,以桀纣为君,而以汤武为弑,然则是诛民之父母,而师民之怨贼也,不祥莫大焉。”“故至贤畴(囊括)四海,汤武是也;至罢(极无才德)不能容妻子,桀纣是也。今世俗之为说者,以桀纣为有天下,而臣汤武,岂不过甚矣哉!”(《荀子·正论》)鉴于臣民“从道不从君”的“革命”权利,荀子引用孔子的一段话告诫君主居安思危:“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荀子·哀公》)

四、结语

从管子、晏子、墨子、史黯、孔子、庚桑楚到荀子,周代政治家、思想家探讨、总结的为臣之道主要有如下几个要点:

(1)人臣分“贤臣”与“不肖之臣”、“忠臣”与“逆臣”。“忠臣”是“吉臣”,是“国之宝”;“逆臣”是“凶臣”,是“国之贼”。(2)“忠臣”是从“利君”的大义出发“和而不同”、敢于“从道不从君”的“逆命”之臣,是奋不顾身、匡君之邪、“纳善于君”的谏诤之臣。(3)“逆臣”是从保护自己的“私利”出发,事事附和君主、“从命而不利君”、与君主保持绝对同一、陷君于难的“谄臣”“谀臣”。(4)由于君为臣主,所以“忠臣”的产生是需要条件的,“君仁”则“臣忠”,“君僻”则“臣从”。所以“谀臣”的产生,根子在“君邪”;“忠臣”的受用,源头在“君明”。“忠臣之道”与“明君之道”或“仁君之道”骨子里是一致的。(5)“忠臣”不可与昏君、僻君同流合污。如果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君主不能接受自己的谏议,为臣者应当选择离开,决不能“与君行邪”。这就叫“顺则行,否则退”“进不失忠,退不失行”。(6)如果君主刚愎自用、一意孤行、众叛亲离,成为独夫民贼,“忠臣”就可以而且应该从“民意”出发替天行道,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暴君。

要之,周代关于“臣道”的基本思想主张,是“忠臣”所忠,是国泰民安之道。明君行道,就从道忠

君；昏君悖道，就从道逆君。周代“从道不从君”的“臣道”学说，为制衡君主独断专行、匡正君主刚愎自用、保证君主最终作出正确决策提供了的思想依据。

责任编辑：侯德彤

Theory of the "Way of Ministers" in the Zhou Dynasty: "Follow the Way Instead of the Ruler"

Qi Zhixiang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aikou 571158, China

Abstract: A key theme in the Zhou Dynasty's discourse on the "Way of external king" was the "Way of ministers". Ministers, as "assistants" who aided rulers in stabilizing the realm and serving the populace, bore dual responsibilities: fulfilling the duty of "obeying the ruler with shared purposes" while retaining the right to "prioritize the Way over blind loyalty to the ruler". The Zhou era did not impose a unilateral demand of "monarch as the supreme authority", but instead established a reciprocal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 of "virtuous rule and loyal service". If a ruler deviated from the Way of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ministers were obligated to "resist unjust orders to benefit the ruler"; if the ruler became a tyrant, ministers held the right to "revolution" to overthrow him. The "Way of ministers" doctrine in the Zhou era emphasized ministers' duty to rectify rulers' errors and "guide the rulers toward goodness", framing remonstrance as the essence of true loyalty. Its core tenet asserts that a "loyal minister" must prioritize the Way of national stability and public welfare. For a wise ruler aligned with the Way, loyalty to the ruler aligned with loyalty to the Way; for a tyrant opposing the Way, loyalty to the Way necessitated resistance to the ruler. This theory laid the people-oriented foundation and the checks-and-balances mechanism for imperial governance in ancient China, offering valuable ideological resources for modern political progress.

Key words: Zhou Dynasty; Way of external king; Way of ministers; follow the Way instead of the ruler; contravene the mandate for the benefit of the ruler

《老子》之“道”的隐喻思维新探

廖 雪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 北京 100872

摘 要: 隐喻思维从根植于人类日常经验基础的喻象出发,以喻象与主旨之间的直接类似为关联,超越融贯地将喻象与主旨共同呈现于主体之中。隐喻思维是《老子》一书中独具特色的论证方式,体现了中国传统原创性、灵活性、超越性的思维模式。纵观全书,《老子》道论有四个主要的隐喻:一为“谷神”喻,以“生”的直接类似,诠释了“道”是宇宙万物生发的总根源,具有生的创造性;二为“橐籥”喻,以“虚”“气”的直接类似,诠释了“道”藏纳万物、动中求本,具有动的恒常性;三为“水”喻,以“柔弱”“处下”“慈悲”的共通性,诠释了“道”善济万物、居下处卑,具有为的至善性;四为“婴儿”喻,以“善继”“处静”“厚德”的感通性,诠释了体“道”之士,与天地合其德,归于生命之本,具有复的自然性。隐喻思维以灵活、原创、超越的优势克服理性思维固定、僵化的困境,使玄妙深邃的“道”更加具有可描述性、可体验性,也是我们重新审视经典文本,更加贴近中国古代文思的形式。同时,隐喻思维重视主体心性的易简体悟,是对理性思维、实践思维大行其道带来的主体性危机的一种补救方案。

关键词:《老子》; 道; 隐喻思维; 非用舌论; 返本开新

中图分类号: B2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 (2025) 02-0030-13

“道”是老子哲学的核心范畴,其意玄妙精微。“道”本不可言说、不可命名,道字本身也只是对“道”的一种符号性描述。然而,“道”的绝对无限性使其自身作为一种指称符号,又是可以被无限命名的。正如钱锺书先生所言,“大道真宰无名而复多名。”《老子》一书的哲学表达是老学研究备受关注的领域,近年来,隐喻思维作为一种哲学表达再度成为老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和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合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①,从认知语言学的视域建构了深刻的隐喻理论,这一理论对理解《老子》哲学思维和哲学语言开出了新的视角。汉学家葛瑞汉认为,《老子》使用隐喻不是为了说明某种抽象思维,而是其本身便是思想。^② 艾兰认为,哲学意义上作为自然规律的“道”,是基于水之溪流的本喻。^③ 由匡钊、李巍、景海峰等学者发起的“哲学修辞与范畴研究”“先秦哲学的隐喻世界和道家之思”学术讨论,呈现了隐喻这个话题的最新研究成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老子哲学与先秦道论研究”(20AZX00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廖雪,女,贵州遵义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政治哲学、先秦儒道哲学研究。

① [美] 乔治·莱考夫、马克·约翰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何文忠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

② [英] 葛瑞汉:《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张海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54页。

③ [美] 艾兰:《水之道与德之端:中国早期哲学思想的本喻》,张海晏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3页。

果。^①此次研讨提出：在什么意义上来讨论隐喻？为什么要讨论《老子》一书的隐喻？如何讨论《老子》的隐喻？这些问题对我们讨论《老子》之“道”的隐喻思维提供了新的思考。也有学者从西方语境下的原始思维来研究中国传统的隐喻思维、象思维。^②对此，颇有商榷的余地。

就目前而言，学界循着以上研究思路，颇有理论创获。其研究成果的特征大致表现为：主要围绕《老子》文本中“道”的各种隐喻进行分析，但仍有未竟之处：一，诸如橐籥这个很重要的隐喻，并未关涉到；二，对隐喻和主旨之间内在关联缺乏多角度的分析。基于此，笔者试图从人类日常经验基础以及对此经验的思索展开讨论，较为全面地讨论《老子》一书所举之隐喻，揭示喻象与其主旨之间深刻的内在关联。

一、以“谷神”喻：生的创造性

“谷神”隐射了“道”作为宇宙万物生发的总根源，类似的表述还有“玄牝”“母”“雌”“门”“根”“本”，皆是以隐喻的形式指向“道”的根源性。然而，尤其要注意的是，这些隐喻性的概念或事物只能部分非全面地显现“道”。每一个隐喻所隐射的“道”之特性只是大全之“道”的一个切面。假使可以全面地隐射“道”，那“道”实际上就是这些隐喻性的事物或概念，隐喻也将失去存在的合理性。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隐喻是如何与“道”相连的？张沛在《隐喻的生命》一书中指出：“隐喻的主旨与载体往往并不对等，二者相差愈远，隐喻内部的‘张力’也就愈大，为此隐喻需要某种‘依据’来维持自身的存在；‘依据’有两种，包括事物间的‘直接类似’或人们对之具有的‘共同心态’。”^③有鉴于此，“道”的哲学意蕴现实上需要通过各种载体来展现，其可能性在于“道”与各种喻象之间的直接类似和共同心态。这种直接类似和共同心态往往根植于人类的日常经验以及对此经验的思索。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老子·六章》）

其一，“谷神”之“谷”有虚无之谷、生养之谷。《说文解字》：“谷，泉出通川为谷，从水半见，出于口。凡谷之属皆从谷。”甲骨文“谷”字由“水”和“口”组成，泉水从山川中流淌出来，又从山口流出就是谷。作为农作物的“穀”产于河谷，因此古人多假借同音的“谷”代替“穀”，“穀”是庄稼粮食的总称。《老子》中所言之“谷”可略从虚无之“谷”、生养之“谷”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虚无之“谷”颇见于王

① 匡钊驳斥了艾兰的相关研究，认为试图寻找一个本喻是巨大误区。他认为应该以概念建构的隐喻机制为讨论的对象，探索研究中国古典理性思维或哲学修辞的可能路径，使其成为一个新的理论增长点。（匡钊：《道家心论的隐喻维度——先秦哲学修辞与概念建构方式举隅》，《天津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李巍认为，我们讨论隐喻的问题，涉及到怎么看待隐喻与分析之间的关系。而且，比起20世纪到现在的“隐喻”研究，还没有实现革命性的突破。“隐喻”作为一种方法、作为一种视域本身，对它的理解还囿于艾兰他们所代表的水平当中。（李巍等：《哲学修辞与范畴研究》，《国学论衡》第十四辑）景海峰认为，隐喻与中国传统思想的起源有关，隐喻的研究对当前中国哲学研究构成一个新的致思方式。（景海峰等：《先秦哲学的隐喻思维与道家之思》，《国学论衡》第十辑）

② 邓晓芒：《从隐喻看逻辑推理的起源——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的启示》，《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③ 张沛：《隐喻的生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页。

弼的《老子道德经注》,“谷神,谷中央无者也。无形无影,无逆无违……”^①(《老子·六章注》,下引该书,只注章次)这是王弼寻“山谷”之象以尽“道”虚无不可名状之意。又如:“不德其德,无所怀也。”(《老子·四十一章注》)王弼用“无所怀”来解释“谷”,所谓“虚怀如谷”,正是虚无之义。王弼以“无”释“谷”实际上源于他以“无”释“道”的玄学思想。成玄英、唐玄宗也认为“谷”有“空”“虚”之义。成氏注:“谷,空虚也。”^②他认为体道之士,“尘累斯尽,心灵虚白,故道德宽旷,包容如谷也”^③;“胜上道德之人,与太虚等量,故能包容万物,若彼空谷也”^④。这不仅说明了空谷为天下苍生之所归,也展现了退身谦下、虚柔容物者的虚容圣道。唐氏注:“谷者,虚而能应者也。”^⑤注重的是“虚而能应”。这与老子所言“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是相契合的。白奚认为《老子》将“虚”进行了关键性的哲学提升,大道无穷的创造力正是由于具有“虚”“无”的特性。^⑥另一方面,生养之“谷”见于河上公注:“谷,养也。”^⑦实际上,作为虚容万物的空谷自然也涵养万物,因为谷得“一”以盈满而永不枯竭。“一”乃“无”乃“道”,空谷衣养万物正在于其空无,彰显的正是:“故有之以利,无之以用。”(《老子·十一章》)“谷”字的生养之义在先秦诸子的思维中就已存在,并非道家独有。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论语·泰伯》)朱熹注:“谷,禄也。”^⑧再如,原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论语·宪问》)朱熹注:“谷,禄也。邦有道不能有为,邦无道不能独善,而但知食禄,皆可耻也。”^⑨对此,正始玄学之士何晏注曰:“谷,禄也。邦有道,当食禄。君无道而在其朝,食其禄,是耻辱。”^⑩荀子也说:“心好利,而谷禄莫厚焉。”^⑪《荀子·王霸》这都是将“谷”作为食禄来讲,皆有生养之义。

其二,“谷神”之“神”乃无形无方、不生不死。《说文解字》:“神,天神,引出万物者。”王弼注:“神,无形无方也。”(《老子·二十九章注》)河上公认为:“神,谓五脏之神。……心藏神。”^⑫司马光:“中虚故曰谷,不测故曰神。天地有穷而道无穷,故曰不死。”^⑬可见,“神”的形象,一是五脏之中枢,二是无形无象,三是不生不死。“谷”中空、处下、容纳万物的形象,隐喻“道”之虚玄、包容、谦柔成为可能。“谷”虽至虚却仍有形,“神”乃无形无方,故“谷神”便是至虚无形、不见其迹、无生无死。不生不死才能得生生不穷,这与“道”的无形无象、永恒无限关联起来。

以“谷神”喻“道”的创生性,是基于先秦时期人们对“谷”和“神”的认知。“谷”由一自然物演变成象形文字,被赋予中空、生养之义。“谷”的具体物象模型在呈现“道”的思想意味上,已有端倪。

① 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8页。

② 《老子道德经义疏》,成玄英疏:《老子集成》第一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第292页。

③ 《老子道德经义疏》,成玄英疏:《老子集成》第一卷,第298页。

④ 《老子道德经义疏》,成玄英疏:《老子集成》第一卷,第318页。

⑤ 《老子道德经义疏》,成玄英疏:《老子集成》第一卷,第419页。

⑥ 参见白奚:《〈老子〉对“虚”“静”的哲学提升》,《哲学研究》2022年第6期。

⑦ 《道德真经注》,河上公注:《老子集成》第一卷,第140页。

⑧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06页。

⑨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49—150页。

⑩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06页。

⑪ 严灵峰编辑:《荀子集成》,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1977年,第146页。

⑫ 《道德真经注》,河上公注:《老子集成》第一卷,第140页。

⑬ 《道德真经论》,司马光:《老子集成》第二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第541页。

“神”则是与中国古代的礼乐文化有关,礼乐源于祭祀,祭祀又与远古的巫文化有关。巫文化具有原始性和神秘性,巫师的功能就是沟通人以外的其它神秘力量,祈求得到人类所需的某种力量,比如起死回生的力量。老子建立“道”的超越性领域必然要突破巫文化的束缚,而这一突破的过程始终与对巫文化的依赖交织在一起。一方面试图以个体的思维之力贯通天人,建立“道”“心”合一的天人关系;另一方面又并未彻底脱离巫文化的影响,借“神”以说“道”。因此,“谷神”与“道”之间存在类似的经验基础,以“谷神”隐喻“道”才成为可能。

其三,“玄牝”“母”“雌”“门”“本”“根”作为词族对“道”之根源性进行了转移和呈现。“牝”的本义是雌、母。《说文解字》:“牝,畜母也。从牛,匕声。”指的是母牛,可引申为生育。“玄牝”指代雌性生殖器。比起“谷神”“溪谷”来,就更加直截了当。^①

“门”“本”“根”在《老子》一书中多次出现。历代注家中,成玄英释“门”为“法门”,唐玄宗释“虚极”为“妙本”,吕祖谦释“根”为“元”。熊十力对《老子》第六章的解释可谓独到:

此第六章。以其冲虚,曰“谷”;以其用之不盈,曰“神”;以其湛兮或存,曰“不死”。三者皆道之相用。玄,冥也。牝,生也。冥然无作而生生不息,故谓“玄牝”。门,玄牝之所由也。本其所由,一极无上,故谓天地之根也。体离常断,故曰“绵绵”。认为老氏言“玄牝”,与《易》言太极义通。

高山之下有谷,谷中央空洞,无所有,故谓之谷也。此以谷为太虚之譬喻,犹《易》之取象也。张子《正蒙·太和篇》曰“太虚为清,清则无碍,无碍故神”云云,此乃祖述老氏神生于虚之旨。神生于虚,故称谷神。元,犹大也。牝者,母性,乃生生之义。此以元牝为生命之譬喻,亦犹《易》之用象也。《大易》以乾为神、为生命,心灵、生命不可离而为二,吾实据《易》义。老子于此等大义犹承《易经》也。问:“《易》以乾为生命、心灵,坤为物质。如此则生命、心灵与物质分开,可乎?”(《十力丛书·明心篇》)

由此可见,“谷神”“玄牝”“母”“雌”“门”“本”“根”皆以象道之体,况道之用,二者之间通过“生”联结在一起。人类“生”所具有的自然基础和人文基础,为体贴“道”之根源性提供了可能性。需要指出的是,自然及人文现象的“生”与“道”之“生”仍然存在巨大的张力。自然现象的生,会产生母与子的相对待关系,在时间的序列中有先有后,展演出系列人文文化。在人文文化语境里,这种有先有后的相对待关系具有伦理规范的要求。“道”的生则没有时间的先后,与所生之“万物”是一体的,只是在逻辑推演上先在于“万物”。因此,体贴“道”之根源性需要超越自然及人文现象之“生”,直达“生”的创造性本质。“谷”“牝”对“道”的根源性意蕴进行了转移,但未能完全再现,老子分别又加了“神”“玄”字,以象“道”之不死之德,深远不可见、不可竭的生生之功用,以明天地万物由此生、由此出之意。

^① 李振纲:《〈老庄易三玄〉浅解》,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8页。

二、以“橐籥”喻：动的恒常性

“橐籥”隐射了“道”藏纳万物、于恒常运动中求其本质的辩证性。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老子·五章》)

“橐籥”在《老子》一书中出现了一次,在隐喻思维这个话题中,它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历代《老子》注疏本大体将“橐籥”解释为冶铁的风箱或笛子,以言天地大道。近代以来,对“橐籥”的研究往往采取组合式结构,延用注疏本的解释。冯友兰认为:“‘橐籥’就是扇火用的风箱,它的中间是空虚的,可是运动起来,可以扇风助火。这个风是没有穷尽的。只要它运动,就有风生出来。”^①但是,“橐”和“籥”本是由不同结构演变而成的相互独立的文字,字义各异,组合式结构难免会导致每一个字最原始的意蕴有所遮蔽。若对“橐”“籥”二字分别辨析,找出“橐籥”与“道”之间的直接类似,许是能更加直接深入地窥见二者之间的关系。

其一,“橐”之贮藏。

在字义上,与“橐”相近的有“囊”“袋”,这三个字之间存在一个历史更替的问题。“‘橐’字在先秦时期使用频率较高。‘囊’在两汉时期用量相对较多,到唐宋元时期,‘袋’逐步冲击了‘囊’的优势地位。明清时期‘袋’就明显占优势地位了,发展到近代汉语时,‘袋’的使用已经普遍化,‘囊’多用于书面语,‘橐’更是基本不用。”^②由此,“橐”的演变呈现出动态更替的特征,理应动态地理解它。

“橐”与“囊”二者常同义连用,泛指袋子、藏匿。𠂔是“橐”字的甲骨文,上端像用绳子扎住,中间呈空鼓状,表示可以储藏物品。古人在造字的时候,特别强调字的形象化,突出它的器物特征。按徐复观的说法,中国人的思维方法是实际的、即物的,表现概念的方法是具象而不喜抽象,象形文字是基本的文字构成方法。^③《说文解字·囊部》:“橐:车上大囊。从囊省,咎声。《诗·周颂·时迈》曰:‘载橐弓矢。’”^④“橐”于器为“弓衣”,于用为“藏纳”。^⑤《诗·大雅·公刘》:“乃裹糒粮,于橐于囊。”^⑥意思是把粮食装在袋子里。《说文·囊部》:“囊,囊也。”“囊,囊也。”《周易·坤·六四》:“括囊;无咎,无誉。”王弼注曰:“括结否闭,闲人乃隐;施慎则可,非泰之道。”^⑦王船山曰:“‘括囊’,藏之固也。”贾谊《新书·过秦上》:“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另外,对王弼“括结否闭”之“否闭”,楼宇烈校释为: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30页。

② 参见杨振华:《常用词“囊、囊、袋”的历史更替及相关问题》,《探讨与争鸣》2017年第1期。

③ 参见徐复观:《徐复观全集》一,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59—69页。

④ 陈戌国点校:《四书五经》,长沙:岳麓书社,1991年,第412页。

⑤ 程邦雄:《释“囊”》,《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2期。

⑥ 陈戌国点校:《四书五经》,第396页。

⑦ 王弼撰,楼宇烈校释:《周易注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3页。

“闭塞,指天地阴阳二气不相交通。”^①这是从《坤》卦的爻位分析而得,表明“囊”字蕴含的信息与天地阴阳二气之间存在相似性。

由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在中国传统思维中,对“橐”的基本经验是储藏东西的器物,其特征是中空。只有保持内部的空虚,才能使储藏功能持续可用,盛放足够多的物品。粮食乃子孙后代生存延续之基本,将粮食装入橐囊中,意味着将民之根本贮藏。天地之道于万物亦然。大道虚极,乃能包通万物,无所不容,无所不包。大道虚极,内无闭塞,则有气相交,相交则有气,相交不止,则气之变化不止。翕辟开合,生生不止。大道衣养万物,长养万物,而不自恃,与万物共时共在。这便是以“橐囊”絪縕事物、含藏阴阳隐喻“道”之虚容万物、生生不止。

其二,“籥”之动中求本。

“籥”是我国远古时期的吹管乐器。^②从音乐视域来讲,“古籥”的意蕴是超越器形的乐律之律,即乐律本质,“籥”是彰显乐律本质的管籥之“籥”。但是“籥”和“龠”的使用边界经常模糊不清。先秦及此后,由于古代文化和音乐的巨大变动,“龠”和“籥”的使用已经混乱,不仅“籥”替代了“龠”的使用,很多注家多以“风箱”“吹火管”注之,特别是汉代之后。王秉义认为:“这是由于汉代发生的龠文化错位,导致人们对龠(籥)的认知产生严重扭曲。”^③对“籥”的解释,古说颇多,历来有三孔、六孔、七孔,单管、编管之争。汉代许慎《说文解字》认为:“龠,乐之竹管,三孔,以和众声也。从品龠。龠,理也。”郭沫若认为,“三孔”应作“三管”理解。^④虽分歧很大,但其主旨是吹奏出“相和”之声,以呈现乐律的本质。

这个乐律本质何指呢?“龠”与“和”为同源词。《说文》:“龠,调也。从龠,禾声,读与和同”;“和,相应也。从口,禾声。”“龠,以和众声也。”可见,“龠”“和”“龠”是层层递进的关系。“龠”用来调和众声。龠之所以能和众声,在于众声皆从同一理。这个理既是无蔽也是遮蔽于某一个声的。就像五声音调中宫、商、角、徵、羽五个不同的音要自然和谐地生出天籁之声,就必须通达于五音,而又不粘滞于五音。此者何也?只有“无”,才能通达而不粘滞,遮蔽也无蔽。何者致“无”?“和”乃能致“无”。因此,这个乐律本质应是“无”。

《老子·五章》中究竟是“龠”还是“籥”?从具体器物形态超离出来通往“道”之本质,是《老子》一书的整体思维倾向,根据这一整体观照足以证明老子是以“籥”为喻求“龠”。明代朱载堉,在其《律吕精义》中指出:“竹音诸器,管为首,籥次之。籥者,五声之主宰,八音之领袖,十二律吕之本源,度量衡权之所由出者也。”^⑤这就给“龠”赋予了普遍性的观念义,使其超越音律而成为一种公共性的符号,成为世间万物之根本。当“龠”成为乐律之本时,就无所谓何声、何音、何律,乃即空、即无,“龠”字已然成为一种观念、一种符号性表达。因此,王弼的“管籥说”当是符合老子本义的,风箱说则次之。

① 王弼撰,楼宇烈校释:《周易注校释》,第16页。

② 刘正国:《笛乎箏乎龠乎——为贾湖遗址出土的骨质斜吹乐管考名》,《音乐研究》1996年第3期。

③ 王秉义:《古龠新探——“龠文化错位”说的提出》,《艺术研究》2007年第4期。

④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一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93—97页。

⑤ 朱载堉撰,冯文慈点注:《律吕精义》,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年,第629页。

“籥”又是如何呈现恒常之动的呢?

“籥”的主要形式是吹籥,《释名·释乐器》:“籥,跃也,气跃出也”。吹则有气,有气则有动,吹不止,气不止,动则恒常。吹“籥”成音也可能与吹火管相关。乐音的产生取诸自然界,取诸人们的日常经验。老子以乐器作喻,可能与他生活的楚地文化有关。籥是一种竹类乐器,百姓使用的火管也以竹为材。这种火管至今在很多地区仍存在,称作“吹火筒”,往里吹气会发出清脆的声音,声音会在管内回旋。那么,“籥”的成声有赖于缓缓吹吸气,流行不断的气在空虚的管内自然摩擦相荡,翕辟往复,声气相辅,生出无尽音声。天地之道亦如此,“天地之间空虚,和气流行,故百物生。”^① 无形、无状、无限之“道”在浩渺虚空中周行不怠、周流六虚,生出世间万物。“籥”还有开启的意思。“籥”与“钥”同,“管籥或作钥。”^② “钥”又称为“管”。郑玄注《周礼·地官·司门》引郑司农云:“管,谓籥也。”^③ 贾公彦疏:“用管籥以启门。”(同上)如前所述,“门”是“道”的一个隐喻,“管籥以启门”便可引申为通过管籥进入“道”的场域。“籥”与“道”的关联,尤要注意王弼注本中的一个表述:“籥,春分之音,万物振跃而出也。”“‘动而愈出,正谓钥耳。’‘钥主出物,故曰辟户,谓之坤矣。’”^④ 可以说是道出了“籥”与“道”的直接类似。总之,无论是音生还是物始,气息之摩擦相荡、阴阳之翕辟往复,皆在于虚而能动,虚与动乃自是如此,非有意求之。自是如此乃能至和,至和乃“兆于幽冥”。

综上,以“橐”“籥”喻“道”之包藏万物、恒常运动成为可能,在于“虚”和“气”。虚而无心,动而能应。空无乃能无穷。橐囊之虚空鼓风不断,管籥之运气音声相和。囊之极便无内无外,籥之极便无音无律。“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即是。囊、籥皆生活之常见物,上至帝王、下至百姓,人人皆有通过此物悟“道”的实践可能。虚无之道即橐籥之中,即空,即无。

三、以“水”喻:为的至善性

“水”隐射了“道”之于人间世“为的至善性”的价值准则。“水”的直接表述在《老子》一文中有两见: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老子·八章》)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谓天下王。正言若反。(《老子·七十八章》)

“几于道”之水,“几”字表明“水”不是“道”,而是无限地接近“道”。“水生万物”表明了水的宇

① 《道德真经注》,河上公注:《老子集成》第一卷,第139—140页。

② 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第16页。

③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82页。

④ 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第16页。

宙创生义,“水之本体为一喻道的本体为一”^①表明了水的本体义。“水”在儒、释、道三家皆有论及,以水比德、以水喻道、以水喻人事^②等很难说是哪一家专属的表述。释家喻至道于水月,明道的玄妙,却是让人生出许多遐想。然而,水这个在日常生活经验中极其常见的现象,是怎么走进哲人的视野,成为对宇宙、人生之回答的呢?又是怎么在人间世具有法则义的呢?

其一,“水”的本义是一种物质,一种自然现象。人类生活经验中,主要从颜色、气味、形态、功能等方面来认知水。水是无色、无臭、无味的,没有自己固定的形态。水的常见功能是清洗污垢、灌溉植物、生津止渴。水因其无色,可以容纳不同的颜色,构成多彩多样的图景。同时,也能抹除色彩,清洗污垢。因其无臭无味,可以包含无限多的气味,在气味的世界中,可以感受到各种生命的痕迹。因其没有自己的形态,可以多样态存在,渗透于一切事物之中。水没有自己的“势”,顺势而动,跟随周遭的状况方圆东西变动无常。因其是各种生命体的必需,故能养育万物。人类生活的每一个当下都与水共在。如此平常之物,古圣先贤以直观体认到抽象理性表达过渡的方式,早已述之。由此构成了人类历史长河中对“水”的文化经验基础。

其二,“水”的文化经验基础。子曰:“知者乐水。”(《论语·雍也》)朱子注曰:“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将知者比作水,水的流动性、通透性被转换为知者的通达无滞碍。“民归之,由水之就下。”(《孟子·梁惠王上》)这里既表明了水就下的特性,又在政治上将民比作水,民对王的归顺如水之就下是自然而然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孟子将人性与自然之水联系在一起。“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衡以水,以绳,正以县。”(《墨子·法仪》)墨家认为办事必须要有法则,方、圆、直、绳、正是五个法则。“直衡以水”指用混有墨和水的绳墨画直线,具有法则的意思。《说文·水部》:“水,准也。”也将水引申为标准、尺度。“水”常与“鉴”相关联,“鉴”本是古代盛水的器物,盛满水可做镜子使用,引申为反观自照,“以水为鉴”就是以水之特性映照自身。《文子》中大讲水之动静清浊,用水的清明来喻人之澄净,认为水之下流,乃是圣人之道。“人莫鉴于流潦而鉴于澄水。”(《文子·守清》)兵家认为:“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谓之神。”(《孙子兵法·虚实》)由此可见,在中华文明的思维体系里,“水”具有多种意蕴。“水”周流不止,通而无碍;“水”清净澄明,映照万物;“水”自发地顺流而下,居下处卑;“水”之柔弱不争,方圆东西之变动无常;“水”之源源不竭,奔流不息;“水”乃生命之源,滋养万物等等皆是对水之文化经验的共同心态。可以看到,在先秦时期,水已经进入人文世界,用以表达人类的理性思维。这种表达的可能性就在于水与某种理性思维之间的直接相似性,正如张立文先生所言:“在某种特殊的物体元素中寻找自然现象的无限多样性的统一。”^③在《老子》一书中,这个统一就是“水”,就是“道”。

其三,“水”的人间世法则义。老子以“水”的七善喻“上善”,诠释“道”的至善性。具体操作一

① 罗安宪:《老子“水几于道”思想解说》,《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6期。

② 刁生虎认为水是中国古代的根隐喻。以水喻道、以水论政、以水谈兵等以自然之水隐喻社会人事的做法是中国古人基本的思维习惯和修辞倾向。(刁生虎:《水:中国古代的根隐喻》,《中州学刊》2006年第5期。)

③ 张立文:《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14页。

是通过方位隐喻将“道”的至善性具体化,二是通过与“水”字相关的族类文字,形成一个以“水”为核心的关联网络进行论证。首先,“上”表方位,有尊、崇、至、极的意味,是一个积极、刚健的字。方位隐喻是指与空间方位有关的隐喻。^①据此“上善”指明的是至尊、至崇、至极的善,是具有普遍性、绝对性、准则性的善。然而,老子话锋一转,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故无尤。”如果用另一个表方位的字来涵括老子所言水的特性,没有比“下”字更合适的了。“下”有贱、去、后、底的意味,是相对消极、柔顺的字。很显然,老子以正言若反的方式以“下”誉“上”,甚至,“上”“下”本身就具有同一性。此类方位性表达在《老子》一书中有很多。其次,“溪”“江海”“川”“谷”“渊”等作为“水”的关联网络,将“道”的至善性具象化为“水”之柔弱、处下、慈爱三个面向,以树立一套人间世的价值准则。推天道以明人事,生命循道以守柔,守柔者生之徒,守柔能胜刚,能体“道”之用(弱者,道之用);循道以处下,处下者性之朴,处下以知上,处下以成其大;循道以慈悲,慈爱者赞天地之化育,顺其性命因任自然,无执无用。

综上,水,从一种自然物质现象,被置于人文世界之中而具有文化属性,再经由理性思维演绎成“几于道之水”,为人间立法。“水”的七善指向“道”的至善,源于“水”与“道”在柔弱、处下、慈悲三个面向的共通性。

四、以“婴儿”喻:复的自然性

从本根论、工夫论至境界论是论证老子道论体系的一种逻辑进路,以“婴儿”喻“道”的境界义——复的自然性,隐射体道之人的精神境界是必然的指向。诚然,婴儿往往是以柔弱不争、纯真自然、生机勃勃的形象出现。^②除此之外,婴儿作为一个基于身体经验的隐喻,是从身体出发去体认本质之道。因此,“婴儿”既有身体的特性,又有道的特性。类似“婴儿”的表述还有“赤子”“愚人”“孩”。

专气致柔,能婴儿乎? (《老子·十章》)

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儻儻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若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飏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老子·二十章》)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为天下谿,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老子·二十八章》)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老子·五十五章》)

圣人之在天下,歙歙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老子·四十九章》)

① [美] 乔治·莱考夫、马克·约翰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何文忠译,第11页。

② 黄克剑以柔、守雌来说婴儿的与世无争。认为老子的“赤子”或者“婴儿”之喻,其所比况或侧重于生机内敛而“精之至”“和之至”,或侧重于“专气致柔”而“守雌”不争,或侧重于恬然自处而“泊焉未兆”,然而所有这些无不生发于“赤子”或“婴儿”所喻示的那种生命的朴浑或天真。(黄克剑:《儒、道“赤子”之喻辨略》,《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其一,婴儿之善继。《周易·系辞上》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从生理上,婴儿的善继是对父母生命的延续,是对宗祖生命的延续。婴儿从父母那里获得生命的因子,代代相传,延绵不绝,共同构成一个氏族、部落、邦国、天下甚至全人类,这是对自然生命的本然追求,是生命的持续生产。从文化心理上,“婴儿”作为新生事物,是对生命的继承,代表了人们对生的畅往。“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老子·五十四章》)祠堂、宗庙、祭祀承载生命相传,婴儿的善继,不仅是对自然生命的延续,也是对先道的传承。婴儿与父母构成生命的无限循环,亦如道之于万物的无限创生。^①“道”无所不至,周行不怠地成济万物,万物之内饱含“道”的因子。父母生育婴儿,婴儿继承父母生命,父母亦由婴儿长成,婴儿亦长成父母。一个体之小生命上下通达,转瞬成为一大生命。天地万物承“道”将“道”的至善性继续推衍,这便是“继之者善也”。“婴儿”之性出于天性,即出于“道”性,推天道以明人事,天道善继,人道即当为善继,天道自然,那么人道亦当为自然。“婴儿”之性混沌一体,不违天性,乃得成性,“婴儿”继天性,乃成此天性,以续天道之善。圣人察“婴儿”之性,体“道”继善。老子云:“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老子·六十七章》)故,老子笔下的圣人体“道”之善继,反战争、反强力,主自然、顺性命,以彰对生命的悲悯。

其二,婴儿之处静。婴儿较之少壮、老耄是柔弱、安静的,婴儿之静,常常让人联想到“安”“和”,再进一步则会想到“藏”。“专气致柔,能婴儿乎?”(《老子·十章》)展现了“柔”是婴儿最原始的生命精神性状,“‘致柔’之‘柔’即是‘柔弱胜强’之‘柔’。此‘柔’的要旨在于‘不争’。”^②《山海经》中多处使用“其音如婴儿”描述各种怪力猛兽的奇力,说明这种柔弱的内在是精纯之气,是能胜刚强之力。“终日号而不嘎,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老子·五十五章》)婴儿日间夜里地哇哇大哭,声音还是那么洪亮,看起来这是一幅热闹不得安宁的画面。实际上,“号而不嘎”的动态背后是内在的安定宁静。“安”有和好不争的意思,“守静”即是“守安”,不与外在人、事、物争夺,避免被伤害的祸患,保全其恒常性。婴儿作为人的最初形态,完整承接天地之德,婴儿法地、法天、法道,终是法其自身,复归其本身的自然之性。何以有“复”呢?老子云:“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老子·十六章》)芸芸万物各返其所始,回到它的本源处即是复。“复”的指向说明了事物本身就有所藏纳,有藏才有复。此藏不是有形之物的储藏,而是虚静的保任。因此,婴儿的处静,即是藏,是对虚静之本根的保任。按河上公的说法,体道之士,“捐情去欲,五藏清静,至于虚极。守清静,行笃厚。”^③能虚能静,才能观万物归其本根,复还性命,与天地同。

其三,婴儿之厚德。“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老子·五十五章》)婴儿的厚德,主要体现在真朴无妄。婴儿的这一特性,在很多文本里都可以找到相关的佐证。如王充《论衡·本性》:“一岁婴儿,

① 史少博从《周易》宇宙论和本体论的双重结构论证了此“生生之理”。参见史少博:《〈周易〉的“宇宙论”和“本体论”》,《东方论坛》2020年第1期。

② 黄克剑:《儒、道“赤子”之喻辨略》,《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③ 《道德真经注》,河上公注:《老子集成》第一卷,第144页。

无争夺之心,长大之后,或渐利色,狂心悖行,由此生也。”《吕氏春秋·具备》:“三月婴儿,轩冕在前,弗知欲也,斧钺在后,弗知恶也,慈母之爱谕焉,诚也。故诚有诚乃合于情,精有精乃通于天。”婴儿没有货利是非,其状态是纯白的。若以《列子·天瑞》中所言:“人自生至终,大化有四:婴孩也,少壮也,老耄也,死亡也。”那么,婴儿就处于人生之最初阶段,此阶段,婴儿与天地之间具有原初的感通性。由上可知,这种原初的感通性是以“真”“诚”为前提来定位的,诚然,“真”“诚”是“道”所具有的特性。随着人生长阶段的次递,纯白不备,此原初感通性越难持守。其原因在于美进、荣利的迷惑,美恶是非的析判之心。体道之士则不然,老子笔下的圣人可谓是苍老的婴儿。苍老是于人的身生命而言,其心生命则如婴儿般真、朴。老子通过“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常德乃足,复归于朴”三个并列的句式,将“婴儿”“无极”“朴”置于“道”这个同一概念域,使“婴儿”躋入了“无极”“朴”这两个概念所含的意义,同时,也是三者之间的互相躋入,共同指向“道”。

综上,从“婴儿”致“道”的进路,是从身体经验出发超越地、创造地直达婴儿这个物象的意指。体道之士察“婴儿”之善继、处静、厚德,复归其真、朴的自然之性,以此证“道”、弘“道”。

五、隐喻思维的现代意义:探赜索隐与返本开新

隐喻思维以其原创性、灵活性、超越性的特征,能更加贴近中国传统的经典文本,揭橥其幽隐之处。在应对理性思维和实践思维带来的主体性危机时,隐喻思维以重视心性的易简体悟,为主体性的确立开出新的道路。“哲学建构意义和知识的方式并非只有逻辑论证一个维度,而是始终存在着一个不可抹杀的、甚至居于根基位置的隐喻维度。”^①这一结论也启示了隐喻思维对于中国哲学研究的意义。

其一,隐喻思维是阐述中国经典文本的原初形式。《老子》首章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用语言来表述和指称的皆非“常道”“常名”。“道”无形无相、无声无臭、无名无实,任何的名称、言语、事物都不能与之准确对应。因此,勉强给它一个字,勉强以直接类似的喻象来表达它。《庄子·则阳》:“有名有实,是物之居;无名无实,在物之虚。可言可意,言而愈疏。”“道之为名,所假而行。”庄子又讲:“道无所不在”,“在蝼蚁”“在稊稗”“在屎溺”(《庄子·知北游》)。在庄子这里,“道”同样是无法用名言实相来把握的,“道”遍在一切事物之中,又不在一切事物之中。孔子与子贡有一段经典对话,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圣人无言,无法以言语观圣人。四时行、百物生,是天理流行自身的澄明昭示。值得一提的是孟子的“以意逆志”:“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孟子对语言、诗歌、诗人意志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辨析。儒家最早论及诗论的文本应该是《尚书·尧典》,其中就提到了“诗言志”。当然,不论是“诗言志”还是“以意逆志”,皆引起了后世很大的争论,对后世的文学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周易·系辞上》:“子曰:书不

^① 牛宏宝:《哲学与隐喻——对哲学话语的思考》,《社会科学文摘》2017年第12期。

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周易·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此一段非常经典地言明了《周易》中言、象、意之间的关系,以及观物取象与观象制器。

纵览中国古代典籍,其思想的基本表达方式并非以概念的逻辑分析为主。按概念的逻辑分析方式,对现实世界的认识、观念世界的构造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然而,中国古代从先秦至明清有论道辩名、宗经正纬、谈玄辨理、译经讲义、谈禅说诗、批诗评文、探赜索隐等根植于中国传统哲思的不同的阐释方式^①。若纯粹以概念逻辑阐释中国古代经典文本、分析中国传统哲思,必然不得其真意。我们这里所讲的隐喻思维将人们的目光从纯粹的事物、名称、言语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具有心性意味的易简体悟,是一种更加贴近中国古代经典文本及传统哲思的形式。具体而言,诉诸于各种具有相似性的经验之物,以整体性、广阔性的思维时空从不同的面向把握“道”的无限广袤。“得鱼忘筌”既是认识“道”的进路,也是切近中国古代经典文本的路径。忽视隐喻思维的分析行为会让道家学说的根底受到冲击,思维方式也会受到冲击。甚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底也是一种冲击。正所谓“才涉唇吻,便落意思,尽是死门,终非活路。”隐喻思维作用的发挥关键在于一个能上通下达的主体。

其二,隐喻思维是应对主体性危机的一种补救方案。隐喻思维在论“道”以及诠释中国古代经典文本上的优势,是理性思维和实践思维所不及的。然而,应当看到的是,每一种思维在根底上诉诸的对象是不同的。隐喻思维面对的是“道”,在《老子》文本中,“道”既与人们的日常经验基础有关,又于此基础上有超越性。括而言之,中学的“道”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根基,突出从心性角度的证悟。理性思维面对的是“逻各斯”,主要以概念的逻辑分析来把握。概念思维或逻辑思维可称为理性思维。^②自亚里士多德创立逻辑学以来,这种思维在西方哲学的历史上影响至深至远,其中,语言以其规定性、稳定性的特征起到重要作用。实践思维面对的是“物质”,将人们的目光拉回现实,体现了以物质、实践为根基的哲学。在这个现实性的地方,一切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由此可见,三种思维方式面对的是不同根基的哲学形态。由于根基的不同,由此推演和建构的哲学体系也不同,所运用的思维方式也不同。如果我们承认人是理性的、实践的、超越的,那么理性思维、实践思维、隐喻思维的分野也不是绝对的。因此,隐喻思维并非反理性斥实践。

理性思维和实践思维现今仍是主流,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现代化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唯理性主义带来的对概念的崇拜,导致人的创造性的持续性压迫,这一点在理论上也受到存在主义、生命哲学、现象学等学派的批评。更有甚者,当概念的抽象脱离了主体时,就是一种毫无生命的纯粹的逻辑范畴,“一切事物都成为逻辑范畴”。就像马克思批判形而上学家那样:“他们在进行这些抽象时,自以为在进行分析,他们越来越远离物体,而自以为越来越接近物体,以至于深入物体。……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经过抽象都可以归结为逻辑范畴,因而整个现实世界都

① 周裕锴在其《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一书中,从阐释学的角度重新审视了中国古代传统学术。针对经学、玄学、佛学、禅学、理学、诗学,概括了从先秦到清代关于理解和解释的一系列重要方法。

② 王树人:《中国象思维与西方概念思维之比较》,《学术研究》2004年第10期。

淹没在抽象世界之中,即淹没在逻辑范畴的世界之中。”^① 在实践上带来的危机则是对技术主义或工具主义的痴迷,进而导致所谓现代性的时代弊病,对人之主体性的戕害是这一时代弊病的突出表现。实践思维以面向现实为根抵,以物质生产实践为其基本活动形式。其弊在于物质生产实践进程中对物质世界的迷恋、崇拜,导致主体与各种关系、物质之间发生不可避免的异化,一切都是异化的痕迹。当理性思维和实践思维迎面相撞时,其危机显而易见。然而,隐喻思维则贯通现实世界和意义世界,将主体纳入其间,重视主体的生命证悟,强调体“道”之士的“与道合一”。因此,隐喻思维关注活泼泼的现实的主体,将主体拯救于工具理性和社会压迫手段的泥沼。隐喻思维也是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关系的思维模式,体现了中国传统哲思的生命意识与价值关怀。

责任编辑:侯德彤

A New Exploration of the Metaphorical Thinking of the "Tao" in *Laozi*

Liao Xue

School of Philosophy, Re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Metaphorical thinking emerges from figural imagery grounded in human daily experience, establishing direct analogical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se images and their thematic subjects to achieve transcendent integration through their co-presentation in cognitive frameworks. As a distinctive way of argumentation in *Laozi*, it embodies the originality, flexibility, and transcend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hought. The Tao discourse in *Laozi* articulates four core metaphors: The "Valley Spirit" metaphor, through the analogy of "generativity," interprets Tao as the cosmic source of creation with generative vitality. The "Bellows" metaphor, mapping "emptiness" and "*qi*", reveals Tao's paradoxical constancy in nurturing existence through dynamic vacuity. The "Water" metaphor, via attributes of "softness", "humility", and "compassion", manifests Tao's supreme benevolence in sustaining all beings. The "Infant" metaphor illustrates the spiritual communicability characterized by "skillful inheritance", "abiding in stillness", and "profound virtue", elucidating how Tao practitioners align their virtues with Heaven and Earth, return to the origin of life, and embody the natural essence of cyclical renewal. By transcending the rigidity of rational paradigms, metaphorical thinking enhances the describability and experiential accessibility of Tao's profundity. This approach revitalizes classical hermeneutics by aligning with ancient Chinese intellectual traditions. Meanwhile, metaphorical thinking emphasizes the easy and intuitive comprehension of the subject's inner nature, and it is a remedial solution to the crisis of subjectivity brought about by the prevalence of rational and practical thinking.

Key words: *Laozi*; Tao; metaphorical thinking; non-use of the tongue theory; return to the roots and open up new horizons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19页。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前沿进展

汪 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 金融研究所, 北京 100710

摘 要:近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和深入。系统梳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概念、基本原理及其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后发现,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金融机构的客服、营销、投顾、风控等业务中已有较多应用。对比中美来看,美国因成熟产业生态和先发技术优势领先,但中国凭借政策支持、垂直场景及以 DeepSeek 为代表的技术突破,正加速缩小差距,形成差异化竞争力。进一步地,深入分析了生成式人工智能促进金融创新的内在机理,并探讨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威胁金融稳定的潜在机制。最后,提出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更好赋能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生成式人工智能;金融大模型;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

中图分类号: F830; TP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5)02-0043-11

2022年11月,美国人工智能实验室 OpenAI 推出的 ChatGPT 类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横空出世,在两月的时间内就收获了超过1亿人次的活跃用户,成为历史上用户数量增长速度最快的应用程序,受到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ChatGPT 大语言模型显著提升了人工智能的认知表达能力和推理迭代能力,不仅使得人工智能成为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动能之一,也带动其成为探索科技产业变革的全新高地和前沿领域,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中美等国在该领域展开激烈竞争,纷纷加紧布局,抢占先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超级计算、传感网、脑科学等新理论新技术的驱动下,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呈现出深度学习、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群智开放、自主操控等新特征,正在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等方面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①

金融行业一直都是先进技术应用的先行者。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计算机、移动互联、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广泛应用,有效推动了金融行业的信息化与数字化发展。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金融自身需要通过科技赋能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大力支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金融资源向现实生产力不断转化。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重点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因此,分析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前沿进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数据库专项“金融科技发展指数及数据库建设”(2024SJK01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汪勇,男,安徽黄山人,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金融科技、宏观金融与经济政策评估研究。

^①《习近平:推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2018年10月31日, http://www.xinhuanet.com/2018-10/31/c_1123643321.htm.

展,深化其金融领域应用,对推动我国科技金融和数字金融实现跨越式发展,以及对建设金融强国、服务实体经济和应对国际竞争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生成式人工智能概述

(一)概念

人工智能概念起源于1956年,该领域技术发展至今已超过60年,但始终未能实现大规模应用,直至生成式人工智能出现,标志着人工智能开启新纪元。人工智能可分为判别式和生成式两种。其中,生成式模式是面向类建立模型,计算基于类的联合概率,然后根据贝叶斯公式分别计算条件概率,进而根据输入数据预测类别。2022年被认为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元年,Dall-E2、Stable Diffusion等文生图应用程序涌现,12月ChatGPT横空出世更是将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提升到了全新高度,能够模拟人类的创造逻辑和创新思维,有望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大幅跃迁。2024年OpenAI发布的人工智能文生视频大模型Sora的问世,标志着人工智能理解真实世界场景并与之互动的能力实现了飞跃。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借助算法突破和算力提升,结合大数据技术从海量数据中开展集中学习与深度学习,构建人工智能的模型和规则,形成文本、图片、声音、视频、代码等多种类型原创内容的生成能力,全面超越了传统软件的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掀起新一轮人工智能技术浪潮。本质上,生成式人工智能强调学习归纳后的演绎创造,通过模仿式和缝合式的生成创作,不断分析、判别、迭代和进化,生成创造出全新内容。

(二)基本原理

根据技术应用路径,生成式人工智能可细分为数据层、算力层、模型层、商业化应用层四个维度。第一,数据层。该层包括数据的搜集、整理、清洗、标注、分析、学习和沉淀等环节。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的诞生需要依托海量的数据资源,以及云计算、云服务和大数据等技术。以GPT-3模型为例,其数据基础来源于8000亿个单词的语料库(约45TB文本数据),最终形成1750亿个参数。第二,算力层。这是生成式人工智能训练的数字基础设施,包括数据中心、服务器和高性能人工智能芯片。根据相关测算,训练一次13亿参数的ChatGPT模型,所需算力约为27.5 PFlop/s-day,即以1万亿次每秒的速度进行计算需要耗时27.5天,而ChatGPT模型单月运营需要算力约为4874.4 PFlop/s-day。第三,模型层。这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关键环节。得益于近年来生成对抗网络GAN模型、Transformer转换器模型、Diffusion扩散模型和预训练模型的快速发展和不断融合,使得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模型实现环节日趋成熟^①。第四,商业化应用层。这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端,也是其最终能否实现大规模应用和真正创造价值的关键环节,覆盖文本、音频、图片、视频等各类原创生成领域。目前,领先人工智能企业已完成标准化产品输出,开始进入商业化探索阶段。

^① 董新义、梅贻哲:《生成式人工智能之规制框架——基于技术风险与专项治理的视角》,《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

二、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主要应用方向及中美发展对比

（一）应用方向

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应用日趋活跃,金融机构探索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业务场景不断落地。ChatGPT 等大模型涌现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推理迭代能力,推动人机交互体验和人工智能泛化能力跃迁,展现出提高工作效率和客户体验的应用前景。从金融业务细分场景看,生成式人工智能已覆盖数据分析、财富管理、银行信贷、保险承保理赔、客户识别、投研投顾、反欺诈、反洗钱和支付等众多领域。根据英伟达对全球 400 家代表性金融机构的调研,2024 年初已有 43% 的机构正在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主要应用于生成报告(37%)、优化客户体验(34%)、生成合成数据(33%)和智能营销(32%)等领域,而余下的 57% 的机构开始考虑研究应用^①。同时,金融业一直是知识密集型、先进技术应用及交互场景丰富的行业,其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的应用需求远超其他行业。

目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主要应用方向,可以概述为智能客服、智能营销、智能业务、智能投顾和智能风控五大方向。

1. 智能客服

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升级金融机构的智能客服系统。多数商业银行打造线上智能客服,向客户提供信息查询、业务咨询、业务办理等服务。传统智能客服系统不仅解放了劳动力和降低了人力成本,而且满足了客户 24 小时无间断金融服务需求,但传统系统也存在一定缺陷,如服务人性化程度不高、服务流程格式化等问题。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能够有效升级传统客服系统,提升系统的智能化水平和人性化程度,继而提升金融服务能力。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借助机器学习技术,能够不断提升自然语言生成与处理能力,更快掌握和熟悉客户的用语习惯和需求表达,更好地处理复杂、模糊或个性化的客户需求输入,提升智能客服的迅速响应能力,继而提供更加准确有效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借助大数据分析和处理技术,能够直接解构和分析客户输入的文字、图片、语音等非结构化数据内容,准确把握客户的真实需求,并借助上下文数据信息进行情感分析,提升人性化金融服务水平。

2. 智能营销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金融机构营销环节,帮助相关营销和渠道团队准确把握客户需求,实现客户精准画像和准确定位,有效提升产品智能营销。一方面,客户存在高度个性化和多元化需求,生成式人工智能借助语料库、训练数据和算力提升,助力快速抓取、分析市场和客户数据信息,实现客户精准画像,更加精准触达客户需求。根据客户的年龄、教育、收入等多元化特征,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实现差异化标签分类,完善客户群体属性标签,开展预训练模型多次迭代,并通过开放 API 调用,对不同群体叠加相关特征,开展客户消费倾向和实际购买力的准确预测,寻找客户属性和需求特征的内在匹配关系。根据匹配效果对不同购买力的客户进行差异化营销,从而精准触达客户群体需求。另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提升金融机构的差异化服务能力,赋能金融营销的生产环节。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营销人员的指令要求,结合客户的历史交互数据和最新的金融产品信息,融入金融

^① NVIDIA:《2024 年金融服务业 AI 现状与趋势》,2024 年, <http://www.sgjbg.com/baogao/605099.html>.

行业新闻动态及热点等,快速迭代营销物料,生成更加个性化、更适合金融营销场景的文案、图像和视频。结合客户多元化标签,生成式人工智能面向不同特征客户智能化推荐差异化营销内容。

3. 智能业务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金融机构具体业务,实现各类业务智能化发展。其一,在证券业务中,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优化交易软件性能。生成式人工智能与交易软件相结合,既有效优化交易软件中的客户搜索功能和互动问答效果,提高操作便捷性和用户体验;还通过自然语言交互功能,以自然语言识别生成各种条件单的交易指令,通过智能化交易系统提高交易准确性,降低人为失误风险。其二,在银行业务中,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提高业务审批的速度和准确度。客户申请的信贷服务或金融产品,必须通过银行的审核评估。传统做法是由银行工作人员进行人工核对,分析此类纸质资料内容,不仅耗费大量时间、效率低下,而且容易出现人为失误导致评估不准确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可以将人工智能模型接入银行操作系统,将贷款申请书、征信报告、调查报告、信贷合同等纸质资料内容,上传至人工智能模型之中。银行利用预训练模型的分析迭代能力,处理信贷业务中涉及的纸质资料评估与合规性审查,快速判断合规风险,智能反馈审批意见,从而提高审批速度和准确度。其三,在保险业务中,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投保承保和理赔业务。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可自动识别和提取信息,提升信息的准确性和高效性,利用在线咨询和智能问答等服务,更智能化与客户互动,更准确理解客户投保意图。根据历史对话、消费记录和购买力分析,提供定制化报价方案,实现精准定价,推荐最匹配客户的保险产品,不断优化产品方案。另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可以强化保险顾问培训。基于大量历史数据,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采用角色扮演、案件准备等情景化教学方式,对保险人员开展职业培训,并在销售过程中针对每个潜在的销售时机给出针对性具体建议。当客户报案时,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可以自动精准识别和提取信息,通过加快损失告知、索赔处理等一系列流程,提高保险理赔的环节效率,加快索赔处理速度,减少失误和避免损失。

4. 智能投顾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客户沟通环节,提升投研投顾效率,辅助生成智能投资建议。一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作为投顾助理服务客户,协助投顾人员在智能系统和客户数据中查询信息和理解客户意图,并能基于与投顾人员的多轮对话,构建用户画像,缩短投顾人员搜集、提炼和总结信息的时间,极大提升投顾人员的工作效率和业绩产出。二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大量浏览和输入国内外行业信息和数据,抽取、提炼和学习关键要素,强化外部公开数据和内部私域数据的训练,自动生成宏观环境、行业、企业各类研究报告。投研分析师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分析报告,结合个人专业判断,实现专业化和个性化的投研报告,大幅缩短投研时间和提升投研效果。三是在强化投顾投研的基础上,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给出针对性的投资建议。生成式人工智能利用大数据开展机器学习,全面了解用户投资意图、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等信息,全方位分析客户需求和市场特征,从而生成智能化投资建议。理财顾问可以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客户描述画像和智能投资建议等信息,快速高效回应客户,实现智能投顾。

5. 智能风控

生成式人工智能强化动态数据实时监控,降低合规风险和防范金融风险。一方面,生成式人工

智能赋能各类金融机构中后台环节,帮助实现数据的采集、清洗、预处理和数据标注,并自动生成代码和代码注释,自动化测试和解决代码问题。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风控人员,开展大量相对规范性文件合同管理和资料搜集整理,进行预模型学习迭代,实现文件合同的智能管理,帮助金融机构更好跟踪合同生命周期,及时处理与提醒客户合同条款的变化,从而提高合同文本质量。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快速解读金融相关法律、合规、政策类文件,帮助中后台管理人员有效审核相关文件,再结合管理人员需求,自动规范生成合同文本、法务报告等,有效降低操作风险和合规风险。另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实时分析海量数据,实时监测风险。生成式人工智能面对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时,均可有效提取关键信息,更快地检索和识别问题,及时向风控人员发出交易警示、合同风险、利率风险和操作风险等,并生成规范性的风控报告,解放针对复杂异常交易的冗长人力分析过程。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辅助风控部门分析关联交易、虚假交易和异常交易等,识别虚假申请、虚假索赔、重复索赔、欺诈行为等异常情况,评估交易预期损失率和潜在风险等,从而快速识别高风险交易并提醒金融机构,帮助其快速采取必要措施方式防止风险爆发。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深度解读征信报告和历史交易信息,协助金融机构更好地评估客户信贷偿付能力,从而降低金融机构面临的信用风险。此外,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协助金融机构,在大量资产价格变动趋势中灵活调整风险管理策略,降低投资组合波动性,减少金融机构面临的市场风险和利率风险。

(二)中美发展对比

当前,中美两国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金融应用领域呈现出差异化竞争格局。美国凭借其成熟的AI产业生态和先发技术优势,在金融大模型的场景覆盖广度与核心业务渗透深度上处于领先地位;而中国则依托本土化数据优势、政策支持及技术迭代加速,在垂直场景创新、可控性技术研发等方面展现出竞争力,逐步缩小与美国的差距。

1. 中国金融大模型的场景拓展与生态构建加速

相较而言,美国依托 BloombergGPT、BondGPT 等专业模型,在投研分析、债券交易等场景形成深度壁垒。不过,中国通过“基础大模型+领域增强”的模式,正在构建差异化竞争力。除商业银行领域外,证券、保险及资管行业的探索初见成效。例如,农业银行 ChatABC 大模型通过知识增强与强化学习技术,不仅实现智能问答服务超 200 万次,还拓展至辅助编程、智能风控等场景;工商银行推出行业通用模型,支撑智能客服、工业工程融资监测等核心业务;蚂蚁集团基于“百灵大模型”升级的“支小宝 2.0”,已覆盖财富管理、保险服务的全流程智能交互。此外,DeepSeek-R1 模型凭借低成本、高推理效率的特性,在金融数据分析、风险评估等场景中展现出商业化潜力,其算法优化使推理成本降至传统模型的 1/256,为中小金融机构技术普惠提供了可能。例如,16 家券商完成 DeepSeek-R1 本地化部署,覆盖信息检索、行业研究等核心业务。

2. 中国借助“政策驱动”与“成本控制”形成差异化优势

美国金融大模型生态以“通用底座+垂直优化”为显著特征,展现出强大的应用能力。例如,彭博社的 BloombergGPT 通过混合通用数据与金融数据进行训练,在行情分析、研报生成等金融场景中表现出色。摩根士丹利则基于 GPT-4 构建投顾助手,利用数十万页内部语料库,实现了投资建议的精准化。美国金融机构更是将大模型贯穿于“营销—投顾—风控—理赔”全链条,如 Broadridge 债券

AI能够实现投资组合的动态优化。相比之下,中国金融大模型在场景协同方面仍显不足,多数机构还处于单点突破的阶段。然而,中国在政策驱动与成本控制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一方面,国家数据标准体系的推进和算力基础设施的建设,如华为存算网协同中心,为大模型提供了坚实的底层支撑。另一方面,中国本土企业通过开源模型适配与轻量化方案,如 DeepSeek 采用 MOE 架构与国产芯片适配,显著降低了技术应用门槛。这些优势为金融大模型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3. 竞争焦点转向“场景深度”与“安全可控”

当前,中美差距正从“技术代差”转向“应用效能”层面。美国在跨领域协同和复杂决策支持方面仍具优势,例如 Broadridge 的 BondGPT 债券投资模型,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为投资者提供精准建议,提升投资决策效率和准确性。OpenAI 与金融机构合作的风险预测系统,利用先进机器学习算法和大规模数据,准确预测市场和信用风险,为金融风险管理提供支持。中国则聚焦于安全合规与动态适应性。例如,马上消费的“天镜”大模型通过“群体智能与安全可控”架构,平衡数据共享与隐私保护,为金融业务提供可靠技术支持;度小满开源的“轩辕”金融大模型,显著提升了研发、客服和智能办公效率,其中研发效率提升 20%,客服效率提升 25%,意图识别准确率达到 97%; DeepSeek 的突破证明了中国在算法创新方面的潜力,尽管受到算力约束,但在复杂科学问题的推理能力上已接近美国顶尖水平。

三、生成式人工智能影响金融发展的理论机制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会对金融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推动金融创新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能够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金融交易成本和运行成本,提高金融运行效率和服务效率。另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可能对金融发展带来威胁和挑战,引发数据安全风险、技术应用风险和金融监管风险。

(一)生成式人工智能促进金融创新的内在机理

1. 缓解信息不对称

客户的金融风险越高,越有可能产生广泛的边际效应,从而引发更多的信用违约和道德风险^①。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深度挖掘分析客户相关信息,能够显著缓解金融领域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一是在强化客户分类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可以精细构建客户画像,有效评估客户贷款风险,缓解银行与客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②。人工智能的高效存储能力,能够解决传统的信贷市场中仅仅依靠客户的财务信息等进行决策的不足。客户的社会关系、网络上留下的数据记录等也是信贷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特别是全球进入智能化时代,网络上的数据记录将日益丰富,更能反映客户的债务偿付能力^③。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有效利用客户社会关系、浏览记录等信息,描述客户千丝万缕的社会联

① Livshits I., Mac Gee J. C., Tertilt M., The Democratization of Credit and the Rise in Consumer Bankruptci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83, no. 4, 2016, pp. 1673–1710.

② Baensens B., Van Gestel T., Viaene S., et al., Benchmarking State-of-the-art Classification Algorithms for Credit Scoring, *The Journal of the Operational Research Society*, vol. 54, no. 6, 2003, pp. 627–635.

③ Lin M., Prabhala N. R., Viswanathan S., Judging Borrowers by the Company They Keep, *Management Science*, vol. 59, no. 1, 2013, pp. 17–35.

系并合理刻画客户特征,全面评估客户的流动性水平和偿付能力,实现精细化的客户画像^①。二是在金融交易过程中,人工智能可以整合金融市场长尾客户群,有效挖掘信贷客户信息,精准匹配中小企业资金需求,提高资金配置效率,缓解信息不对称^②。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相较于传统金融模式,既可以高效地存储数据和管理客户信息,又可以方便高效地实现移动支付和在线结算,这都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③。人工智能将客户画像和数据信息应用于信贷审核中,能够大幅度降低信息不对称,有效缓解信贷违约风险和道德风险^④。三是在强化金融风险防控方面,机器学习在识别财务造假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更精准快速地对财务造假的识别^⑤。有研究认为人工智能能够有效应用于信用风险评估模型,利用机器学习方法强化信用风险影响因子的定量分析效果,结合数字信息资源,提升信用风险评估模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继而缓解信息不对称^⑥。

2. 降低金融交易成本和运行成本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能够基于金融机构和客户两个维度,显著降低金融交易成本和运行成本。

其一,金融机构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有效降低交易成本^⑦。人工智能助力金融业务的流水化操作,涉及客户身份识别、风险控制和智能化交互式等领域,智能化和标准化地处理数据、自然语言与信息资源,带动交易成本显著降低^⑧。金融机构应用数据挖掘、智能识别、大数据等技术,实现金融业务智能化开展,降低了金融机构运行成本。同时,人工智能应用可以降低金融中介交易成本。大数据和区块链等技术的应用,促使金融中介在面对不同交易利益主体时,其所面临的差异化交易成本均能够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⑨。其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带动企业财务和信息成本下降。人工智能技术可简化业务操作和组织流程,提升企业股权和债券融资时的信息披露程度,继而带动财务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程度下降^⑩。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成本,随着其在金融业务和产品增长中的广泛应用,将产生显著的规模效应。特别是通用型 AI 大模型在银行、保险、证券等细分领域的垂直应用,在不断改进模型和提升模型专业性的同时,将带动人工智能边际成本下降^⑪。

① 汪勇、孟香君、沈维萍:《量子计算在经济与金融领域中的应用》,《经济学动态》2023年第1期。

② Tian X., He J. S., Han M., Data-driven Approaches in FinTech: A Survey, *Information Discovery and Delivery*, vol. 49, no. 2, 2021, pp. 123-135.

③ 廖高可、李庭辉:《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应用研究进展》,《经济学动态》2023年第3期。

④ Chade H., Silvers R., Informed Principal, Moral Hazard, and the Value of a More Informative Technology, *Economics Letters*, vol. 74, no. 3, 2015, pp. 291-300.

⑤ Hajek P., Henriques R., Mining Corporate Annual Reports for Intelligent Detection of Financial Statement Fraud—A Comparative Study of Machine Learning Methods, *Knowledge-Based Systems*, vol. 128, no. C, 2017, pp.139-152.

⑥ Berg T., Burg V., Gombović A., et al., On the Rise of Fintechs: Credit Scoring Using Digital Footprints,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vol. 33, no. 7, 2020, pp. 2845-2897.

⑦ 廖高可、李庭辉:《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应用研究进展》,《经济学动态》2023年第3期。

⑧ Arli D., Esch P. V., Bakpayev M., et al., Do Consumers really Trust Cryptocurrencies? *Marketing Intelligence & Planning*, vol. 39, no. 1, 2021, pp. 74-90.

⑨ Philippon T., On Fintech and Financial Inclusion, *NBER Working Paper*, 2020, no. 26330.

⑩ Puschmann T., Fintech, *Business & Information Systems Engineering*, vol. 59, no. 1, 2017, pp. 69-76.

⑪ 廖高可、李庭辉:《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应用研究进展》,《经济学动态》2023年第3期。

3. 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和运行效率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通过金融产品创新、金融模式创新和资源配置效率改善三种方式,显著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和运行效率。

一是基于金融产品视角,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了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金融产品智能化创新,以满足客户的个性化和多元化需求,继而提高金融服务质效^①。人工智能技术不仅能够强化金融产品的个性化服务质效,还能够发挥技术优势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降低同类型产品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②。二是基于金融模式创新视角,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推动了信用中介、交易服务、风险定价、投资决策等金融活动朝着智能化、标准化的方向演进,提升了金融模式智能化发展,继而提高金融服务效率^③。人工智能技术不仅显著提升了在线和移动访问以及第三方支付占比^④,还简化信贷、融资、投资等金融业务的审批流程和时间,共同提升金融服务质效^⑤。例如,同样的贷款条件和风险分析情况下,人工智能技术的贷款审批进度比传统审批流程快20%,显著提升金融业务处理和信用评估效率^⑥。三是人工智能有助于提升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过去面对缺乏抵押担保物的客户申请贷款时,其信用风险和违约概率无法准确评估,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通过大数据建模和机器学习模拟,结合客户相关资产与财务信息,可以在缺乏抵押担保物的情况下,金融机构依然能够进行信用风险和违约概率的智能化评估。人工智能技术完善了社会信用评估和风险评级体系,实现了对客户风险的更精准识别,增加了中小微客户和长尾群体的融资可得性机会^⑦。此外,人工智能不仅具备低成本优势,通过智能化技术以满足长尾客户群体的金融需求,还兼备高效率特征,有效延伸了金融市场的服务边界,拓展了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⑧。

(二)生成式人工智能威胁金融稳定的潜在机制

1. 数据安全风险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引发数据泄漏风险。其一,人工智能商业化价值显著,并且以语言、图像、视频等海量的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作为基础。这就需要借助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技术,面向网络上公开与非公开的海量数据,开展数据的搜集、整理、清洗、标注、处理等工作。由于目前人工智能

① Wang R., Liu J., Luo H., Fintech Development and Bank Risk Taking in China,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Finance*, vol. 27, no. 4-5, 2021, pp. 397-418.

② Shanmuganathan M., Behavioural Finance in an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ongitudinal Case Study of Robo-advisors in Investment Decisions, *Journal of Behavioral and Experimental Finance*, vol. 27, no. 100297, 2022, pp. 1-9.

③ Peng X., Liao Z., Xu N., Quantum Adiabatic Algorithm for Factorization and Its Experimental Implementation,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vol. 101, no. 22, 2008, p. 220405.

④ 廖高可、李庭辉:《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应用研究进展》,《经济学动态》2023年第3期。

⑤ Gomber P., Kauffman R. J., Parker C., On the Fintech Revolution: Interpreting the Forces of Innovation, Disrup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Financial Services,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vol. 35, no. 1, 2018, pp. 220-265.

⑥ Fuster A., Plosser M., Schnabl P., et al., The Role of Technology in Mortgage Lending,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vol. 32, no. 5, 2019, pp. 1854-1899.

⑦ Wang X., He G.,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Farmers'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Sustainability*, vol. 12, no. 4, 2020, p. 100297.

⑧ David B., Daniel S., The Assessmen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Financial Services,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vol. 37, no. 3, 2021, pp. 417-434.

对数据搜集目标的技术规定和限制缺乏明确的要求,在基于海量数据的预训练模型下,可能会导致个人身份和隐私信息、风险偏好与行为特征等敏感数据泄露,引发个人信息安全风险。一些不法分子通过与人工智能模型进行有针对性的对话交流,可能会在信息主体没有防备的情况下窃取个人数据信息,侵犯公民个人隐私。其二,人工智能模型被广泛应用到办公软件和多种语言的编辑中,大部分数据都是以电子数据方式存储于网络空间,“网络黑箱”的存在模糊了现实使用主体对金融大模型的准确把握尺度。金融领域人工智能大模型从各种渠道上搜集和分析的数据、数据库、语料库和学习参数,可能会时刻遭受不明网络的攻击,从而引发个人信息泄露和信息安全风险。

2. 技术应用风险

人工智能技术在金融多元化场景的应用表现出一定的同质性特征,容易引致技术性风险^①。人工智能在金融细分领域的算法运算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叠加数字金融的易变性和内生性特征,容易诱发操作风险传导和技术风险溢出,造成整个金融业务体系陷入瘫痪,甚至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②。在一定设定条件和数据环境的影响下,人工智能金融大模型分析结果具有一定的确定性特征,这使得基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金融分析结论,容易被诱导至“错误”或者固定方向的结果。一旦人工智能金融大模型的底层算法和运算内部工作原理遭到破解,或者数据源和数据信息遭到泄露,就有可能对人工智能模型产生影响,通过实时操纵输入数据流获取控制权,引发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③。

3. 金融监管风险

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并未彻底消除金融业务过程中产生的风险,甚至在某些方面强化了金融业务的监管风险。

一是人工智能技术加剧了经济动荡时期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加大了金融监管难度^④。外部宏观经济环境和金融系统的稳定性越高,越能发挥人工智能模型由数据驱动的智能交易策略的优势。但是,一旦外部宏观经济环境出现变化或金融系统的稳定性遭受冲击,数据驱动的智能交易策略可能愈发不适用,特别是在经济动荡下行时期做出错误决策或者引发“合成谬误”。在经济动荡下行时期,不同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强化逆周期调节操作,人工智能更倾向于降低金融交易频率,反而降低逆周期调节功能和加剧市场风险^⑤。二是人工智能显著增强了金融市场内不同主体关联度,提升了金融混业程度,加大了金融风险传播速度和波及范围,更容易引发聚合共振效应,强化金融风险的易变性、非平衡性和内生性特征,增大了金融风险的传染性和监管难度,造成系统性金融风险在不同国家和经济主体之间的加速扩散^⑥。同时,单个金融机构爆发的金融风险冲击,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下,更容易向金融市场内的其他金融机构传导,造成更加强烈的传染效应^⑦。三是人工智能增强了利益相

① 廖高可、李庭辉:《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应用研究进展》,《经济学动态》2023年第3期。

② Cao L., Ai in Finance: Challenges, Techniques, and Opportunities, *ACM Computing Surveys*, vol. 50, no. 3, 2023.

③ Khiaonarong T., Goh T., Fintech and Payments Regulation: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Journal of Payments Strategy & Systems*, vol. 14, no. 2, 2020, pp. 157–171.

④ 张光君、彭池:《反身法视野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耦合型监管》,《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

⑤ Chemmanur T. J., Imerman M. B., Rajaiya H.,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Fintech Industry, *Journal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vol. 08, no. 01, 2020, pp. 66–67.

⑥ Egger D. J., Gambella C., Marecek J., et al., Quantum Computing for Finance: State of the Art and Future Prospects, Working Papers, in *IEEE Transactions on Quantum Engineering*, vol. 1, Art no. 3101724, 2020, pp. 1–24.

⑦ Benedetti M., Realpe-Gómez J., Biswas R., et al., Estimation of Effective Temperatures in Quantum Annealers for Sampling Applications: A Case Study towards Deep Learning, *Physical Review A*, vol. 94, no. 2, 2016, pp. 1–13.

关者之间的网络化特征。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下各类金融利益主体的网络化特征日趋明显,从而在线联结了各类型的相关金融业务,强化了风险的跨业务、跨市场、跨区域传播,导致金融风险传染性错综复杂^①。

四、推动中国人工智能金融大模型发展的政策建议

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不仅是一项前沿数字技术,更是引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力量,对我国建设金融强国、发展数字经济和应对国际竞争意义重大。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加速技术研发与生态建设,缩小中美核心技术差距

要通过技术突破与生态协同,提升金融大模型的行业渗透率,推动应用场景从基础服务向投研、风控等高价值环节延伸,缩小与美国的技术代差。第一,加大核心技术研发投入。设立国家级金融AI专项基金,重点支持自然语言处理、多模态数据融合、模型可解释性等关键技术攻关,鼓励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联合研发垂直领域的专业大模型(如债券、保险精算等)。第二,构建开放协同的产业生态。推动金融机构与科技企业建立联合实验室,共享数据资源与算力基础设施。例如,可借鉴摩根士丹利与OpenAI的合作模式,鼓励国有银行与国内AI企业联合开发定制化模型。第三,完善技术标准体系。制定金融大模型训练数据、算法透明度和性能评估的国家标准,推动模型接口开放与互操作性,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二)深化应用场景创新,推动金融业务智能化升级

要提升金融业务智能化水平,实现从“单点应用”向“全链路赋能”转型,增强金融机构的差异化服务能力和运营效率。第一,试点示范工程。选取头部金融机构开展智能投顾、动态风控、自动化承保理赔等场景的试点,例如在证券行业推广“AI+交易指令生成”,在保险业试点“智能理赔全流程优化”。第二,鼓励跨场景数据融合。打破部门数据孤岛,推动客户行为数据、市场舆情数据与业务数据的多源整合,支持大模型在客户画像、风险预测等场景中实现跨领域分析。第三,支持中小金融机构上云用数。通过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降低中小银行、保险公司接入AI大模型的成本,推动其利用公有云或行业平台共享模型能力。

(三)构建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体系,防范技术应用风险

生成式AI依赖海量数据训练,但数据泄露、算法黑箱等问题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需平衡创新与安全。要在保障客户隐私的前提下释放数据价值,降低技术滥用风险,增强公众对AI金融服务的信任度。第一,强化数据治理框架。建议出台《金融领域AI数据安全管理办法》,明确训练数据采集范围、匿名化处理标准和跨境流动规则,要求金融机构建立数据分级分类管理制度。第二,推广隐私计算技术。在模型训练中强制使用联邦学习、同态加密等技术,确保客户敏感信息(如征信数据、交

^① Pacelli V., Miglietta F., Foglia M., The Extreme Risk Connectedness of the New Financial System: European Evidenc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 vol. 84, no. C, 2022.

易记录)在不暴露原始数据的前提下完成分析。第三,建立算法问责机制。完善 AI 伦理审查制度,要求金融机构对大模型的关键决策(如信贷审批、投资建议)保留人工复核路径,并定期披露算法的公平性、偏差性评估结果。

(四) 优化动态监管框架,应对新型金融风险

AI 技术的复杂性和关联性可能加剧风险传染,传统监管模式难以适配,需构建敏捷监管体系。要实现监管从“事后处罚”向“事前预防+事中干预”转型,有效防控系统性风险,并为技术创新提供弹性空间。第一,推行“监管沙盒”机制。可在自贸区或金融科技示范区设立 AI 金融创新试验区,允许机构在限定范围内测试高风险应用(如自动化高频交易),监管部门实时监测风险传导路径,同时设定容错阈值与熔断机制。第二,开发智能监管工具。利用大模型构建“AI 监查系统”,自动识别异常交易模式、舆情风险信号,并生成风险预警报告,提升监管穿透力。第三,加强跨部门协同。建立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网信办等多部门联席机制,针对 AI 引发的数据安全、市场操纵等问题制定联合应对预案。

(五) 推动国际合作与标准制定,提升全球话语权

当前美国主导金融 AI 技术标准与伦理规则,中国需通过国际合作避免技术脱钩,同时输出自身实践。应通过规则对接与技术合作,减少国际市场壁垒,提升中国在金融 AI 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和产业链地位。第一,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例如,在 G20、FSB 等平台发起“AI 金融伦理准则”倡议,推动建立模型透明度、算法公平性等全球性规范,争取规则制定主动权。第二,深化技术交流机制。与欧美国家共建联合研究项目,聚焦跨境数据流动、反洗钱 AI 协作等议题,探索互认的模型认证体系。第三,支持企业出海布局。鼓励头部金融机构与科技公司拓展“一带一路”市场,输出智能风控、移动支付等成熟解决方案,打造中国 AI 金融品牌。

责任编辑:孙继国 朱晴晴

Cutting-edge Advances in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Finance

Wang Yong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Banki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10,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led to its increasingly widespread and in-depth applications in the financial field.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laborates on the concept, basic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It finds that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in various business areas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cluding customer service, marketing, investment advisory service, and risk management. However, a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reveals that America maintains its lead due to a mature industrial ecosystem and first-mover technological advantages. However, China is rapidly narrowing the gap by leveraging policy support, vertical-specific scenarios, and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exemplified by Deepseek, thereby developing differentiated competitive strengths. Furthermore,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inherent mechanisms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promoting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discusses the potential mechanisms by which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y threaten financial stability. Lastly, it puts forwar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better empower financial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promotion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Key word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inancial large model; information asymmetry; transaction cost

金融科技对中小企业融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赵金国¹ 刘文雯²

1.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政法学院; 2.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部,
山东 济南 250353

摘要: 中小企业联系千家万户,构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但融资难题长期以来一直是阻碍其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金融科技的迅速发展为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提供了新的解决路径。以 2011—2022 年 A 股上市中小企业为研究样本,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实证分析金融科技对中小企业融资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发展显著提高了企业的融资效率;金融科技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来提高融资效率;良好的企业 ESG 表现强化了金融科技对中小企业融资效率的正向影响;基于内部控制水平的异质性研究发现,金融科技提高融资效率的作用在内部控制水平较低的企业表现得更为明显。

关键词: 金融科技; 中小企业; 融资效率; 融资约束; ESG 表现

中图分类号: F832; F2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 (2025) 02-0054-13

一、引言

中小企业联系千家万户,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为更好地促进中小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机制”^①。然而,相较于大型企业,中小企业更容易遇到资金短缺和经济效益欠缺的困境^②,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已成为阻碍中小企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因此,优化中小企业融资环境、提升融资效率,从而更有效地发挥中小企业在推动经济结构优化、缓解就业难题、改善民众生活及激活市场方面的作用,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③。

近年来,金融科技在提高企业融资效率方面展现出巨大的潜力,并逐渐凸显出其日益重要的角

基金项目: 本文系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人文社科科研平台“公共政策治理研究基地”项目(202302)的阶段
性成果。

作者简介: 赵金国,男,山东安丘人,管理学博士,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政法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绿色发展、教育评价研究;刘文雯,女,山东潍坊人,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部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
科创金融研究。

①《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2024 年 7 月 21 日, 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7/content_6963770.htm。

② 陈春、肖博文:《金融科技对中小企业融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科技与经济》2023 年第 2 期。

③ 吴阳芬、曾繁华:《我国新三板中小企业融资效率测度研究》,《湖北社会科学》2019 年第 1 期。

色。关于金融科技对企业融资效率的影响,已有研究大多从银企信息不对称和金融服务角度进行研究^①。在银企信息不对称角度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认为金融科技的信息处理机制,有助于利用网络中的“软”信息^②,缩减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的信息鸿沟^③,显著缓解了企业面临的融资难题,从而提高企业的融资效率^④。在金融服务角度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认为金融科技的不断崛起能够为企业提供新的金融服务进而提高企业的融资效率。借助先进的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金融科技能够实现金融业务的在线化操作^⑤,将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和产品通过互联网远程提供给企业,为企业提供了新的金融服务和创造新的金融产品^⑥,进而提高了金融企业与金融机构的服务效率^⑦。

以往文献主要集中于研究金融科技通过作用于金融机构从而影响企业融资效率,很少有文献基于微观企业视角研究金融科技对中小企业融资效率影响。有一部分文献是从理论上分析金融科技在缓解企业融资困境方面的潜力及实施路径,而实证方面的深入探讨相对匮乏。此外,在测算融资效率时,国内的相关研究大多运用 DEA 模型,研究对象也多为 A 股上市公司,很少有专门针对中小企业这一群体的聚焦研究。本研究致力于详细分析金融科技对提升中小企业融资效率的作用,以期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境提供新的视角和有意义的洞见。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利用网络数据抓取技术,从百度网站上搜集关于不同地区金融科技的相关网页信息,并将收集到的网页数量作为评估金融科技发展程度的指标,从而为现有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测度研究引入新的观察角度;第二,聚焦于中小企业这一关键经济群体,通过构建金融科技发展水平与融资效率之间的关联模型,实证分析金融科技如何成为推动融资效率提升的关键因素,为破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提供新的思路和解决方案;第三,在影响机制方面,从减轻融资约束角度、企业 ESG 表现角度论证金融科技发展影响中小企业融资效率的作用机制,为促进中小企业融资效率的提升提供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金融科技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效率

融资效率是指企业如何在能力范围内高效且在最低成本的前提下获得企业运营所需要的资

-
- ① 刘琳、赵海旭、王洪伟:《金融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技术创新绩效》,《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24 年第 5 期;周灿灿、谢佩瑜:《金融科技推动下的小微企业融资模式探究》,《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23 年第 7 期。
- ② 周雷、邱勋、刘婧等:《金融科技创新服务小微企业融资研究——基于金融科技试点地区 840 家小微企业的调查》,《西南金融》2020 年第 10 期。
- ③ 宋敏、周鹏、司海涛:《金融科技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赋能”和信贷配给的视角》,《中国工业经济》2021 年第 4 期。
- ④ 刘琳、赵海旭、王洪伟:《金融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技术创新绩效》,《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24 年第 5 期;周灿灿、谢佩瑜:《金融科技推动下的小微企业融资模式探究》,《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23 年第 7 期。
- ⑤ Vincenzo B.,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in the Age of FinTech: P2P Lending and the Reinvention of Banking,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42, no. 1, 2022, pp. 48–75.
- ⑥ 皮天雷、刘焱森、吴鸿燕:《金融科技:内涵、逻辑与风险监管》,《财经科学》2018 年第 9 期。
- ⑦ 李志辉、魏斌、陈海龙等:《金融科技对小微企业融资的影响——基于上市银行的实证分析》,《金融论坛》2024 年第 4 期。

金^①,并将资金发挥其最大的作用。当前实体经济发展仍存在突出的结构性问题,制造业、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型和科技型企业的发展面临着诸多困难^②。与大型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在融资方面面临着一定的局限性,这主要体现在它们通常需要承担更高的融资成本,并且从融资活动中获得的经济效益相对较低。近年来,金融科技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及区块链等先进技术,实现了迅猛的发展^③。有效解决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在中小企业融资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传统的金融服务中,存在着金融机构与企业间较大的信息不对称以及融资渠道单一的问题,这导致了企业融资成本的提升,阻碍了其创新发展步伐。然而,随着金融科技的不断进步,这一困境得到了显著的改善。首先,金融科技的广泛应用建立了更为透明且高效的信息交流渠道,有效减轻了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④。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与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相互融合,在社会各个领域得到了广泛利用,使得相关金融机构可以精准高效地掌握企业的信用情况和还款能力,从而大大减小了贷款的风险和成本^⑤。这不仅增强了金融业为实体经济输入流动性的能力^⑥,还显著优化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效率^⑦,从而为企业融资效率的提升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其次,金融科技的出现极大地拓宽了企业的融资渠道。随着影子银行规模的扩大^⑧,企业融资不再受限于传统金融机构,从而为企业开辟了更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并有效提升了融资效率。除减少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和拓宽融资渠道外,金融科技还能通过多种方式助力中小企业缓解融资难题,包括削减融资成本^⑨、加速融资流程和降低融资门槛^⑩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小企业在融资过程中的压力,提高了融资成功率。综合相关研究可知,金融科技的迅猛发展为中小企业融资效率的提高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基于上述具体分析,提出假设1。

假设1:金融科技的发展有利于提升中小企业的融资效率。

(二)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

融资约束指的是,由于市场自身的不完善,企业从外部获取资金的成本往往高于从企业内部获取资金的成本,较高的成本使得企业难以获得生存发展所需要的资金,进而无法进行最优的投资活

① 郭金录、金宁、张婕等:《科技金融与企业融资效率——来自长三角城市群高新技术企业的经验证据》,《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23年第10期。

② 尹振涛、汪勇:《数字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路径与对策》,《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

③ 高蕊、丘永萍、章苒今:《金融科技能否提高中小企业信贷包容性》,《新金融》2024年第10期。

④ 鲍星、李巍、李泉:《金融科技运用与银行信贷风险——基于信息不对称和内部控制的视角》,《金融论坛》2022年第1期。

⑤ Langley P., Leyshon A., Neo-Colonial Credit: FinTech Platforms in Africa,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y*, vol. 15, no. 4, 2022, pp. 401-415.

⑥ 李学峰、杨盼盼:《银行金融科技与流动性创造效率的关系研究》,《国际金融研究》2021年第6期。

⑦ 刘丹阳、黄志刚:《金融科技、OFDI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视角》,《中国管理科学》2023年第11期。

⑧ Buchak G., Matvos G., Piskorski T., et al., Fintech, Regulatory Arbitrage, and the Rise of Shadow Bank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 130, no. 3, 2018, pp. 453-483.

⑨ 冯学良、周桢、戚馨雨:《金融科技发展与科技中小企业成长——来自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证据》,《技术经济》2023年第11期。

⑩ 谭常春、王卓、周鹏:《金融科技“赋能”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信贷配置与监督的视角》,《财经研究》2023年第1期。

动的情况。在外部融资过程中,金融市场信贷资源稀缺,加之中小企业规模有限、财务报表不够透明等因素,常导致传统金融机构不愿轻易提供资金支持,或者要求企业承担较高的成本才能获得外部资金的注入。这种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就导致了企业的融资约束。在此情境下,企业的业务运营和投资决策都会受到制约,即便面临良好的成长机遇,也可能因资金短缺而不得不放弃^①,进而影响了中小企业在经济和创新层面的可持续发展表现。对于有着较低融资约束的企业,由于其本身有着较高的融资效率和完备的现金流,因此企业能够稳步健康地发展^②。

对于融资约束的研究来看,融资约束限制了企业的融资渠道,迫使其依赖高成本的融资手段,如高利率贷款或债券发行,这不仅提升了企业的融资成本,还降低了融资的效率^③。而金融科技的发展有助于减少企业的融资成本,为企业提供所需的资金流通,从而减轻其融资上的限制。这一变化使得中小企业能够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以实现其高收益项目,最终促进了企业融资效率的提升。具体而言,金融科技的应用极大地推动了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在线化与自动化,显著简化了融资申请与审批流程,有效减少了人力与时间成本,进而降低了企业融资的复杂性和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④。例如,分析蚂蚁金服的小额信贷数据揭示,金融科技审批流程中如果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能够显著减少人为因素的干扰,有效遏制审批环节的权力滥用,并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⑤。综上所述,金融科技的发展通过缩减融资成本并简化融资步骤,对企业的融资效率有着积极的影响。基于上述具体分析,提出假设 2。

假设 2: 金融科技的发展有助于减轻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提升中小企业的融资效率。

(三) ESG 的调节效应

金融科技的发展为企业融资提供了新的渠道和工具,而 ESG 表现作为评估企业综合实力和长期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其在金融科技对企业融资效率中的调节作用也日益受到关注。企业的 ESG 表现是其社会责任和价值观的体现,其优劣直接映射出企业的稳定性、健康发展潜力、合规程度及信誉度。作为一种综合性评估工具,ESG 专注于衡量企业的可持续性和社会责任,对金融科技的创新与进步以及金融行业的正向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⑥。

首先,从价值提升角度来看,良好的 ESG 表现不仅可以提升企业价值,还能为其创新发展开辟新道路^⑦,有助于激励企业实现良性、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⑧。良好的 ESG 表现有助于树立企业的良好

① 梁榜、张建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激励创新吗?——来自中国城市和中小企业的证据》,《当代经济科学》2019 年第 5 期。

② 王静:《金融科技创新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转分析——以破解银企信息摩擦为视角》,《学术论坛》2024 年第 5 期。

③ 邓雪莉:《融资约束对零售业投融资效率的影响分析》,《商业经济研究》2024 年第 12 期。

④ 张波、江泽茹:《数字普惠金融、政府补助与融资约束:来自中小板高新技术企业的经验证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 4 期。

⑤ Whited T. M., Wu G., Financial Constraints Risk,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vol. 19, no. 2, 2006, pp. 531–559.

⑥ 孙光国、曹思宇、安家鹏:《企业 ESG 表现能提高分析师盈余预测质量吗——来自 A 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财经论丛》2023 年第 5 期。

⑦ 方先明、胡丁:《企业 ESG 表现与创新——来自 A 股上市公司的证据》,《经济研究》2023 年第 2 期。

⑧ 王翌秋、谢萌:《ESG 信息披露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基于中国 A 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南开经济研究》2022 年第 11 期。

声誉和品牌形象,而良好的声誉则是金融科技支撑平台或者信贷机构十分注重的方面。其次,在融资方面,良好的 ESG 表现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并提升企业声誉。一个持久有效的 ESG 策略是企业稳健发展的关键因素,它吸引着投资者和观察者的目光,使他们更愿意为 ESG 表现更佳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因此,在金融科技提升融资效率的过程中,有着良好 ESG 表现的企业往往能够借此契机获得更多的融资途径,从而提升企业融资效率^①。这种融资效率的提升,不仅有助于企业优化资本配置,还能加大对技术研发的投资力度^②,进而促进企业的发展。最后,从风险管理角度,ESG 考量使企业能够更好地管理各种风险,包括环境、社会和治理方面的风险。在金融科技平台提供借贷服务的时候,ESG 表现良好的企业更容易获得金融机构的信任和支持^③,从而更容易获得融资^④。综上所述,良好的企业 ESG 表现在金融科技促进企业融资效率的提升中起到促进作用。基于上述具体分析,提出假设 3。

假设 3: 企业 ESG 表现强化了金融科技对中小企业融资效率的正向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 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企业融资效率(FE)

企业的融资效率通常表现为其价值创造的水平,是一个复杂的指标,很难凭借单一指标来准确表达。考虑到企业融资效率的核心要素涵盖三大方面:首要的是力求融资成本的最小化;其次是确保所筹资金能最大化经济效益;最后是获取并有效利用资金时有着较低的财务风险。因此,本文衡量企业融资效率时,综合考虑融资成本(FC)、融资收益(FI)和融资风险(FR)这三大财务指标,融资成本由加权平均资本成本衡量,融资收益由净资产收益率衡量,融资风险由财务风险衡量^⑤。构建如下计算公式(1):

$$FE = FI \times [1 - FC(1 + FR)] \times 100\% \quad (1)$$

2. 解释变量: 金融科技发展指数($Fintech$)

对于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衡量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DIFI$)作为衡量标准^⑥;二是利用爬虫技术构建区域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指数^⑦。本文在进行网络爬取时运用的是百度搜索指数,而不是关键词在新闻中的发布次数,主要考虑到以下两方面原因。第一,百度搜索与金融科技有关的词频可以反映真实的金融科技发展程度。网络搜索数据源自用户需求,适用于现

① 张晨、李理、李博欣:《ESG 表现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融资效率的影响》,《财会月刊》2023 年第 22 期。

② 刘慧、徐悦:《ESG 表现、融资效率与研发投入——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经验证据》,《管理现代化》2024 年第 4 期。

③ 周立、曹嘉仪:《ESG 表现提高了制造业企业融资效率吗》,《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24 年第 6 期。

④ 崔春、祖晓燕:《互联网企业 ESG 报告披露及鉴证研究——基于扎根理论的多案例分析》,《财会月刊》2024 年第 8 期。

⑤ 张玉喜、赵丽丽:《政府支持和金融发展、社会资本与科技创新企业融资效率》,《科研管理》2015 年第 11 期。

⑥ 郭峰、王靖一、王芳等:《测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编制与空间特征》,《经济学(季刊)》2020 年第 4 期。

⑦ 沈悦、郭品:《互联网金融、技术溢出与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金融研究》2015 年第 3 期。

状监测和趋势预测^①；互联网搜索行为作为网络大数据的典型代表,有助于宏观经济预测^②。第二,新闻中的关键词发布次数不能准确到各省份地区各年份,而百度搜索指数能很好地弥补这一缺陷。本文运用 Python 技术,选出特定的关键词库,按省份地区进行相关词频抓取。在时间选取上,由于百度指数相关词频数据仅提供 2011 年之后的,因此本文抓取的时间范围为 2011 年至 2022 年。本文将同一年份同一地级市所有相关关键词的搜索结果数量进行汇总,最终得出搜索总量,再将最终结果取对数,作为最终衡量地区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指标。

3. 中介变量: 融资约束(WW)

本文在衡量企业融资约束水平时选用 WW 指数模型^③。 WW 指数越大,融资约束越高,计算公式如下:

$$WW_{it} = -0.091 \times CF_{it} - 0.062 \times DIVPOS_{it} + 0.021 \times LEV_{it} - 0.044 \times SIZE_{it} + 0.102 \times ISG_{it} - 0.035 \times SG_{it} \quad (2)$$

式(2)中, WW_{it} 为企业的融资约束水平; CF_{it} 表示现金流与总资产比率,即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总资产; $DIVPOS_{it}$ 表示现金股利支付哑变量,当期如果派发现金股利则为 1,否则为 0; LEV_{it} 表示长期负债与资产比率; $SIZE_{it}$ 表示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ISG_{it} 表示行业平均销售增长率,按照 2012 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制造业取两位编码,其他行业取一位编码; SG_{it} 表示销售收入增长率。

4. 调节变量: 企业 ESG 表现(ESG)

企业环境、社会与治理表现(简称为企业 ESG 表现)是当前市场关注的焦点。华证 ESG 评价体系相较于其他评级体系展现出较大的优势,表现为覆盖范围广泛和更新频率及时。因此,本文选择采用华证 ESG 评级数据作为本文的调节变量。华证 ESG 评价体系由高到低共有九个等级,本文为这九个等级分别赋予 9 至 1 的分数,从而代表企业 ESG 表现的相应评分。

5. 控制变量

选取企业规模($Size$)、资产报酬率(Roa)、总资产周转率(ATR)、每股收益(EPS)、城镇化水平($Urban$)^④ 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如下。

(1) 企业规模($Size$),将总资产的单位转化为万元后取对数,以此来衡量公司规模。相比于小型企业,大型企业具备更为充裕的可抵押资产资源,从而降低了银行在向其提供贷款时所面临的信用风险。此外,大型企业在信息披露的范围与准确性方面均超越小型企业,展现出更高的透明度。同时,规模较大的企业往往拥有更强大的产品制造能力,这使得它们的风险抵御能力增加,并使得它们更容易获得融资支持。(2) 资产报酬率(Roa),净利润与平均总资产的比值,综合反映企业利用资产创造净利润的盈利能力。资产报酬率越高,表明企业通过资产配置实现的净收益越高,资产的整体利用效率越强。(3) 总资产周转率(ATR),主营业务收入与总资产的比值,反映了利用资产变现的营运能力。总资产周转率越高,代表企业每单位资产带来的利益越高,企业的资产回报率也越高,企业资

① Ripberger J. T., Capturing Curiosity: Using Internet Search Trends to Measure Public Attentiveness, *Policy Studies Journal*, vol. 39, no. 2, 2011, pp. 239–259.

② 刘涛雄、徐晓飞:《互联网搜索行为能帮助我们预测宏观经济吗》,《经济研究》2015 年第 12 期。

③ 沈坤荣、乔刚、谭睿鹏:《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与就业增长》,《中国工业经济》2024 年第 12 期。

④ 李伟、詹凯敏:《数字化转型与中小企业融资效率——来自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会计之友》2025 年第 4 期;郝海霞、张旭娜、田瑶:《风险投资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理论分析及经验证据》,《西南金融》2025 年第 1 期。

产变现的能力越强,融资效率也越高。(4)每股收益(*EPS*),企业盈利能力是衡量其在特定时期内整体收益状况的关键指标,体现了资本的增值效能。鉴于每股收益为税后利润与总股本的比例,选用每股收益作为评估指标。每股收益的提升意味着企业盈利能力增强,进而表明其融资效率也相对较高。(5)城镇化水平(*Urban*),城镇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用于衡量区域人口结构转型与空间集聚程度的核心指标。城镇化水平提高,反映了区域经济在生产要素配置上的高度集约化能力,往往伴随着基础设施的健全、消费市场的扩大以及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较高的城镇化率借助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间接促进了企业资产周转效率的提升与融资环境的改善,成为衡量区域经济活力与现代发展水平的关键视角。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Obs	mean	sd	min	max
被解释变量	企业融资效率	<i>FE</i>	2918	-0.35	3.59	-13.43	21.13
解释变量	金融科技发展指数	<i>Fintech</i>	2918	7.34	0.84	5.04	8.86
中介变量	融资约束	<i>WW</i>	2918	-0.76	0.47	-15.12	0.00
调节变量	企业 ESG 表现	<i>ESG</i>	2918	0.53	0.24	0.04	1.88
	企业规模	<i>Size</i>	2918	20.84	0.90	18.48	23.33
	资产报酬率	<i>Roa</i>	2918	0.02	0.11	-0.72	0.30
控制变量	总资产周转率	<i>ATR</i>	2918	0.32	0.19	0.01	1.14
	每股收益	<i>EPS</i>	2918	0.19	0.45	-1.46	1.49
	城镇化水平	<i>Urban</i>	2918	0.75	0.15	0.38	1.00

(二)模型设定

本文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来研究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提高是否会促进中小企业的融资效率,并纳入控制变量来消除扰动项与核心解释变量之间的潜在影响,以此确保回归模型的精确度。具体模型构建如下:

$$FE_{it} = \beta_0 + \beta_1 Fintech_{it} + \beta_2 Controls_{it} + \delta_i + \the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3)$$

式(3)中,企业用*i*表示,年份用*t*表示,*FE_{it}*为公司*i*在第*t*年的融资效率;解释变量*Fintech_{it}*表示公司*i*在第*t*年的金融科技发展水平;*Controls_{it}*为控制变量。 δ_i 表示企业个体固定效应, θ_t 表示年份固定效应, ε_{it} 表示随机误差项。

进一步地,为验证*ESG*在金融科技影响中小企业融资效率过程中的调节作用,本文在模型(3)的基础上纳入调节变量及其与解释变量的交乘项,构建模型(4)如下:

$$FE_{it} = \varphi_0 + \varphi_1 Fintech_{it} + \varphi_2 ESG + \varphi_3 FINIC_{it} + \varphi_4 Controls_{it} + \delta_i + \the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4)$$

其中,*FINIC*为对金融科技与*ESG*指标进行去中心化处理后相乘计算所得^①, φ 为待估参数,其他变量的含义与式(3)相同。

(三)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1年至2022年间国泰安数据库中收录的全部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随后,根据2011年工业和信息化部与众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依据营

① 赵金国、王秀丽、李先涛:《绿色技术创新、环境规制对黄河流域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机理》,《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4年第9期。

业收入、资产总额和从业人员数量等核心指标,对各行各业的企业进行了细致的划分与筛选,最终确定了 908 家中小企业作为研究对象。A 股企业的相关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地区城市层面的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数据来源于百度爬取。对原始数据进行以下处理:剔除非正常交易上市公司以及数据缺失的公司,最终得到 908 家企业的 2918 个面板数据。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分析

表 2 为固定效应模型的基准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金融科技对融资效率的影响均至少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两次分析的结果一致地显示出,金融科技的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效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金融科技的进步对提升中小企业的融资效率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假设 1 成立。这说明利用金融科技的一系列顶端技术,能显著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减少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现象,金融机构也能够更加迅速且准确地识别并支持那些具有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有效解决其资金瓶颈问题。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FE	(2) FE
<i>Fintech</i>	1.629** (0.645)	2.162*** (0.550)
<i>Size</i>		0.252 (0.216)
<i>Roa</i>		-14.219*** (0.951)
<i>ATR</i>		-1.630*** (0.587)
<i>EPS</i>		-0.982*** (0.307)
<i>Urban</i>		0.805 (2.453)
常数项	-12.409*** (4.348)	-19.882*** (6.072)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N	2918	2918
R ²	0.058	0.320

注:***、**、* 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 1%、5%、10% 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二) 融资约束的中介作用

考虑到融资约束对企业融资效率具有重要影响,本文聚焦于这一维度,对金融科技提升融资效率的影响进行了深度剖析。表 3 显示了中介效应的结果,95% 置信区间上利用 Bootstrap 方法^①对融

① 孙玉环、许子易、董莹:《中国碳交易价格提高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基于技术进步效应和要素资源配置效应视角》,《统计研究》2025 年第 1 期。

资约束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若 95% 的置信区间不含 0,则表示其直接或间接影响是显著的。根据表 3 结果可知,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95% 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因而可以认为,金融科技对中小企业融资效率的直接作用和融资约束的部分中介效应均显著。综合本部分的验证数据,可以确认假设 2 是成立的。

表 3 Bootstrap 检验

项目	Observed coefficient	Bootstrap std.err.	z	p>z	Normal based[95% conf.interval]	
间接效应	-0.1860705	0.0337225	-5.52	0.000	-0.2521655	-0.1199756
直接效应	-0.7295726	0.148918	-4.90	0.000	-1.021446	-0.4376986

(三)ESG 表现的调节作用

ESG 作为一种评估企业可持续性和社会责任的框架,对金融科技的创新与发展以及推动金融向善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为检验企业 ESG 表现在金融科技提升企业融资效率中的调节效应,运用模型(4)进行回归分析。表 4 第(1)列为基准回归结果,第(2)列结果显示金融科技的系数在 1% 水平显著为正,而 *Fintech* 与 *ESG* 的交互项(*FINIC*)在 5% 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当企业拥有良好的 ESG 表现时,金融科技更能促进企业的融资效率提升,有效验证了假设 3。综上结果表明,ESG 表现作为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责任的衡量指标,在金融科技对融资效率发挥作用的过程中能够起到很好的促进效果,能够帮助企业更好地利用金融科技手段获得更多的融资渠道、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

表 4 调节作用回归结果

变量	(1) <i>FE</i>	(2) <i>FE</i>
<i>Fintech</i>	2.162*** (0.550)	2.107*** (0.516)
<i>FINIC</i>		0.147** (0.068)
<i>Size</i>	0.252 (0.216)	0.222 (0.202)
<i>Roa</i>	-14.219*** (0.951)	-15.860*** (1.022)
<i>ATR</i>	-1.630*** (0.587)	-1.425** (0.555)
<i>EPS</i>	-0.982*** (0.307)	-0.709** (0.294)
<i>Urban</i>	0.805 (2.453)	0.713 (2.282)
常数项	-19.882*** (6.072)	-18.964*** (5.682)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N	2918	2918
R ²	0.320	0.339

(四) 稳健性检验

1. 替换解释变量

北京大学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可以用来衡量地区金融科技水平,是一种较为全面的综合指数,具有独特性和全面性的特征。本文采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DIFI*)作为替换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DIFI*的回归结果见表5列(1)(2)。根据第(2)列的回归结果显示,*DIFI*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因此表明,随着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增加,企业融资效率也相应提高。这一结论表明了金融科技发展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融资效率,与前文的结论一致,回归结果较为稳健。

表5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1) <i>FE</i>	(2) <i>FE</i>	(3) <i>FE</i>
<i>DIFI</i>	0.052*** (0.017)	0.065*** (0.015)	
<i>Fintech</i>			2.115*** (0.547)
<i>Size</i>		0.213 (0.216)	0.123 (0.216)
<i>Roa</i>		-14.415*** (0.950)	-14.989*** (0.958)
<i>ATR</i>		-1.566*** (0.586)	-1.818*** (0.585)
<i>EPS</i>		-0.916*** (0.306)	-0.854*** (0.306)
<i>Urban</i>		2.154 (2.464)	0.821 (2.439)
<i>TDR</i>			-0.088*** (0.018)
<i>MRG</i>			-0.002 (0.004)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N	2918	2918	2918
R ²	0.059	0.321	0.328

2. 增加控制变量

在已有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再加入资产负债率(*TDR*)和主营收入增长率(*MRG*)两个控制变量,回归结果见表5列(3)。结果显示,在加入以上两个控制变量后,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依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模型的估计结果未发生明显变化。亦即,金融科技发展水平与中小企业的融资效率之间正相关关系稳健,即金融科技水平越高,企业的融资效率也会显著提高,与前文结论保持一致。

(五) 内生性检验

在金融科技水平影响企业融资效率的实证检验中可能存在由于遗漏变量和测量误差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因此,在进行内生性检验时,本文采用各省1984年人均邮电业务量与金融科技的交互

项(*PTFintech*)作为金融科技的工具变量^①。针对内生性问题,表 6 展示了运用工具变量法的全样本回归结果。在表 6 的第(1)列中,回归结果显示人均邮电业务量与金融科技的交互项系数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内生性检验的第一步相关性检验成立。第一阶段 F 值为 160.847,弱工具变量的问题也不存在。工具变量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显著提升企业融资效率。因此,内生性检验通过,显示的结果与前文结论一致。

表 6 内生性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第一阶段 <i>Fintech</i>	第二阶段 <i>FE</i>
<i>PTFintech</i>	0.095* (4.254)	
<i>Fintech</i>		4.546** (2.081)
<i>Size</i>	0.006 (0.009)	0.189 (0.227)
<i>Roa</i>	-0.033 (0.039)	-14.062*** (0.980)
<i>ATR</i>	0.041* (0.024)	-1.847*** (0.627)
<i>EPS</i>	0.023* (0.013)	-1.100*** (0.329)
<i>Urban</i>	0.192* (0.102)	0.385 (2.529)
常数项	6.433*** (0.203)	-51.404* (27.651)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N	2918	2918
R ²	0.9066	0.215
第一阶段 F 值		160.847
豪斯曼检验 p 值		<0.001

(六)异质性分析

企业内部控制是指企业为确保运营顺畅、财务报告准确及合规性达标所实施的一系列流程和机制。企业在内部控制方面的表现强弱与质量高低呈现出明显的多样性。这种差异性会对企业在采纳金融科技时的接纳程度、运作效率及实施成效产生作用。有较高内部控制水平的企业在管理效率和控制风险上更具有优势,如信息不对称水平较低、能够很好地获得融资、本身具有较好的融资能力等;而内部控制水平较低的企业往往信息不对称问题较为突出,风险管理水平较差,难以获得较好的融资支持。因此,金融科技的出现可以更好地为内部控制水平较低的企业提供融资支持。

为检验上述推理,本文采用迪博公司发布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来评估企业内部控制状况。依据取得数据的中位数,将样本企业划分为高内部控制质量组和低内部控制质量组,回归结果见表 7。结果显示,内部控制水平较高的企业金融科技对融资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内部控制水平较低的企业金融科技对融资效率的影响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意味着金融科技可以更好地提高内

① 王仁曾、詹姝珂、庄旭东:《空间视角下金融科技赋能绿色金融发展研究》,《统计与信息论坛》2023 年第 12 期。

部控制水平较低企业的融资效率,与前文推理一致。经过组间系数差异性检验后^①,发现两组存在差异性,因此金融科技对企业融资效率的提升作用在低内部控制水平的企业中更加显著。

表 7 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1) 内部控制水平较高	(2) 内部控制水平较低
<i>Fintech</i>	0.463 (0.82)	4.170*** (2.80)
<i>Size</i>	0.020 (0.08)	-0.555 (-1.21)
<i>Roa</i>	-17.876*** (-7.66)	0.319** (2.43)
<i>ATR</i>	-0.640 (-0.69)	-3.066*** (-3.33)
<i>EPS</i>	0.100 (0.27)	-1.830*** (-9.25)
<i>Urban</i>	-0.379 (-0.15)	6.175 (1.02)
常数项	-3.913 (-0.55)	-18.360 (-1.35)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N	1552	1133
R ²	0.442	0.153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 2011 年至 2022 年间上市中小企业数据,运用百度指数中涉及金融科技的关键词构建了一个综合性的金融科技发展指数,并通过特定的计算方法来评估中小企业的融资效率。随后,对金融科技发展对中小企业融资效率的提升作用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科技的发展对中小企业融资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机制层面的结果揭示,金融科技通过减轻融资约束有效促进了中小企业融资效率的提升;当企业展现出良好的 ESG 表现时,金融科技对其融资效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金融科技提高融资效率的作用在内部控制水平较低的企业表现得更为明显。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首先,在政策导向层面要认识到金融科技的发展能够提高企业融资的效率,为实体经济的稳健与持续增长提供强劲动力。随着我国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我们应积极顺应科技变革的潮流,对金融科技企业采取积极有效的政策扶持措施,深化科技、金融与资本市场的有机融合,为金融领域的创新发展注入新的蓬勃活力。在政策实施的具体环节,政府需致力于打造一个多元化的金融服务生态系统,确保金融资源能够精准、高效地对接中小企业的实际需求,从而有效降低金融服务的门槛,使企业能够以更低成本、更便捷流程获取所需的金融服务。这一系列精心设计的举措,旨在充分

^① 组间差异性检验结果的 p 值为 0.044,表明组间结果存在显著性差异。

发挥金融科技在提升经济增长效率、激发经济新增长点方面的引领与催化作用,推动中国经济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其次,科技对金融领域的赋能效应应被重点强调。金融企业需正视信息技术给金融行业带来的巨大转变,并大幅提高对金融科技相关技术及其专业人才的关注。金融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群体,应借助数字化手段深入分析企业的信用情况及融资需求,进而不断优化并丰富自身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以吸引更多的长尾客户群体,实现更加精准且高效的实体经济服务。

最后,为了保障金融科技能够有效惠及我国多元化的所有制经济结构,必须协调传统金融机构与金融科技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一方面,传统金融机构应积极适应金融科技带来的技术革新,充分利用其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来弥补自身在信息获取上的不足,从而精准识别并支持那些真正具备发展潜力和资金需求的优质企业。另一方面,广大中小企业更应深化金融科技的应用实践,以提升其融资效率并优化融资环境。这要求我们逐步建立健全金融科技审核企业融资申请的标准化流程,确保流程规范、公正透明,从而让更多符合资质且拥有广阔发展前景的中小企业能够顺利获得所需的资金支持,助力其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

责任编辑:孙继国 朱晴晴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on the Financing Efficiency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Zhao Jinguo¹ Liu Wenwen²

1.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Qil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handong Academy of Sciences);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Qil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handong Academy of Sciences), Jinan 250353, China

Abstract: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which have a close bearing on thousands of households, constitute an important pillar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financing difficulties have long been a key factor hindering their further developmen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provides a new solution to their financing difficulties. Using the panel data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 A-shares from 2011 to 2022 as a sample, this study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and function mechanism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on the financing efficiency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using bidirectional fixed effects model, mediation effect model, and moderation effect model.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financing efficiency of enterprises; financial technology improves financing efficiency by alleviating financing constraints for enterprises; good corporate ESG performance strengthens the positive impact of fintech on the financing efficiency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 grouping study based on internal control heterogeneity finds that the role of fintech in improving financing efficiency is more pronounced in companies with lower levels of internal control.

Key words: financial technology;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 financing efficiency; financing constraint; ESG performance

传承·新变·融合：当代现实题材长篇 小说乡村聚落空间书写嬗变论

张 欢

贵州师范学院 美术与设计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18

摘 要:在当代现实题材长篇小说中,“乡村聚落”空间书写不仅是地理学上的叙述,还具有一定的社会学和文化学意义。作为当代现实题材长篇小说重要的书写对象,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在“十七年”时期、新时期、新世纪三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乡村聚落”空间书写分别呈现依山傍水的自然形态和以“庙宇、祠堂为中心”的空间格局、出现“公路”“新房”等新质元素、传统与现代融合的差异性特征。这种差异性书写不仅反映了乡村现实社会的代际演变,也映射了乡村文化传承—新变—融合的嬗变过程。

关键词:长篇小说;乡村聚落;空间书写;嬗变

中图分类号:I24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25)02-0067-10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乡村聚落。乡村聚落是指“除了城市外位于农村地区的所有居民点,包括村庄和集镇。……村庄是数量广大的农村聚落。”^①“聚落的发生,即由于‘或久无害’,人们相继汇集集合,‘稍筑室宅’,定居立业,久而久之,‘遂成聚落’。”^②费孝通也说:“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③可见,“聚落”是乡村整体形态的总称。在当代现实题材长篇小说中,乡村聚落空间书写的对象是由山川、建筑、道路、河流、森林等组成的乡村整体形态空间意象,它是具有整体性特征的乡村物质生活空间。早在20世纪90年代,新文化地理学的代表人物迈克·克朗就认为:“文学作品不能被视为地理景观的简单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塑造了这些景观。”^④文学作品将那些在社会历史进程中不断消失的乡村风景,以文字形式记录了下来,特别是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呈现的空间想象往往是现实世界的映射。在“十七年”时期、新时期、新世纪三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当代现实题材长篇小说中乡村聚落空间的书写呈现代际演变。这种演变不仅反映了乡村现实社会的变迁,也映射了乡村文化症候的差异性特征,乡村文化呈现传承—新变—融合的嬗变过程。

作者简介:张欢,女,湖北武汉人,文学博士,贵州师范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空间理论、文学景观学、民族艺术与文化研究。

① 左停:《新农村:村容整洁》,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页。

② 罗汉田:《庇荫:中国少数民族住居文化》,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312页。

③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页。

④ [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5页。

一、传统文化的继承:“十七年”时期聚落空间的书写

聚落空间书写呈现自然形态和依山傍水的特征。在“十七年”时期当代现实题材长篇小说的空间书写中,聚落空间呈现的特点是:枕山、靠水、环田,民居布局遵循自然法则,民居沿山川河流自然排列,构成聚落依山傍水的自然形态特征。费孝通认为,传统村落“几乎家家户户都至少有一条船。……房屋必须建筑在河道附近,这就决定了村子的规划。河道沿岸,大小村庄应运而生;大一些的村子都建在几条河的岔口”^①。可见,传统村落的特点是整个村庄在河道边,大小民居建筑随着河流或山脉的线条而建,整个村落形成无序中有序的自然形态。在长篇小说《暴风骤雨》里,元茂屯村的描写就体现了这一特点,在“一片烟云似的远山的附近,有一长列土黄色的房子,夹杂着绿得发黑的树木”^②。元茂屯坐落在群山附近,而民居则建在山脚下,元茂屯的描写体现了费孝通描述的中国传统乡村聚落自然生态的特点。在长篇小说《三里湾》里,三里湾村的描写也具有相同的特点。三里湾村在“靠黄沙沟口的北边山根”里,“村里的房子,好像事先做好了一座一座摆在稀密不匀的杂树林下,摆成大大小小的院子一样”^③。三里湾村依水而建,旁边是一条黄沙沟,黄沙沟往北叫上滩,往南叫下滩,黄沙沟的水是两岸村庄用来浇灌土地的重要来源。同样,《红旗谱》《艳阳天》《山乡巨变》《创业史》等长篇小说的聚落空间书写也呈现相同的特征。如《红旗谱》书写的锁井镇一带,是由四十八村沿着大河湾形成;《艳阳天》中的东山坞村后是山,村前是望不到边的大平原,村落背山面水,村庄建在河道边上;《山乡巨变》中的清溪乡,“四围净是连绵不断的、黑洞洞的树山和竹山,……一条沿岸长满刺蓬和杂树的小涧,弯弯曲曲地从垵里流过”^④;《创业史》里的下堡村也是沿河边形成,房屋也沿水域而建。在这些当代现实题材长篇小说中,聚落空间书写呈现的特点是:靠山背水,自然形成,村中民居无序中有序地自然排列在水域边或山脚下。“十分明显,十七年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与农村生活的变迁是同步前进的,和现实保持着密不可分的胶着状态。”^⑤在“十七年”时期的典型现实题材长篇小说中,乡村聚落空间形成的特征是自然生态和依山傍水。

聚落空间书写呈现以庙宇祠堂为中心的特征。在“十七年”时期现实题材长篇小说的聚落空间书写中,还呈现以“庙宇和祠堂”为中心的特点。在小说中,庙宇往往是位于村落的中心,与村落其他建筑物相比,庙宇建筑物是比较宽大的。例如,在长篇小说《红旗谱》中,作者将河神庙的书写放在小说的开篇,它坐落在村里重要的堤坝上,是村落的重点建筑;小说中写道,河神庙空间是村民日常生活的中心,村民无论大小事务都喜欢到庙前去讨论。同样,在长篇小说《山乡巨变》里,祠堂建筑物较大且处于村落中心:“邓秀梅来到了乡政府所在的白垛子大屋。这里原是座祠堂”^⑥。这里的祠堂是村里的“大屋”。而在《创业史》中,传统的村落中心,是围绕着“大庙”和“土神庙”形成的。长篇小说《艳

①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戴可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4页。

② 周立波:《暴风骤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9页。

③ 赵树理:《三里湾》,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66页。

④ 周立波:《山乡巨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4页。

⑤ 巫岭芬:《漫议建国后十七年农村题材的小说》,《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

⑥ 周立波:《山乡巨变》,第18页。

阳天》里书写的大庙,也是全村较好的建筑。可见,聚落空间呈现以庙宇祠堂为中心的空间形态。

“十七年”时期当代现实题材长篇小说聚落空间书写呈现自然生态和依山傍水的特征,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乡村文化症候的外现,映射了传统农耕文化在乡村的继承特征。“中国传统社会的根基在农村”^①。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农耕社会,“传统的乡村空间差不多是在农耕社会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农业经济和社会形态是它的大背景,自然生态环境则是它的基础”^②。“十七年”时期当代现实题材长篇小说的聚落空间书写,正体现了传统乡村农耕文化的特点。在传统农耕文化的影响下,无论是民居还是农田,都与水域比较近,这是便于农耕。而村落“依山”,是因为依山可以抵御外敌入侵、防御大自然中恶劣的气候,山中树木又可提供农民生活所需,农民还把山当作一种精神信仰。万物有灵论中山中有山神,村庄靠山使人们更有安全感。因此,自然生态与依山傍水的聚落形态、无序中有秩序的民居排列,是“十七年”时期当代现实题材长篇小说聚落空间书写的特点。

同样,“十七年”时期当代现实题材长篇小说聚落空间书写呈现以“庙宇或祠堂为中心”的特征,映射了宗族文化和传统信仰文化在乡村的继承,揭示了乡村社会的交往仍然延续传统模式、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是主要交往纽带的事实。因为,中国传统乡村是一个熟人社会,传统村落的空间布局往往以宗族和血缘的关系为纽带。费孝通这样说村落的构成:“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我们在方向上分出尊卑:左尊于右,南尊于北,这是血缘的坐标”^③。“十七年”时期当代现实题材长篇小说聚落空间书写的这一特征,说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传统的祠堂仍然是整个村落空间网络的中心。看起来松散的村落,被宗族关系与血缘关系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在地理位置上,都是以寺庙或祠堂为中心,这也是当时村落文化的中心。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对暖水屯乡邻关系的书写,也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传统乡村的这一特点。“大家都是一个村子长大的,不是亲戚,就是邻舍”,“村上就这二百多户人,不是大伯子就是小叔子”^④,这是传统村落宗族关系与血缘关系的真实写照。古希腊政治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家庭常常由亲属中的老人主持,各家所繁衍的村坊同样地也由年辈最高的长老统率”^⑤,这种乡村治理模式是乡村的一种习俗和传统。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乡村仍是由家族和宗族为主导的文化。不仅如此,传统信仰文化仍然对乡村有一定的影响,村民对土地庙、河神庙的祭拜仍然十分常见。例如在《创业史》里,富成老大说“土神爷是庄稼人的神,因此村村都有土神庙”^⑥;富农姚士杰的母亲,是一个旧社会的妇女,她与村里的许多农民一样,有困难就会去庙里求神拜佛。同样,在《暴风骤雨》里,杜善人家里人生病了,不仅要叫人拔火罐,还要到北庙去许愿,祈求病人早日康复。我们可以从当代现实题材长篇小说的聚落空间书写中看到,尽管在新社会,在新质文化的影响下,寺庙和祠堂的传统功能逐渐消失,乡村正在从以血缘关系为权威的模式向现代社会以法理为关系的模式转变,但

① 刘育名:《中国农村社会变迁文献述评》,《青年时代》2016年第21期。

② 张小林:《乡村空间系统及其演变研究:以苏南为例》,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4页。

③ 费孝通:《乡土中国(修订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6页。

④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84、72页。

⑤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6页。

⑥ 柳青:《创业史(第二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1页。

传统信仰文化仍然影响着乡村,村民家中有事仍然会去土地庙祭拜,也会在农时去河神庙祈求河神保佑。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乡村这种传统宗族文化和信仰文化逐渐被新质文化影响并取代,传统聚落空间出现了新的元素,产生了新变特征。

二、空间书写下的文化新变:新时期长篇小说聚落空间的书写

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时期现实题材长篇小说中,聚落空间书写出现了一些新质空间元素,它们与山川河流共同呈现了新时期乡村聚落的新景象。

首先,“公路”成为新时期现实题材长篇小说聚落空间书写的新元素。在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颜少春和齐明江二人出了连云场,走上那条“新铺不久的拖拉机路”;这条“新铺不久的拖拉机路”将连云场聚落与外面的世界相连接。长篇小说《浮躁》里,聚落镇街沿着公路形成:“两岔镇街道正好是由省城到白石寨的公路,每日有客车和货车从铺门前经过,总要在这里停下来……”^①长篇小说《苍生》里,也书写了新修的公路。可见,随着经济的发展,为了方便交流与经商,乡村开始建造“公路”,从而影响了乡村传统聚落的空间形态,公路成为连接传统乡村与城镇之间的新空间纽带。在长篇小说《羊的门》中,呼家堡的聚落空间书写就呈现这一特点:“走在呼家堡的柏油马路上,你还会看到学校、医院、浴池和村舍周围的工厂”;呼家堡村落坐落在国道边上,“在离村不远的108国道上,先后有一辆辆的小汽车向呼家堡驶来”^②。这里的聚落空间书写不仅有柏油公路,还有学校、医院、浴池、工厂等新元素。同样,在长篇小说《多彩的乡村》的聚落空间书写里,呈现了20世纪90年代乡村公路的蜕变:三将村柏油路连接了村落与县城、市里、省城的枢纽,柏油路是三将村聚落的重要公共交通空间,它将三将村的发展命脉与城市紧密结合在一起,使小小村落成为黄金地段。“公路”在长篇小说聚落空间书写中的出现,表明随着国家建设的重心逐渐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主,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从传统自给自足、半自给自足的社会逐渐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型,乡村从封闭单一的乡村逐渐转变为开放型、异质多样型乡村。社会的转型促使乡村聚落空间发生变化。随着改革在乡村的推进,带有新质文化符号的空间出现在乡村,乡村传统聚落空间也发生了新变。

其次,“新房”元素也出现在新时期现实题材长篇小说的聚落空间书写里。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十分看重建房,视其为人生中一件重要的大事。长篇小说《多彩的乡村》书写了农民对于建房的重视:“庄稼人一辈子的大事就两件,娶媳妇盖房”^③。新时期长篇小说聚落空间书写中出现了“新房”这一空间意象,反映了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让农民拥有更多财富、农民实现“建房”心愿的条件越来越成熟等事实。乡村建新房现象越来越普遍,使“新房”这一空间书写更多地出现在新时期长篇小说的聚落空间中。长篇小说《苍生》这样书写“新房”:“在八十年代刚刚开头的那个热热闹闹的日子里,偏僻

① 贾平凹:《浮躁》,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第302页。

② 李佩甫:《羊的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年,第11、46页。

③ 何申:《多彩的乡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10页。

的山村……‘又有三层新房起来了,又有两家平地基、码地盘了……’”^①“又有三层新房”,还有两家在“平地基”准备开建,“新房”成为聚落空间中新的元素。在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里写道,“现在,田福堂当年拦河打坝震坏的校舍窑洞,已经被一排气势宏伟的新窑洞所替代”^②。这“一排气势宏伟的新窑洞”,是聚落空间组成的新元素。长篇小说《苍凉后土》里书写了砖混结构的新房:“中明老汉家去年新修的楼房,和我们近年来常见的农家新房一样,正面是砖混结构的四间一楼一底楼房,小青瓦人字形结构的房顶,两边还各有一间水泥板铺的平房,平时可作晒台,一遇住房紧张,又可以再往上加盖一层”^③。可见,新时期长篇小说聚落空间书写里出现的“新房”元素并不是偶然现象,它体现了乡村社会的现实变化,即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过渡时期的乡村农民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农民拆旧房建新房的愿望逐渐实现。

再次,在新时期现实题材长篇小说的聚落空间书写里,还出现了整齐划一的空间形态。中国传统村落大多是自然形成,主要是为了生存生产方便,同时受到风水等传统观念影响。因此,“十七年”时期长篇小说呈现的聚落空间特点是自然生态和依山傍水。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人为规划的空间越来越多,聚落空间由传统自发型向现代规划型转变,长篇小说中聚落空间也开始呈现整齐划一的系统规划特征。长篇小说《多彩的乡村》这样书写三将村人为规划的街道与房屋:三将村前街的这片房子,早些年间是不存在的,这里原来是一片空地,20世纪70年代用作大队会场;20世纪80年代乡村实施家庭联产承包以后,村民们开始想用空地盖房,村里统一规划这一片房屋的建设,限定了高度与宽度,规定了老街与新街之间的房屋建造模式。自此,小说的聚落空间书写呈现出人为规划的特点。这一特点同样出现在长篇小说《羊的门》中:“这里的村舍的确是一排一排、一栋一栋的,看去整齐划一,全是两层两层的楼房。那楼房的格局是一模一样的;一样的房瓦,一样的门窗,一样的小院,院子里有一模一样的厨房和厕所。你一排一排地看下去,走到最后时,却仍然跟看第一排时的感觉一样。”^④呼家堡坐落在国道附近,聚落整齐划一,民居格局也是一样的。这显然是一个被规划后的新式乡村:民居逐渐向国道等主要干道靠拢,聚落向周围的城镇集中,既扩大了城镇的规模,也增加了两个空间之间的融合。

最后,新时期现实题材长篇小说的聚落空间书写开始出现“城”与“镇”等新空间元素。随着乡村生活中心开始向集镇转移,集镇成为“农村经济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⑤。农民的农田相对集中,私人化经营成为主流,各级乡政府鼓励人民从分散的村落向城镇集中,乡村不再仅仅是独立封闭的存在,经济的发展促使乡村与外界交流越来越多,商业行为进一步加强了乡村与集镇之间的融合。新时期当代现实题材长篇小说中的乡村聚落空间书写,极大地反映了乡村社会的这一变化。如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葫芦坝的村民平时会将蔬菜送到连云场甚至太平镇上去售卖,葫芦坝、连云场、太平镇三个空间之间紧密联系。长篇小说《古船》中的洼狸镇是周围四村八乡的生活中心:

① 浩然:《苍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1—2页。

② 路遥:《平凡的世界》(下),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第405页。

③ 贺享雍:《苍凉后土》,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4页。

④ 李佩甫:《羊的门》,第9页。

⑤ 陈国庆、安树彬:《近代陕西乡村生活变迁与慈善事业》,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2页。

四村八乡与洼狸镇空间并没有绝对的分隔,周围村落与洼狸镇坐落在河边,周围四村八乡围绕着洼狸镇生产生活,村民工作与商业行为集中在洼狸镇,集镇与村落融合在一起,聚落呈现了传统聚落与现代城镇结合的特点。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中也可以见到“集镇”元素:石圪节是双水村人民平时去的较多的村落,而双水村与米家镇、米家镇与原西县城和周围村落交流与来往也都很频繁,这里的镇子由十几个村庄围绕起来,是村落的商贸和生活的中心。长篇小说《浮躁》描写的是河边上的乡镇社会,以静虚村和两岔镇的乡镇生活为主,揭示了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命运、文化变迁轨迹,反映了当代乡村在20世纪80年代的变迁。可见,新时期长篇小说呈现的不再只是单纯的传统的乡村聚落景象,聚落空间书写始终与城镇发展结合在一起,聚落空间书写出现新变特征。

新时期当代现实题材长篇小说聚落空间书写的新变特征,是20世纪80年代乡村文化症候的外现,映射了乡村社会与文化的巨变。这一时期聚落空间书写的特征,与“十七年”时期形成鲜明对比,其聚落空间的形成有其文化成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乡村大多是半封闭的村落,村庄往往自然形成,农民信仰自然神灵与宗族庇佑,农民生活范围较小,大多局限于本乡本土甚至是本村的生产队里,较少有去外地谋生者。农民的生活状态,一如唐代诗人白居易笔下的《朱陈村》:“家家守村业,头白不出门。……生者不远别,嫁娶先近邻。”农民的社会交往空间十分狭小,与外界交往不多,使得聚落空间较为传统且单一。20世纪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推动了经济市场化,传统乡村与周边的村落及城镇交往越来越多,乡村商品生产与非农产业的发展,让农民走出家门,增加了与外界的联系,打破了传统文化对乡村的垄断,现代文明及商业文化开始影响着乡村。这些新质文化的融入,使得村与镇之间的界限被逐步打破,乡村由封闭、半封闭的村落向开放型村镇转变,乡村聚落空间呈现开放且多元的态势。尽管乡村公社的影响力仍然存在,但“集体”意识逐渐在农民心中减淡,正如长篇小说《苍生》里所说:“七十年代的人民公社社员,‘集体’这个神圣的字眼儿,已经在心里淡薄了。”^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鼓励个体工商业发展等政策,让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变得多样。许多农民不再以单纯的集体务农形式为生,他们有的参与家庭联产承包,有的进城打工,有的直接经商成为“个体户”。新时期现实题材长篇小说的空间书写积极地反映了这一乡村社会的巨大变迁。在解放思想、搞活经济的方针指导下,从事商业活动的农民越来越多,商业文化对乡村的影响也越来越深。随着乡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乡村商品生产的迅速发展,乡村集镇经济呈现出兴旺发达的景象,许多单纯消费型乡村集镇逐渐转变成为生产与消费结合、农工商建结合的新型集镇。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小说书写的集镇周围都会有许多村落围绕,这是由于村与镇之间的商品交换多、农民生活逐步提高,从而形成了一村一集市、多村围绕着一个集镇的空间形态,这也是乡村社会良性发展的结果。这一时期长篇小说中出现“新路”“新房”、整齐划一的空间形态、“城”与“镇”等新质空间元素的书写,呈现出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空间形态,说明了城镇在乡村聚落空间书写中越来越重要,映射了在改革开放后传统乡村聚落空间因改革所带来的变化以及新质文化的冲击使乡村传统文化发生嬗变的事实。

^① 浩然:《苍生》,第49页。

三、文化碰撞与融合：新世纪聚落空间书写的传统与现代并存

进入 21 世纪,传统文化与改革开放后的现代文化持续影响着乡村聚落空间的构成。在新世纪当代现实题材长篇小说的聚落空间书写中,“乡村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生态空间;至少在文学史上,乡村同时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空间”^①。此时,“乡村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变化,为创作提供了生动的现实资源。除了‘农民工进城’给乡村带来的冲击,这种结构性的变化,主要体现于乡村社会的制度性新变,即村一级民主和法治社会建设。与此相关,敏感的作家已经创作了意味深长的佳作”^②。在这些佳作中,乡村聚落空间书写继续发生着变化,呈现出传统与现代并存、自然生态与商业共生的特征,映射了不同的文化在乡村的碰撞与融合。

中国文化具有历史的继承性与连续性。尽管西方文化与城市文化正不断地渗透到传统乡村,但从新世纪小说的乡村书写中还是可以看到文化的继承性,这展现了中国乡村丰富性、复杂性和多样性的一面。在长篇小说《歇马山庄》中,歇马山庄是一个传统且现代的乡村聚落。尽管受到改革开放的冲击,歇马山庄聚落空间仍保持着传统且纯朴的特征,土地、牛羊、山川与村落结合在一起,宁静美好。但现代化也在逐渐改变歇马山庄,村落与乡镇之间紧密结合在一起,有通往歇马镇的大道,有供灌溉的水库堤坝,许多年轻人在镇上上班,农忙时节回到村里帮忙;但村落整体形态依然是自然生态与依山傍水的特征,体现了传统文化对乡村的持续影响。在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中,楚王庄是一个正处在历史变革关键时刻的传统湖边村庄:它依丹湖而形成,许多村民外出打工,但留在村里的人依然过着以打鱼、种地为生的传统生活;村落虽然凋零,但传统空间的形态依然保持着。小说中,楚王庄是一个依山(伏牛山群)傍水(丹湖)、真正体现自然生态的聚落空间,村里的农民世代以湖为生,但与所有的乡村一样,它也受到了改革的冲击和城市文化的影响,这一影响通过女主人公暖暖的视角展示出来。从北京打工回来时,暖暖看到,“离开两年的村庄里那些高高低低的房屋,她突然间觉得,往日感到很大很威风的村子,变小变旧了。记忆里很高很漂亮的屋子,变低变破了;印象里很宽很平的村路,变窄变难看了;只有自家屋前的那棵老辛夷树,还是记忆中的样子”^③。在看惯了大城市的暖暖眼中,村庄虽然“变小变旧了”,但仍是她记忆中依山傍水、自然而成的淳朴模样。楚王庄聚落空间,呈现的是对传统文化继承的特色。在长篇小说《上塘书》中,上塘村是一个依水而建的村落:这里有前街、中街、后街三条记录上塘村历史沿革的街道,街与街的间距不过三十米,前街有老房,住的是中老辈人;中街有新房,住的都是年轻儿女一辈。上塘村的街道布局是村落历史发展的痕迹,村落延续了传统的习俗:年轻人结婚要盖房,就在老房后面盖了新房,就是中街。在传统习俗影响下,上塘村的街道逐渐形成了现在的格局。

但随着新农村建设和经济发展对乡村的影响,传统乡村发生了巨大变革,聚落空间从自然生态的村庄逐渐变得空旷、现代、商业化,甚至原来传统的空间特征逐渐消失,聚落空间书写逐渐呈现传

① 南帆:《启蒙与大地崇拜:文学的乡村》,《文学评论》2005 年第 1 期。

② 施战军:《乡村小说:时代之变与文学之难》,《上海文学》2007 年第 10 期。

③ 周大新:《湖光山色》,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 年,第 5 页。

统与现代融合的特征。在长篇小说《上塘书》中,上塘村最具现代性的房子要数后街了,这些房子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建的,许多是打工回来的人盖的,房屋比较阔气且现代化。可以说,上塘村的街道,记录了上塘村的发展历史。上塘村是一个传统村庄,四十几户人家,水田分布在水塘边,旱田分布在坡地边,依山傍水;上塘村也是具有现代化特征的村庄,它有“横贯歇马镇的柏油路,东通丹东,西通大连、营口”,“是上塘人们重要的交通。它衔接了上塘的甸道和山道,使上塘人们的生活跟外面世界有了联系”^①。上塘还有与城市一样的集市。在上塘村,通往外界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甸道,甸道就是水渠,从上塘到镇上赶集,都要走甸道;一条是山道,山道出来有乡级公路,通往其他村庄与歇马镇。《上塘书》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传统且现代的聚落空间:水域、民居、水田、旱田错落地布局,散发着浓厚的历史感和传统文化的特色;与之相对的是打工回乡者建的民居,新的民居建在后街,还有通往歇马镇的现代化公路,以及与城镇一样的集市等等,这些都是城市文化影响下形成的新变空间。可以说,上塘村聚落空间是时代变迁下的见证者,兼具传统与现代特征。

长篇小说《富矿》的聚落空间书写也呈现传统与现代融合的特征。苏北地区的村落康庄,到了麦收季节,男男女女打仗般地涌向麦田;一望无际的麦地,在人们收割后,便被条条块块地分割开来,长短不一的麦田如同划过云彩的飞机画在天上的一条条尾巴。这是传统村落田野劳动的景象。而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乡村与城镇之间出现了另一些空间书写,如长篇小说《后土》中麻庄中的矿区。矿区是整个麻庄聚落的一部分,是时代发展呈现的新空间形态。它是城乡接合部的空间,也是传统村落麻庄中独立出来的空间。麻庄与矿区是代表着传统与现代的两个空间,但它们又是一个整体的乡村聚落:“从矿区延伸出来的公路两边慢慢开始搭起了零零星星的房子,一些精明的麻庄人开始毁掉自家的麦田,利用自家田地所在的黄金位置做起了矿上的生意。有人开起了饭店,也有人开起了小旅馆,加上村长喜贵早先圈出来储运煤炭的地块,这个地段与矿区的街道连成了一个小小的商业区”^②。麻庄不再是传统且淳朴的乡村,而是将传统与现代融合在一起的新乡村。麻庄的发展始终与周边的城市(镇)发展结合在一起,与国家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在麻庄聚落空间的书写中,有传统的麦田,也有沿公路新建的民居、在田地里建起的饭店和旅馆、通往矿区的商业街道等。新世纪以后的麻庄聚落空间发生了改变,同时也将传统的麦田与工业文明下的矿区融合在一起,代表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在乡村的融合。

长篇小说《麦河》《后土》《日头》中的聚落空间书写,也有传统与现代融合的特征。《麦河》里的鹦鹉村有着传统聚落村庄的特点,但在房屋的规划上,则体现了现代型的乡村特色,新农村建设使村落的房屋都统一了外观——青砖大瓦房。与这一时期的大多数乡村一样,村里的土地都是空空的,土地都流转给村办企业麦河集团,村民们成了股东,不用自己种地,还可以在集团的工厂里上班。农民不仅是老板之一,还是工人,农民的工作空间从传统的田地,转移到村办企业麦河集团。小说呈现了许多厂房空间的书写,反映了新农村建设进程中传统乡村向现代化乡村的迈进。不仅如此,鹦鹉村还仿照城市建设了文化广场,为村民提供休闲娱乐空间,这是城市文化影响下乡村聚落空间的新变。

① 孙惠芬:《上塘书》,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年,第52—53页。

② 叶炜:《富矿》,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10页。

《后土》中的苏北鲁南小山村——麻庄,也受到城市文化的影响,呈现传统与现代融合的特征。苏北鲁南多丘陵,一块块平原地带四周基本上都是被小山丘所包围。这种地形地貌类似于四川地区的盆地,麻庄就坐落在这里。四周被山丘包围的麻庄是个传统特色鲜明的聚落,农忙时节,乡场到处是忙碌的身影。但是麻庄的现代特征更明显,村里不仅有现代化的休闲广场,还有应市场化需求而兴办起来的窑厂、砖厂、私人苹果园、村办鱼塘,以及穿过麻庄的国道、紧挨着114国道的福利院、马上就要建成的统一规划的新村等,这些都是城市文化影响下的传统与现代结合的聚落空间。在《日头》中,日头村开办了钢铁厂、砖厂、窑厂等各类村办企业,这些村办企业建在公路边上,占了五六十亩的荒滩;大旱时节,荒芜的土地歉收,只有钢铁厂红红火火,村民不再种地,纷纷去厂里当了工人,村里也建了广场。土地和庄稼荒芜落寞,还被人鄙视,家庭农场建立起来了,城市文化逐渐成为日头村的主流文化;因为建厂,农民的老房子被拆迁,农民搬进了新村的楼房,村落原始的民居不再存在,传统聚落空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新世纪长篇小说聚落空间书写的传统与现代融合,还体现在商业空间的书写上。在长篇小说《上塘书》里,上塘村不仅保留有部分传统聚落形态,还拥有与城镇一样的商业空间,村里有百货店、糖酒店、饭店、杂货铺、自行车修理铺、理发店、成衣铺、寿衣店、酒店等,“凡是城里有的,镇上都有”^①。在长篇小说《富矿》里,麻庄的一些农民将自家的麦田毁掉,“利用自家田地所在的黄金位置做起了矿上的生意”,“有人开起了饭店,也有人开起了小旅馆”;而麻庄的另一个独立空间——矿区,更像一个微型的小集镇,这里的商业空间应有尽有,走进矿区,就可以看到“一个繁华热闹的城镇雏形初现”^②。连接矿区与麻庄的公路两边,开了许多店铺,使这里俨然成为一个商业性街道,这个街道将传统的麻庄聚落与商业化的矿区连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显然,麻庄的矿区空间是属于整个麻庄聚落的一部分,而麻庄不再是仅由农田、水系、山脉、民居组成的传统村落,而是商业文化与城市文化影响下越来越城镇化、商业化的现代聚落空间。长篇小说《带灯》里的樱镇,也同样具有明显的商业特征。樱镇是十几个村落的中心,也是一个什么店铺都有的商业化乡镇:“樱镇辖管几十个村寨,是个大镇,镇街也大。街面上除了公家的一些单位外,做什么行当的店铺都有。每天早上,家家店铺的人端水洒地……”^③与还存在部分传统村落形态的上塘村、麻庄不同,樱镇已经是一个商业气息非常浓郁的现代化小城镇。鸚鵡村、麻庄、日头村、上塘村等传统村落,未来也会像樱镇一样,逐渐向城镇化转变。新世纪现实题材长篇小说聚落空间的书写,为我们呈现了当代中国乡村已然向商业化、城镇化转型的现实状态。新世纪的乡村更加开放,它们紧跟国家经济建设的步伐,不断做出相应的调整、变化,从而使传统乡村文化与现代城市文化不断地融合,逐渐形成属于这个时期的文化特色。在新世纪当代现实题材长篇小说的聚落空间书写中,呈现的特征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以及对不断渗透的城市文化的融合。

① 孙惠芬:《上塘书》,第51页。

② 叶炜:《富矿》,第210、213页。

③ 贾平凹:《带灯》,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3页。

事实上,当代现实题材的乡村小说,往往是通过乡村景观空间的描写来表现特定地方的自然风景、传统文化和习俗观念,具有一定的社会属性和文化意味,小说中书写的聚落空间不仅仅是衬托故事情节发展的背景,同时也是反映乡村社会与文化变迁的一面镜子。在“十七年”时期、新时期、新世纪三个重要历史阶段,现实题材长篇小说书写的乡村聚落空间呈现的不同景象是乡村变迁的外现。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这几个重要历史时期典型现实题材长篇小说的观察与分析,观照当代中国乡村的社会与文化变迁。

责任编辑:潘文竹

Inheritance, New Change and Integration: The Evol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 Spatial Narrative in Contemporary Realist Novels

Zhang Huan

School of Fine Arts and Design, Guizhou Education University, Guiyang 550018, China

Abstract: In contemporary realistic novels, the depic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as a spatial narrative is not only a geographical account but also carries significant sociological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s. As an important subject in contemporary realistic novels, the portrayal of "rural settlements" has evolved through three significant historical periods in Chinese society: the "Seventeen Years" period, the New Era, and the New Century. In these periods, the spatial depic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has respectively showcased natural forms nestled by mountains and waters, spatial patterns centered around "temples and ancestral halls," the emergence of new elements such as "highways" and "new houses," and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usio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This differential portrayal not only reflects the intergenerational evolution of rural society but also mirrors the transformative process of rural cultural heritage, its renewal and integration.

Key words: novel; rural settlement; spatial narrative; evolution

女性精神困境的探源式书写

——张爱玲、苏青、梅娘现代长篇小说论

董卉川¹ 于欣琪²

1. 青岛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71; 2. 南京大学 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 时人热衷于将张爱玲、苏青、梅娘三位女作家相提并论,她们本人亦不避讳此种并置。回溯三人的文学创作,尤其是现代长篇小说撰写,更是颇多相似之处,即缮写探秘女性的内在灵魂,并从根源上探求女性产生精神困境之因由。总体而言,三位女作家皆关注到女性精神困境的内在成因——性欲的抑塞、爱情的消逝,以及外在动因——经济的重担、封建伦理道德的压迫,并由此承继了“人的文学”的写作精神,发扬了“五四”文学对封建伦理道德批判的传统。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她们的现代长篇小说极为深刻地表现出对女性自身原欲和生命力的关照,对女性群体命运和前途的关怀,从而使文本洋溢着浓郁的现实关怀精神,擎起了1940年代女性文学创作的大旗。

关键词: 张爱玲; 苏青; 梅娘; 现代长篇小说; 女性精神困境; 探源式书写

中图分类号: I24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5)02-0077-09

在1940年代中后期,有三位女性作家闪耀文坛,时人热衷于将其视同一律,她们本人亦不讳于同年而校,这三位女作家便是张爱玲、苏青、梅娘。苏青和张爱玲互为欣赏,苏青在“女作家聚谈会”中谈及,“女作家的作品我从来不大看,只看张爱玲的文章”^①。张爱玲也予以回应,并表达出对苏青的高度赞赏,“如果必需把女人作者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②。著名学人谭正璧也曾将二人相提并论,“目前最红的两位女作家——张爱玲和苏青”^③。1942年,北平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书店,联合发起了“读者喜爱的女作家”的调查活动,南方的张爱玲和北方的梅娘“双双名列榜首”,从此,文坛上出现了“南玲北梅”之说^④。而梅娘则谦虚地指出自己和张爱玲之间的不可同日而语:“1942年,当社会上把‘南玲北梅’并称的时候,我读了张爱玲的《金锁记》。为她的深刻、浓艳所倾倒,而且暗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百年长篇小说的现实关怀与文体变迁研究”(22JJD750027)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文学大系整理、编纂与研究(1900—2020)”(22&ZD27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董卉川,男,山东青岛人,文学博士,青岛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诗剧和散文诗研究;
于欣琪,女,吉林东丰人,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① 《女作家聚谈会》,《杂志》1944年第13卷第1期。

② 张爱玲:《我看苏青》,《天地》1945年第19期。

③ 谭正璧:《论苏青及张爱玲》,《风雨谈》1944年第16期。

④ 梅娘著,侯健飞编:《梅娘近作及书简》,北京:同心出版社,2005年,第153页。

自惭愧,无资格与她并列。”^①但在当下众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均可见“南玲北梅”的论述,亦可发现二者之隐秘关联。

然而,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多谈论“苏张”或“玲梅”,较少将三人并置。她们的文学写作实则“颇多相似”^②,尤其是现代长篇创作——张爱玲的《半生缘》^③、梅娘的两部未竟之作《小妇人》《夜合花开》以及苏青的《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歧途佳人》,均表现出了对女性个人精神困境进行揭示与解剖的强烈兴趣,并从根源上发掘女性产生精神困境之因由,实为一种探源式的文学书写。这一写作特质就其本质而言,极具现实性与社会性,与特殊的时代背景相互呼应:“革命之后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固有的宗法和旧礼教势力对于女性的压抑,非但没有消除,反而变本加厉,资本主义在外国是封建势力的仇敌,然而到了我们中国,却会化敌为友,互相狼狈,造成更多重的压力,依旧盘踞在各个黑暗的角落里。然而人总是有着‘人性’的生物,当那些被压抑者一朝觉醒而倾向于自由的要求的时候,她们不但会喊出反抗的呼声,甚至也会见之于行动。”^④可见,三位女作家深刻地承继了“人的文学”的写作精神,发扬了“五四”文学对封建伦理道德批判的传统,其现代长篇小说文本无不洋溢着浓郁的现实关怀精神,并表现出了对女性原欲和生命力的关照,对女性命运和前途的关怀,由此擎起了1940年代女性文学创作的大旗。

一、女性灵魂的缮写探秘

1928年,受英国感伤主义代表作家斯泰恩《感伤的旅行》一文的影响,郁达夫写下了散文《感伤的行旅》。鲁迅也将感伤视为这一时期作家心灵与写作的常态:“多伤感情调,乃知识分子之常,我亦大有此病,或此生终不能改”^⑤。浪漫感伤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草创期小说创作的一大特质,此股风潮一直延续至1940年代,张爱玲、苏青、梅娘的长篇小说明显浸染着浪漫感伤的典型气质。人类的外在行为是由其内在灵魂所决定的,灵魂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需要具体可见的外在表现形式进行呈现。在文学创作中,节奏是传达情绪的主要方式,“文学的本质是有节奏的情绪的世界”^⑥。诗人在写作诗歌时,需要把自我的内在情绪转化为具体可感的外在诗化节奏,而小说家在撰写小说时,外在浪漫感伤的文字则是内在悲哀苦痛灵魂的“表现或吐露”^⑦,由此印证和揭示出张爱玲、苏青、梅娘本人的灵魂——精神状态。

张爱玲、苏青、梅娘曾经悲哀苦痛的人生经历,使她们的灵魂苦闷忧郁。张爱玲的青少年时期是

① 梅娘著,侯健飞编:《梅娘近作及书简》,第153页。

② 张萍萍:《四十年代女性文学“三人厅”——张爱玲、苏青、梅娘创作比较谈》,《东岳论丛》2000年第4期。

③ 《半生缘》是张爱玲第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它先以《十八春》之名连载于从1950年4月25日至1951年2月11日的上海《亦报》,又由《亦报》报社于1951年11月出版了单行本。后来,张爱玲改写了《十八春》,以《惘然记》为题连载于1968年2月至7月的《皇冠》月刊;最终,张爱玲又将它更名为《半生缘》,于1969年3月由皇冠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④ 谭正璧:《论苏青及张爱玲》,《风雨谈》1944年第16期。

⑤ 鲁迅:《致曹聚仁》,见《鲁迅全集·13》,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87页。

⑥ 郭沫若:《文学的本质》,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352页。

⑦ [美]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郇稚牛、张照进、童庆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3页。

在苦闷中度过的,正如有学者所言:“十七岁之于张爱玲就是一个劫,一个心灵的疤痕。在后来的自传体小说《小团圆》《雷峰塔》里,每写到17岁,总笼罩着阴森森的死亡黑影。爱玲从此无家。”^①作家本人也曾将自我的原生家庭比作“心碎的屋”,“有一本萧伯纳的戏:《心碎的屋》,是我父亲当初买的……一种春日迟迟的空气,像我们在天津的家。”她以淡漠疏离的口吻讲述了同父亲、后母等家庭成员之间的隔膜关系:“我父亲扬言说要用手枪打死我。我暂时被监禁在空房里,我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忽然变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白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我后母把我一切的东西分着给了人,只当我死了。这是我那个家的结束。”^②梅娘的人生经历与张爱玲类似:“我很小失去了母亲,在后娘手下养大的。最初,我并不知道娘并不是亲生的,我抱着小的纯贞的女儿心去和娘亲近,娘总是不爱理我,跟我说话的时候板着脸,生气的时候就骂,我没看见过娘的笑脸。”^③失母的哀痛与家人的冷漠形成了梅娘悲苦的人生基调。对于两位女作家来说,这种儿时和少年时代的惨淡经历必然伴随自我一生,使其灵魂变得忧郁苦涩。苏青虽不像张爱玲、梅娘那样在童年或少年时代经历过伤害苦难,可婚姻同样带给她无尽的抑郁苦闷。她曾借散文揭露当时社会看待离婚女性的严苛态度:“男人厌弃了黄脸婆,仅可在外头寻花问柳,姘居纳妾,甚至再来重婚一个‘夫人’,他们用不着逼太太离婚,尤其是太太已养了成群的儿女,则留在家中就替他照顾儿女也是好的”^④;也曾尖锐地写出了女性在传统家庭结构中的痛苦境遇:“做过媳妇才知道做媳妇的苦处……在公婆跟前必须尽量抑制喜怒哀乐之情,多唯唯,少谏诤,在父母跟前当然不必如此拘束”^⑤。可见,对于女性精神困境的高度关注与细腻呈现,三人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相似性和一致性,其文学创作因之具备了相通的可能。

对人类精神困境的探秘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母题之一,“我们关心人的难题,因为他是一个被矛盾和困惑折磨的存在……成为人就是成为一个难题,这个难题表现在苦恼,表现在人的精神痛苦中”^⑥。1920至1930年代,白薇、谢冰莹、苏雪林、葛琴等女性作家的创作即是如此,张资平、叶灵凤、洪灵菲、汪锡鹏、罗西、叶鼎洛、予且等男性作家的创作亦不遑多让。而到了1940年代,以碧野为代表的男性学人继续注重探究女性的精神困境,而有着悲哀苦痛灵魂的张爱玲、苏青、梅娘,则以现代长篇小说的创作与之呼应,通过对女性内在灵魂的谱写探秘,呈现女性——现代人类的精神困境。

张爱玲、苏青、梅娘笔下的女性人物无不处于悲哀痛苦、寂寞压抑的精神状态之中。在张爱玲的《半生缘》中,顾曼璐的父亲去世后,家中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来源,为了养家糊口,她中学未毕业就做了舞女,靠出卖肉体供妹妹弟弟们读书,年老色衰后决定与祝鸿才结婚,但祝鸿才内心嫌弃她的过往,不肯明媒正娶。顾曼璐作了舞女后,内心始终是“幽怨”的,祝鸿才对待婚姻仪式的态度使她的幽怨无限扩大,并延续至婚后。尤其是当发现自己曾经的订婚对象张豫瑾爱上了妹妹顾曼桢后,她的这种幽怨达到了顶峰:“曼璐的一生已经完了,所剩下的只有她从前和豫瑾的一些事迹,虽然凄楚,可是很有回味的。但是给她妹妹这样一来,这一点回忆已经给糟蹋掉了,变成一堆刺心的东西,碰都不能

① 刘川鄂:《张爱玲传》,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第48页。

② 张爱玲:《私语》,见《张爱玲典藏全集3散文卷一:1939—1947年作品》,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第101—102、112—113页。

③ 张泉选编:《梅娘小说散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511页。

④ 苏青:《论离婚》,见苏青著、方铭主编:《苏青文集·散文卷(中册)》,新北:金堯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7年,第87页。

⑤ 苏青:《做媳妇的经验》,见苏青著、方铭主编:《苏青文集·散文卷(中册)》,第184—185页。

⑥ [美]A. J. 赫舍尔:《人是谁》,隗仁莲、安希孟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页。

碰,一想起来就觉得刺心。”^①为了拴住丈夫的心,顾曼璐打算让祝鸿才同妹妹发生关系,她的内心开始是无比恐惧的,而幽怨坚定了她实施计划的决心;但当妹妹被自己丈夫强暴并生下一子后,她却在悔恨和苦痛的精神困境中抑郁离世。张爱玲、苏青、梅娘笔下那些处于婚姻围城中的女性,均在精神困境的泥沼中苦苦挣扎。在梅娘那里,《小妇人》中,凤凰的恐惧和无助随着婚姻生活的推进不断加深,情感上陷入了无声的绝望,“只觉得恐惧,只觉得有如掉在深渊里,没有人知道,自然也不会有人来救她,她忽然觉得她将像那些无声地飘落到渊底来的许多叶子一样,把生命的汁液耗干了之后,便悄悄地死去”^②;《夜合花开》中,已婚女性李黛黛也于精神困境之中逐渐耗尽“生命的汁液”,“像水面的萍被水波带到了岸上一样,唯一的归宿,就是干死……白白地干死”^③。同样,在苏青那里,《结婚十年》中的“我”(苏怀青)进入婚姻后,亦如凤凰、李黛黛般陷入精神困境,“仿佛置身在茫茫无边的大海中央,漂流着,一些没有归宿的地方”^④;这种精神上的漂泊无依之感,一直延续到《续结婚十年》中的怀青那时,即便已与徐崇贤离婚,她依旧在一种说不清的精神困境愈陷愈深,“心境仍旧是那么郁郁的,百般无聊……有一种说不出的寂寞之感”^⑤;《歧途佳人》中离婚后的符小眉也是一样,“像一只受伤的鸟骤然离开樊笼,虽然自由,却仍旧感到更多的惆怅与茫然”^⑥。苏青笔下的女性,即便摆脱了婚姻的束缚,却依旧无法摆脱空虚与悲哀的心理困境,她们难以恢复在婚姻中被慢慢消耗殆尽的生命力,获得精神上的真正自由。

张爱玲、苏青、梅娘的长篇小说之中,充溢着“烦闷”“苦闷”“凄楚”“空虚”“悲伤”“悲哀”“痛苦”“寂寞”“孤独”“伤感”“悲观”“凄寂”“恐惧”等字眼,这些字眼展现出她们对女性灵魂的缮写探秘。但她们的创作探索并不止步于此,而是对造成女性精神困境的内在成因、外部动因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探源式剖析阐释。

二、精神困境的内在成因——性欲的抑塞、爱情的消逝

张资平曾在其长篇小说中将现代人类尤其是青年一代精神困境的成因之一概括为“性的苦闷”^⑦,罗西则在其长篇小说中提出了“爱情不能调和之烦闷”^⑧是造成人类精神困境的成因之一。张爱玲、苏青、梅娘也承继了上述的理念,在长篇小说的创作过程中,将女性精神困境的内在成因概括为性欲的抑塞、爱情的消逝。

梅娘、苏青以细腻的笔触大胆描摹女性的原欲,“除了性部位造成的性兴奋,全身各器官也都是

① 张爱玲:《半生缘》,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第21、114页。

② 梅娘:《小妇人(未完)》,见张泉主编:《梅娘文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3年,第85页。

③ 梅娘:《夜合花开(未完)》,见张泉主编:《梅娘文集》,第218页。

④ 苏青:《结婚十年》,见苏青著、方铭主编:《苏青文集·小说卷(上册)》,新北:金堃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7年,第21页。

⑤ 苏青:《续结婚十年》,见苏青著、方铭主编:《苏青文集·小说卷(中册)》,新北:金堃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7年,第87页。

⑥ 苏青:《歧途佳人》,见苏青著、方铭主编:《苏青文集·小说卷(下册)》,新北:金堃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7年,第102页。

⑦ 张资平:《脱了轨道的星球》,上海:上海现代书局,1932年,第206页。

⑧ 罗西:《你去吧》,上海:光华书局,1930年,第16页。

性兴奋的源泉……我们可以建立起一种原欲量子的概念——‘自我原欲’(ego-libido)”^①。原欲是生命力的象征,自我原欲的释放,是生命力的张扬。

在《小妇人》中,凤凰的丈夫袁良移情别恋于校长张长庚的太太婉莹,不再迷恋已经生育过的妻子的肉体,这令二人不再有夫妻生活;袁良悔悟后独自到日本谋生,再次使二人失去了肉体结合的机会。可以说,性欲的抑塞是凤凰婚后精神困境的成因之一,“她是知道那麻醉了一样的感觉的,那感觉可以使人发疯”^②。因此,青年时代的暗恋者小勤的出现,令她如死水般的内心起了些许波澜,使她在精神困境之中看到了一丝解脱的曙光。在原欲的驱使下,原本矜持的凤凰主动抚摸并亲吻小勤那健硕的躯体,但道德的约束又提醒她停止这种疯狂的举动,并使其再次陷入深深的精神困境之中,“心恐惧地跳动着”^③。在《夜合花开》中,黛黛的丈夫王日新是一个终日在外寻欢作乐的纨绔子弟,无法得到丈夫温存、性欲抑塞的黛黛自然陷入精神困境之中:“失去了爱情润泽的少妇的心,比渴于爱恋的少女的心还来得焦躁……寂寞孤独的感情使得她底心酸楚着,她觉得她的大好的青春浪费得可惜,想珍贵已经晚了”^④。在《结婚十年》中,怀青平日在上海求学,与丈夫崇贤分隔两地;缺乏夫妻生活滋润的现实中,她的原欲无法得到排解,以致陷入这样一种精神困境中:“我怀春了……我需要——一个青年的,漂亮的,多情的男人,夜夜假着我并头睡在床上,不必多谈,彼此都能心心相印,灵魂与灵魂,肉体与肉体,永远融合,拥抱着在一起。……事实上,我却独睡在寂寞的宿舍里,对面,脚后,头边都横着一张张的空床。”^⑤只有与能令她产生“狂炽的欲望”^⑥的同学应其民相处以及和丈夫崇贤同房时,怀青内心的精神困境才能稍有缓解。梅娘和苏青以女性视角揭示了“女人的性欲同男人的性欲一样发达”^⑦,既关照了女性的个体生命,又揭示出性欲的抑塞是造成女性精神困境的缘由之一。

在张爱玲、苏青、梅娘的长篇小说中,男性是造成女性精神困境乃至悲剧命运的原罪。张爱玲、苏青、梅娘对婚姻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解剖和呈现——在婚姻关系中,女性是源于爱情与男性结合,而男性则是以性欲为驱使,同女性结合。当丈夫对妻子的性欲丧失后,男性对女性的爱情纽带自然切断,便会去另寻其他女性,以寻求新的性欲刺激,由此使彼此的爱情消逝,导致女性的精神困境。

在《半生缘》中,世均的父亲啸桐嫌弃生了两个孩子后的沈太太年老色衰,便又娶了一房姨太太,并搬离老宅,和姨太太共筑新巢,沉沦于年轻貌美姨太太的温柔乡中。沈太太因爱情的消逝而陷入了精神困境之中,悲哀苦闷了一世。同样,鸿才因曼璐年老色衰而觊觎年轻貌美的曼桢,爱情的消逝令曼璐陷入精神困境之中,而鸿才想要霸占曼桢的无耻提议更令她在道德和亲情的双重折磨中苦痛不已。曼璐死后,在鸿才的花言巧语下,也为了照顾自己的孩子,曼桢同他结了婚;婚后,鸿才依旧在外花天酒地,而曼桢本就对鸿才没有爱情,这种没有爱情基础(爱情的消逝)的婚姻关系,必然导致她的精神困境:“她和什么人都来不来往,恨不得把自己藏在一个黑洞里……她觉得她是整个一个人都躺

① [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性学三论》,贾宁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91—92页。

② 梅娘:《小妇人(未完)》,见张泉主编:《梅娘文集》,第172页。

③ 梅娘:《小妇人(未完)》,见张泉主编:《梅娘文集》,第173页。

④ 梅娘:《夜合花开(未完)》,见张泉主编:《梅娘文集》,第216—217页。

⑤ 苏青:《结婚十年》,见苏青著、方铭主编:《苏青文集·小说卷(上册)》,第28页。

⑥ 苏青:《结婚十年》,见苏青著、方铭主编:《苏青文集·小说卷(上册)》,第33页。

⑦ [法] 波伏瓦:《第二性I》,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63页。

在泥塘里了”^①。在《小妇人》中,袁良同凤凰原本是一对有着坚固爱情基础的夫妻,可是同样无法抵挡爱情消逝、特别是丈夫对妻子性欲丧失对婚姻关系的冲击,凤凰已无法唤起袁良对她的兴趣,袁良疯狂迷恋上了婉莹的肉体,“他心中,整个为婉莹底美丽的身体所盘踞,眼前,能看得清楚,只有那只红色的纱灯,甚至抱着小麟的时候他也梦噫一样不留心地叫着莹”;爱情的消逝令凤凰陷入精神困境之中,只能以阿Q的精神胜利法聊以自慰:“再忍耐一次吧!……这正是人生途上的磨难,不受磨难是不能成佛的,为了得到那真正的爱,付出去这苦痛的代价吧。”^②在《夜合花开》中,美貌的黛黛被日新优渥的家境、阔绰的作派、温柔的态度迷醉了双眼而与其结合,但婚后,日新对黛黛的新鲜感(性欲)逐步丧失,终日在外花天酒地,并找寻到新的原欲对象——陈珍珠,令黛黛陷入了精神困境:“她觉得心底深处空着,空得宛如失去了血液,只剩了多皱的心壁,干缩在寂寞的胸膛里。”^③在《结婚十年》中,崇贤和怀青结婚后,依旧保持着与表嫂瑞仙的暧昧关系;二人到上海谋生后,结识了相互间屡有罅隙的余白和丽英夫妇,本就风流的崇贤对当时正怀有身孕的怀青早已丧失性欲,而是十分欣赏美貌温柔的丽英,便同丽英同赴情天孽海。丈夫的背叛、爱情的消逝,令怀青陷入了精神困境。在《歧途佳人》中,小眉父亲就像世均父亲那样,抛弃生育了两个女儿的妻子,另寻新欢,令人老珠黄的符太太陷入无尽的精神困境之中。

梅娘在《小妇人》中建构的“袁良—凤凰—婉莹”的三角关系结构,是张爱玲、苏青、梅娘长篇小说中夫妻关系结构的典型代表,更是与沙汀《困兽记》中的“田畴—孟瑜—吴楣”的关系结构极为相似。在长篇小说《困兽记》中,田畴和孟瑜原本像袁良和凤凰一样,是自由结合,他们冲破了家庭的阻碍奔赴异地生活,且有着深厚的感情基础;但田畴后来也对妻子失去了激情与欲望,“当接吻过她那干枯的嘴唇过后,一种生疏嫌恶的感觉忽然袭击着他。他有点狼狈了”^④。年轻貌美的吴楣成为他新的泄欲对象,从而导致了他和孟瑜之间爱情的消逝,使孟瑜陷入苦痛悲哀的精神困境之中。1940年代,张爱玲、苏青、梅娘的长篇小说与沙汀的《困兽记》遥相呼应,共同建构了男性的背叛导致爱情消逝、最终令女性陷入精神困境的婚姻模式,印证了爱情消逝是导致女性精神困境重要缘由这一事实。

三、精神困境的外部动因——经济的重压、封建伦理道德的压迫

作为文学家的张爱玲、苏青、梅娘化身为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以小说作为审视女性个体心灵的工具,除了探秘造成女性精神困境的内在成因(情感根源)外,还对造成女性精神困境的外部动因(现实缘由)进行了探寻和反思。张资平曾在其长篇小说中将导致现代人类尤其是青年一代精神困境的另一动因概括为“经济的压迫”^⑤,张爱玲、苏青、梅娘的长篇小说也承继了此种论调,她们还在揭示经济重压这一女性精神困境外部动因之外,揭示了造成女性精神困境的另一外部动因——封建伦理道德压迫。

① 张爱玲:《半生缘》,第245—246页。

② 梅娘:《小妇人(未完)》,见张泉主编:《梅娘文集》,第149、108页。

③ 梅娘:《夜合花开(未完)》,见张泉主编:《梅娘文集》,第214—215页。

④ 沙汀:《淘金记·困兽记》,见《沙汀文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299页。

⑤ 张资平:《脱了轨道的星球》,上海:上海现代书局,1932年,第206页。

对于在经济重压下的人类陷入精神困境的阐释,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和叙述传统,“这不妥的最大之一层就是经济,经济是和大家的现在与将来都有绝大的关系的,于是大家的心理便时常戚戚然跳着,跳了一会便都觉得周身都不舒适,就是烦恼的时候了”^①。张爱玲、苏青、梅娘在其长篇小说中亦进行了细致的撰写。

在《半生缘》中,导致曼璐精神困境、曼璐和曼桢悲惨命运、曼桢和世均爱情悲剧的根源,便是经济的压迫。假若不是受困于经济重压,曼璐就不会中途辍学并解除与豫瑾的婚约,也不会做起舞女,又遇到世均的父亲,更不会结识和嫁给鸿才;而曼桢想要离婚、想要逃离因无爱婚姻而导致的自我精神困境时,也受制于经济的重压:“法律上应当准许她离婚,并且孩子应当判给她的。但是他要是尽量拿出钱来运动,胜负正在未定之天。所以还是钱的问题。她手里拿着刚才束钞票的一条橡皮筋,不住地绷在手上弹着,一下子弹得太重了,打在上手非常痛。”^②如果筹集不到金钱(经济的重压),曼桢就无法从精神困境中挣脱。在《小妇人》中,凤凰和袁良在失去家族经济支持独自生活后,无力应对经济重压而时常发生龃龉,这使凤凰陷入了更深的精神困境:“想到了在苹果摊前为了不愿意花两毛五分钱买那两只肥硕的苹果而被苹果贩说得怪窘的时候,又禁不住地流出来泪……一分钱也要好好计算计算才能用掉的小学教员的妻底生活,什么时候才能好转呢”^③。在《夜合花开》中,黛黛出身贫寒,丈夫日新的接济使她陷入了备感屈辱和难堪的精神困境:“她接受日新对她自己底家的接济的时候,她像接受侮辱一样地觉得难堪。”这种精神困境同样发生在黛黛那个自尊要强又孝顺懂事的妹妹黛琳身上,而且更为严重:“姐姐寄生在姐夫身上,用给姐姐作漂亮的装饰品得来的报酬来接济妈妈,用受着姐夫奚落的受着姐夫蔑视,被姐夫像布施一样掷下来的钱来接济妈妈,用姐夫企图获得姐姐笑脸而拿出来的钱来接济妈妈……妈妈老、病、穷,钱是唯一能治疗这三者的妙药有钱的又是妈妈底女儿。自己那样地在姐姐身前焦躁、不耐,讨厌地拒绝姐姐底钱的样子,使得姐姐因为羞于自己底寄生不安,使得妈妈被困窘逼迫,结果怎样呢?”^④

在《续结婚十年》和《歧途佳人》中,苏青承继鲁迅有关“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阐释,将经济重压导致女性精神困境这一问题同女性离婚后的精神状态和生存状态这一问题相结合,并进行了细致论述。“娜拉走后怎样”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常见命题,鲁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娜拉走后怎样”实际是一个经济问题,导致女性精神和现实双重困境的根源,就在于她们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和经济权利;与男性相比,女性更难谋生,“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⑤。在苏青笔下,“娜拉”走后(离婚后)依旧囿于精神困境之中。《续结婚十年》中,怀青在和崇贤离婚后,只能暂住于自己的姑母家,由于是寄人篱下,她甚至都不敢放声哭泣:“我的泪流着,我让它尽量地流着,只是不敢呜咽出声,这是别人的家呀……我怎么可以哭湿姑母的绣花枕呢?”^⑥当她稍有积蓄后,却

① 叶鼎洛:《乌鸦》,上海:现代书局,1933年,第143页。

② 张爱玲:《半生缘》,第262页。

③ 梅娘:《小妇人(未完)》,见张泉主编:《梅娘文集》,第99页。

④ 梅娘:《夜合花开(未完)》,见张泉主编:《梅娘文集》,第227、272—273页。

⑤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见《鲁迅全集·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68页。

⑥ 苏青:《续结婚十年》,见苏青著、方铭主编:《苏青文集·小说卷(中册)》,第13页。

依旧过着窘迫的日子,想把女儿菱菱接到身边,又怕无力抚养:“‘只为我们穷了,我想还是不要得罪他的好。——菱菱,假使妈妈没有饭吃,你还是仍旧跟爸爸去吧。’……钱,可真是一件了不得的东西,失去容易赚来难,我只好又卖文了,斤斤与人计较着稿费,不断地写,我们还是不能够过活。”^①《歧途佳人》中,小眉在和承德离婚后,带着一对女儿四处寻找职业,后来终于找到一份家教的职业,却也没干长久,还被混混史亚伦盯上,差点染上官司;最后为生计所迫,只能沦为交际花,陷入精神困境之中:“再从事交际,不过我的心理只感到空虚与嫌烦,拼命用功或拼命找求刺激都不能使我满足,我渐渐养成了一种与众不同的习惯”^②。经济的重压使离婚后的怀青、小眉们愈发悲哀苦闷,印证了“娜拉走后”的悲苦人生与精神困境。

不过,中国新文学现代性的内涵之一便是启蒙,“现代性摆脱了传统文化强加给人们的信条和集体信仰”^③。作为现代作家的张爱玲、苏青、梅娘,承继了“五四”学人的这一时代使命,也对封建伦理道德进行了深刻严肃的批判,揭示了封建伦理道德的压迫是造成女性精神困境的重要成因,由此希冀女性——人类的觉醒和启蒙。

传宗接代的思想深深烙印在张爱玲、苏青、梅娘笔下的每一个人物的基因之中,映射了封建伦理道德的强大与顽固。既然要传宗接代,势必会重男轻女。在三位女性作家笔下,重男轻女首先体现在生育方面。在《半生缘》中,曼璐同意鸿才霸占自己妹妹的重要缘由之一,便是她由于长期做舞女(妓女)而致不孕,无法为祝家传宗接代;因此,她认为自己愧对祝家、愧对丈夫,陷入了封建伦理道德的精神困境之中,最终决定出卖自己的妹妹。在《歧途佳人》中,深受封建伦理道德荼毒的符太太甚至天真地以为,丈夫的背叛和胡作非为是自己的错误——自己只为符家生育了两个女儿,未能为符家生下一个儿子以传宗接代,“我母亲毕竟也来不及再养一个儿子,这是她的终身遗憾”^④;可笑可悲的是,她的哀怨主要是针对自己而非罪恶的丈夫。在《结婚十年》中,因为盼着怀青能为徐家生下一个男婴从而传宗接代,公婆一家对怀孕的怀青照顾得无微不至,甚至连丈夫崇贤都对她礼让三分、平日作威作福的小姑子杏英也收敛起自己的脾气;而当胎儿是个女婴后,徐家人立即换了一副嘴脸,这种封建伦理道德压迫令怀青陷入难以挣脱的精神困境之中:“我心中只觉得一阵空虚,不敢睁眼,仿佛惭愧着做了件错事似的在偷听旁人意见,有一个门口女人声音说:‘也好,先开花,后结子!’另一个声音道:‘明年准养个小小弟弟。’”^⑤重男轻女其次体现在认知方面。在《夜合花开》中,日新直接对黛琳说出了并不是有意侮辱却是潜意识中的心里话,“目前能维持生活的女子职业只有卖淫,那还得是最漂亮的姑娘”^⑥。纨绔子弟日新的心地其实不坏,但在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下,他的认知便是:女性只能在家中相夫教子,不应也无法独自谋生;如果想要赚钱,只能做不正当的职业。这种压迫使黛琳陷入了更加难堪悲哀的精神困境之中。在《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中,受过现代教育洗礼的崇贤对妻子怀青的态度亦是如此。当时的“怀青”们既要背负现实生活的经济压力,也要承担传统观念对其精神世界的摧残。

① 苏青:《续结婚十年》,见苏青著、方铭主编:《苏青文集·小说卷(中册)》,第208页。

② 苏青:《歧途佳人》,见苏青著、方铭主编:《苏青文集·小说卷(下册)》,第165页。

③ [法]伊夫·瓦岱:《文学与现代性》,田庆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0页。

④ 苏青:《歧途佳人》,见苏青著、方铭主编:《苏青文集·小说卷(下册)》,第29页。

⑤ 苏青:《结婚十年》,见苏青著、方铭主编:《苏青文集·小说卷(上册)》,第50页。

⑥ 梅娘:《夜合花开(未完)》,见张泉主编:《梅娘文集》,第232页。

以苏青、张爱玲、梅娘为代表的女性作家对中国封建伦理道德、传统社会关系及秩序进行了细致解剖,并通过阐释女性精神困境的外部动因——经济的重压、封建伦理道德的压迫来观照、摹写女性的悲剧命运,同时揭露封建势力的根深蒂固以及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等社会问题。

学界以往多将张爱玲、苏青、梅娘的创作概括为个人化写作,指出她们关注的是个人精神世界的状态,着墨于个人心灵世界的探秘,表达了个人而非时代的情绪。谭正璧早在1940年代就曾论述过此种特质,并加以指摘:“在同样的倾向里,我们读了以前冯沅君、谢冰莹、黄白薇诸家的作品再来读这两位,便生出了后来何以不能居上的疑问。因为前者都向着全面的压抑作反抗,后者仅仅为了争取属于人性的一部分——情欲——的自由;前者是社会大众的呼声。后者只喊出了就在个人也仅是偏方面的苦闷”^①。但通过回溯张爱玲、苏青、梅娘的现代长篇小说文本,可以发现,她们详尽书写了女性的精神困境,并对造成女性精神困境的内在成因和外部动因进行了深度思考和呈现。在此基础上,以女性主义视角为切入口,对中国传统的家庭关系、社会关系展开刻画,对女性在传统和现代的家庭——社会维度之中的地位、命运、出路进行阐释,这对当下女性的地位、命运、出路也极具参考意义,具有跨越时空的理性沉思气质,表现出了强烈的现实关怀精神和时代反思之态度。由此可见,张爱玲、苏青、梅娘的文学创作,尤其是现代长篇写作并不是囿于个人象牙塔中的噫鸣独语,而是与历史、当下、未来紧密相关的社会化写作。

责任编辑:潘文竹

Root-Cause Narrative of Women's Psychological Dilemmas: A Study of Modern Novels by Eileen Chang, Su Qing, and Mei Niang

Dong Huichuan¹ Yu Xinqi²

1.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2. Center for Research of China's New Literatur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People used to keenly compare the three female writers, Eileen Chang, Su Qing and Mei Niang, who did not shy away from this juxtaposition. Looking back on their literary creations, especially their modern novels, there are many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m. For example, they wrote about exploring the inner souls of women and searching for the causes of women's psychological dilemmas from the root. Generally speaking, the three female writers were concerned with the internal causes of women's psychological dilemmas - the suppression of sexual desire and the disappearance of love, as well as the external causes - the economic burden and the oppression of feudal ethics and morals. They thus inherited the spirit of writing "human literature" and carried forward the tradition of criticizing feudal ethics and morality in the "May Fourth" literature. What is particularly noteworthy is that their modern novels show a deep concern for women's original desires and vitality and care for the fate and future of women groups, so that the texts were full of the spirit of realistic concern, and held up the flag of women's literary creations in the 1940s.

Key words: Eileen Chang; Su Qing; Mei Niang; modern novel; women's psychological dilemma; root-cause narrative

① 谭正璧:《论苏青及张爱玲》,《风雨谈》1944年第16期。

数字技术应用与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

詹新宇 赵 昊 姜佳彤

北京工商大学 经济学院, 北京 100048

摘 要: 随着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数字技术在企业转型与全球价值链升级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本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海关进出口及投入产出数据,系统检验了数字技术应用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技术显著提升了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且对小规模、非高科技、中东部及民营企业的促进作用尤为明显。进一步的机制分析显示,数字技术通过增强国内供应链韧性、降低市场摩擦及提升海外价值捕获能力,实现了企业全球价值链的优化升级。该研究不仅为数字技术助推企业升级提供了坚实的实证依据,也为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改革及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对优化经济结构和构建具有竞争力的全球经济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数字技术; 全球价值链; 创新能力; 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 F49; F1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 (2025) 02-0086-17

一、引 言

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技术创新的不断推进,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 GVC)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模式使得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各自的生产环节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中,处于价值链上游的企业往往拥有更高的附加值、更强的创新能力和更大的市场话语权。然而,对中国而言,随着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逐渐消失,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锁定”问题日益突出,限制了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空间。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这一战略部署为中国企业在新时期更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提供了明确指引。数字技术,尤其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正推动全球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发生深刻变革。同时,5G技术、人工智能等关键数字技术创新和应用也是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生动力^①。

基金项目: 本文系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以高质量发展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核心要求与制度保障研究”(23ZDA02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詹新宇,男,安徽安庆人,经济学博士,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财税理论与政策、数字经济发展与治理研究;赵昊,男,湖南邵阳人,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数字经济与企业全球价值链研究;姜佳彤(通信作者),女,江苏徐州人,经济学博士,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全球价值链、环境规制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①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4)》,2024年8月, <https://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408/P020240830315324580655.pdf>。

数字技术创新,尤其是专利技术,是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获取市场竞争优势的重要资产,涵盖了从大数据、云计算到人工智能等各类创新技术。近年来,随着全球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专利的应用在推动企业创新、提高生产效率和优化产品结构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①。对于数字化转型的企业而言,数据作为一种新兴的生产要素,能否最终成为实体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已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话题。现有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是重塑国际贸易格局的重要推动力^②,主要体现在数字技术带来的成本下降和生产效率提高,使得参与出口活动的企业通过增加出口产品数量和产品范围更广泛地参与国际市场^③。尽管中国出口贸易快速增长,但其主要通过低价竞争和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生产环节进入国际市场^④。亦有研究发现,越来越多的中国全球化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依托先进的数字技术实现了生产流程、管理模式、营销手段等方面的创新,提高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增强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⑤。在全球生产分工日益细化的背景下,如何实现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跃升,不仅关系到中国贸易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也对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现有文献多集中于技术创新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研究,而较少从数字专利技术应用的角度进行系统探讨。部分文献已对数字技术对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影响进行了初步探讨。有研究指出,签署区域贸易协定(RTA)中的数字贸易规则能够显著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⑥;亦有研究发现,对于制造业企业而言,数字技术能够显著促进企业价值链位置攀升,且对一般贸易、高科技企业和处于成熟期的企业促进效应更为显著^⑦。然而,尽管已有研究揭示了数字技术在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中的作用,但具体的作用机制仍不完全明确,尤其企业如何通过数字专利推动企业向全球价值链高附加值生产环节攀升,尚缺乏系统的实证研究。为此,基于中国上市企业的数据,采用数字经济专利申请数量作为衡量企业数字技术发展水平的指标,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数字技术应用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应用显著提升了企业在全价值链中的地位,尤其是对小规模企业、非高科技企业、中东部地区企业及民营企业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① 詹新宇、梁蓝心:《链长制如何“链”出企业技术创新》,《中国工业经济》2024年第11期。

② 裴长洪、刘斌:《中国开放型经济学:构建阐释中国开放成就的经济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

③ 李兵、李柔:《互联网与企业出口: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经验证据》,《世界经济》2017年第7期;王欠欠、夏杰长:《互联网发展对全球价值链贸易的影响评估》,《改革》2018年第9期;徐保昌、闫文影:《综合保税区政策与企业出口产品范围调整》,《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Brynjolfsson E., Hui X., Liu M., Does Machine Translation Affect International Trade? Evidence from a Large Digital Platform, *Management Science*, vol. 65, no. 12, 2019, pp. 5449-5460.

④ 张二震:《中国外贸转型:加工贸易、“微笑曲线”及产业选择》,《当代经济研究》2014年第7期;戴翔、马皓巍:《数字化转型、出口增长与低加成率陷阱》,《中国工业经济》2023年第5期。

⑤ 杜明威、耿景珠、刘文革:《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来自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国际贸易问题》2022年第6期。

⑥ 侯俊军、王胤丹、王振国:《数字贸易规则与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中国工业经济》2023年第4期。

⑦ 李晓静、蒋灵多、罗长远:《数字技术与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基于制造业企业的实证研究》,《学术研究》2023年第5期。

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研究视角上,尽管现有文献已探讨了数字技术在促进全球价值链参与中的积极作用,但大多数研究侧重于行业或国家层面的中宏观分析,难以揭示企业内部及企业之间的微观差异。而本文从微观企业视角系统检验了数字技术应用对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提升的重要作用,从而更精确地捕捉到企业之间的异质性特征。这一视角不仅丰富了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框架,也为理解企业战略决策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其次,现有文献通常依赖于文本分析方法,如关键词提取和情感分析来衡量企业数字化水平,但这种方法容易受语言表达和解释框架的影响,导致一定的主观偏差。本文创新性地引入了企业数字相关专利技术作为衡量指标,利用专利数据的客观性和标准化特点,更准确地反映了企业在数字技术领域的实际应用水平和技术发展潜力。再者,与以往研究主要关注大型企业或国有企业的技术应用优势不同,本文通过细致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技术应用对小型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这一发现为数字化转型在弥补企业发展差距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依据,表明在推动全球价值链整合过程中,应更加重视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支持,进而增强其全球价值链参与韧性和竞争力。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回顾相关文献,详细梳理数字技术与全球价值链位置关系的研究现状,并基于理论分析提出四个研究假说;第三部分介绍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并阐述计量模型的设定;第四部分进行实证分析,考察数字技术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第五部分对前文提出的有关机制方面的假说进行检验;第六部分总结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探讨数字技术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应用前景,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综述

近年来,数字技术作为推动全球经济转型的重要驱动力,对生产方式、商业模式及国际分工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现有研究主要肯定了数字技术应用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Akerman 等指出,数字技术因其具有开放性、可扩展性和跨界整合性,能够显著降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成为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工具^①。部分研究一致认为,数字技术的赋能效应和渗透性,推动产业融合与协同创新,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②。

与此同时,全球价值链理论为理解国际贸易转型和产业升级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Kaplinsky 强调,企业或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决定了其参与国际经济的收益^③,而这一收益与其所在环节的附加值密切相关。Porter 提出的价值链理论为分析价值增值提供了理论基础^④,而全球价值链理论

① Akerman A., Helpman E., Itskhoki O., et al., Sources of Wage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03, no. 3, 2013, pp. 214–219.

② 赵宸宇、王文青、李雪松:《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财贸经济》2021年第7期。

③ Kaplinsky R., *Globalisation, Poverty and Inequality: 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 PoliPoint Press, 2000.

④ Porter M. E., *Competitive Advantage: Creating and Sustaining Superior Performance*, Free Press, 1985.

则进一步将其延伸到国际分工网络中。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三个核心维度^①,其中价值链升级是全球价值链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主要体现在产品升级、工艺升级、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四个方面^②。近年来,跨境数据流动、电子合同与知识产权保护等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更为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提供了制度保障。

国内学者广泛关注中国企业如何摆脱“低端锁定”,依托技术创新^③和国际化战略实现价值链升级。同时,现有研究普遍认为近年来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地位有所提升^④。已有文献从多个角度探讨了这一现象的原因,包括对外直接投资^⑤、地区间技术互补^⑥、产品多样性^⑦和制造业服务化^⑧等。然而,从数字化技术视角分析中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地位提升的研究较为缺乏。部分研究集中探讨跨国公司如何通过技术控制和市场渠道主导价值链上游环节,同时指出,数字化转型通过信息流动、技术扩散和协同效应加速企业向高附加值环节迈进^⑨。

目前关于数字技术应用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表现影响的研究相对有限,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在国家层面或者行业层面的探讨。文武等基于74个国家面板数据研究发现^⑩,数字技术的嵌入可以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马述忠等利用构建的行业层面数字化水平指数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产业数字化水平提升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上升^⑪。此外,何宇等聚焦于人工智能等数字化应用技术,得出类似结论,即数字化技术应用促进了一国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⑫。针对企业层面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数字化转型相关指标的构建^⑬,而差异化的指标构建方式可能导致估计结果存在偏差。尽管部分文献探究了数字技术应用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但对于数字技术应用的界

-
- ① Humphrey J., Schmitz H., How Does Inser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ffect Upgrading in Industrial Clusters? *Regional Studies*, vol. 36, no. 9, 2002, pp.1017–1027; Gereffi G., Humphrey J., Sturgeon T., 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2, no. 1, 2005, pp. 78–104; Coe N. M., Dicken P., Hess M.,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Realizing the Potential,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vol. 8, no. 3, 2008, pp. 271–295.
- ② Humphrey J., Schmitz H., How Does Inser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ffect Upgrading in Industrial Clusters? *Regional Studies*, vol. 36, no. 9, 2002, pp.1017–1027.
- ③ 汪克亮、赵斌、许如玉:《地方政府竞争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
- ④ 彭水军、吴腊梅:《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变化及驱动因素》,《世界经济》2022年第5期; Chor D., Manova K. B., Yu Z., Growing like China: Firm Performance and Global Production Line Posi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130, 2021.
- ⑤ 刘斌、王杰、魏倩:《对外直接投资与价值链参与:分工地位与升级模式》,《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5年第12期。
- ⑥ 郑江淮、金晟男:《地区间技术互补、均衡发展与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中国工业经济》2024年第7期。
- ⑦ 吕越、谷玮、包群:《人工智能与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国工业经济》2020年第5期。
- ⑧ 蔡良群、王曦研、刘晶磊:《基于服务化的中国先进制造业如何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中国科技论坛》2023年第11期。
- ⑨ OECD, *The Digitalisa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y*, OECD Publishing, 2017.
- ⑩ 文武、卢媛婷、吕建阳:《数字技术对GVC分工地位的影响——机制识别与技术来源的差异效应》,《南京审计大学学报》2024年第2期。
- ⑪ 马述忠、陈逸凡、张洪胜:《产业数字化与生产全球化——基于附加值地理分布的视角》,《管理世界》2024年第11期。
- ⑫ 何宇、陈珍珍、张建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与全球价值链竞争》,《中国工业经济》2021年第10期。
- ⑬ 杜明威、耿景珠、刘文革:《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来自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国际贸易问题》2022年第6期。

定仍较为宽泛,如以行业层面的数字技术投入作为代理变量^①。相比之下,采用企业层面的数字专利作为数字技术应用的测度能够更准确、直接地从企业数字创新的视角衡量其数字技术发展水平。

(二)理论分析

随着数字经济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数字技术已成为企业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关键推动力。本文结合国内外研究,提出数字专利技术提高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假说,并从企业国内供应链韧性增强、外部市场摩擦下降和国际市场价值捕获能力提升三个角度提出其作用机制。

数字专利体现了企业在数字化技术领域的创新能力和发展水平。数字技术通过智能制造、自动化和数据分析等手段,优化企业生产流程,提高生产效率。同时,这些技术还推动了产品创新和业务模式的转型,使企业能够更好地满足全球市场需求,从而增强其竞争力。此外,数字技术尤其是区块链、大数据和云计算等工具,可以显著降低跨境交易的成本,提升物流、支付和信息传递的效率^②,进而降低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门槛,帮助其更顺利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同时,电子商务平台和数字化营销手段扩大了企业的市场覆盖范围,进一步增强了企业的全球竞争力。

再者,借助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企业能够实现供应链的透明化和高效管理。这有助于提高全球供应链的协同性,降低了潜在风险,并使企业能够快速响应全球市场的变化,从而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③。对于全球价值链参与企业而言,数字技术促进了企业与国际伙伴之间的协作,如技术共享和联合研发。这种合作模式不仅有助于企业获取先进技术和全球资源,还进一步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优势。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1:

H1: 数字技术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数字专利通过何种机制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图1展示了本文所阐述的数字技术提高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逻辑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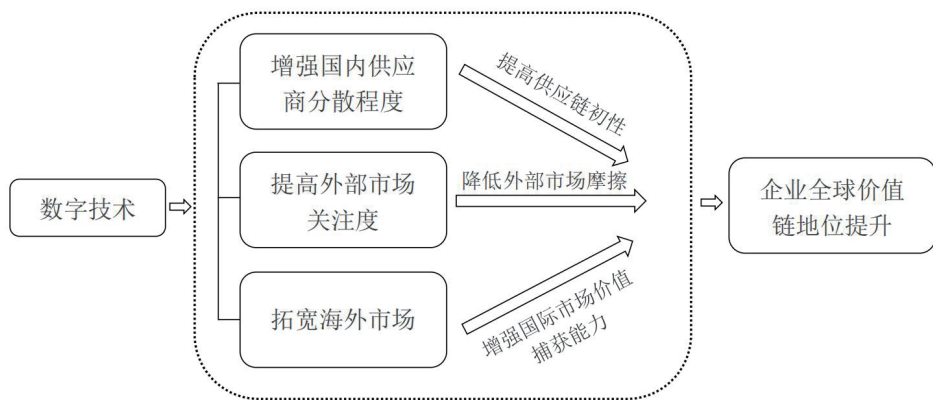


图1 数字技术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逻辑框架图

① 李晓静、蒋灵多、罗长远:《数字技术与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基于制造业企业的实证研究》,《学术研究》2023年第5期。

② 何帆、刘红霞:《数字经济视角下实体企业数字化变革的业绩提升效应评估》,《改革》2019年第4期。

③ 陶峰、王欣然、徐扬等:《数字化转型、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企业生产率》,《中国工业经济》2023年第5期。

首先,随着企业数字技术水平的提高,数字化工具如大数据分析、物联网和云计算为企业提供了实时监控与数据驱动决策的能力^①。这些技术可以帮助企业更加精准地预测需求、优化库存管理、协调供应商关系,并提高生产效率。通过数字技术提升供应链管理,企业可以减少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从而降低供应商集中度,增强供应链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供应商集中度的下降意味着企业在面对外部冲击时,能够更好地分散风险、保持生产的稳定性^②。供应链韧性的提升使得企业能够在应对外部冲击和市场不确定性时更加游刃有余,进而提高其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稳定且高效的供应链管理有助于企业在全价值链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2:

H2: 数字技术通过提高企业国内供应链韧性,提升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

其次,数字技术水平的提升使得企业在产品质量、生产效率和技术创新等方面具备了更强的竞争优势。这些技术优势不仅能够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还能提高市场关注度,特别是吸引更多分析师的关注,进而提升企业在资本市场和行业中的可见度。分析师通过发布研究报告和技术分析,增强了外部市场对企业的认知度和信任度,提升了信息透明度,进而有助于减少跨国交易中的认知差异,降低市场摩擦^③。此外,分析师的关注使得企业的技术优势和市场潜力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吸引更多国际客户和投资者,从而降低了跨境交易的摩擦成本,进一步提高了企业的附加值和全球价值链地位。

与此同时,外部市场摩擦的减少为企业提升品牌认知度和国际声誉创造了有利条件。文化和法律差异的缩小,使得企业能够在国际合作中更加顺畅,进一步强化了品牌形象和产品信任度,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3:

H3: 数字技术通过提高企业的外部市场关注度,降低外部市场摩擦,提升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

最后,国际市场的价值捕获能力对于全球价值链中的企业地位至关重要。数字专利技术研发不仅推动了企业内部效率的优化,还通过降低跨境交易的壁垒,从外部角度提升了企业在全价值链中的地位。一方面,数字技术为企业提供了更加便捷的信息获取渠道,使其能够更全面、及时地掌握全球市场需求变化与竞争格局。这使企业能够灵活调整其产品、服务及市场布局,以适应国际市场的多样化需求,从而提升其竞争力和价值捕获能力。另一方面,数字化工具大幅降低了企业跨境交易的沟通成本与协调成本,例如,在线协作平台、实时翻译工具和数字支付系统显著缓解了语言、文化和制度差异带来的阻碍。这些技术赋能企业更顺畅地完成国际贸易流程,降低了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成本。

① Choi T. Y., Dooley K. J., Rungtusanatham M., Supply Networks and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Control versus Emergence,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 vol. 19, no. 3, 2001, pp. 351–366.

② Tang C. S., Perspectives in Supply Chain Risk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vol. 103, no. 2, 2006, pp. 451–488.

③ Lien W. C., Chen T., Chen J., et al., How do Financial Analysts' Recommendations Affect Firm Competitive Actions? A Rival-centric View,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vol. 134, 2021, pp. 531–539.

此外,降低的市场壁垒和贸易限制促进了企业与国际合作伙伴之间的技术交流与创新合作,帮助企业快速获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增强了其全球竞争力、提高全球价值链参与地位。更为重要的是,数字技术为企业的国际化拓展提供了基础设施支持。在跨国经营中,数字技术通过加强对海外子公司的管理与控制,例如实时数据共享与运营优化,使企业能够高效建立并维护其国际市场网络。这不仅拓宽了企业价值捕获的边界,也强化了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战略地位。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4:

H4: 数字技术通过促进国际市场参与,增强企业国际市场价值捕获能力,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有三个来源。①本文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简称海关总署)提供的企业—产品层面的交易数据^①,该数据提供了中国所有进出口企业的产品交易信息,包括企业代码、进出口产品的六位数HS编码、出口数量、出口价值、出口方式和目的地等。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海关采用的商品分类标准在样本期间多次更改,为了确保数据的一致性,本文根据联合国统计部门提供的商品分类标准对应表,将所有数据统一定义在六位数HS96分类标准上。②企业专利申请与授权数据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总局,包含在不同时间段申请的专利数量、授权的专利数量,以及相关的专利类型(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等)。③企业特征数据,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本文借鉴Brandt等的研究^②,重新构建面板数据后,剔除了数据库中的异常值。

针对以上数据,本文做了以下处理:①将企业分为一般贸易企业、加工贸易企业和混合贸易企业,分别计算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用于度量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③;②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数据,以2000—2022年上市公司为样本,根据专利的主分类号与《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进行匹配,用于衡量企业数字创新水平。

(二)计量模型设定

为探究企业数字技术应用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本文在吕越等的研究基础上^④,构建以下计量模型(1):

$$DVAR_{ijt}} = \alpha + \beta_1 Digital_tech_{ijt} + \beta_2 X_{ijt} + \delta_i + \lambda_t + \gamma_j + \theta_c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DVAR_{ijt}$ 表示*j*行业的企业*i*在年份*t*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Digital_tech_{ijt}$ 为*j*行业的*i*企业在*t*年份数字技术发展水平,使用企业当年申请的数字经济专利数量; X_{ijt} 为企业和行业的控制变

① 郑江淮、金晟男:《地区间技术互补、均衡发展与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中国工业经济》2024年第7期。

② Brandt L., Biesebroeck J.V., Zhang Y., Creative Accounting or Creative Destruction? Firm-level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97, no. 2, 2012, pp. 339–351.

③ 郑江淮、金晟男:《地区间技术互补、均衡发展与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中国工业经济》2024年第7期。

④ 吕越、谷玮、包群:《人工智能与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国工业经济》2020年第5期。

量,用以控制企业和行业层面随时间变化的干扰因素。本文在回归中还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δ_i)、行业固定效应(γ_j)、城市固定效应(θ_c)和年份固定效应(λ_t); ε_{it} 为误差项。

(三) 关键变量定义

1. 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DVAR_{it}$)

根据本文研究需要,使用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衡量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地位^①。该指标反映参与全球价值链企业的价值捕获能力和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真实收益。 i 企业 t 年的出口 $DVAR$ 测算公式如下:

$$DVAR_{it}^{\theta} = \begin{cases} 1 - \frac{M_{it}^o}{Y_{it}} - \sigma_t F^o, \theta = o \\ 1 - \frac{M_{it}^p}{Y_{it}} - \sigma_t F^p, \theta = p \\ \tau_{ot} (1 - \frac{M_{it}^o}{Y_{it}} - \sigma_t F^o) + \tau_{pt} (1 - \frac{M_{it}^p}{Y_{it}} - \sigma_t F^p), \theta = m \end{cases} \quad (2)$$

式(2)中, θ 表示企业类型, o 、 p 、 m 分别表示一般贸易企业、加工贸易企业和混合贸易企业。企业类型的划分则依据其贸易方式,具体通过上市企业的加工贸易出口占比来判断:加工贸易出口占比为 0% 的企业归为一般贸易企业;占比为 100% 的企业为加工贸易企业;而占比介于 0% 与 100% 之间的企业,则被归类为混合贸易企业。参考 Upward 等的方法,假定所有进口品都是中间投入^②, M 为根据联合国广义经济类别分类(BEC)标准识别得到的企业生产使用的进口中间品。 Y_{it} 为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 $\sigma_t F^o$ 和 $\sigma_t F^p$ 分别为一般贸易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使用的国内中间投入中的国外成分比例。

由于企业可能存在间接进口的情况,如果不考虑国内中间投入的国外成分,则可能高估企业的出口 $DVAR$ 。为了缓解这一问题,本文基于 2012 年 139 部门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测算得出行业层面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的中间投入品中的国外成分,即 F^o 和 F^p 。考虑到国内中间投入的国外成分比例可能随年份发生变化,本文以 2012 年测算结果为基准,使用一般贸易进口企业数量的同比增长率($\sigma_t - 1$)进行调整。混合贸易企业的出口 $DVAR$ 由加工贸易方式下的出口 $DVAR$ 和一般贸易方式下的出口 $DVAR$ 加权得到,权重 τ_{ot} 和 τ_{pt} 分别表示一般贸易出口和加工贸易出口占企业出口总额的比重。

2. 数字技术发展程度($Digital_tech$)

本文采用企业数字专利作为衡量其数字技术发展水平的指标。为识别与数字经济相关的专利,基于每项专利的主分类号(IPC 代码)进行筛选,将其与《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

① 郑江淮、金晟男:《地区间技术互补、均衡发展与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中国工业经济》2024 年第 7 期。

② Upward R., Wang Z., Zheng J., Weighing China's Export Basket: The Domestic Content and Technology Intensity of Chinese Export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41, no. 2, 2013, pp. 527-543.

中的类别进行匹配^①,符合这些类别的专利被认为与数字创新相关。最终得到的数字经济专利申请数量,代表了企业在数字创新方面的能力和投入水平。

分析 2000 年以来样本企业数字专利申请数量和全球价值链地位变化趋势发现,整体来看,数字专利申请数量在此期间稳步增长,尤其自 2013 年起增速显著加快,反映出中国上市企业在数字技术领域的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持续提升。与此同时,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指数也呈现上升态势,并自 2012 年后显著提高。数据还显示,数字技术创新与上市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具有相似的趋势变化。后文将通过实证模型的回归分析,进一步验证数字技术创新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推动作用。

3. 控制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融资约束(*Fin_con*),使用 SA 指数测度;企业年龄(*Age*),选取企业成立年份的自然对数值衡量;企业规模(*Size*),采用企业总资产对数值测度;企业资本密集度(*Cap_int*),为企业固定资产与员工人数的比值取自然对数;托宾 Q 值(*TobinQ*),采用企业市值与长期债务市场价值之和比上资产账面价值测度;资产负债率(*Leverage*),为企业总负债比总资产;以及流动比率(*Liquidity*),使用企业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值衡量。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	<i>DVAR</i>	12148	0.3860	0.5237	-0.6931	0.6931
数字技术发展程度	<i>Digital_tech</i>	12148	0.7240	1.2244	0	8.4976
融资约束	<i>Fin_con</i>	12128	-3.5839	0.2392	-4.3579	-2.9375
企业年龄	<i>Age</i>	12148	1.7250	0.8401	0	3.2188
企业规模	<i>Size</i>	12148	21.6599	1.1274	19.1389	26.0709
资本密集度	<i>Cap_int</i>	12148	2.0003	1.3839	0.3292	23.4679
托宾 Q 值	<i>TobinQ</i>	11931	1.9103	1.1063	0.8831	15.6066
资产负债率	<i>Leverage</i>	12148	0.4212	0.1987	0.0274	0.9078
流动比率	<i>Liquidity</i>	12148	2.5531	3.1419	0.1975	35.5011

四、实证分析

根据理论分析,数字技术发展水平能够提升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竞争力,进而增强其全球价值链地位和价值捕获能力。接下来,本文基于实证数据验证上述推论,分析企业数字技术对其全球价值链参与地位,特别是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并对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一) 基准回归

表 2 展示了以专利申请数量衡量的企业数字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回归中本文依次加入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以缓解不可观测因素对估计结果准确性带来的干扰。其中,第(1)列未加入控制变量但考虑了企业层面、行业层面、城市层面和时间层面

^① 2021 年 5 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将数字经济产业划分为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数字要素驱动业、数字化效率提升业 5 个大类,为我国数字经济规模测算提供了统一可比的统计标准、口径和范围。

固定效应。第(2)列加入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并纳入企业层面固定效应,回归结果中解释变量 *Digital_tech* 系数估计为 0.0135,且在 1% 水平下显著,初步表明企业数字创新水平显著提高了企业全球价值链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列(3) — (5)逐步加入年份、行业和城市固定效应,数字经济专利技术变量的估计系数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且依然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以上结果表明,企业数字技术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因此本文研究假说 1 成立。究其原因,首先,企业数字化提高了生产效率、创新能力和产品质量,帮助企业优化生产流程、缩短研发周期,增强市场竞争力。其次,数字技术促进了全球市场的接入,企业可以通过电商平台和社交媒体迅速与全球客户和供应商建立联系,拓展市场份额。数字化还增强了企业的供应链管理能力,使其能够更加灵活应对市场变化、降低风险。此外,企业通过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做出精准决策,提升了战略执行力。在产品定制化和高附加值环节,数字技术帮助企业向高端制造和技术密集型领域发展,提升全球价值链中的附加值。同时,跨国合作与并购进一步加速了技术创新和市场拓展。总之,数字技术不仅提升了企业的运营效率,还推动了其向价值链高端环节的升级,从而在全球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i>Digital_tech</i>	0.0123*** (0.0041)	0.0135*** (0.0041)	0.0143*** (0.0041)	0.0120*** (0.0042)	0.0131*** (0.0042)
<i>Fin_con</i>		0.0915*** (0.0336)	0.1307** (0.0537)	0.0685 (0.0570)	0.0192 (0.0575)
<i>Age</i>		0.0074 (0.0085)	-0.0005 (0.0089)	-0.0093 (0.0094)	-0.0115 (0.0093)
<i>Size</i>		0.0077 (0.0072)	0.0053 (0.0076)	0.0031 (0.0080)	0.0009 (0.0080)
<i>Cap_int</i>		0.0063** (0.0029)	0.0038 (0.0030)	0.0037 (0.0031)	0.0037 (0.0031)
<i>TobinQ</i>		0.0100*** (0.0029)	0.0072** (0.0035)	0.0075** (0.0035)	0.0069* (0.0035)
<i>Leverage</i>		-0.0036 (0.0283)	0.0050 (0.0289)	0.0200 (0.0296)	0.0173 (0.0297)
<i>Liquidity</i>		-0.0018 (0.0014)	-0.0008 (0.0015)	0.0003 (0.0015)	0.0004 (0.0015)
Firm FE	是	是	是	是	是
Year FE	是	否	是	是	是
Industry FE	是	否	否	是	是
City FE	是	否	否	否	是
Observations	12148	11913	11913	11913	11913
R ²	0.427	0.418	0.483	0.419	0.551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值为聚类稳健标准误,以下各表同。

(二) 稳健性检验

1. 内生性讨论

考虑到数字技术发展水平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问题,可能的原因在于,处于全球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的企业通常拥有更多的资源和创新能力,因此更有可能进行更多数字技术方面的创新。为此,本文采用工具变量和双重差分的方法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首先,本文借鉴已有研究^①,使用“宽带中国”政策(*Treat*Post*)作为外生冲击。“宽带中国”政策作为一种政府主导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旨在提升全国范围内的互联网宽带覆盖率,特别是在偏远地区。这一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给企业带来了外部的数字技术发展促进作用,因此可以用作一种自然实验,帮助识别数字技术发展与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之间的因果关系。结合双重差分方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检验数字技术发展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表现的影响^②。表 3 第(1)列的估计结果表明,“宽带中国”政策带来的数字技术发展,促进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

表 3 内生性处理

变量	(1)	(2)	(3)
	DID <i>DVAR</i>	工具变量一阶段 <i>Digital_tech</i>	工具变量二阶段 <i>DVAR</i>
<i>Treat * Post</i>	0.0484*** (0.0103)		
<i>Digital_tech_mean</i>		0.0288*** (0.0045)	
<i>Digital_tech_est</i>			0.0296*** (0.0045)
<i>Controls</i>	是	是	是
Observations	11913	11913	11913
R ²	0.633	0.259	0.258
Kleibergen-Paap Wald F			77.4918

注:各列均控制了企业、行业、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以下各表同。

其次,本文参考裴建锁等、Cui 等使用企业所属行业的数字专利申请数量均值作为企业产业层面数字技术发展的工具变量^③,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估计。表 3 第(2)列数字技术专利行业均值变量(*Digital_tech_mean*)系数结果显著为正,表明企业所在行业数字专利申请数量与企业数字专利申请数量呈现正相关关系。Kleibergen-Paap Wald F 检验值远大于零界值 10,意味着工具变量强相关性的条件得到满足,排除了可能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另外,行业数字专利技术指标主要反映整个行业在数字技术创新方面的总体水平,这种水平更多受到宏观政策、技术扩散和行业竞争环境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而非单个企业内部的随机扰动。因此,该指标与企业层面未观测的特定因素(如个别企业的管理水平或内部资源配置)不存在直接关联,从而满足外生性要求。将拟合后的企业层面数字专利技术变量代入工具变量第二阶段回归,列(3)回归结果显示,企业数字专利申请数量显著提升企业价值链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因此本文基本结果不变。

2. 其他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除了上述内生性检验外,本文还进行了其他稳健性检

① 田鸽:《数字基础设施能否缩小社会经济地位的性别差距》,《世界经济》2024 年第 10 期。
② 在本文中,我们利用“宽带中国”准自然实验进行了平行趋势检验,结果表明在政策实施前处理组与对照组呈现相似趋势。鉴于篇幅限制,具体检验结果未在文中详尽展示。
③ 裴建锁、方勇彪、姜佳彤:《嵌入全球价值链助力企业绿色发展:投入结构转型效应的解释》,《中国工业经济》2024 年第 2 期; Cui X., Sensoy A., Nguyen D. K., et al., Positive Information Shocks, Investor Behavior and Stock Price Crash Risk,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vol. 197, 2022, pp. 493-518.

验。首先,加入行业 $\times$ 年份固定效应。考虑到 2002 年前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贸易自由化可能导致关税政策变化,从而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变化。为了消除贸易自由化政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干扰,鉴于关税减免等政策通常在行业层面实施,本文在基准模型中加入了行业 $\times$ 年份固定效应。表 4 第(1)列的回归结果显示,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依然稳健。其次,变换核心解释变量。考虑到数字专利授权数量能够更好地反映企业在专利审查通过后实际技术应用的情况,本文将数字专利申请数量替换为数字专利授权数量(*Digital_granted*)进行再分析。第(2)列的回归结果表明,使用数字专利授权数量作为数字技术发展水平的衡量标准并未改变本文的基本结论。再次,更换聚类标准误的聚类层级。考虑到企业间可能存在相关性,从而影响估计结果的准确性,本文采用企业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进行回归。列(3)中的回归结果再次验证了基准结果的稳健性。最后,为了确保研究结论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考虑到中国直辖市实施政策的特殊性,本文删除了企业所在城市为直辖市的样本,并对剩余样本进行了类似基准模型的回归。表 4 最后一列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表 4 其他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加入行业 $\times$ 年份固定效应	(2) 更换核心解释变量	(3) 变换聚类标准误	(4) 剔除直辖市
<i>Digital_tech</i>	0.0143*** (0.0041)		0.0131** (0.0059)	0.0153*** (0.0043)
<i>Digital_granted</i>		0.0455*** (0.0069)		
<i>Controls</i>	是	是	是	是
Observations	11610	6084	11598	9808
R ²	0.604	0.633	0.627	0.667

(三) 异质性分析

1. 企业规模异质性

考虑到中国大规模企业在发展程度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小规模企业往往具有抵御风险能力弱等特点。数字技术创新水平提高是否对大规模和小规模企业在全价值链地位提升方面具有差异性?为探究这一差异性本文基于企业规模的中位数将样本企业划分为小规模和大规模企业,并进行类似基准模型的分组回归。回归结果见表 5 的(1)(2)列。结果发现,第(1)列中回归结果显著为正,表明数字技术创新在提升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方面对小规模企业的影响更为显著。这一差异可能源于小规模企业通常具备较强的灵活性和适应能力,在技术创新上的敏感度更高。小规模企业在技术突破后,能够通过较低的成本和灵活的组织结构快速提升其在全价值链中的参与地位,尤其是在细分市场和附加值环节中。而大规模企业通常拥有更完善的资源和管理体系,数字技术的投入对其影响相对较弱。这一结果体现了数字技术创新对缩小中国大规模企业之间发展差距具有重要意义。

2. 行业技术水平异质性

本文进一步探讨了数字专利技术应用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异质性作用。为此,依据证

监会 2012 年行业分类标准以及《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对企业进行分类^①,我们将样本分为高技术行业企业和非高技术行业企业,回归结果见表 5 的(3)(4)列。基于回归结果,我们发现,数字专利技术应用对非高技术企业的影响更为显著。具体而言,非高技术企业在数字专利技术的应用下,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更为明显。这一现象可能与高技术企业本身在技术创新和市场竞争中的优势有关,导致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提升已经达到一定水平,因此数字专利技术的应用效果相对较弱。相比之下,非高技术企业在应用数字专利技术方面,能够显著提升其全球价值链地位,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潜力,从而缩小与高技术企业的差距。

这一发现意味着,数字专利技术应用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具有行业差异性,尤其在非高技术行业中,数字技术的引领作用更加突出。因此,政策制定者应考虑根据企业行业特征采取针对性的数字经济发展策略,进一步推动非高技术企业利用数字专利技术提升全球竞争力。

表 5 异质性分析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企业规模		行业科技水平		企业所在地区			企业所有制	
	小企业	大企业	非高科技	高科技	中部	东部	西部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Digital_tech	0.0254*** (0.0065)	0.0036 (0.0063)	0.0232*** (0.0063)	0.0045 (0.0058)	0.0134*** (0.0048)	0.0557*** (0.0162)	-0.0084 (0.0104)	0.0089 (0.0074)	0.0099* (0.0052)
Controls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Observations	5941	5972	6829	5084	1397	8466	2050	4642	6241
R ²	0.631	0.672	0.535	0.522	0.429	0.387	0.563	0.422	0.523

3. 地区异质性

在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差异较大,因此数字专利技术应用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也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异质性。为探究地区异质性,本文将样本按企业所属地区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企业,并分别进行分组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 5 的(5)―(7)列。结果显示,数字专利技术应用对东部和中部地区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对西部地区企业的影响不显著。值得注意的是,中部地区企业亦通过数字专利技术实现了价值链升级,尽管数字技术对其价值链升级促进作用较东部地区企业低 4 个百分点。这一结果与现有研究关于制度因素提升企业出口表现主要集中于东部的结论存在差异,表明数字技术具有不同于其他政策性因素的特点,在缩小中东部地区发展差距方面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相比之下,西部地区企业普遍面临资源禀赋不足、创新能力较弱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等问题,这些因素限制了数字专利技术应用的效果。西部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相对缓慢,数字专利技术对其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并不显著。尤其是在信息化水平和技术创新环境较为薄弱的情况下,数字专利技术难以充分发挥其潜力,从而导致其在西部地区的影响效应较为微弱。因此,西部地区亟需进一步的政策支持和创新资源,才能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并提升企业地位。

4. 企业所有制异质性

在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过程中,企业的所有制形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创新动力、战略

① 石琦、肖淑芳、吴佳颖:《股票期权及其要素设计与企业创新产出——基于风险承担与业绩激励效应的研究》,《南开管理评论》2020 年第 2 期。

决策机制、政策依赖性等方面的差异,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在数字专利技术应用的功效上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因此本文结合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在数字专利技术应用中的差异,探讨两类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中的作用。根据表 5 最后两列的结果,数字专利技术的应用对国有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不显著,而对民营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提升作用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

这一差异的可能原因在于,民营企业通常具备更强的市场适应能力、更灵活的创新机制以及较少的体制制约,使其能够更高效地将数字专利技术转化为市场优势,从而推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上升。相较之下,尽管国有企业也能通过数字专利技术提升技术水平,但其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更多依赖于政策支持、资本资源整合和产业布局等外部因素。因此,在全球价值链的提升过程中,民营企业的数字专利技术应用效应通常更为显著,而国有企业则更依赖于政策引导和体制改革来增强其技术创新的驱动力。

这一分析表明,未来在推动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时,政策制定者和企业管理者应充分考虑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特点与需求。应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多创新支持与市场化激励,同时推动国有企业深化体制改革并完善创新机制,从而全面提升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五、影响机制检验

前文机制分析部分指出,数字技术的发展通过提升国内供应链韧性、降低外部市场摩擦及增强国际市场价值捕获能力三个机制,促进了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在本部分,本文将基于实证回归结果,为上述三条路径机制提供实证支持。

(一) 数字技术发展增强国内供应链韧性

近年来,企业面临的外部冲击愈加复杂,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需求波动、自然灾害、国际贸易摩擦以及全球疫情等。这些因素使得企业在原材料采购、生产、物流等环节遭遇重重困难,进而影响到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因此,提升供应链的韧性,即增强其应对突发事件和市场变化的能力,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数字专利技术,尤其是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领域的应用,能够帮助企业高效地进行供应商的筛选和评估。通过数字化手段,企业可以利用数据分析对潜在供应商的履约能力、生产能力、市场信誉等维度进行全面评估,从而选择出最合适的供应商。供应商多元化和供应链韧性的提升,最终能够增强企业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企业通过更为灵活的供应链管理,能够更好地应对市场波动和风险,保持生产的稳定性和竞争力。此外,企业能够借此获得更多的技术合作机会,进一步提升技术研发和创新能力,在全球市场中获得更高的竞争地位。

本文使用企业前五大供应商集中度指标度量企业国内供应链韧性,供应商集中度越高,意味着企业的供应链韧性越低。表 6 第(1)列展示了供应商集中度的回归结果,结果发现,数字专利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显著降低了企业的供应商集中度,意味着企业国内供应链韧性增强。且第(2)列的回归结果展示,供应商集中度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呈反向变动关系,亦证实了理论假说中提到的,供应链韧性提高显著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因此,本文印证了研究假说 2。

表6 机制检验

变量	(1)	(2)	(3)	(4)	(5)	(6)
	国内供应链韧性增强 供应商集中度	<i>DVAR</i>	外部市场关注度提高 分析师关注度	<i>DVAR</i>	国际市场价值捕获能力提高 海外子公司数量	<i>DVAR</i>
<i>Digital_tech</i>	-0.9280*** (0.1787)		0.1059*** (0.0086)		0.2957*** (0.0206)	
供应商集中度		-0.0027*** (0.0006)				
分析师关注度				0.0068** (0.0032)		
海外子公司数量						0.0078*** (0.0013)
<i>Controls</i>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Observations	7455	7455	11659	11659	11913	11913
R ²	0.387	0.538	0.367	0.522	0.121	0.557

(二)数字技术发展降低外部市场摩擦

在当前全球化和信息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企业面临的外部市场环境愈加复杂,尤其是资本市场和分析师对企业的认知和评价直接影响其竞争力。外部市场的摩擦,特别是信息不对称和市场认知偏差,可能导致负面评价,进而影响企业的股价、融资能力和全球价值链参与表现。为了减少这些摩擦,企业需要增强市场透明度,提升外部对其的认同和信任,而数字专利技术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工具。通过数字专利技术的应用,企业能够展示其在技术创新和行业前沿的竞争力,吸引资本市场、分析师和媒体的关注。这些技术突破和专利成果不仅提升了企业的技术形象,还增强了企业的市场话语权,使得外部市场对企业的认知更加清晰、准确。企业通过专利技术的发布和与行业合作伙伴的互动,能够提高分析师对其的关注度,并减少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市场摩擦,增强其股价表现、融资能力和品牌声誉,进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本文将分析师关注度作为企业外部市场关注度的代理变量。在表6的(3)(4)列结果中,我们发现,以数字专利申请数量衡量的企业数字技术发展水平显著提高了外部分析师的关注度。同时,分析师关注度的提高进一步增强了企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这一回归结果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说3,即企业数字技术发展水平的提升,通过增强外部市场对企业的关注度,降低外部市场摩擦,从而为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高价值生产环节降低壁垒,进而提升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三)数字技术发展提高国外市场价值捕获能力

数字专利技术作为企业创新的核心资产,能够帮助企业在全球市场中形成独特的技术壁垒,提升其价值捕获能力。具体而言,企业通过数字专利技术应用,能够在海外市场获得更高的溢价收入、扩大市场份额^①,从而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这种海外市场份额的增加,不仅直接促进企业国际化进程,还能反向推动企业国内研发投入、技术创新和生产力提升,进而增强国内市场的增加值。通过这一互动机制,企业在全球市场中获得的价值最终能够反馈到国内市场,提升其整体生产效益和技术水平,实现国内增加值的增长。因此,数字专利技术通过提升海外市场的价值捕获能力,

① 在未展示的结果中,本文还发现,数字技术水平的提升显著增加了企业海外收入占比,这一发现进一步验证了企业通过数字技术创新降低国际市场进入壁垒、扩大海外市场份额的结论。

进一步推动了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

为此,本文采用上市企业海外子公司数量来衡量企业国外市场价值捕获能力。回归结果见表6中(5)(6)列。数字技术发展水平和海外子公司数量的系数回归结果均在1%水平显著为正,这一结果与研究假说4相一致,表明数字技术水平的提升提高了企业的海外子公司数量,反映了企业国际市场价值捕获能力的增强,进而表现出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地位水平的提升。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论文基于中国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探讨了企业数字技术发展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企业数字技术发展在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和全球价值链地位中的关键作用。研究发现,数字专利技术数量的增加显著提高了企业在全价值链中的参与地位,且这一效应在小企业、非高新技术产业、中东部地区企业和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数字专利技术通过提高企业国内供应链的韧性、降低外部市场摩擦以及增强国外市场价值捕获能力,推动了企业在全价值链中的地位提升。研究结果表明,数字专利技术的应用和推广是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为企业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关键支持。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针对政府和企业如何利用数字经济推动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提出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加大对企业数字创新的支持力度,特别是加大对中东部地区企业的支持力度。政府应提供更多的技术研发资金支持和政策优惠,推动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缩小地区间的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推动宽带网络覆盖、5G布局 and 工业互联网发展,降低企业获取数字技术的成本和门槛。同时,应为高科技和创新型企业提供更有力的政策扶持和财政激励,推动数字技术的研发与应用。通过提供税收优惠等措施,鼓励企业加大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研发投入。此外,政府还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通过加速专利审批流程和完善专利保护机制,确保企业的技术创新成果能够得到有效保障,从而提升企业在全市场中的竞争优势。

第二,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小企业在数字经济中至关重要,但面临资金、技术和市场等多重挑战。政府应加强对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小企业的支持,通过提供补贴和政策优惠,帮助其降低数字化转型的成本,推广数字技术应用。此外,应推动共享型数字化服务平台建设,提供供应链管理、市场营销和数据分析等一站式服务,提升企业的数字化能力。同时,政府应优化民营小企业的发展环境,简化融资、市场准入和政策扶持程序,推动金融改革,扩大普惠金融覆盖,鼓励金融机构为小企业提供数字化金融服务。简化行政审批环节,减少市场准入壁垒,营造公平透明的竞争环境。通过设立专项基金,支持中小企业在跨境电商和数字外贸等领域的数字化转型,提升其全球竞争力。

第三,推动企业国际化与全球价值链升级。企业在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时,应加快国际化步伐,特别是通过海外并购、跨国合作等方式,推动全球市场扩展。政府可以通过简化跨国并购审批流程、提供并购税收优惠等措施,鼓励企业收购国际领先企业或通过合作获取先进技术,快速提升技术能

力和全球竞争力。同时,政府应推动企业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或生产基地,进一步提升其全球布局和本土化优势。在此过程中,政府可以加强与国际市场的连接,推动贸易便利化和市场开放,为企业提供更为宽广的国际化发展空间。

第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与高附加值产品生产。为了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企业应加速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尤其是在智能制造、绿色经济和高端服务业等领域。政府应通过政策引导和财政激励,支持企业在高附加值产业的投资和创新。例如,政府可以提供专项资金,支持企业在智能制造和数字化生产等方面的技术升级,推动企业从低端制造向高端技术研发和服务转型。同时,政府应鼓励企业通过自主创新打造国际品牌,提升其在全球市场中的话语权和品牌影响力。

责任编辑:孙继国 朱晴晴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Upgrading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Zhan Xinyu Zhao Hao Jiang Jiatong

School of Economics, Beij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digital technology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enterprise transformation and global value chain (GVC) upgrading. Leveraging data from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customs import-export records, and input-output tables,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 on the GVC positioning of enterprises. Empirical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digital technology significantly enhances enterprises' GVC status, with particularly pronounced effects on small-scale, non-high-tech, mid-western,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Further mechanism analysis reveals that digital technology drives value chain optimization through three pathways: strengthening domestic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reducing market friction and enhancing overseas value capture capabilities. This research not only provides robust empirical evidence for digital technology-driven enterprise upgrading but also offers policy insights for advancing high-level openness, deepening reforms, and fostering innovative development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he findings hold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optimizing economic structures and constructing a competitive global economic landscape.

Key words: digital technology; global value chain (GVC); innovation capability; internationalization

数字技术赋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效应与机制研究

——来自中国 277 个城市的经验数据

克 魁 滕彦琼

新疆财经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2

摘 要: 凭借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前沿技术的强劲驱动,数字技术已成为赋能中国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和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路径。基于 2011—2022 年中国 277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数字技术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数字技术显著促进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且这一促进作用在地理区位优势、公众环境关注度高以及资源型城市中表现更为突出;第二,通过历史数据工具变量法和“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等稳健性检验,研究结论保持稳健;第三,要素重构是数字技术释放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红利的重要传导路径;第四,数字技术的正向影响呈现非线性递增的“边际效应”特征,并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不仅深化了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因素的理论认知,而且从效应、机制、区域异质性三个维度拓展了数字技术赋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框架,为推进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的深度融合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撑。

关键词: 数字技术;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要素错配; 空间溢出

中图分类号: 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 (2025)02-0103-20

一、引 言

数字技术作为赋能城市发展的关键力量,正与绿色产业、生态治理等多个领域深度融合,跨越多个范畴和层次,不断拓展其应用范围,在优化资源配置、降低能耗、助力减排等方面彰显了关键效能。中国信通院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4年)》显示,2014—2023年,中国数字资本对GDP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0.71%,美国则为0.18%^①。近年来,两国持续加大在人工智能、新型网络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战略投入与技术迭代,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实现了经济复苏的结构性突破。国家网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的理论、原则和政策研究”(24&ZD041)和2024年度新疆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数字技术对新疆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XJUFE2024D0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克魁,男,河北衡水人,经济学博士,新疆财经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研究;滕彦琼,女,辽宁丹东人,新疆财经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经济统计研究。

^①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4年)》,2025年1月, <https://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501/P020250116675154243240.pdf>.

信办发布的《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报告(2024)》显示,我国在数字技术赋能行业绿色转型与生态环境治理领域取得显著成效,同时通过数字化手段推动全民绿色生活方式普及,有效促进了传统产业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①。但伴随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以及中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亟待从粗放式的环境治理和资源利用模式“切换”至数字技术驱动的精细化绿色发展模式。因此,如何引导数据要素导向城市的绿色产业,已然成为政府及社会各界热议的行动焦点。

那么,数字技术是否赋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二者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其背后作用机制是什么?从自身特征到空间规律,这种关系又呈现何种差异?现有研究虽表明数字技术有利于生产率提升^②,但针对二者影响的精准实证尚缺,其背后作用机制及特征差异也亟待探究。本研究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研究内容,紧扣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智慧中国”建设愿景,立足城市层面全面测度数字技术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更微观视角剖析了二者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关系;二是机制研究,构建了“数字技术—要素错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分析框架,将数字技术、资本与劳动力要素错配以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纳入统一研究体系,有效破解了数字技术赋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黑箱”,深化拓展了既有理论研究成果;三是进一步分析,借“宽带中国”开展外生冲击检验,采用“宽带中国”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进行外生冲击检验,增强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和可靠性。同时,基于公众环境关注度和城市自然资源禀赋等异质性特征进行分组检验,不仅丰富了异质性分析的维度,还为制定差异化政策提供了实证依据。技术路线图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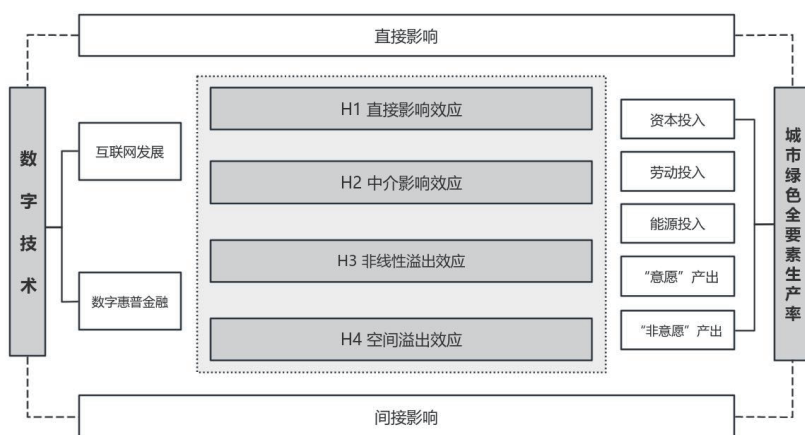


图1 数字技术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技术路线图

二、文献梳理

(一)数字技术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与内涵研究

数字技术是多种数字化技术的集合概念,主要涵盖硬件设施、软件系统和网络技术三大领域,其

①《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报告(2024)》,2024年11月30日, https://www.cac.gov.cn/2024-11/30/c_1734685875638875.htm。

② 龚勤林、万一孜:《数字技术应用与能源效率提升:来自中国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工程管理科技前沿》2024年第4期。

中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是其核心组成部分^①。这一概念体系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 Don Tapscott 于 1996 年在《数字经济》中提出,现有研究主要从整体概念^②和具体技术范畴^③两个维度展开探讨,但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标准。

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由经济学家 Solow 率先提出,广泛应用于评估企业等经济主体的发展状况^④。然而,在绿色发展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深入推进的背景下,传统全要素生产率测算体系已难以全面准确地反映经济发展的质量水平。为更科学地评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协同效应,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这一创新性概念应运而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将工业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氢排放物、废水、烟粉尘排放总量等“非期望”产出纳入考量范畴,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理念高度契合^⑤。从理论逻辑来看,绿色发展理念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提供了战略指引和目标导向,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则是实现绿色发展的具体路径和量化表征,二者相互促进、协同演进,共同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特征和实践方向。

(二) 数字技术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与机制研究

梳理现有文献,学界针对数字技术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研究已形成多层次的研究体系,涵盖宏观、中观和微观经济层面^⑥。在宏观层面,研究证实数字技术对经济增长^⑦、产业结构升级^⑧、新质生产力孵化^⑨以及高质量发展^⑩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在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形成了“生产率效应”^⑪与“生产率悖论”^⑫两种相悖理论。在中观产业层面,数字技术在推动农业产业链“提质增效”^⑬、促进制造业

① 刘平峰、张旺:《数字技术如何赋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科学学研究》2021 年第 8 期。

② Bharadwaj A., EL Sawy O. A., Pavlou P. A., et al., Digital Business Strategy: Toward a Next Generation of Insights, *MIS Quarterly*, vol. 37, no. 2, 2013, pp. 471–482.

③ Vial G., Understand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 Review and a Research Agend,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Information Systems*, vol. 28, no. 2, 2019, pp. 118–144.

④ 宋美喆、柴江艺:《数字经济背景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中国流通经济》2023 年第 6 期。

⑤ 张宙材:《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我国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研究》,《价格理论与实践》2023 年第 7 期。

⑥ 谢谦、郭杨:《数字技术、创新要素结构优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6 期。

⑦ 刘达禹、徐斌、刘金全:《数字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增长门槛还是增长瓶颈?》,《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6 期。

⑧ 方湖柳、潘娴、马九杰:《数字技术对长三角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22 年第 4 期。

⑨ 周振:《数字技术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作用机理、问题障碍与应对策略》,《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 4 期;翟绪权、夏鑫雨:《数字经济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机制构成与实践路径》,《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 1 期。

⑩ 黄勃、李海彤、刘俊岐等:《数字技术创新与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来自企业数字专利的证据》,《经济研究》2023 年第 3 期;吕铁、李载驰:《数字技术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基于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取的视角》,《学术月刊》2021 年第 4 期。

⑪ Lin W. T., Shao B., The Business Valu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puts Substitution: The Productivity Paradox Revisited,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vol. 42, no. 2, 2007, pp. 493–507.

⑫ Oliner S. D., Sichel D. E., Stiroh K. J., Explaining a Productive Decade,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vol. 30, no. 4, 2008, pp. 633–673.

⑬ 李飞星、叶云、张光宇:《数据价值链构件及其作用机理——基于数字技术促进农业产业的案例》,《科技管理研究》2022 年第 11 期。

智能化转型^①以及提升服务业生产效率^②等方面展现出显著成效。在微观企业层面,数字技术通过革新企业分工模式^③、优化资源配置效率^④、增强供应链协同效应^⑤等途径有效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然而,现有研究在数字技术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影响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首先,相关研究较为匮乏,作用机制尚未明晰;其次,关于数字技术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仍存在较大争议。部分学者担忧数字技术发展可能导致“接入鸿沟”和“使用鸿沟”等问题,产生“虹吸效应”^⑥,从而抑制外围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也有学者认为数字技术有助于促进信息扩散^⑦,推动资源共享,带动周边地区生产率提升和产业升级^⑧,并通过监测数据共享实现污染联防联控^⑨,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综上,现有研究在以下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第一,在研究视角上,多数研究通过数字经济和绿色技术创新等间接路径探讨数字技术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缺乏对二者直接关联的深入分析;第二,在研究对象上,现有区域对比研究多集中于国家和省级宏观层面,由于经济结构复杂,难以深入揭示其影响机制;第三,在研究内容上,实证分析多采用标准面板线性回归方法,缺乏空间维度的考察,对二者可能存在的空间效应分析不足。这些研究的待完善之处为本研究的深入探索提供了重要空间。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技术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效应

基于网络外部性与技术内生增长理论,数字技术可视为一种关键创新要素,网络的扩张使知识与技术在城市各主体间快速传播共享,产生协同创新效应。城市的产业布局层面,能够凭借多源数据的综合分析促进产业聚集,集聚区域内产业紧密关联,达成投入产出市场及交易信息的互通共享,进而直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⑩。企业层面,一方面,数字平台可以整合产业链上下游的信息,实现按需采购和生产要素的最优组合,成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微观基础^⑪。另一方面,上下

① 孙铭、张亦驰:《数字经济对我国制造业竞争力影响研究——基于产业集聚的中介效应分析》,《西部经济理论论坛》2022年第2期。

② 李帅娜:《数字技术赋能服务业生产率: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年第10期。

③ 杨勇:《数字技术影响产业链内部创新分工的机制研究》,《科学学研究》2023年第8期。

④ 韦庄禹:《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年第3期。

⑤ 张树山、谷城、张佩雯等:《智慧物流赋能供应链韧性提升:理论与经验证据》,《中国软科学》2023年第11期。

⑥ 裴长洪、倪江飞、李越:《数字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财贸经济》2018年第9期。

⑦ 赵涛、张智、梁上坤:《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管理世界》2020年第10期。

⑧ 张万里、宣暘:《产业智能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劳动力结构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调节作用》,《经济管理》2020年第10期。

⑨ 刘华军、乔列成:《中欧大气污染的空间交互影响网络与双边合作治理——基于大数据因果推断技术的实证研究》,《统计研究》2021年第2期。

⑩ 李玉洁、刘思思、贺正楚:《产业协同集聚、技术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系统工程》2023年第1期。

⑪ 李政、孙圣涛、刘丰硕:《两化融合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政策实践》,《中国经济问题》2023年第5期。

游企业间会催生示范效应,凭借协同设计、制造与管理手段,促进产业间资源循环利用与绿色技术共享,进一步推动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宏观层面的显著提升^①。创新生态层面,可实现污染排放与空气质量等环境数据的实时监测及溯源^②,同时拓展环境监督途径并强化监督效能,倒逼企业朝着绿色低碳方向发展^③,直接带动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提升。基于此,提出假设 H1。

H1: 数字技术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二) 数字技术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影响效应

当全部要素依市场机制自由流转并实现帕累托最优时,即达成了“有效配置”。基于“理性人假设”理论,减少流动性壁垒和资本要素与劳动力要素错配,被认为是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途径。资本要素配置层面:一是数字技术削减企业与消费者信息不对称成本,推动产品供给转向供需双向流通^④,企业以精准数据践行共享经济,纠正生产要素错配;二是技术革新激发企业跨领域竞争,智能体系突破行业壁垒,拓宽创新资源整合范围^⑤,优化资源配置;三是数字化转型带动要素数字化发展,变革组织与分工模式,催生“平台+企业”竞争格局,促进资源高效流动^⑥,有益于激发企业扩充绿色投资体量,进而达成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劳动力要素配置层面:一是数字技术发展可提供多元岗位与就业信息,重塑劳动力配置效率^⑦,矫正劳动错配直接提升绿色生产效率;二是经由“吸”“放”两阶段的衔接过渡,数字技术可切实削减资金机会成本,助力缓解融资困境、增添创新创业契机,突破劳动力要素流动的束缚,进而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⑧。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2。

H2: 数字技术的发展能够缓解资本、劳动力要素错配,进而有利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三) 数字技术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溢出效应

数字技术具有网络效应,依据梅特卡夫法则(Metcalf's Law),网络溢出呈边际效应递增态势^⑨。数字技术赋能将加快产业联动融合,降低边际成本,收益呈几何级数攀升^⑩。区域间通过数字技术构建信息共享平台,能够促进更具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形成,从而推动数字技术的绿色红利呈现非线性

① 张东玲、焦宇新、刘敏:《数字经济推动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吗?——基于“宽带中国”试点的证据》,《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23年第7期。

② 郭丰、杨上广、任毅:《数字经济、绿色技术创新与碳排放——来自中国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③ 魏丽莉、侯宇琦:《数字经济对中国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作用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年第8期。

④ 郭家堂、骆品亮:《互联网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吗?》,《管理世界》2016年第10期。

⑤ 余文涛、吴士炜:《互联网平台经济与正在缓解的市场扭曲》,《财贸经济》2020年第5期。

⑥ 傅元海、熊豪:《数字化转型改善资源配置的理论逻辑与路径选择》,《经济学家》2024年第9期。

⑦ 丛屹、俞伯阳:《数字经济对中国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财经理论与实践》2020年第2期。

⑧ 朱杰堂、焦冉晴、谢伟丽:《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金融监管研究》2022年第3期。

⑨ 王巧然:《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用机理与普惠性质》,《中国流通经济》2023年第6期。

⑩ 赵涛、张智、梁上坤:《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管理世界》2020年第10期。

扩张态势助力降碳减污协同增效^①。结合网络效应与梅特卡夫法则,当新市场主体涌现、新业态萌生与新产业融入时,其绿色红利呈非线性增长,由此推测数字技术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非线性的“边际效应”递增特征,且随数字技术发展水平和市场化进程提升而日益凸显。基于此,提出假设 H3。

H3: 数字技术的发展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边际效益”递增的非线性特征。

(四) 数字技术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技术凭借高共享性与高通用性等特质,得以快速冲破传统地理空间局限,既作用于本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亦助力邻近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②。具体而言,一方面,数字技术发展使生产要素突破地理局限在区域间流动,变革产业空间布局,促进区域共享发展^③。另一方面,数字技术进步可加速绿色知识和技术的区域传播扩散,增强其对邻近地区的溢出效能,推动周边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④。基于此,提出假设 H4。

H4: 数字技术可通过空间外溢效应作用于本地及周边邻近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四、研究设计

(一) 计量模型设定

1. 直接效应模型

为验证前述研究假设,率先围绕直接效应搭建基础模型,设定如下:

$$GTFP_{it} = \alpha_0 + \alpha_1 Dig_{it} + \alpha_c X_{it} + \mu_i + \be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式(1)中, $GTFP_{it}$ 为被解释变量,代表第*i*个城市*t*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Dig_{it} 为核心解释变量,代表第*i*个城市*t*年的数字技术发展水平。 X_{it} 为影响 $GTFP_{it}$ 的其他控制变量合集, μ_i 为城市*i*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固定效应, β_t 为控制时间固定效应, ε_{it} 为随机扰动项。 α_0 为常数项, α_1 、 α_c 为回归系数。

2. 中介效应模型

式(1)体现的直接效应,验证了数字技术 Dig 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GTFP$ 回归模型系数的显著性,现检验资本要素错配 τ_k 、劳动力要素错配 τ_l 是否为二者的中介变量。首先,构建 Dig 与中介变量 τ_k 、 τ_l 的回归方程,见式(2)。然后,构建 Dig 与中介变量 τ_k 、 τ_l 各自对 $GTFP$ 的回归方程,见式(3)(4)。最后,依据各回归方程中诸如 β_1 、 γ_1 、 γ_2 、 ϕ_1 、 ϕ_2 等回归系数的显著性,以判别中介效应是否成立。设定如下:

① 李志远、冯学钢、何静:《数字经济对旅游产业绿色发展效率效率的空间影响及门槛效应》,《地理科学进展》2024年第10期。

② 杨军、孙杰刚:《数字经济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东岳论丛》2024年第11期。

③ 黎新伍、黎宁:《贸易便利化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及空间效应研究》,《国际经贸探索》2021年第10期。

④ 姚璐、王书华、王小腾:《数字赋能中国经济绿色转型研究——基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3年第2期。

$$Dig_{it} = \beta_0 + \beta_1 \tau_{k_{it}} (\beta_1 \tau_{l_{it}}) + \beta_c X_{it} + \mu_i + \be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GTFP_{it} = \gamma_0 + \gamma_1 Dig_{it} + \gamma_2 \tau_k + \gamma_c X_{it} + \mu_i + \be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3)$$

$$GTFP_{it} = \varphi_0 + \varphi_1 Dig_{it} + \varphi_2 \tau_l + \varphi_c X_{it} + \mu_i + \be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4)$$

3. 门槛效应模型

在探究间接传导机制时,实证检验不能仅局限于中介效应模型,还需兼顾互联网的网络效应与遵循的梅特卡夫法则,即数字技术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二者本身,极有可能对数字技术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过程中的非线性动态溢出效应发挥间接影响。设定如下:

$$GTFP_{it} = \lambda_0 + \lambda_1 Dig_{it} \times I(Adj_{it} \leq \theta) + \lambda_1 Dig_{it} \times I(Adj_{it} > \theta) + \lambda_c X_{it} + \mu_i + \varepsilon_{it} \quad (5)$$

式(5)中, Adj_{it} 为数字技术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等门槛变量, $I(\cdot)$ 为引入的指示函数,其值取 1 或 0,目前设定为单门槛模式。

4. 空间溢出效应模型

为探究数字技术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在式(1)中纳入二者空间交互项及其他控制变量,将原模型拓展为 SDM 空间杜宾模型。设定如下:

$$GTFP_{it} = \alpha_0 + \rho W GTFP_{it} + \phi_1 W Dig_{it} + \alpha_1 Dig_{it} + \phi_c W X_{it} + \lambda_c X_{it} + \mu_i + \be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6)$$

式(6)中, ρ 为空间自回归系数, W 为空间权重矩阵。 $W GTFP_{it}$ 、 $W Dig_{it}$ 分别为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的空间交互项, ϕ_1 、 ϕ_c 分别为二者的弹性系数。为从多维度验证结论,本研究选取地理距离矩阵、经济距离矩阵以及邻接矩阵三种情境展开回归分析。

(二) 变量测度与说明

1.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主要分为参数估计法与非参数估计法,参数估计法涵盖 GMM 法^①、随机前沿 SFA 法^②、索罗余值 OLS 法^③、LP 法^④ 和 OP 法^⑤,非参数估计法则主要涵盖指数法^⑥ 和数据包络分析法^⑦。本研究将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中的 SBM-GML 指数法测算,指标体系见表 1。

资本投入为资本存量和城市化水平。其中,资本存量以 Goldsmith 的永续盘存法(PIM)为基础进行折算,公式为 $K_{i,t} = K_{i,t-1} \times (1 - \delta_t) + I_{i,t}$ 。式中的 $K_{i,t}$ 、 $K_{i,t-1}$ 分别为在 t 年、 $t-1$ 年的资本存量; δ_t 为固定资产折旧率,借鉴张军的研究结果^⑧,取值为 9.6%; $I_{i,t}$ 为在 t 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涵盖了每年年末从事社会劳动并获得相应经济报酬的个体总和。城市化水平以各年城市城镇建成区面积表示,即

① 鲁晓东、连玉君:《中国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估计:1999—2007》,《经济学(季刊)》2012年第2期。

② 涂正革、肖耿:《中国的工业生产力革命——用随机前沿生产模型对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分解及分析》,《经济研究》2005年第3期。

③ 谢千里、罗斯基、张轶凡:《中国工业生产率的增长与收敛》,《经济学(季刊)》2008年第3期。

④ 邵敏、包群:《政府补贴与企业生产率——基于我国工业企业的经验分析》,《中国工业经济》2012年第7期。

⑤ Feenstra R. C., Li Z., Yu M., Exports and Credit Constraints under Incomplete Information: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China,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96, no. 4, 2011, pp. 729-744.

⑥ Hsieh C. -T., Klenow P. J., et al., Misal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24, no. 4, 2009, pp. 1403-1448.

⑦ 崔志新、陈耀:《区域技术协同创新效率测度及其演变特征研究——以京津冀和长三角区域为例》,《当代经济管理》2019年第3期。

⑧ 张军、吴桂英、张吉鹏:《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经济研究》2004年第10期。

城市范围内已经开发和建设的土地,包括居住、商业、工业等用途的面积。劳动投入以年末市辖区从业人员数表示,包括全职、兼职、自雇等几类人员。能源投入以能源消费总量(万吨标准煤)表示。“意愿”产出以国内生产总值(万元)表示,以2006年为基期,并以各省物价指数对名义国内生产总值进行平减获取。“非意愿”产出:工业废气排放量(吨)、工业废水排放量(万吨)、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吨)。

2. 数字技术发展水平(Dig)

虽然现有研究已从不同角度对数字技术进行了定义与测度,但尚未形成统一标准,可概括为以下三个主流方向:一是构建单一或多维度的代理指标,如数字中国指数^①、基本构成要素^②、关键词词频^③、多维度^④;二是替代衡量对数字经济发展起推动作用的指标,如数字技术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⑤、行业ICT资本投入指数^⑥、资本存量^⑦;三是使用发展中的经济效益或社会问题指标进行衡量,如数字普惠金融^⑧、数字经济^⑨。综上,大多数学者更倾向于采用客观赋值法中的熵值法构建数字技术综合评价指标。故本研究参考黄群慧等^⑩的方法,运用熵值法结合互联网发展和数字普惠金融两个维度,构建数字技术发展的综合指数,指标体系见表1。

表1 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和数字技术发展水平(Dig)测度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三级指标单位	指标方向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投入	资本投入	资本存量(永续盘存法估计折算)	—
		城市化水平(城镇建成区面积)	平方千米	+
		劳动投入	年末市辖区从业人员数	万人
		能源投入	能源消费总量	万吨标准煤
	产出	“意愿”产出	国内生产总值	万元
		“非意愿”产出	工业废气排放量	吨
			工业废水排放量	万吨
			工业烟粉尘排放量	吨
			每百人国际互联网用户数	百人
			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	百人
数字技术	互联网发展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就业人数(第三产业)	人	+
		人均电信业务总量	万元	+
	数字普惠金融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	+

- ① 韦庄禹:《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年第3期。
- ② Von Briel F., Davidsson P., Recker J., Digital Technologies as External Enablers of New Veure Creation in the IT Hardware Sector,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vol. 42, no. 1, 2018, pp. 47-69.
- ③ 黎伟、许桂华、任晓怡:《企业金融化与数字技术应用:促进还是抑制?》,《经济体制改革》2021年第6期。
- ④ 江永红、刘梦媛、杨春:《数字化对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驱动机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3年第9期;岳宇君、马艺璇、孙建敏:《数字技术赋能城市环境治理的效应与机制研究》,《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
- ⑤ 陈楠、蔡跃洲:《数字技术对中国制造业增长速度及质量的影响:基于专利应用分类与行业异质性的实证分析》,《产业经济评论》2021年第6期。
- ⑥ 孙琳琳、郑海涛、任若恩:《信息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世界经济》2012年第2期。
- ⑦ 郭鹏飞、罗玥琦:《中国信息通信技术分行业资本存量的估算》,《统计与决策》2018年第13期。
- ⑧ 张勋、万广华、张佳佳等:《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经济研究》2019年第8期。
- ⑨ 赵涛、张智、梁上坤:《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管理世界》2020年第10期。
- ⑩ 黄群慧、余泳泽、张松林:《互联网发展与制造业生产率提升:内在机制与中国经验》,《中国工业经济》2019年第8期。

3. 中介 / 门槛变量 (τ_k & τ_l)

鉴于数据获取的现实考量,运用资源错配指数呈现实际资本运用量相较于有效配置资本量的偏离状况。参考白俊红和刘宇英的方法^①,以计算各城市资本错配指数(τ_k)、劳动力错配指数(τ_l)。设定如下:

$$\tau_k = \frac{1}{\gamma K_{it}} - 1, \quad \tau_l = \frac{1}{\gamma L_{it}} - 1 \quad (7)$$

式(7)中, γK_{it} 、 γL_{it} 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力价格的相对扭曲系数,设定如下:

$$\gamma K_{it} = \left(\frac{K_{it}}{K} \right) / \frac{S_{it} \beta_{K_{it}}}{\bar{\beta}_K}, \quad \gamma L_{it} = \left(\frac{L_{it}}{L} \right) / \frac{S_{it} \beta_{L_{it}}}{\bar{\beta}_L} \quad (8)$$

式(8)中, $\frac{K_{it}}{K}$ 、 $\frac{L_{it}}{L}$ 分别为第 i 个城市 t 年使用的资本、劳动力占总资本、总劳动力的比重, S_{it} 为第 i 个城市 t 年产出在全部总产出中所占份额, $\beta_{K_{it}}$ 、 $\beta_{L_{it}}$ 分别为第 i 个城市 t 年资本、劳动力对各自产出的贡献程度, $\bar{\beta}_K = \sum_{j=1}^N S_j \beta_{K_j}$ 、 $\bar{\beta}_L = \sum_{j=1}^N S_j \beta_{L_j}$ 分别为以产出加权的资本、劳动力贡献值, $\frac{S_{it} \beta_{K_{it}}}{\bar{\beta}_K}$ 、 $\frac{S_{it} \beta_{L_{it}}}{\bar{\beta}_L}$ 分别为测度的资本、劳动力达成有效配置状态下第 i 个城市 t 年应投入使用的资本、劳动力比重。为统一回归方向,在处理资源配置不足($\tau > 0$)与资源配置过度($\tau < 0$)两种态势时,将参考季书涵等取绝对值的方法^②,所得数值绝对值越大,越能直观反映资源错配的严重程度。

4. 控制变量

为降低因遗漏变量而引发的内生性问题,基于既有文献选取了经济集聚水平(EA)、就业结构(ES)、工业化水平($lnInd$)、产业结构($lnIS$)、城市收入水平($lnUI$)、政府干预程度(Gov)、市场化指数(Mar)指标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其中,以地区生产总值与行政区域土地面积比值代表经济集聚水平,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与就业总人数比值代表就业结构,工业就业(含非农产业)及增加值占比代表工业化水平,第三产业增加值与地区生产总值比值代表产业结构,在岗职工平均薪酬代表城市收入水平,政府财政一般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比值代表政府干预程度,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数与城镇就业总人数比值代表市场化指数。此外,为解决异方差问题,对工业化水平、产业结构、城市收入水平等指标进行取对数化处理。

(三)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选取了 2011—2022 年中国 277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未包含数据缺失较多或时序不统一的城市样本),样本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以及历年中国政府网站发展研究报告、各市历年统计公报等。对于少量缺失数据已利用 ARIMA 根据时间趋势填充处理,整理后得到平衡面板数据。鉴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仅更新至 2022 年,因此本研究的时间跨度设为 2011—2022 年。各变量指标的描述性统计信息见表 2。

① 白俊红、刘宇英:《对外直接投资能否改善中国的资源错配》,《中国工业经济》2018 年第 1 期。

② 季书涵、朱英明、张鑫:《产业集聚对资源错配的改善效果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6 年第 6 期。

表 2 各变量指标的描述性统计信息

变量	指标名称	符号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极小值	极大值
被解释变量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i>GTFP</i>	3324	0.9556	0.1840	0.0110	1.7154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技术发展水平	<i>Dig</i>	3324	0.0977	0.0913	0.0036	0.8917
门槛 / 中介变量	资本要素错配指数	τ_k	3324	0.7108	0.3259	0	2.0174
	劳动力要素错配指数	τ_l	3324	0.3712	0.3199	0	2.5108
	经济集聚水平	<i>EA</i>	3324	0.5744	0.8474	0.1113	15.6466
	就业结构	<i>ES</i>	3324	0.4207	0.5010	-4.3070	1.9600
控制变量	工业化水平	<i>lnInd</i>	3324	-0.9390	0.3727	-4.3070	3.8215
	产业结构	<i>lnIS</i>	3324	-0.8511	0.2436	-1.9407	-0.0725
	城市收入水平	<i>lnUI</i>	3324	1.5074	0.9756	0.1120	2.6912
	政府干预程度	<i>Gov</i>	3324	0.2476	0.1789	0.0667	0.9994
	市场化指数	<i>Mar</i>	3324	1.5575	2.2643	0.1260	76.7260

注：以上基础数据经作者整理得出。

五、数字技术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检验

(一) 基准回归结果

采取以下数据预处理步骤：为剔除主要连续变量中可能存在的极端异常值，采取 1% 以内的缩尾处理方法；为规避多重共线性，采用方差膨胀因子(VIF)诊断性检验各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经检验的 VIF 值约为 1.38，维持在较低水平，表明变量间不存在显著多重共线性问题；为排除面板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横截面相关性和序列相关性等问题，采用了 Driscoll-Kraay 标准差来估计标准误差。

表 3 为使用面板模型、Tobit 模型的回归结果。列(1)为面板随机效应，列(2)(3)分别为未加入控制变量、加入控制变量的面板固定效应，列(4)为考虑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GTFP* 的数值均保持在正数范围内，构成了受限因变量的特性，由此选取的含固定效应的 Tobit 模型。

表 3 数字技术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面板随机效应	(2) 面板固定效应	(3)	(4) Tobit
<i>Dig</i>	0.6416*** (0.0205)	0.5016*** (0.0308)	0.4992*** (0.0316)	0.4992*** (0.0302)
<i>EA</i>	0.0106*** (0.0022)		0.0234*** (0.0026)	0.0234*** (0.0025)
<i>ES</i>	0.2628*** (0.0036)		-0.0034 (0.0097)	-0.0034 (0.0093)
<i>lnInd</i>	-0.0060 (0.0050)		0.0237*** (0.0055)	0.0237*** (0.0053)
<i>lnIS</i>	-0.0551*** (0.0093)		0.0302** (0.0118)	0.0302** (0.0112)
<i>lnUI</i>	-0.0094*** (0.0021)		-0.0030 (0.0028)	-0.0030 (0.0027)
<i>Gov</i>	-0.0105 (0.0091)		-0.0321*** (0.0099)	-0.0321*** (0.0095)
<i>Mar</i>	0.0004 (0.0007)		0.0016*** (0.0006)	0.0016*** (0.0006)
<i>Constant</i>	0.7399*** (0.0130)	0.9066*** (0.0033)	0.9526*** (0.0158)	0.9526*** (0.0257)
城市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是
样本量	3324	3324	3324	3324
拟合优度	0.7485	0.8573	0.8630	-

注：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为 10%、5%、1% 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整体上,数字技术 Dig 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GTFP$ 于多种模型中呈显著正向效应,故 $H1$ 得证且回归稳健。对比面板固定效应与含固定效应的 Tobit 模型,结论高度契合。控制变量上,回归结果与理论预期亦基本吻合。鉴于此,后续研究将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二) 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前文从资本、劳动力要素错配视角,理论分析了数字技术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传导机制,现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以验证假设 $H2$ 。首先,参照式(2)验证了数字技术是否缓解了资本、劳动力要素错配,表 4 列(1)(3)数字技术 Dig 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分别在 1%、5% 水平下显著,表明数字技术在资本、劳动力要素配置的合理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后,参照式(3)(4)将中介变量 τ_k 、 τ_l 依次纳入数字技术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回归方程,观察数字技术 Dig 系数及其显著性的变动情况以作判断,表 4 列(2)(4)显示数字技术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相比表 3 基准回归结果的列(3)均有所下降,意味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能够缓解资本、劳动力要素错配,进而有利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假设 $H2$ 得证。

表 4 数字技术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中介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τ_k	(2) $GTFP$	(3) τ_l	(4) $GTFP$
Dig	0.2822*** (0.0857)	0.1459*** (0.0346)	0.3697** (0.1562)	0.4157*** (0.0339)
τ_k		0.0281*** (0.0056)		
τ_l				0.0121*** (0.003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Constant	0.6587*** (0.0517)	0.9275*** (0.0157)	0.2387*** (0.0707)	0.9360*** (0.0154)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3324	3324	3324	3324
拟合优度	0.0415	0.8904	0.4958	0.8861

(三) 非线性效应分析

基于数字技术的网络效应与“边际效应”递增的梅特卡夫法则,现采用门槛效应模型验证假设 $H3$ 。依照 Hansen 法率先开展门槛存在性检验^①,经“自助法”300 次抽样后发现,数字技术、资本要素错配通过单门槛检验,劳动力要素错配通过双门槛检验。表 5 为门槛效应回归结果,列(1)以数字技术作门槛变量,估计系数在 1% 水平下显著,当数字技术指数跨越门槛值时,数字技术与绿色生产各环节协同整合趋优,促使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增强。列(2)(3)分别以资本、劳动力要素错配作门槛变量,显示当门槛值提升时回归系数值呈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化,即数字技术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呈“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即随着数字技术发展水平的提升,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先减弱后增强。综上,数字技术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发展的

① 由于篇幅限制,门槛存在性检验结果未在此列示,备索。

动态影响并非单纯取决于自身水平,还深受资本、劳动力要素错配等因素的中介作用影响,假设 H3 得证。

表 5 数字技术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门槛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i>Dig</i>	(2) τ_k	(3) τ_l
门槛值	q_1			0.1556
	q_2	0.3739	1.3571	0.3426
<i>Dig</i> · <i>I</i> ($Th \leq q_1$)		1.489*** (0.0060)	1.635*** (0.0308)	1.638*** (0.0349)
<i>Dig</i> · <i>I</i> ($q_1 < Th < q_2$)		1.879*** (0.0182)	1.775*** (0.0503)	1.591*** (0.0268)
<i>Dig</i> · <i>I</i> ($Th \geq q_2$)				1.666*** (0.039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Constant		0.180*** (0.0067)	0.168*** (0.0040)	0.167*** (0.0085)
拟合优度		0.967	0.949	0.949

(四)空间计量回归结果

1. 全域莫兰指数

在开展空间计量分析前,需针对数字技术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施空间自相关检验。本部分采用莫兰指数(Moran's I)计算了经济距离矩阵下各年度空间效应。根据表 6 莫兰指数值可知,各项指数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整体呈增强态势(*Dig*: 0.0283→0.0589,*GTFP*: 0.0185→0.0381),表明各城市的数字技术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空间自相关性,即二者在空间上呈集聚分布态势。

表 6 2011—2022 年中国城市经济距离矩阵下的数字技术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蔓延”特征

年份	<i>Dig</i>		<i>GTFP</i>	
	Moran's I	z 值	Moran's I	z 值
2011	0.0283***	6.7793	0.0185***	4.8819
2012	0.0177***	4.5805	0.0212***	5.256
2013	0.0185***	4.6927	0.0187***	4.7846
2014	0.0232***	5.6846	0.0231***	5.5257
2015	0.0213***	5.2057	0.0175***	4.3761
2016	0.0182***	4.5598	0.0247***	5.8657
2017	0.0192***	4.7069	0.0178***	4.8783
2018	0.0102***	2.8644	0.0106***	3.4263
2019	0.0195***	4.7913	0.0069***	2.8854
2020	0.0308***	7.0787	0.0279***	6.3988
2021	0.0235***	5.618	0.0094***	3.5815
2022	0.0589***	12.8757	0.0381***	8.5123

依据莫兰指数值绘制的莫兰散点图,可更为直观地呈现出在空间上的集聚状态与分布特征。鉴于文章篇幅限制,特选取 2020、2021、2022 年三个时间截面,分别绘制各年度数字技术(见图 2)、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见图 3)发展指数莫兰散点图。整体而言,多数城市散点主要聚集于第一、第三象限,

呈现出高一高(H-H)、低—低(L-L)集聚的空间相关性特征。处于高一高集聚状态的城市大多为东部沿海经济较发达区域,诸如广东、上海、山东等地,凭借在经济、科技、人才等多方面的优势,形成了良好的集群效应,有力地推动了区域整体技术发展与绿色转型提升协同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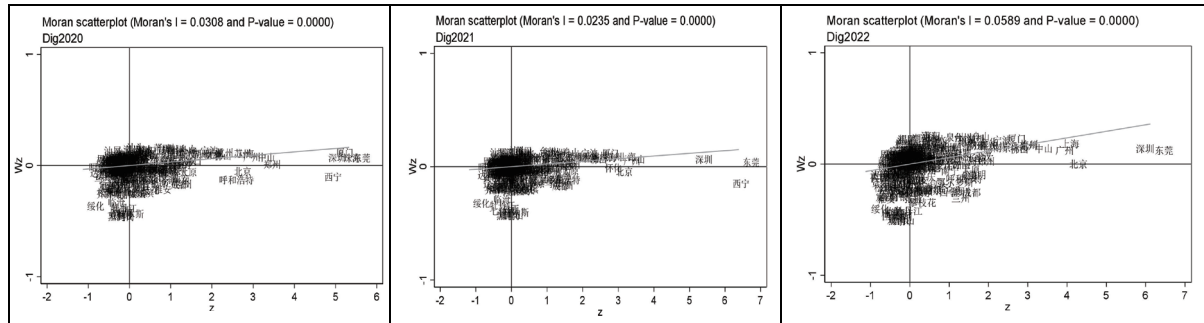


图2 2020—2022年中国城市经济地理矩阵下的数字技术发展指数莫兰散点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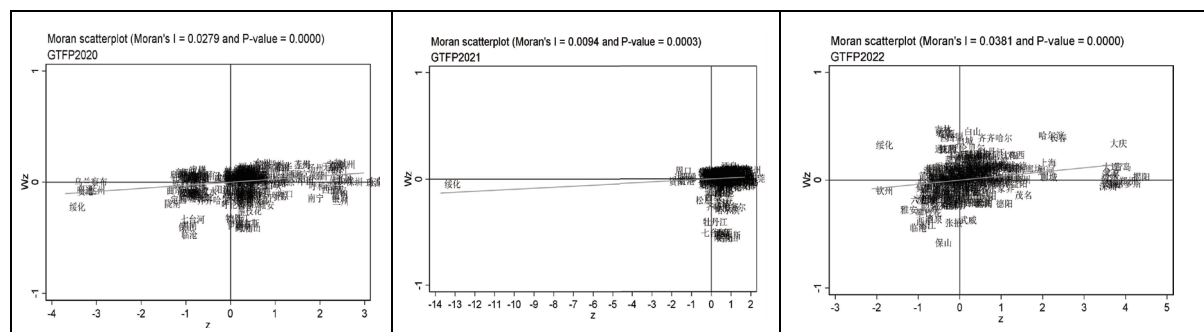


图3 2020—2022年中国城市经济地理矩阵下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发展指数莫兰散点图

2. 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在进行空间计量模型前,按照 Elhorst 提出的检验思路^①,依次实施“LM 检验→SDM 模型固定效应检验→Hausman 检验→LR、Wald 检验”后,发现 SDM 空间杜宾模型无法转化为 SAR 空间滞后模型与 SEM 空间误差模型,最终选定时空双重固定效应的 SDM 空间杜宾模型作为最优模型。同时,本文还列出了时空双重固定效应的 SAR 空间滞后模型,以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 7 显示,基于时空双重固定效应的 SAR 与 SDM 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数字技术 Dig 的回归系数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且其空间交互项 $WDig$ 的系数也显著为正。此外,在经济距离和邻接矩阵两种空间权重矩阵下,空间自回归系数 ρ 均在不同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这一结果进一步证实了样本城市间存在数字技术引入的外部交互效应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内生交互效应。但直接依据空间交互项回归系数评估空间溢出效应需谨慎,需采用偏微分法的直接效应与溢出(间接)效应深入分析具体影响。直接效应显示,数字技术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均在 1% 水平上显著,意味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可以较好实现对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溢出效应显示,数字技术的

^① Elhorst J. P., Matlab Software for Spatial Panels,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vol. 37, no. 3, 2014, pp. 389–405.

发展可以很好地辐射邻近地区,促进邻近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假设 H4 得证。

表 7 数字技术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空间模型的回归结果

模型设定	SAR			SDM		
	地理距离	经济距离	邻接矩阵	地理距离	经济距离	邻接矩阵
ρ	-0.1689 (-1.540)	0.0382*** (3.420)	0.0473*** (0.013)	-0.0736 (0.142)	0.0195* (0.142)	0.0312* (1.08)
Dig	1.4666*** (0.012)	1.4848*** (0.011)	1.4691*** (0.012)	1.4663*** (0.012)	1.4885*** (0.011)	1.4682*** (0.012)
$WDig$				0.4124* (0.241)	0.8777** (0.387)	0.0103 (0.04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直接效应	1.4676*** (120.070)	1.4901*** (135.740)	1.4702*** (120.610)	1.4665*** (118.030)	1.4877*** (131.510)	1.4690*** (118.200)
溢出效应	0.3546*** (3.580)	0.0592*** (3.460)	0.0739*** (3.790)	0.2938*** (3.650)	0.0305 (1.290)	0.0599*** (2.740)
总效应	1.8222*** (19.130)	1.5492*** (122.830)	1.5441*** (81.480)	1.7602*** (22.880)	1.5181*** (73.300)	1.5289*** (74.510)
拟合优度	0.945	0.947	0.944	0.943	0.948	0.934

注: 括号内数值为 z 值。

(五) 异质性检验分析

1. 区域异质性

本研究以国家统计局划分的地理区位将样本分为东、中、西及东北四大经济区,结果见表 8。相较于东北地区,数字技术对其他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为显著。原因可能在于,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位于胡焕庸线(即瑗珲—腾冲线)东侧,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多方面更具显著优势。尽管西部地区位于胡焕庸线西侧,互联网普及率较低,但受益于国家西部大开发等政策的推动,未达边际递减边界反而加强了数字技术的“赋能”和“渗透”,推动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此外,中西部地区应充分利用后发优势,通过数字技术推动金融创新与发展^①,并借助金融手段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推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局面。

表 8 数字技术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
Dig	0.4699*** (0.0331)	0.5419*** (0.0778)	0.5441*** (0.1135)	0.3778 (0.245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Constant$	0.8958*** (0.0270)	0.9645*** (0.0257)	0.9143*** (0.0415)	0.9954*** (0.0475)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200	960	924	240
拟合优度	0.9105	0.9190	0.7807	0.8513

① 尹振涛、汪勇:《数字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路径与对策》,《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4 期。

2. 分位数回归

为探究数字技术对不同城市影响是否存在差异,选取 10、25、50、75、90 分位数进行分位数回归。表 9 结果可知,各项系数为正,且均通过了 1%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所处分位数渐次升高,数字技术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推动效应总体呈先减弱后增强的“U”型趋势。可能原因在于发展初期,城市企业采用数字技术的成本较高,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数字技术带来的效益,使得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推动作用减弱。发展中期(转折点),部分企业成功应用数字技术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示范效应,数字技术在行业内扩散。发展后期,创新生态系统成熟,产学研合作紧密,有助于开发更先进的数字技术应用,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表 9 数字技术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分位数回归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P10	(2) P25	(3) P50	(4) P75	(5) P90
<i>Dig</i>	0.6234*** (0.0293)	0.6181*** (0.0197)	0.5622*** (0.0153)	0.5107*** (0.0180)	0.5312*** (0.019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i>Constant</i>	0.6741*** (0.0186)	0.7484*** (0.0125)	0.8267*** (0.0097)	0.8988*** (0.0114)	0.9542*** (0.0125)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3324	3324	3324	3324	3324

3. 公众环境关注度异质性

随着人们对雾霾、碳排放、水污染等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不断攀升,公众环境关注度已成为反映社会对环境保护重视程度的重要指标。参考已有研究^①,采用引擎检索“环境污染”词汇的日均检索次数代表公众环境关注度指数,并依据指数中位数划分为高、低两组。表 10 列(1)(2)显示,数字技术皆能显著促进两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在高环境关注度组内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相较之下,低环境关注度组可能由于缺乏来自公众舆论和市场需求的强大拉力,促进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

4. 自然资源禀赋异质性

依据国务院 2013 年 11 月发布的资源型城市名单^②,进一步探究自然资源禀赋的城市中,数字技术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效应的差异性。表 10 列(3)(4)显示,数字技术皆能显著促进不同类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在自然资源型城市内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得益于丰富的自然资源为数字技术的应用提供了物质基础与实践场景。相较之下,非自然资源型城市虽然也有积极成效,但在应用场景与作用深度上略显逊色。

① 刘维林、王艺斌:《数字经济赋能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效应与机制研究》,《南方经济》2022 年第 8 期;陈艳莹、曹天一、张子贞:《信息可得性会影响开发区的绿色赋能效应吗——来自中国工业污染源重点调查企业的经验证据》,《财贸经济》2024 年第 11 期。

② 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印发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 年)的通知》,2013 年 11 月 12 日, https://www.gov.cn/zfwj/2013-12/03/content_2540070.htm。

表 10 数字技术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公众环境关注度 & 自然资源禀赋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高环境关注度	(2) 低环境关注度	(3) 自然资源型	(4) 非自然资源型
<i>Dig</i>	0.8338*** (0.0192)	0.4929*** (0.0191)	0.8315*** (0.1199)	0.4753*** (0.033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i>Constant</i>	0.7251*** (0.0207)	0.7929*** (0.0179)	0.9075*** (0.0289)	0.9582*** (0.0192)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662	1662	1212	2112
拟合优度	0.7693	0.7421	0.8641	0.8654

(六) 稳健性检验

1. 控制固定效应

在绿色经济发展较为发达的城市,互联网常优先发展,数字技术应用由此呈现“先发优势”,但可能为本研究实证环节的因果判定引入内生性干扰。为弱化数字技术广泛发展带来的宏观系统性环境变化冲击,参考赵涛等的方法^①,本研究引入涵盖省份固定效应及省份与年份交互效应的虚拟变量。如表 11 列(1)(2)所示,即便将宏观系统性变化纳入考量,核心结论依旧稳健。

2. 变量替换

参考刘家树和顾为都的方法^②,本研究分别实施了两种策略以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一是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由超效率 CCR 模型度量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_{CCR}$);二是将核心解释变量替换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DFTI$)。表 11 列(3)(4)显示,回归系数的方向大体上维持不变且仍显著,有力地证明了原始模型具备稳健性。

3. 缩短时间窗口

鉴于 2015 年以来我国数字技术的迅猛进步及 2020 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特殊情况,本研究将样本时间范围调整至 2015—2019 年,并据此重新进行了回归估计。表 11 列(5)显示,即使缩短样本时间窗口,数字技术 *Dig* 的回归系数符号与显著性保持稳定,进一步验证了数字技术持续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4. 滞后效应检验

针对数字技术发展及其影响的时滞效应,本研究进一步采用 1 期的滞后处理考察。表 11 列(6)显示,数字技术依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验证了假设 H1 的稳健性。

5. 工具变量法

数字技术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或许存在互为因果的交互关系,进而易引发内生性问题,参

① 赵涛、张智、梁上坤:《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管理世界》2020 年第 10 期。

② 刘家树、顾为都:《数字技术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机制与效应——基于中国 265 个城市的实证检验》,《江淮论坛》2023 年第 2 期。

考 Nunn 通过引入随时间变化变量构造面板工具变量的方法^①,采用各样本城市 1984 年每百人固定电话数量、上一年全国互联网用户数这一具有时间动态特性的变量构建交互项(IV),用作该城市数字技术发展指数的工具变量,结果见表 11 列(7)(8)。列(8)显示,K-P rk LM 统计量($p=0.0000$)于 1% 水平上显著,即所选工具变量切实有效。同时 K-P rk Wald F 统计量(25.297)大于 Stock-Yogo 弱识别检验下 10% 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16.38),进一步夯实了所选工具变量既满足相关性要求,又契合外生性假设这一结论。显著为正的回归系数表明,内生性问题未对研究结论产生影响。

表 11 数字技术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1)	(2)	(3)	(4)	(5)	(6)	(7)	(8)
	GTFP	GTFP	GTFPCCR	GTFP	GTFP	GTFP	Dig	GTFP
变量	固定效应		变量替换		缩短时间窗口	滞后效应	工具变量法	
	省份	省份 * 年份	替换被解释变量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剔除年份变量	滞后一期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Dig	0.4226*** (0.0306)	0.4466*** (0.0320)	0.1007* (0.0541)		0.5315*** (0.0649)	0.3615*** (0.0376)		0.6749*** (0.0886)
DFI				0.0018*** (0.0001)				
IV							0.0240*** (0.0028)	
Kleibergen-Paap rk LM statistic								19.426 [0.0000]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statistic								25.297 [16.3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效应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省份 * 年份效应	否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Constant	0.9625*** (0.0150)	0.9558*** (0.0158)	0.5046*** (0.0270)	0.6707*** (0.0329)	0.9129*** (0.0350)	0.9614*** (0.0173)	0.3247*** (0.0143)	0.9592*** (0.0329)
样本量	3324	3324	3324	3324	1385	3047	2354	2354
拟合优度	0.8806	0.8904	0.5613	0.8586	0.6009	0.8609	0.3853	0.3135

注: [] 数值为 p 值, {} 数值为 Stock-Yogo 弱识别检验 10% 水平上的临界值。

6. 外生冲击检验

实际上,一座城市的数字技术发展水平深受当地市场规模、产业技术实力及对外开放程度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而这些要素又对其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深远影响。鉴于此,本研究选取了 2014—2016 年间分批确定的 117 个城市(群)作为“宽带中国”(Broadband China, BC)试点项目,并采用双重差分(DID)方法以评估此现象。BC 为“宽带中国”政策变量,若 i 城市在 t 年入选该政策,则 $BC=1$,否则为 0。基于数字技术离不开稳固的网络基础设施作为支撑,且试点政策呈现逐步拓展之势,营造出一个近乎理想的准自然实验场景,便于更“干净”地识别数字技术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① Nunn N., Qian N., US Food Aid and Civil Conflic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04, no. 6, 2014, pp. 1630–1666.

间的因果关系。设定如下：

$$GTFP_{it} = \alpha_0 + \alpha_1 BC_{it} + \alpha_2 X_{it} + \mu_i + \beta_t + \varepsilon_{it} \tag{9}$$

$$\tau_k = \beta_0 + \beta_1 BC_{it} + \beta_2 X_{it} + \mu_i + \beta_t + \varepsilon_{it} \tag{10}$$

$$\tau_l = \beta_0 + \beta_1 BC_{it} + \beta_2 X_{it} + \mu_i + \beta_t + \varepsilon_{it} \tag{11}$$

$$GTFP_{it} = \gamma_0 + \gamma_1 BC_{it} + \gamma_2 \tau_k + \gamma_2 X_{it} + \mu_i + \beta_t + \varepsilon_{it} \tag{12}$$

$$GTFP_{it} = \gamma_0 + \gamma_1 BC_{it} + \gamma_2 \tau_l + \gamma_2 X_{it} + \mu_i + \beta_t + \varepsilon_{it} \tag{13}$$

之后,检验中介变量资本要素错配 τ_k 、劳动力要素错配 τ_l 在“宽带中国”试点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过程中的内在作用机制。首先,参照式(10)(11)将差分项 BC 与中介变量 τ_k 、 τ_l 进行回归,验证“宽带中国”试点具备影响中介变量的能力。然后,参照式(12)(13)将 BC 分别与中介变量 τ_k 、 τ_l 一同和 $GTFP$ 进行回归,倘若 BC 回归系数不显著,或仍显著但系数降低,即表明 τ_k 、 τ_l 是影响 $GTFP$ 的路径变量。

结果见下表 12,列(1)(2)显示“宽带中国”试点在 1% 的水平上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推动作用。作用机制层面,列(3)(5)显示“宽带中国”试点显著缓解了城市的资本、劳动力要素错配状况。进一步地,列(4)(6)在证实显著正向影响的基础上,分别纳入 τ_k 、 τ_l 后的 BC 回归系数仍显著但有所降低, τ_k 、 τ_l 的系数显著为正。综合来看,充分说明资本要素错配和劳动力要素错配是“宽带中国”试点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机制。

表 12 “宽带中国”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效应及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i>GTFP</i>	<i>GTFP</i>	τ_k	<i>GTFP</i>	τ_l	<i>GTFP</i>
<i>BC</i>	0.0977*** (0.0207)	0.0770*** (0.0183)	0.1005* (0.0539)	0.0827*** (0.0193)	0.3247*** (0.0524)	0.0714*** (0.0181)
τ_k				0.0058** (0.0028)		
τ_l						0.0076*** (0.0029)
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i>Constant</i>	0.3330*** (0.0027)	0.3762*** (0.0209)	-0.4443*** (0.0067)	0.3726*** (0.0250)	0.9255*** (0.1719)	0.3713*** (0.0241)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拟合优度	0.8332	0.8446	0.5700	0.8546	0.8275	0.8505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2024 年 11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向 2024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开幕视频致贺时着重强调,“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把安全作为底线要求、把普惠作为价值追求,加快推动网络空间创新发展、安全发展、普惠发展,携手迈进更加美好的‘数字未来’”。本研究聚焦数字技术深度赋能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优化这一典型现实,立足资本、劳动力要素错配的视角,基于中国 2011—2022 年城市数据,通过构建数字技术综合指标体系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标体系,综合运用面板固定效应、中介效应、门槛回归与空间计量等模型,全方位实证探究了数字技术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效应与机制。结果表明:一是数字技术已跃升为新时代推动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升的核心动力,经工具变量、“宽带中国”试点准自然实验等稳健性检验,该结论依旧稳固。异质性检验显示,东中西部地区较东北部从数字技术中获益更多,二者的推动作用随着数字技术发展水平分位数上升呈先降后升的“U”型态势,且高公众环境关注度、自然资源型城市受益更显著。二是数字技术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效应呈“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印证了网络效应与梅特卡夫法则在此领域的适用性。资本、劳动力要素错配作为中介进一步强化了该效应,促使城市要素配置与数字技术协同发力。三是数字技术在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上的空间溢出效应得证,利于推动地区协调发展绿色经济格局的构建。四是激发资本、劳动力要素错配是数字技术赋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机制,“互联网+”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双轮齐驱,对中国绿色发展在提质、增效、升级的征程上大步迈进极具战略意义。

(二)政策建议

第一,日益聚焦数字技术赋能。数字技术已然崛起为驱动区域经济增长、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引擎。政府层面,需紧扣时代律动,加速布局人工智能、5G 等新型基建,积极推动数字技术的发展,重点从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加速区块链技术创新两方面入手,持续加码数字技术应用所需基础设施投入。区域层面,深入推进“智慧中国”系列政策落地,全力促进数字技术与传统工业深度互融,牵引经济朝着数字化、智能化、高效化轨迹大步跨越。立足产业技术前沿,鉴于数字技术在工业流程中的深度渗透,着力搭建涵盖生产、交易、流通、监管的大数据中枢,打破地域、行业、部门藩篱,孕育云产业集群,强力助推经济模式向循环、高效、集约蜕变。

第二,破解资本、劳动力要素错配难题。政府层面,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精准监测要素在产业、地区间的流向,构建动态预警机制,及时干预错配。企业层面,紧抓“互联网+”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契机,传统制造企业借电商拓展渠道、依需求定制生产,提升劳动力效能,借助互联网金融获取更精准的资本支持。同时加大绿色科创投入,淘汰落后产能,按需优化要素投入,政企合力重塑配置格局,赋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攀升,进而达成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的良性循环。

第三,对于自然资源型城市,应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优势,敏锐捕捉公众环境关注度提升带来的机遇。一是,积极布局高技术、新能源及战略性新兴产业,设立专项产业扶持资金,吸引优质企业入驻,打破产业单一僵局。二是,以数字技术为纽带,搭建产业数字化平台,推动数字经济深度嵌入新产业。针对新能源产业,利用数字技术优化能源开采、转化与配送流程,提升效率;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借助大数据精准分析市场需求,助力产品研发创新。三是,强化环保宣传,将公众环境关切转化为产业绿色发展动力,促使企业采用绿色生产技术,实现产业提质增效,全方位激活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城市可持续发展。

第四,强化数字技术创新,激活新兴数字产业潜能,驱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政府作为牵头

者,运用政策杠杆撬动资源流向,强化顶层设计与扶持手段,设立专项基金助力数字绿色技术研发,推动产学研联合攻坚,加速成果落地。企业作为实干家,传统工业企业要积极引入前沿数字技术改造升级生产流程,实时管控能耗与排污,实现降本增效与绿色生产兼顾。城市作为管理者,更要着力构建数字生态共同体,汇聚全域数据资源,搭建共享平台,破除数据壁垒,促进数字技术多领域渗透融合,赋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持续上扬,助力城市绿色发展迈向新高度。

责任编辑:孙继国 朱晴晴

Research on the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Digital Technology Empowering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Based on Empirical Data from 277 Chinese Cities

Ke Han Teng Yanqiong

Institute of Statistics and Data Science, Xin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Urumqi 830012, China

Abstract: Driven by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ig data, and blockchain, digital technology has become the core engine empowering China's gree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a key path to achieving the "dual carbon" strategic goals.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277 cities at the prefecture-level and above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2,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on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digital technology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this promoting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in cities with superior geographical locations, high public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resource-based cities. Second, the robustness of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is maintained through robustness tests such as the historical data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and the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of the "Broadband China" pilot policy. Third, factor reconfiguration is an important transmission path for digital technology to release the dividends of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Fourth, the positive impa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shows a nonlinear increasing "marginal effect" characteristic and has significant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This study not only deepens the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driving factors of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but also expands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digital technology empowering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from three dimensions, i.e., effect, mechanism, and regional heterogeneity, providing new theoretical basis and empirical support for promot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green development.

Key words: digital technology;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mismatch of elements; spatial spillover

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多重堕距： 生成、表征与破解路径

曹现强^{1,2} 李 琼¹

1. 山东大学 国家治理研究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2. 山东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山东 青岛 266237

摘 要: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环节, 乡镇政府则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和重点, 扮演着“最后一公里”的执行者和打通者角色。当前, 乡镇政府普遍面临公共服务供给的系统性失衡问题, 对上繁杂任务目标加重负担, 对下群众需求多样难以满足。从组织活动的复杂性来看, 这便是一种乡镇政府的能力堕距现象。研究发现, 经由向上维度的压力传导与资源掣肘、向下维度的需求响应与供给失焦以及自身维度的组织嬗变与能力断层共同作用, 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存在制度堕距、资源堕距、组织堕距、执行堕距和文化堕距, 这本质上是物质环境与适应环境间系统性张力的现实反应。对此, 需通过制度调适、资源整合、组织变革、过程强化以及文化塑造的协同, 推进堕距破解以实现能力跃迁。

关键词: 基层治理; 乡镇政府; 能力堕距; 公共服务

中图分类号: D0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 (2025) 02-0123-10

一、引 言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 乡镇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单元。作为中国政权组织中特有的最基层的一级政府, 以及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组织者、协调者和践行者, 乡镇政府不仅负责各项具体农村公共服务政策的贯彻落实, 而且决定着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发展方向和总体水平。近年来, 国家持续推进服务型政府转型, 由过去的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这一治理理念的转变对于强化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也提出了更高要求。2017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从顶层设计出发, 出台并印发《关于加强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的意见》。随后,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也明确提出“夯实基层政权”“健全农村基层服务体系”^①的要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基金项目: 本文系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项目和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和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研究”(22AWJ3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曹现强, 男, 山东莒南人, 法学博士,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主要从事国家治理理论与城市治理研究; 李琼, 女, 山东临朐人, 山东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基层治理与政府创新研究。

^① 中共中央 国务院:《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 2018年9月26日, https://www.gov.cn/zhengce/2018-09/26/content_5325534.htm.

会更是进一步提出要“健全乡镇(街道)职责和权力、资源相匹配制度,加强乡镇(街道)服务管理能力”^①。由此可见,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直接关系到基层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制约基层治理的效能提升。

长期以来,基层治理所面临的问题集中体现为乡镇政府负担过重的“小马拉大车”难题^②,乡镇一级日益成为利益关系的交会点和社会矛盾的聚焦点。在制度转型与社会需求升级的双重压力下,随着治理事务密集下沉,由于乡镇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不足,导致公共服务供给的系统性失衡,在供给总量、质量及结构上均存在不足^③,无法满足群众需求^④,与政策目标之间的差距问题越发凸显^⑤,难以走出整体服务效能滞后的怪圈^⑥。但纵观来看,既有研究大多聚焦于财政投入、制度设计等单一维度,或局限于某一个案例分析,缺乏对由于公共服务能力不足而产生的“堕距”表现及其生成机理的整体性探讨。由此,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所产生的堕距何以生成?有何现实表征?如何破解?

二、堕距理论与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多重堕距的生成

(一) 堕距的概念界定

“堕距”(Lag)概念发轫于社会学领域,源自奥格本(Ogburn)的文化堕距理论,指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因变迁速度差异而产生的非物质文化更新落后于物质文化或文化集丛的滞后问题^⑦,本质上即由于无法快速适应并融入新趋势,而导致“应然图景”和“实然状态”之间存在脱节或割裂。堕距现象是社会飞速转型发展时期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⑧,在公共管理领域,堕距被引申为政策目标^⑨、制度设计^⑩、资源配置^⑪与执行效果之间的结构性差距,表现为基层形式主义^⑫、政策执行异化^⑬等具体样

①《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2024年7月21日, 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7/content_6963770.htm。

②丁煌、卫劭华:《“小马拉大车”:本土情境中基层政府的负重运作现象考察——基于W区Q镇环保项目推进案例的实证分析》,《行政论坛》2021年第2期。

③袁锐:《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需失衡难题何解》,《人民论坛》2019年第14期。

④吴理财:《从“管治”到“服务”——关于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问卷调查》,《中国农村观察》2008年第4期。

⑤谭秋成:《农村政策为什么在执行中容易走样》,《中国农村观察》2008年第4期。

⑥李金龙、张德芳:《公共服务提供能力建设视域下的基层政府公信力提升》,《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⑦参见[美]威廉·费尔丁·奥格本:《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王晓毅、陈育国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⑧郝雅立、王亚楠:《能力堕距: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公务员队伍建设与发展问题研究》,《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7年第4期。

⑨张欣、欧谷:《乡村产业振兴中的政策堕距研究》,《管理学刊》2024年第6期。

⑩王琪、陈昭:《央地关系:制度堕距与改革的内卷化困境》,《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

⑪叶继红、邓明磊:《多重堕距:地方政府创新缘何难以持续——基于安徽省亳州市B县邻长制的案例研究》,《求实》2024年第4期。

⑫陈平、贾浩霖:《基层形式主义的生成机理——基于行政发包异化的视角》,《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

⑬李利文:《执法堕距:政策执行在基层缘何容易走样?——基于D村违法建设综合整治案例的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21年第8期。

态。而本文中的乡镇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堕距,则是指其公共服务能力与群众需求、政策要求等维度之间的系统性脱节。

(二) 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多重堕距的来源

受适应性、压力等维度的影响,基层的“堕距”现象尤为显著^①。而乡镇政府处于国家与社会交互作用的直接关键节点,是连接政府与广大群众的重要中枢和纽带。乡镇政府的行为是在复杂环境下由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既是其行为所追求的目标结果,又是行为完成所必需的重要助推剂,多重堕距的产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体制张力与乡土社会转型摩擦的集中投射(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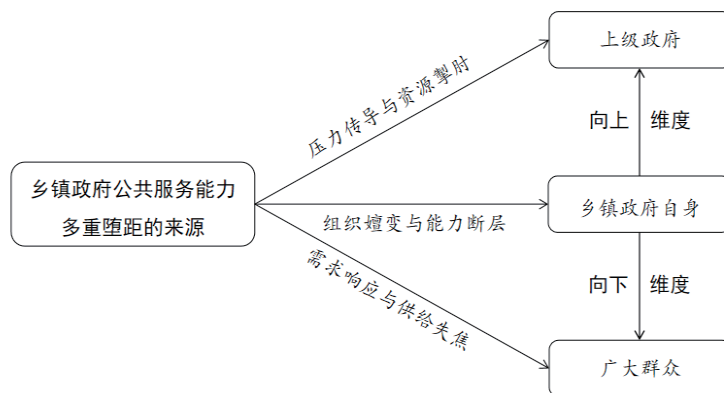


图1 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多重堕距的来源

1. 向上维度：“权力无限小，责任无限大”

上级政府要求无法与乡镇政府资源相适配,成为左右乡镇政府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上级政府通过“政治锦标赛”模式强化目标管理。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上级政府为了督促下级政府更好地完成任务,并避免科层组织任务执行力的衰减,往往采取“层层加码”的方式,以对总体目标的实现加以保障^②。在环保督察等重大领域采取“指标放大”策略,重要指标实行“一票否决”制,使得处于压力型体制下的乡镇政府“超负荷运转”。另一方面,中央政策的标准化设计与乡土社会复杂性之间存在较大张力。如“厕所革命”等民生工程在技术标准、文化适配等方面常遭遇“制度悬浮”,乡镇政府不得不在政策刚性与地方弹性之间艰难平衡。本身处于最低层级的乡镇政府所拥有的资源数量便非常有限,加之当前“项目制”成为国家治理乡村地区的重要形式,上级资源大多以各种类型的项目形式下达,但乡镇政府的基础各异,甚至部分项目要求以承担相应的配套资金为前提,不仅承接困难,更难以有效支配^③。

2. 向下维度：“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

“供不应求”“供大于求”等问题本质上都是公共服务的供需错位,使得乡镇政府的治理效果难

① 陈家建、张琼文:《政策执行波动与基层治理问题》,《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3期。

② 李辉:《层层加码:反制科层组织执行衰减的一种策略》,《中国行政管理》2022年第4期。

③ 陈鹏:《乡村治理困境的生成与消解:基于资源错配的视角》,《宁夏党校学报》2019年第3期。

以满足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一方面,农民的需求逐渐从传统的物质需求转向公共服务均等化、环境治理精细化等复合型诉求,但参与决策的意愿不强,利益表达的制度性渠道不畅。加之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教育、医疗等领域出现明显的“质量鸿沟”,数字政府建设的滞后也导致“数字弱势群体”被排斥在服务体系之外^①。另一方面,乡镇政府按照职能需要承担经济发展、招商引资、征地拆迁、信访维稳等常规性工作,外加专项整治等阶段性工作,但当前各个业务部门都想方设法地将其业务工作穿插进县委的政治任务中,乡镇政府需承担的政治任务的总量剧增,而这些额外任务往往具有考核上的“痕迹主义”特征,使得在公共服务供给的过程中,乡镇政府逐渐从与群众联系密切的扎根基层型政权变为“悬浮型”政权^②,更多考虑指标而非实际需求,与群众诉求的“结果导向”形成价值冲突。

3. 自身维度:“八十公公挑担子,心有余而力不足”

乡镇政府受制于传统科层结构的路径依赖,缺乏突破制度约束的创新能力,体现了科层组织转型滞后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之间的矛盾。一方面,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乡村发展日益现代化,乡镇政府所处的社会环境日趋复杂,亟需从传统的“维持型”“管理型”政府向“引导型”“服务型”政府转变^③。然而,受制于传统科层结构的路径依赖,乡镇政府缺乏突破制度约束的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基于传统的命令和控制的封闭官僚体制来供给公共服务已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④。乡镇政府自身为增强公信力、竞争力,也存在着主动转型的发展需求。然而其内部仍存在着较多的“短板”,队伍建设薄弱表现为干部素质与能力不足,职能错位使得自身职能发挥的空间不足,无法形成互相衔接的权力和责任体系,以及实现与社会组织、企业和村民的有效协同,从而导致公共服务供给的碎片化问题。

三、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多重堕距的表征

(一) 堕距的识别

2020年8月,山东省率先出台了全国首部直接针对乡镇政府工作的省级地方性法律规范文件《山东省乡镇人民政府工作条例》,旨在为基层“减负”,为转变并强化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等方面提供工作保障和行为准则。基于田野的可进入性、资料的可获得性等原则,本文选取山东省作为案例,通过扎根理论方法,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堕距进行识别。

访谈是扎根理论的核心研究方法,本文以山东省为取样范围,采用理论抽样结合滚雪球抽样方法选取案例,共计选取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涵盖山东省16个地级市的24个乡镇(或近年来转变为街道的乡镇),访谈对象包括乡镇长、分管副镇长、民政工作相关办公室主任、其他工作人员等共计51人,外部效度较高。将原始一手访谈材料以文字形式进行整理,共计近18万字。

① 刘天元、田北海:《治理现代化视角下数字乡村建设的现实困境及优化路径》,《江汉论坛》2022年第3期。

② 周飞舟:《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税费改革对国家与农民关系之影响》,《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3期。

③ 陈文胜、汪义力:《乡村振兴背景下乡镇治理现代转型研究》,《农村经济》2022年第4期。

④ 黄建红:《三维框架:乡村振兴战略中乡镇政府职能的转变》,《行政论坛》2018年第3期。

在扎根理论方法论中,编码是通过不断比较分析,包括事件之间以及事件与概念之间的比较,从而促使形成更多的范畴和特征,以及形成对数据的概念化,包括开放编码、主轴编码、选择编码三个步骤^①。开放编码是整个编码过程的第一阶段,是指在排除个人偏见和已有定论的基础上,对数据进行逐行编码,将其逐层(句)进行概念化和抽象化,并按其本身所呈现的属性分类,基于逐层编码的扎根理论方法具有标准规范性和满足内部效度的特点。开放编码形成的副范畴代表一组相关的现象,但副范畴相互之间的逻辑联系并不紧密。主轴编码通过比较寻找相似和差异之处,旨在梳理副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得副范畴形成一定的逻辑关系。按照相关性原则将关联度高的副范畴作为一类,形成5个主范畴,包括制度堕距、资源堕距、组织堕距、执行堕距和文化堕距。选择编码是对开放编码和主轴编码的理论加工,通过对5个主范畴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从而挖掘出本文的核心范畴为“乡镇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堕距”(见表1)。对比检验原始资源发现没有产生新的观点、概念与范畴,由此判定达到理论饱和。

表1 范畴及编码示例

主范畴	副范畴	编码示例
制度堕距	权责不等	责大权小;无执法权
	领导地位	弱势部门;多头领导;非核心工作
资源堕距	资源错配	财政短缺;结构失衡;资源有限
	资源调配	资源碎片;缺乏自主;乡镇债务
组织堕距	队伍薄弱	人才短缺;人员流动;专业性弱;混岗现象
	党的领导	凝聚虚化;组织力弱;决策脱节
执行堕距	执行偏差	被动执行;执行异化;目标替代
	服务均等	基础设施;弱势群体;地区差异
文化堕距	行政文化	保守避责;缺乏创新;官本位;工作惰性
	服务意识	工作投入;奉献精神;参与意识

(二)制度堕距：服务职能划分模糊

在制度层面,乡镇政府与县(市)政府的权责关系并不能有效应对公共服务供给^②。一方面,乡镇政府将各项行政任务作为日常工作开展的重点,实际运作过程中扮演“抓总”角色的社会事务服务中心,权力小、任务多,作为习惯了处理老、弱、病、残等事务的职能部门,故而只可能以“调研—督导—总结”的“弱考核”路径进行推进,无权协调,效率低下,甚至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出现选择性执行、表面性执行、扭曲性执行乃至拒绝执行现象,本质上都是目标异化导致的结果偏离。另一方面,当前乡镇政府职能设置仍以经济发展作为中心重点任务,公共服务职能不突出,主要负责牵头从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的民政部门无力独自承担此项工作的开展,需通过寻求党政办、组织部等强势部门的帮助来进行“责任转移”,由此则造成了“双头领导”甚至“多头领导”的问题。不仅如此,乡镇政府基本不享有独立行政执法权,在配置中呈现出纵向“重心过高”、横向“分布过散”的特征^③,且所处特殊级别导致了各单位(如综合行政执法局)的代理或派驻机构或部门嵌入乡镇,与乡镇原有部门职能进行交叉甚至重复,直接导致了工作的低效。

① 贾旭东、衡量:《基于“扎根精神”的中国本土管理理论构建范式初探》,《管理学报》2016年第3期。

② 李明:《补齐乡镇政府服务能力的短板》,《人民论坛》2018年第23期。

③ 陈柏峰:《乡镇执法权的配置:现状与改革》,《求索》2020年第1期。

(三)资源堕距:服务资金不足

多次县乡财政体制改革过后,乡镇级的财政逐渐由“吃饭财政”发展到“讨饭财政”,财政问题尤为显著。一方面,在税费改革即取消农业税之后,乡镇财政的收支变为了“收支管统”,加之“超收分成、节支留用”^①,据统计,乡镇政府承担着近60%的公共服务事项,却仅掌握不足20%的财政资源,形成“无限责任—有限资源”的治理悖论。另一方面,中央和省级财政转移支付存在“总量不足”与“结构错配”问题。过去“七站八所”的垂直管理体系更是直接导致了组织自身所拥有资源的碎片化,环保所、国土所等派驻机构形成“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的治理盲区。同时,城乡二元结构下,乡镇公共服务长期依赖“乡财县管”模式,财政自主权受限,难以灵活调配资源。部分项目甚至要求乡镇政府配套资金,加剧债务风险,导致公共服务投入难以持续^②。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乡镇政府财政紧缺甚至负债累累乃是常见现象^③,在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中,尤以乡镇政府债务为甚。

(四)组织堕距:服务队伍建设涣散

组织保障是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的重要支柱,而组织方面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人及其作用发挥方面。一方面,乡镇干部队伍建设中,首先,“招不来人”,乡镇的人才引进政策吸引力不足,大学生村官、选调等途径被很多人才视为“跳板”或者“镀金工具”;其次,“活多人少”的境地下,乡镇干部陷入“上下挤压的工作生态”^④,“人随编走,编随人走”的模式下公务员与事业单位人员“混岗使用”现象常见,“编外用工”规模不断增大^⑤;再者,“留不住人”,人员素质与岗位需求不匹配,人员专业程度不高、业务能力不足、青年力量缺乏,尤其年轻干部陷于“成长性缺失”的锁定状态,出现“逃离乡镇”现象。另一方面,乡镇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虚化,党建与业务存在“两张皮”现象,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力度不够,致使一些错误未能得到及时纠正,违法违纪问题频发^⑥。且乡镇党委对涉及本区域的重大决策,例如在公共服务设施布局等方面仅有“建议权”,实际决策权仍集中在县级政府,容易导致乡镇服务规划与本地需求脱节。

(五)执行堕距:服务供给结构失衡

乡镇政府服务供给结构的失衡是执行堕距的核心表征之一,其本质是目标与执行效果之间的系统性偏差。第一,服务类型失衡。相较于硬公共服务,软公共服务明显滞后,重经济轻文化、重项目轻民生的倾向仍较为根深蒂固^⑦。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不健全,数量本身不足,且破坏和老化现象严重,还缺乏长期性、定期性维护,使得“一次性”设施常见。医疗卫生服务、教师队伍水平、社会劳动保障等公共服务产品薄弱更加明显。第二,服务区域失衡,存在空间分配中的“中心—边缘”分化现象。乡镇政府往往将有限资源集中投放在镇区或交通便利的行政村,而偏远自然村、山区村落成为服务“盲区”,碎片化和低效化的叠加,使得大量存在分布不均甚至相互冲突的现象出现。第三,服务

① 谭秋成:《财政考核、制度租金榨取与乡镇债务》,《中国农村观察》2004年第6期。

② 吴春宝:《增权赋能: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升及其实现路径》,《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③ 参见吴理财:《从“管治”到“服务”——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④ 杨磊:《返场、控制与捆绑:乡镇干部的压力源及其解释》,《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0年第1期。

⑤ 杜姣:《乡镇政府编外人员的规模差异及其解释——基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四个乡镇案例的比较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

⑥ 杨勇文:《当前乡镇治理存在的三个根本问题及应对之策》,《领导科学》2016年第10期。

⑦ 周飞舟:《回归乡土与现实:乡镇企业研究路径的反思》,《社会》2013年第3期。

对象失衡。在资源约束下,乡镇政府更倾向于“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①,更多选择覆盖面广、执行难度低的“普惠型”服务(如发放农资补贴),而回避针对特殊群体的精细化服务(如残疾人康复、留守儿童心理辅导),对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和利益诉求未能给予足够重视。

(六)文化堕距:服务氛围趋于保守

传统行政文化中的“官本位”思维导致乡镇政府过度依赖上级指令,将“完成上级任务”和“规避风险”视为核心目标,而非主动探索服务创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保守策略,本质上是行政环境对于试错空间的挤压。一方面,官本位导向下存在“被动执行”惯性。就乡镇政府整体而言,执行县级政府的意志在工作中占绝大部分,导致占用乡镇政府太多的精力而使其无暇追求创新,甚至出现偏差现象。就乡镇政府内部而言,乡镇政府工作人员的公共服务意识淡薄,“官本位”思想严重^②。干部队伍在工作中态度较为被动,缺乏强大的创新能力和学习能力,甚至以形式主义对待国家政策、巧妙应付上级交办任务,以及产生惯性依赖与怠惰情绪^③。另一方面,呈现服务的“悬浮化”与适应性不足现象。乡镇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时,过于注重上级指示,常将上级文件简单“平移”至基层,忽视本地文化特性和基层民众的文化认同与参与,且在乡镇的公共服务决策中,民众本身的参与意识较为薄弱,加之多被视为“被动接受者”而非“共同生产者”,进而影响政策的有效性。

(七)能力堕距:物质环境与适应环境间的系统性张力

根据堕距理论,奥格本将文化划分为物质型文化(Material culture)和适应型文化(Adaptive culture),物质维度主要是指技术、经济、政治等事务,而适应维度则主要是指为适应物质文化而发生变迁的事务,如制度、习俗、观念等^④。当物质维度的变迁速度快于适应维度的变迁速度时,两者之间就会产生失调和冲突。

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多重堕距,本质是在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中,快速变迁的物质环境与迟缓调整的适应环境之间的系统性断裂。物质环境主要是指经济、政治、技术等“硬性”事务,而适应环境主要是指制度、习俗和观念等“软性”事务,物质环境发展需要适应环境同步匹配。一方面,物质环境倒逼与适应环境阻滞产生恶性循环。经济转型与技术升级客观上要求乡镇政府提升服务能力,但制度僵化与观念保守形成反作用力。例如数字技术本可优化服务流程,但因干部数字技能培训制度缺失反而加剧“数字形式主义”。另一方面,层级冲突与利益固化的叠加效应限制了对于环境的适应。制度与观念对服务能力提升形成掣肘,县级政府通过“项目制”控制资源分配,乡镇为争取资金不得不迎合上级偏好,进一步强化“重硬件轻服务”的路径依赖。

四、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多重堕距的破解路径

(一)制度调适维度

制度调适作为破解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堕距的关键引擎,亟需构建以动态权责调适为根基、服务供给效能提升为核心、考核激励机制重构为保障的三维联动体系,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系统

① 李广斌:《青海藏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与和谐社会构建》,《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② 张武强、汪雷、王蕙:《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影响因素及对策分析》,《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③ 赵秀玲:《破解农村基层治理“空转”难题》,《人民论坛》2019年第36期。

④ 相关内容参见威廉·费尔丁·奥格本:《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一书。

性制度支撑。一是建立动态权责清单制度。山东省于2021年颁布《山东省乡镇(街道)职责任务清单指导目录(试行)》,并于2024年发布《山东省赋予试点县(市、区)所辖乡镇(街道)行政执法权指导目录》,在此基础上,应当逐步扩大试点范围及清单适用范围。通过规定目标、分配权力、明确责任,生成一种更具理性化管理特征的模式,完善“新双轨制”^①。同时可以三年为周期,修订乡镇政府事权目录,巩固全面深化改革成果^②。二是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模式。要打造动态平衡模型,按照“需求升级—供给改进—服务提升”的路径,明确不同类型的供给责任的匹配以及相应供给方式的优化。乡镇公共服务尤其要发挥“兜底”作用,侧重提供面向农民生计和农村发展的公共服务,形成服务需求和供给的动态平衡。三是推行“差异化考核体系”。引入“服务效能指数”,将群众满意度、需求响应速度等纳入核心指标,并将服务人口密度、老龄化程度等纳入考核权重,对不同机构、层级、职责的工作人员设计不同指标,并赋予合理指标比例和比重,形成以全流程业务量化考核为基础、以目标管理责任制和绩效考核激励为动力的新型考核体系。

(二)资源整合维度

资源整合维度是破解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堕距的关键支点,需构建以财权事权精准配置为基础、以多元资源拓展机制为突破的协同赋能框架,激活基层公共服务供给的内生动力。一是赋予乡镇和事权相匹配的财权。根据乡镇承担的公共服务职责,对乡镇财权进行调整,加大乡镇政府财政收入分成比例。完善“乡财县管”的财政管理体制,对于一些经济实力和管理水平较强的乡镇,可允许自行管理财政收支,自主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上级机构做好监督指导工作。在“乡镇债务”背景下,除了大力发展乡镇经济、培植财源、下放财权之外,还应构建与事权相统一的转移支付制度,以及建立在国情基础上现代化的财政支付^③。中央和省级政府应建立起直接面向县乡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将追求纵向平衡和均等作为目标^④。尤其是在“乡财县管”制度下,对乡镇的部分职能履行中的财政缺口和诉求,县级政府应充分了解需求,在合理范围内尽可能予以帮助,对乡镇政府的发展经济行为予以大力支持,使乡镇发展没有后顾之忧。二是积极拓宽资源途径。建立健全社会资本参与机制,针对农村养老、托育等准公共服务领域,设计“公益性与经营性平衡”的PPP合作框架,通过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实现共同建设和运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同时,建立乡镇公共服务基金池,完善“县乡协同”的资源统筹机制,通过试点“县域公共服务共同体”,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实现跨乡镇的资源共享,降低边际成本。

(三)组织变革维度

组织变革维度是破解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堕距的战略突破口,需以党建引领统合为轴心、以人才梯队建设为支撑的双轮驱动架构,重塑乡镇政府干部队伍建设的可持续动能。一是发挥乡镇党委领导核心作用。乡镇党委作为基层治理的“主心骨”,需以系统性思维重构党建与公共服务的耦合关系。完善“党建+服务”责任传导机制,建立公共服务责任网格,将“群众满意度”“需求响应率”

① 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②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权责清单制定中的难题与对策》,《中国行政管理》2017年第7期。

③ 项继权、袁方成:《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政投入与需求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08年第3期。

④ 阎坤:《转移支付制度与县乡财政体制构建》,《财贸经济》2004年第8期。

等指标纳入党委班子绩效考核,形成“目标量化—过程督导—结果运用”的闭环管理体系。联合村级党组织、驻镇单位、社会组织建立“红色服务联盟”,依托数字党建平台构建需求收集、任务派单、进度跟踪的“云端议事厅”,实现民意诉求的即时响应。同时深化党群互动双向赋能,推行“民生实事党员认领制”,通过“群众评议会”对公共服务项目进行反向质询。二是破解基层人才困境需突破传统人事管理惯性,实施差异化人力资源策略。建立“定向招录+柔性流动”机制,降低偏远地区招录门槛,同时实施“服务期满优先晋升”政策,激励人才扎根基层。此外,实施编外人员专业化提升计划,建立县域统一的劳务派遣人员培训体系,有效提升基层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和服务水平。三是构建“模块化+专班制”的组织架构。针对重点、难点工作,打破站所界限,组建工作专班,按服务场景重组团队,专兼结合、统分结合,以更好发挥团队的专业优势。同时建立跨层级干部交流机制,鼓励县级部门业务骨干到乡镇挂职服务岗位。

(四)过程强化维度

过程强化维度是破解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堕距的重要枢纽,亟需构建以需求导向精准识别为起点、流程重构协同赋能为中轴、效能追踪闭环优化为终端的全周期治理链,重塑公共服务供给的可及性、精准性和响应度。一是建立完善的需求识别机制,从“供给主导”转向“需求驱动”。以农民的实际需求为出发点,通过需求调研和反馈机制,精准识别公共服务的短板领域,合理调整供给结构。精准识别不同群体例如留守老人、返乡创业者等群体的差异化需求,强化弱势群体的需求表达渠道,通过“网格员+社工”的联动机制,及时收集并有效反馈。同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发挥技术赋能优势,建立公共服务需求数据库,实现精准供给。二是推行“全周期服务流程再造”,打破“碎片化供给”与“低效执行”。建立“县级统筹—乡镇调度—村级落实”三级联动机制,避免项目重复申报与资金分散,构建“县级决策—乡镇建议”的双向反馈机制,确保乡镇政府在重大决策中有更多话语权,避免“一刀切”所带来的供给失衡问题^①。三是强化公共服务的监督与反馈,建立“效能评估—动态纠偏”闭环。通过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公共服务项目的实施过程和效果进行独立监督,实时监测项目进度与资金流向,并加强反馈响应机制的优化,建立“问题发现—整改复盘”的完整闭环,确保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

(五)文化塑造维度

文化塑造维度是破解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堕距的价值内核,亟需形成以适应性调适对接治理情境、以服务理念内化重塑行为逻辑、以创新生态培育激发变革活力的“价值生态”,为公共服务供给注入深层文化认同与持续创新势能。一是增强与地方文化的适配性。在政策设计和服务供给过程中,充分尊重和根植于地方情境,构建乡土文化与现代治理的共生模式。确保政策和服务与地方传统相契合,新技术、新模式与社会结构相融合,保留乡土社会的弹性,从而减少“落地”时的不适感。在此基础上,将地方文化中的优秀元素与现代治理理念相结合,形成兼具地方特色又适应现代需求的治理模式,打造喜闻乐见、颇具影响力的品牌项目。二是培育服务型行政文化。牢固树立以广大民众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理念,推动乡镇政府治理理念从“管控”向“服务”

^① 吕普生、张梦慧:《执法召集制:“吹哨报到”机制如何使综合执法运转起来》,《河南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

转型,增强互动意识,彰显人文关怀的价值理性。通过“村民议事会”“服务需求清单制”等多种形式,同步增强民众的参与意识和提高参与度,将乡土智慧嵌入公共服务的供给和优化领域。三是营造有效互动社会氛围。鼓励政府内部提出创新性建议和方案,对有价值的创新成果给予表彰和奖励,并广泛宣传弘扬。同时加大对于农民自组织、社会组织等主体的帮扶力度,发挥市场、社会领域多元治理主体的灵活性和创造力优势,巩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氛围。

责任编辑:侯德彤 尹婷婷

Multi-dimensional Lags in Public Service Capacity of Township Governments: Generation, Manifestations, and Resolution Pathways

Cao Xianqiang^{1,2} Li Qiong¹

1. Institute of State Governanc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2.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Qingdao 266237, China

Abstract: Grassroots governance constitutes a foundational component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bilities, with township governments serving as the operational bedrock and critical node in the state governance framework, functioning as the "last-mile" executors and enablers. Currently, township governments are generally faced with systemic imbalances in public service provision, with escalated administrative burdens from the higher-level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s and various unmet demands from the public societal expect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plexity of organizational activities, this phenomenon is a kind of capability lag in township governance.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due to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upward pressure transmission and resource constraints, downward demand response and supply misalignment, as well as internal 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capability gaps, there exist institutional, resource, organizational, execution, and cultural lags in the capacity building of public services by township governments. Essentially, this is a realistic response to the systemic tension between the material environment and the adaptive environment. To address this,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resolution of lags through the coordinated efforts of institutional adjustment, resource reorganization, organizational change, process strengthening and cultural shaping in order to resolve capability lag and achieve a leap in capacity.

Key words: grassroots governance; township government; capacity lag; public service

联结融合：驻村工作队助力乡村治理的实践机理

——基于 IAD 框架的实证研究

王晓灵 王俐晶 田 亚

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与法政学院, 上海 200234

摘 要: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 驻村工作队作为常态化治理主体深度参与乡村场域。面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时代任务, 驻村工作队通过持续嵌入乡村场域, 成为推动综合治理的重要动能。本研究基于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 整合社会资本理论, 采用田野调查法, 对Y村驻村工作队的治理实践进行解构。研究发现: 驻村工作队通过下沉式嵌入建构起“联结融合”型治理模式, 这种模式既“联结”了村庄社会、相关部门与市场力量, 也“融合”了主体和资源; 其运作逻辑可解构为外生变量层、行动舞台层、互动模式与结果层。“联结融合”型乡村治理模式的提出, 将为驻村工作队更好地融入帮扶乡村治理提供具象的理论回应, 也将为进一步完善乡村振兴战略下的驻村工作机制提供新的可行方案。

关键词: 驻村工作队; 乡村治理; IAD 框架; 社会资本; 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 D0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 (2025) 02-0133-12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 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完善和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 是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的基础工作。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党中央将干部下沉确立为助推乡村治理的行动指南, 2021年5月印发了《关于向重点乡村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意见》, 提出“健全常态化驻村工作机制,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和干部人才支持”^①。2022年11月《乡村振兴责任制实施办法》再次指出“加强与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等帮扶力量沟通协调”“持续选派挂职干部和驻村第一书记, 加强工作指导, 督促政策落实, 提高帮扶实效”^②。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明确指出“派强用好驻村第一书记和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双碳’目标下绿色人力资源管理促进企业绿色低碳发展的机制及策略研究”(24BGL16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信息: 王晓灵, 女, 山东济宁人, 管理学博士,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王俐晶, 女, 福建泉州人,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田亚, 女, 贵州铜仁人,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乡村治理研究。

① 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向重点乡村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意见》, 2021年5月11日, https://www.gov.cn/zhengce/2021-05/11/content_5605841.htm。

②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乡村振兴责任制实施办法》, 2022年12月13日,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3/content_5736709.htm。

工作队”^①。作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农村工作的优良传统,驻村工作制度形成已久,进入“后扶贫时代”,国家在政策上做出了相应调整,驻村工作队的时代背景由精准扶贫的政策背景转变为乡村振兴的时代要求^②。中央延续应用驻村工作队帮扶乡村治理经验,是处理新任务的又一历史选择。

学界主要从以下不同角度对驻村工作队参与乡村治理展开了研讨。一是嵌入型治理视角。在嵌入形式上,王维和向德平提出制度嵌入、关系嵌入、资源嵌入、文化嵌入等形式^③。驻村工作队作为外在权力嵌入到乡村社会中发挥作用,包括以刚性体制和制度构建的“结构性嵌入”治理机制,以柔性的价值情感、社会生态和利益关系重构构建的“关系性嵌入”治理机制^④。制度化解、场域融入与情感融入是驻村工作队取得帮扶效果的有效途径^⑤。二是互动治理逻辑视角。驻村工作队运行于平等互动的非程式化乡土社会中,兼备并超越了常规与动员的治理机制,呈现了超常规的逻辑^⑥。依托驻村工作队的调和,干群协作空间得以拓展并因此在协同中提升乡村治理效能^⑦。在乡村建设目标协同驱动下,驻村干部与村两委之间形塑治理主体之间的角色互动^⑧,以紧密协作配合的关系形塑工作责任连带,进而提高工作效率,促进信息共享,从而实现治理效能的优化配置^⑨。三是社会网络视角。结构洞理论视角认为驻村工作队填补了贫困村、弱势农户与政府之间的结构洞,呈现出自上而下的科层化治理与自下而上的反科层化治理的制度逻辑^⑩。通过社会网络的拓展与再造,在城市与农村、国家与社会、先富与贫困人群之间织造一张合力攻坚的脱贫之网,弥合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裂隙,最终实现减贫成效^⑪。

虽然学界探讨了驻村工作队注入乡村治理的制度逻辑,但仍未在充分的实践研究支撑下,剖析驻村工作队何以有效的过程,并详细揭示出驻村工作队协助推进乡村治理中与村级自治主体形成的融合互动共治机理;在研究视角上也缺乏对驻村工作队融合互动过程和作用机制整体性的深入考察。鉴于此,引出以下思考: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驻村工作队如何参与村治实践?产生了哪些成效?其中如何与乡村自治主体合作互为?构建了怎样的治理实践逻辑?

①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二〇二三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人民日报》2023年2月14日,第1版。

② 陈显林:《驻村工作队 in 干什么——基于中部山区X贫困县的田野调查》,《公共管理评论》2024年第2期。

③ 王维、向德平:《从“嵌入”到“融入”:精准扶贫驻村帮扶工作机制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④ 朱新武、谭枫、秦海波:《驻村工作队如何嵌入基层治理?——基于“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案例的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20年第3期。

⑤ 黄改、李斌:《制度化解、场域融入、情感嵌入:嵌入理论视角下驻村工作队的实践逻辑》,《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5期。

⑥ 钟海:《超常规治理:驻村帮扶工作机制与运作逻辑——基于陕南L村的田野调查》,《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

⑦ 李丹阳、钟楚原:《差序嵌入、双轨并行与干群关系重塑——基于A省B镇驻村帮扶的田野实践》,《农村经济》2022年第6期。

⑧ 李丹阳、张等文:《驻村干部和村两委的协同治理》,《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⑨ 高飞:《从美丽乡村到和美乡村:基层治理中复合型社会关联的变化及其重塑》,《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

⑩ 李壮、李亚雄:《论精准扶贫中驻村工作队的双重联结与双轨治理——鄂西L镇的个案研究》,《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2期。

⑪ 参见蒋晨光:《精准扶贫中干部驻村帮扶机制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共中央党校,2020年。

本文立足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选取制度分析与发展(IAD)理论框架作为分析工具,结合社会资本理论视角,通过田野调查,以贵州省 T 市 Y 村为例,对驻村工作队助力乡村治理的实践机理和运作逻辑进行深入解剖,尝试提炼出驻村工作队下沉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创新模式,并期冀提出针对性的理论应用与优化建议,为新时期驻村工作队更好地融入帮扶乡村治理提供参考借鉴和有益思路。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一) 社会资本理论

社会资本是在目的性行动中被获取的或被动员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①。资源是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要素,而其中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是解释社会资本何以破解集体行动困境的重要切入点^②。社会资本主要划分为粘合性社会资本和连接性社会资本^③。粘合性社会资本是最常见的个人型社会资本,源于有相似特征的同质性网络,反映群体内部建立凝聚力的密切关系。连接性社会资本强调群体和网络与其他拥有影响力、权力、权威的群体或网络之间的关系。两种社会资本不是非此即彼的,都能够产生积极影响^④。从社会资本视角下研究乡村治理,通常认为乡村社会资本和社会结构紧密相关,是实现乡村有序治理的重要力量。乡村治理重要切入点在于重建乡村社会资本,进而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优化乡村治理结构。

(二) 驻村工作队融入乡村治理的分析框架

制度分析与发展(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简称 IAD)框架已成为公共治理与制度分析的经典分析工具,成为理解公共事物管理的精致理论^⑤,能结构化地阐释出制度安排中的主要变量及其关系^⑥。IAD 框架作为一种分析工具,融合了内部结构要素与外部环境变量,将复杂多变的各种情境条理化。在研究对象上,驻村工作队融入到乡村治理是在结合当地的自然条件、共同体属性、使用规则的外生变量作用层面,在乡村行动场域中通过相应的行动情境,与相关的行动主体互动产生治理效果等多个维度交织的结果,与 IAD 框架具有一致性。在行动舞台、互动模式与结果中,经较长期的观察,发现驻村工作队与村级组织的互动模式及其效果,形成了社会资本从粘合性到连接性的转化和扩大融合效应,其中的机理符合社会资本理论蕴涵,因此本文以社会资本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在社会资本理论启发下,信任和资源是社会资本的基础与核心,驻村工作队、村两委、村民协同合作,共同推动社会信任建设。作为外力融入的驻村工作队,不仅有其自身积累的社会资本来解释其为乡村治理带来的影响,并且结合村级组织治理中形成的社会资本存量,还可以启发在村级组织层面,通过加强村级自治力量促进参与,最终实现治理改善之效。

① [美] 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张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28 页。

② 汪崇金、杨亿、谷军健:《第一书记驻村帮扶能提升乡村社会资本吗?——一项田野实验研究》,《财经研究》2021 年第 3 期。

③ 罗伯特·帕特南、孙竞超:《社会资本研究 50 年》,《探索与争鸣》2019 年第 3 期。

④ [美] 帕特南:《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刘波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12 页。

⑤ 王亚华:《对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的再评估》,《公共管理评论》2017 年第 1 期。

⑥ 王亚华、李星光:《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制度分析与理论启示》,《中国农村经济》2022 年第 1 期。

在分析框架中主要聚焦于其前三层结构(见图1)。第一层是外生变量,具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七种基础行动规则;二是村庄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源条件;三是当地村民的群体属性。第二层是行动舞台,主要包括行动情境与行动者。第三层是互动模式与互动结果:互动模式是在村庄治理中,行动者在行动情境中更深入地动态相互作用,包括驻村工作队携带的社会资本融入,以及在其社会网络带动下村庄粘性社会资本的转化;互动结果指治理互动模式与行动路径所产生的绩效,体现在乡村治理中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的改善,亦是治理主体、治理结构与治理方式的有效组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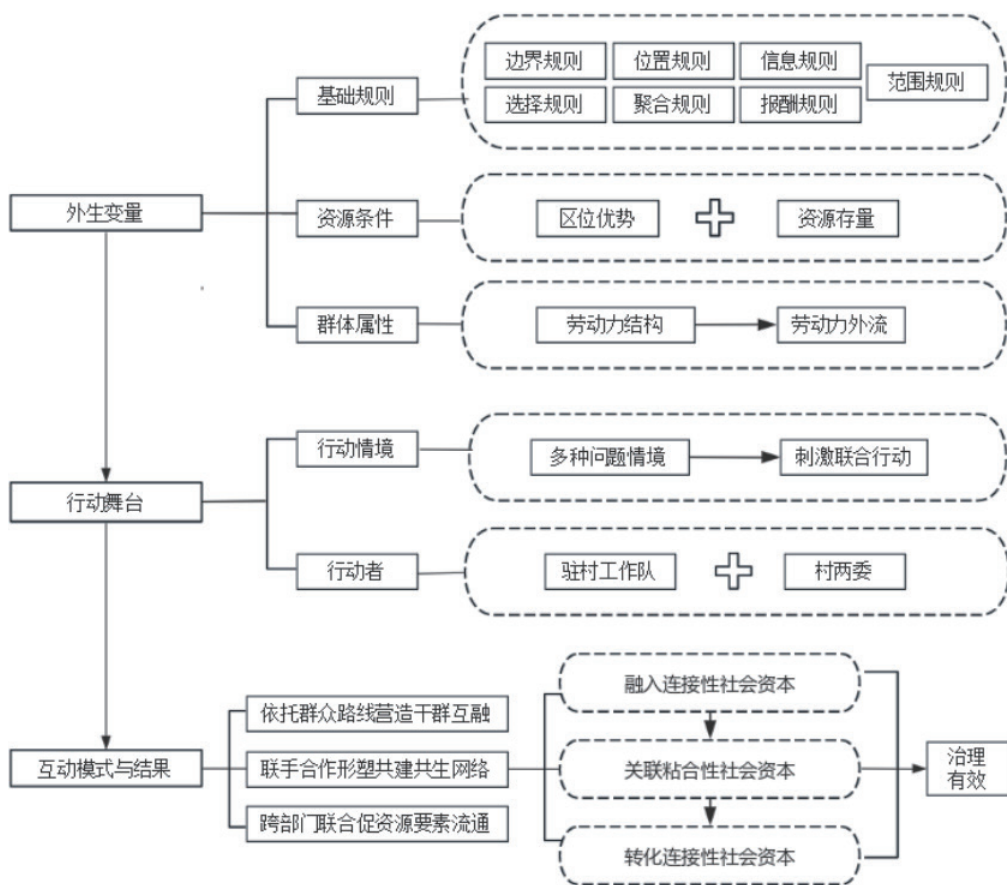


图1 分析框架

三、驻村工作队参与乡村治理的案例呈现

笔者及调研团队于2023年1—2月、6—9月以驻村工作队志愿者的身份在Y村实践服务,进行累计接近六个月的驻村调查,以参与式观察的方式获取了充分的资料数据。Y村位于贵州省T市B区C街道西北方,是一个典型的山高坡陡、地少人多的脱贫村。Y村有建档立卡脱贫户153户584人,“四类人员”中有低保户44户86人、特困供养户14户14人、监测户6户19人、边缘户2户10人。调研发现,经过近几年驻村工作队的融入协助村两委干部合作共治,发挥了该村具备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同时驻村工作队引入外部资源后,该村综合情况改善明显,获得“综合示范村”“省级乡村

旅游重点村”“平安村”称号,在驻村工作队协助村两委的治理实践中具有较好的示范性。

在近六个月的参与观察下,结合 IAD 整体性框架,将 Y 村的驻村工作队融入乡村的综合治理概括为:“联结融合”型乡村治理模式。其中,“联结”体现为驻村工作队作为外力融入的行动者,联结相关资源、社会资本和行动力量;“融合”体现为驻村工作队融入乡村治理场域,与当地治理主体互助融合,实现乡村内外主体和资源转化激活的融合效应。驻村工作队赋能村庄治理过程中紧密联结了相关行动者、行动情境、治理过程与结果,形成了良性的融合互动逻辑,实现了深化巩固减贫成果与衔接乡村振兴的综合有效治理模式。

(一)“联结”

文中所指的“联结”偏重“连接”之义,由社会资本理论中“连接性社会资本”引申而来,旨在概括驻村工作队在横向层面与相关部门和市场力量的联动,及在纵向上与村两委和村民等自治主体之间的连接。其中,以村两委、村民为代表的乡村自治主体之间原本积累的粘性社会资本,是“联结”的社会基础与前提条件。

第一,“联结”村庄社会:运用粘性社会资本。乡村治理中本身的社会网络系统是乡村治理的基石,情感与互惠等元素更好地助推了农村事务的开展。村民之间以互惠互助的交往为基础,在农村中长久的积淀形成了熟人关系网络,建立起了粘性社会资本。驻村工作队的干部凭借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网络关联,依托村干部进入村庄场域,逐步破解国家权力与村庄社会的隔膜,在进场后常态化践行群众路线,实施走访过程中,继续将村庄社会互动边界拓展,塑造了新的社会关联。

驻村工作队下沉融入 Y 村后,协同村两委实行网格化管理。通过发挥“党小组+网格员+十联户”“铁三角”优势,落实“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基层治理工作机制,完成网格、联户单元划分,网格员、联户长配备,每月开展安全生产自查工作,将事关村民生活环境的安全隐患动态清零,夯实了乡村治理基础。在 Y 村设立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红白理事会村民自治机构,专门用于协调村民纠纷,与群众谈心、与干部谈话。同时,驻村工作队不断融入村治场域,通过实际的为民办事服务获得村民和村干部的信任,走访入户了解群众实际需求从而做到为民办实事。为最大程度降低农产品销售成本,驻村工作队整合资源帮助农户开辟销售渠道,通过线上线下结合以及人际关系等渠道为民广开销路。

Y 村驻村工作队员 YH 说道:“我们建了一个群,那个群的规模有三百多个人,农户每天都把新鲜的农副产品发到群里面,村民就直接在里面下单发红包,就相当于在群里面就把东西销售出去了。我们走访发现村里面有什么好的产品的话,我们都是自主自发地通过微信发朋友圈帮助销售。”(访谈编号:20230816YH)^①

第二,“联结”相关部门:释放连接性社会资本。处于连接位置的个人将获取更多多样化的信息,从而逐渐形成连接性社会资本^②。驻村干部背后的社会资本帮助村庄提升整体资本,通过接近拥有更高价值资源的行动者,获取村庄发展所需的社会资本,将自身的人力资源连接社会资本并将其融入到村庄的发展中,以唤醒村庄的资源活力。

Y 村驻村干部通过在工作中向上联络争取得到发展项目资源,为村庄发展叠加形成纵向连接的

^① 资料来源:YH—驻村工作队员,20230816。访谈记录编码规则为:访谈时间,被访谈者姓名拼音首字母,下同。

^② 陈梦、王积龙、邢亚琳:《乡土中国调查:社会资本理论下村民环保传播的实证研究》,《新闻界》2022 年第 5 期。

社会资本力量。社会资本下乡为乡村注入新动能^①。以驻村第一书记为主力的驻村工作队伍将个人和单位资源力量与农村社会相连接,通过资金、人力和项目的接入,提升了村庄的综合发展能力。驻村工作队下沉融入Y村后,积极对接区工业和商务局、三大通信运营商等单位,提升村内通讯基础设施,保障僻远村组网络全覆盖,而后围绕乡村旅游规划兴建了垃圾处理池、公共厕所和文化广场,逐步完成了村级活动场所、便民服务大厅、村文化活动室、农民书屋提级建设。面对村内较大型建设项目与硬件设施的需求,驻村工作队同村两委在协作沟通中及时识别问题,主动与上级部门合作,实现多部门联动,以共同解决治理问题。

Y村驻村工作队员JY说道:“……可以提供更多的帮扶资金,如果帮扶单位是水务局、文旅局等有资源项目的单位,也可以对口提供一些设备、资源……”(访谈编号:20230815JY)

第三,“联结”市场力量:释放连接性社会资本。驻村工作队主动谋策将村庄的资源与外部市场对接,促进了资源的增值。在这一过程中,驻村工作队扮演着桥梁和纽带的角色,利用其自身的人脉资源,与外部企业和投资者建立联系,为乡村搭建“走出去”的平台。以合作互惠的方式提升了乡村的社会资本,增强了乡村与外界的互动和联系。与市场力量的联结合作是基于各取所需的原则,旨在实现双赢,既促进外部企业的收益,也增进了乡村的集体发展和村民的福祉。

为壮大村集体经济,Y村驻村工作队积极协调引进乡村种植业项目,驻村以来为村新增玫瑰花园、火龙果种植项目,重点推进了区主推的仙草种植产业,在种植项目的运营过程中,充分带动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促进农民增收。同时,驻村工作队积极对接龙头企业,帮助村庄主动融入龙头企业产业链条,发展肉牛羊生态养殖业。此外,利用区级加大对Y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种养殖专业合作社扶持机遇,推广“村社合一”“社社联合”等模式,将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有效融合,建立起互惠共赢利益机制,增强了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Y村驻村第一书记兼驻村工作队队长的HW同志说道:“我们区把加多宝企业引进落地生产,一是增加区的企业落地,二是增加财政税收,三是解决就业……种植仙草让很大一批老百姓的土地流转了、荒山土地复垦了,至少保证上万亩的土地全部用活了,产生了效益。”(访谈编号:20230814HW)

(二)“融合”

“融合”一方面意指驻村工作队分别连接村庄内相关主体后,在乡村综合治理中进一步的主体互动合作过程;另一方面指在驻村工作队融入乡村治理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合作过程中,对村庄治理和发展资源的开拓与融合的过程。“融合”既是主体的互动融合,也是乡村治理资源的融合。

第一,主体“融合”。首先,将驻村工作队的配置性力量与村两委的基础性力量融合^②,形成和合共生的治理主体团队力量,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统筹了政党权力、政府权力和自治组织权力,以对治理行动做出组织化的安排与协作,充分结合引领力量来实现治理目标,这样的“融合”治理既能够集中治理权力,也保证了关键主体的合作。其次,驻村工作队融入村庄的过程中,通过为民解决实际问题,长期积累而与村民之间形成了融洽的干群关系,与村民之间的沟通、对话建立起了新的公共治理话

^① 席月民:《社会资本下乡的风险处置研究》,《人民论坛》2022年第2期。

^② 黄改、李斌:《中国式脱贫攻坚实践:驻村帮扶工作队治贫的单位逻辑与行动策略研究——以湖南省P镇为例》,《求实》2023年第4期。

语体系,突破了单向度的治理模式,形成干群相融合的治理特色。

第二,资源“融合”。驻村工作队协助村庄盘活闲置资产和资源的过程,是充分调动农业产业资源与旅游资源的过程,借助和引入村外资源的同时,注重将村庄内生资源优势充分发掘开发,以融合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业与农业,为村庄的经济治理拓展了渠道,即为乡村治理的资源“融合”运用。村庄资源的深度融合,目的在于整合提升其价值链、让村民共享发展的增值收益。“融合”的保障在于治理的主体依托政府、村庄资源和市场的共同作用。

(三)“联结融合”

“联结”是“融合”的前提,“融合”是“联结”的目的,社会信任的增强则是“联结融合”的效应实现。信任不仅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更是稳定社会关系的基本因素^①。驻村工作队代表国家行政力量,以其制度优势下沉到村,较大程度地深化了乡村社会对于国家制度的信任。在Y村驻村帮扶实践的田野调查发现,村庄原本存在的信任困境、资源困境能够通过驻村工作队与村级之间的资源连接和有效互动得到解决,其中通过加强信任合作深化了信任机制,实现了更强的社会关联。在国家资源下乡的过程中,由于村民对于利益分配机制存在一定的不信任,驻村工作队通过频繁入户走访增进了彼此的信任感。驻村工作干部善于借助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熟人网络减少联络沟通成本,进而再增进沟通以获得村民的支持信任。此外,驻村工作队通过实际作为帮助农户发展种植业,在整个产销过程中全程参与带动示范,帮助解决农户产业增收的实际问题,以情感融入增强了干群之间的信任。

一位驻村工作队员描述了他们通过实际帮带村庄产业发展而与村民之间建立起的信任过程:“那一开始没有人种黄桃,后来是我在外面考察嘛,又调研了确定适合种黄桃后,我才动员他们,后面请了专家去然后才点种子,两年就结果子销售了。好多老百姓都在这里务工,这一开始是荒山,后面就是把这里发展起来了。”(访谈编号:20230821YYH)

四、驻村工作队“联结融合”型乡村治理模式的运作逻辑

(一)外生变量:工作队融入乡村的内外条件

1. 基础规则:工作队融入乡村治理的约束与支持

在工作队融入到乡村治理的过程中,遵循着七种行动规则:边界规则、聚合规则、选择规则、位置规则、信息规则、报酬规则和范围规则。驻村工作队实施行动的舞台、与村干部互动的模式和治理结果之间的逻辑路径建立在七种行动规则的约束和支持的基础上。

边界规则。界定治理的主体,即划分驻村工作队与村两委组织的权利和义务,给出行动者进入与退出的条件,界定参与者的数量^②。Y村的驻村工作队发挥了各年龄段队员的优势,不同行业与单位人员组合,实现队伍成员的优势结合,强化了驻村工作队的整体功能。

位置规则。对行动情境中角色的规定,即驻村工作队与村两委组织及其村民的身份立场。选派

^① 钱海梅:《行动与结构:社会资本与城郊村级治理研究》,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3年,第56页。

^② 杨晓婷、陆镜名、刘奕辰等:《“资本下沉”赋能“资源释放”:第一书记带动贫困村脱贫的行动逻辑与高效机制》,《中国农村观察》2020年第6期。

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发挥的是示范作用。尤其是驻村第一书记肩负党建工作指导员、经济发展领航员、支部书记工作监督员的工作职责。驻村工作队有较高的文化认知和政策水平,因此还能在村务中扮演政策解释者的角色。

信息规则。对行动者之间信息沟通渠道和形式的规定,即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组织对相关政策的获取、掌握和上传下达等。驻村工作队重要职责还在于宣传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和县委县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决策部署、工作措施,因此驻村工作队在重要政策文件在村一级的下达中担任首要责任人。

选择规则。对行动情境中行为选择的制度规定,驻村工作队有严格的工作纪律。Y村驻村工作制度规定要求其每月组织开展一次防贫预警动态监测排查,督促做好监测资料信息上报;要求精准掌握所驻村基本情况、包保片区基本情况以及包保片区重点人群家庭情况,熟悉全村产业发展、资产状况、防贫监测、“3+1”保障等情况,以驻村管理制度对村干部行为进行规范约束。

聚合规则。对行动者从行动过程到结果的控制链条^①,包括驻村工作队与村两委组织的决策权力分配,体现为如何将其他规则更好统合形成良好的运作系统。驻村工作制度对于加强队伍自身建设的規定中,不仅要求选派单位通过指导、关心和支持来调动驻村干部积极性,还要求驻村干部应当同村干部相互配合,积极做好本村各项工作,是作为村两委治理乡村的得力协助者。

报酬规则。对于驻村工作队而言,报酬规则是工作上的收益,包括绩效考核奖金、荣誉称号等激励规则。驻村工作制度对于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作出一定的激励保障规定,包括如予以参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等荣誉激励,报酬规则以正强化的奖励规定激发驻村工作队的干事激情,从而形成示范效应。

范围规则。范围规则指行动者在行动情境中所可能产生的所有结果的集合,对于驻村工作队而言,涉及到参与乡村治理的成效范围,包括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组织通过行动路径与工作互动所可能实现的综合治理效果。

2. 资源条件: 区位与存量双重优势助力村庄发展

村庄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资源条件,包括村庄的区位优势和资源存量。其一是区位优势: Y村距市中心城区8公里,村落选居于河两边山脚平展地域。Y村村委会位于该村中间地段B村民组,临近YH铁路T市站、机场、教育园区,村组公路畅通。区水电站水库淹没区在村境内河床有2.5公里,是主城区集中供水主要取水点。其二是资源存量: Y村自然资源丰富,包括水资源、植被资源、动物资源和矿产资源。村内有形成较早的传统村落,凝结着村庄的历史记忆,也是潜在的旅游资源。村中保存有较好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资源。乡村自有的资源优势为其拓展打造赋予了基础条件。利用乡村自然资源发展生态旅游业,提高其经济附加值,利用乡村传统资源促进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为乡村治理提供文化支撑,而对乡村自有资源的保护与更新维护了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并释放了持续发展的潜能。

3. 群体属性: 村庄内生自治不足需引入外力协助

当地村民的群体属性,包括劳动力结构和乡村社会网络。通过田野调查数据发现, Y村劳动力

^① 史云贵、薛喆:《县乡领导干部容错纠错机制的功能廓析与路径创新——一种基于IAD的分析框架》,《中国农村观察》2020年第3期。

人口不少,但由于较多外出务工,本村发展出现劳动力流失现象,乡村治理青壮年主体较少。在乡村社会,大多数家庭内部存在二元结构^①。乡村治理本应是回归到人的本源主体,然而出生并成长在乡村的本土人才有流向城镇的趋势,熟悉乡村社会的中青年农民外出的规模大于留守本土的规模,村庄治理缺少“不离土不离乡”或“离土不离乡”^②的本土人才群体,村庄群体自身缺少内生发展的动能,因而需引入外力协助以弥补其内生自治的不足。

(二)行动舞台：工作队融入治理的场域需要

1. 行动情境：基于治理需求的联合行动

社会场景或事件是个人及其位置、环境、资源等的形貌^③。Y村主要面临以下问题情境,使得驻村工作队与村两委干部协同共治形成必然。一是发展产业后劲不足。Y村距市中心城区较近,生态环境较好,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优势突出,但尚未形成成规模、成体系、吸引力强的乡村旅游体系,满足不了城市居民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二是发展基础仍有短板。其中,连接外来旅客、投资客商的重要通道即路网建设待进一步完善,村级医疗卫生条件、通讯质量、小学校园硬件设施还需提升,服务功能待优化。因耕地不足等因素制约,Y村较难发展规模化种养殖产业。村级缺乏懂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思路、市场运营管理能力的人才,产业发展人才支撑动力不强。三是发展保障亟待强化。Y村自身发展动力不够,因缺少可持续性、充足的收入来源体系,在产业发展、组织建设、人才培养、生态保护、文化挖掘等方面还需要善于用好用地、规划等方面的政策支持,需要政府提供人力、物力、财力支撑。

2. 行动者：治理主体融入的恰适性

首先是作为乡村外力帮扶重要力量的驻村工作队这一行动者队伍,驻村工作队是具有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优势的行动者,因此其下沉融入乡村具备了恰适性,实际也的确从不同方面改造完善了乡村治理。驻村工作队依据独特的引导协调力促进乡村治理制度调适,将个人单位资源整合到村庄,不断弥合乡村治理情境的制度缺陷。其次是作为乡村内力自治重要力量的村两委这一行动者队伍,在村级治理过程中,驻村工作队往往是能够带来社会资本的一方,而以村两委为代表的村级自治主体是能够依据村级实情将社会资本运作转化的一方。当行动情境赋予了参与者相关身份后,参与治理的主体就能够做出相应的行动选择。驻村干部与村干部分别被赋予了重要的角色地位,组成乡村治理的两支重要的主体队伍,由于各自的优势不同,在围绕同一村治目标情境下形成相辅相成的行动过程,为乡村行动舞台的场域需要融入了其恰适性的行为主体合力。

(三)互动模式与结果：工作队联结融合治理的互动机理

1. 联心：依托群众路线营造干群互融

驻村工作队灵活地打开了乡村社会与正式制度之间的阻隔,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过程中投入大量时间并磨练出与民沟通的技巧,在互动中联结了民心,培养了紧密融洽的情感秩序。驻村干部们将走访工作作为日常活动,与村民之间从最初的陌生疏离感到日渐积累产生密切情感,巧用情感往来形塑干群之间的信任合作,使得村民认可“组织可以依靠、有所帮助、能够解决问题”^④。作为政策在乡村

① 参见吕德文:《基层中国:国家治理的基石》,北京:东方出版社,2021年。

② 李海金:《“外源内生”:乡村人才振兴的实现路径》,《人民论坛》2023年第17期。

③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李康、李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54页。

④ 参见张静:《社会治理:组织、观念与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

转化为行动的载体,驻村工作队一是以调研走访摸清村民基本信息,因户施策制定新的帮扶计划;二是走访宣传政策,以面对面拉家常的形式走进百姓心中,实现政策宣传“零距离”,增进群众对惠民政策的理解,提升群众的安全治理和发展等意识;三是家访互动改善情感融入,驻村工作队的走访频次增多以后,“外来客”的身份局限逐渐淡化,与群众之间的来往互动不仅是浅层面的走访探询,工作队队员与农户谈心,为农户分析和解决问题,久而久之与村民建立了更亲密的社会网络。在充当政策执行者的过程中,驻村工作队以自身高度的觉悟意识同村民之间增进话语互动,进而有效动员了村民参与治理。此外,驻村工作队日益重视村民的意见表达,利益诉求得以积极呈现,同时夯实了干部与群众之间的治理回应性。将群众位置由过去的“边缘看客”变更为“参与主体”,增强了村民公共责任意识,推动了基层事务的协商共识,为乡村社会治理目标与集体行动意愿的达成提供了动力^①。

2. 联责: 联手合作形塑共建共生网络

驻村工作队在乡村治理场域中充当村两委的协助者角色,与村两委形成互助共治局面。作为内生主体的村两委干部是驻村工作队最核心的合作互动对象,两者之间互相依存,以良好的团队协作过程形塑成互惠共生的有机网络。在面对乡村治理任务之下,要求驻村工作队与村两委具备联合行动的能力。乡村囿于难以仅依靠内部主体解决治理难题,诉诸国家行政派遣的外力融入,村庄治理体系由单一力量变为双重合力,驻村工作队与村两委以分工协作方式将各自能量赋予治理场域,达成乡村现代化治理协同性格局。具言之,在产业发展中主要由具有工作经验和资源优势的驻村干部争资跑项,但项目资源承接落地过程中更多需要村两委干部配合实施。在公共秩序维护与综合整治方面,村两委处在乡村社会最基层、服务群众最前沿的一端,是相对熟知村内整体状况的主体,因此在驻村工作队到村初期则更多依靠村两委干部融入乡村语境,由村两委干部先发搭建起群众沟通桥梁;在组织建设方面,经受过党性的严格考验和训练的驻村工作队,本就担当了政党下乡的重任,着重将政党意识融入乡土情感,进而有效强化基层党建。在以基层组织结构重塑为要务的过程中,村级形成了驻村工作队与村两委协同并存的交互结构。以乡村的长远振兴为目标驱动,双主体队伍展开了多方面的分工协作,打好乡村综合治理的“组合拳”。

3. 联动: 跨部门联合促资源要素流通

资源的制约是推动部门合作的重要因素^②,由于治理场域涉及多种需求,仅以驻村工作队自身携带资源仍然难以达成治理目标,需面向掌握不同资源要素的上级部门寻求合作支持,驻村工作队依赖部门合作联动推进了乡村发展行动。其一,在助推Y村产业发展中,驻村工作队协助村两委期间加强了与区委办、区交通运输局、区督查督办局、区移民局等帮扶联系部门协调对接,争取到产业发展工作资金31万元,实施民宿项目二期100万附属设施建设项目,完成了村外主要公路改扩建工作。在工作队驻村期间,曾邀请农技专家为村集体经济火龙果和玫瑰花园产业、村级种植大户提供现场栽培教学指导,更是充分利用了公共宣传平台、抖音网红、其他新闻媒体等方式积极宣传了Y村乡村旅游产业。其二,在助推Y村综合设施建设中,驻村工作队联合村两委干部通过积极对接区工业、商务局、三大通信运营商继续提升通讯基础设施,保障僻远村组4G网络全覆盖且通讯质量更好。其三,

^① 参见毛一敬:《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共同体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中科技大学,2022年。

^② 徐国冲、夏瑜、刘岩松:《“以弱协强”何以成功?——基于“程序—认知”框架的案例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对于乡村基础设施的更新建造,驻村工作队与村两委更多依靠财政局与体育局等其他单位来对接实施,逐步完成村级活动场所、便民服务大厅、村文化活动室、农民书屋的提级建设,对村级卫生室、学校硬件设施建设优化改造,联合联动强化了服务保障。此外,经驻村工作队的跑资争项,引来政社合作与市场交流,更加活化了乡村产业项目的运营。驻村工作队通过争资跑项促进与多部门之间的联动合作,使得政社之间的社会资本活跃于基层治理过程。在此过程中,驻村干部充当其他部门与村庄之间的“中间人”,以另一路径联结国家、市场与乡村社会,使得乡村治理中的关系纽带更加牢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资源要素得以有效流通。

“联结融合”型乡村治理模式一定程度上消融了科层治理与乡村社会的张力,沿循群众路线呼应村域治理的要求,以深入乡村一线、动员群众和政社力量,达到实践本位并契合治理情境的特征。Y村村庄的驻村帮扶经验显示,有效的乡村治理有赖于国家行政力量与村庄社会的均衡联动,尤以驻村工作队为承接政府治理意志的载体,使得乡村治理结构得以连通密合。围绕村治目标,以驻村工作队的下沉融入因势利导地连接起国家和社会各自的资源,同村民、村两委以及其他部门主体之间联心、联责、联动,实现有效治理。首先,沿循群众路线契合了基层治理的实践本位特征;其次,巩固强化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格局;最后,共同缔造了政社联动的乡村善治。Y村“联结融合”型综合有效治理,是行政主体与自治主体互补协同的主体有效治理,是内外主体互融共生的复合有效治理结构,是借助于社会资本合作互动的有效治理方式的多重组合(总体框架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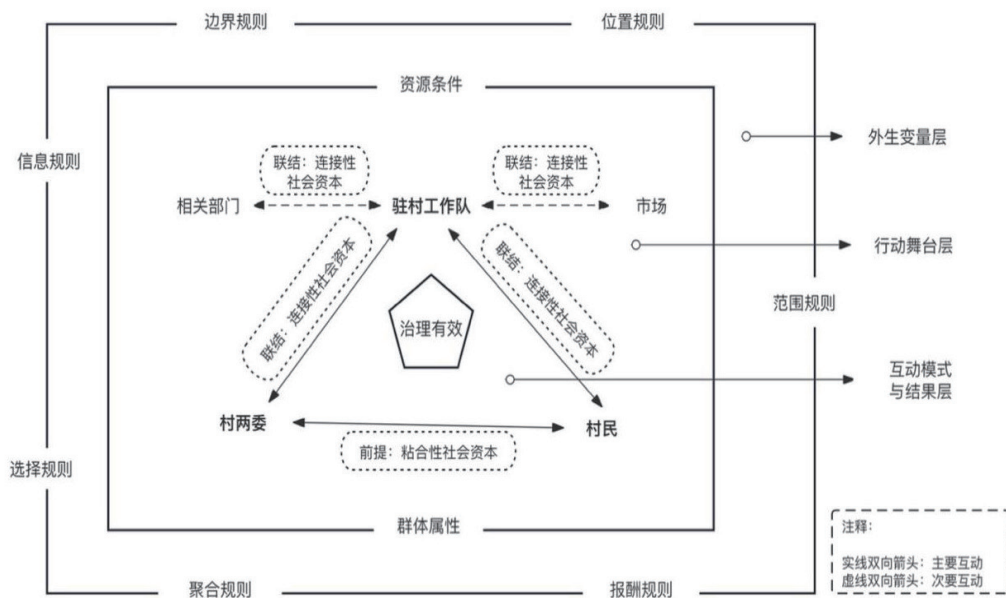


图2 驻村工作队“联结融合”型乡村治理模式总体框架

五、结论与讨论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的综合治理与发展亟需动力主体为乡村注入活力。通过进入“田野”参与观察,从驻村工作队融入Y村治理实践案例中归纳得出,驻村工作队协助村两委干部并合力共治改善了乡村现状,产生了多方面综合治理的良好效果。基于IAD分析框架,从“外生变量层、

行动舞台层、互动模式与结果层”分析驻村工作队融入乡村治理的逻辑机理,最终提炼出“联结融合”型治理模式。

“联结融合”型治理模式明晰了驻村工作队助力乡村综合治理的实践机理与运作逻辑。首先,外生变量层是驻村工作队融入乡村的内外条件。对于外在条件而言,驻村工作队融入乡村受到边界规则、位置规则、信息规则、选择规则、聚合规则、范围规则、报酬规则七种基础规则的约束和激励;对于内在条件而言,乡村自有资源条件是治理基础,乡村弱化的劳动力结构及其社会网络的乡村群体属性是前提,两者共同形成了外力融入的前因。其次,行动舞台层是融入治理的场域需要。乡村治理舞台上的情境需求释放了工作队联合行动,也诠释了乡村治理行动舞台的关键,具有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优势的行动者恰适性。最后,互动模式与结果层阐释工作队融合治理的互动机理。一是依托群众路线营造干群互融,二是驻村工作队与村两委干部联手合作形塑共建共生网络,三是驻村工作队跨部门联合促发展资源要素流通。驻村工作队“联结融合”型治理模式在其制度规则的约束与激励下,起到了聚合乡村治理资源继而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方面的强大作用。该治理模式回应了乡村振兴大背景下,国家力量如何联动相关主体参与村治实践的问题,也回应了如何与乡村社会互为共治,构建了整体共促的治理实践逻辑。

联结更多主体有效聚合资源与社会资本,重塑多主体融合的治理或将是未来乡村治理的有益尝试。外部性要素的联结与融入使得原本乡村治理中的自治主体不再势单力薄。多元主体与资源的有效融合成为乡村治理体系的命题。乡村治理是不断调试的过程,治理体系仍在不断优化改进过程中,对于治理主体的恰适性也仍将随着时代背景发生演变。

责任编辑:侯德彤 尹婷婷

Connection and Integration as the Practice Mechanism of Village Work Teams in Facilitating Rural Governance – A Case Study Based on the IAD Framework

Wang Xiaoling Wang Lijing Tian Ya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village work teams have become a regular governance force deeply involved in rural areas. Faced with the task of effectively connecting the consolidation and expans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chievements with rural revitalization, village work team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through continuous integration into the rural context.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IAD) framework and integrating social capital theory, uses field investigation methods to deconstruct the governance practices of the village work team in Village Y.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village work team has constructed a "connection and integration" governance model through a downward integration approach, which not only "connects" the village society, relevant departments, and market forces but also "integrates" various subjects and resources. The operational logic of this model can be deconstructed into the exogenous variable layer, the action arena layer, the interaction mode and outcome layer. The proposal of the "connection and integration" rural governance model will provide a concrete theoretical response for village work teams to better integrate into the governance of the villages they assist, and also offer a new feasible solution for further improving the village work mechanism under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Key words: village-based work team; rural governance; IAD framework; social capital; rural revitalization

智慧城市建设的影响因素与生成机理研究

——基于24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杨秀勇 滕云飞

青岛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 266061

摘要: 智慧城市建设既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升城市治理水平的内在驱动力。基于TOE分析框架,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我国24个智慧城市建设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以探究智慧城市建设的影响因素和生成机理。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受到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服务平台、组织整合、政策支撑、数字公共服务需求、经济发展水平等要素的共同影响,单一要素无法单独构成智慧城市建设的必要条件。智慧城市建设的生成机理具有“殊途同归”的特征,可以归结为技术驱动型、权威主导型和需求驱动型。其中,技术驱动型智慧城市主要以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服务平台建设为核心,并辅之以有效的组织整合和良好经济发展水平;权威主导型智慧城市则以组织整合、政策支撑和良好的财政资源禀赋为核心条件;需求驱动的智慧城市主要以数字公共服务需求和政策支撑为核心条件。基于此,为了更好地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可以从采取“因地制宜”的差异化建设路径、构建要素协同机制、加强高素质数字人才培养三个方面进行重点推进。

关键词: 智慧城市; TOE框架;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中图分类号: D0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5)02-0145-12

一、问题的提出

在数字化加速转型的大背景下,智慧城市建设作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日益成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战略支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指出,要“分级分类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将物联网感知设施、通信系统等纳入公共基础设施统一规划建设”^①,这一国家顶层设计的战略部署标志着智慧城市建设已经进入了新阶段。同样,《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强调“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数字技术驱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机理与路径研究”(23CZZ026)和青岛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青岛市数字技术赋能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路径研究”(QDSKL230107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杨秀勇,男,山东莒县人,管理学博士,青岛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111”领军人才(第三层次),主要从事城市治理、乡村治理和数字治理研究;滕云飞,男,山东德州人,青岛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乡村治理研究。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2021年3月13日, https://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

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①。可以发现,智慧城市建设已经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抓手。因此,智慧城市建设日益成为实践者和学者重点关注的热点问题,对智慧城市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通过梳理相关研究发现,目前学术界对智慧城市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三个方面。其一,技术主导的视角。以信息通信技术(ICT)为基础,聚焦于物联网、人工智能、5G、大数据等前沿技术的融合与应用,强调技术对城市基础设施、服务效率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作用^②。其二,治理与政策视角。该视角探讨了政府角色、政策框架、跨部门协同机制以及数据治理规则等,重点关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制度设计和权力重构^③。在智慧城市的建设过程中,虽然数字技术是关键支撑,但更需要秉持“以善治之道引领数智技术之应用”的治理哲学,强调智慧理念的引领作用相较于单纯技术堆砌的优先性^④。其三,可持续发展视角。该视角将智慧城市与低碳经济、韧性城市建设结合,探讨了数字技术对能源效率、生态保护的促进作用^⑤。

可以发现,虽然学者在智慧城市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方面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既有研究更多从单一视角展开研究,三种视角各有侧重,例如技术驱动视角容易陷入“技术乌托邦”的陷阱,忽视制度、文化等非技术因素的影响;治理与政策视角则侧重顶层设计,对基层政策执行中的“政策空转”现象解释力不足;可持续发展视角过于重视技术减排效应,忽视了隐性环境成本。基于此,为了更好地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亟需从整体层面探讨智慧城市建设的影响因素与生成机理。因此,本研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依托 TOE 理论分析框架,从技术、组织、环境三个维度入手,对全国 24 个智慧城市建设的典型案例进行了深入剖析,在此基础上揭示了智慧城市建设的影响因素和生成机理,提炼可复制性的智慧城市实践范式,深化智慧城市建设的理论建构和实施策略研究,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数字化转型提供可行的实践路径。

二、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一) 智慧城市建设何以以“智”促“治”

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数字新技术的蓬勃发展与广泛应用,为城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尤其是在信息化浪潮的推动下,信息通信技术(ICT)深度融入了城市的发展与运行之中,催生了数字城市与信息城市的兴起。物联网、云计算等前沿技术的不断进步,极大地推动了信息城市与数字城市在物理域与虚拟域之间的深度融合,这一融合过程逐渐孕育并催生了智慧城市的诞生。具体来看,智慧城市能够实现以“智”促“治”,既具有国家顶层政策的支撑,又有数字技术发展提供的客观基础,更在于城市治理与数字技术的耦合发展。

① 中共中央 国务院:《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2023 年 2 月 27 日, https://www.gov.cn/zhengce/2023-02/27/content_5743484.htm。

② 孙倩倩、鞠方、周建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创新:基于技术分工视角的分析》,《中国软科学》2023 年第 7 期。

③ 沈桂龙、张晓娣、余海燕:《智慧城市建设中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及其公共价值风险分析:数字治理时代的政府—市场关系视角》,2025 年 2 月 4 日,《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0.102>。

④ 颜昌武:《智慧城市建设中的技术与智慧》,《浙江学刊》2023 年第 5 期。

⑤ 董鹏、许润国:《智慧城市建设理念的价值分异与选择机制》,《中国行政管理》2024 年第 10 期。

首先,在国家顶层设计和政策支撑层面。智慧城市建设的持续推进离不开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政策支撑。近年来,党和国家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旨在加快智慧城市建设的步伐,为智慧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撑。2022 年 3 月,国家发改委公布了《2022 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其中明确提出要加速推进新型智慧城市的构建,为智慧城市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2023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该规划强调以数字化为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其工作部署与智慧城市的建设内容、重点及方向高度契合数字中国的发展要求。这标志着智慧城市已成为国家层面的重要战略。此后,国家数据局等部门共同发布了《关于深化智慧城市发展 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该意见从总体要求出发,对全领域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全方位加强城市数字化转型支撑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规划和部署,为智慧城市建设的深度推进提供了具体指导和要求。可以发现,党和国家为智慧城市建设明确了方向,指明了道路,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保障。

其次,在数字理念深化和技术支持层面。一方面,新兴数字技术的发展为智慧城市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普及应用,显著增强了城市治理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能力。特别是大数据技术,凭借对海量数据的深度挖掘与细致分析,为城市治理提供了精确的决策支撑。新兴数字技术的嵌入实现了对城市治理的全面感知、智能分析和精准响应,有效提升了智慧城市建设水平。另一方面,市民数字理念的深化为智慧城市建设奠定了群众基础。《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网民数量已达 10.92 亿,其中数字政务服务用户占比超九成^①。特别是通过政务 APP 的常态化使用,市民日益形成了数字化生活习惯,促进了政府与市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增强了城市治理的透明度和公正性,为智慧城市应用场景的落地提供了广泛的社会认同^②。因此,随着数字政务服务的普及,以及市民数字化生活习惯和数字惯习的逐步形成,智慧城市具备了充分的技术和群众基础。

最后,在城市发展与数字技术耦合层面。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技术已经嵌入到城市治理各个方面,日益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关键力量。城市作为居民社会生活的重要载体,其与数字技术的耦合发展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条件。一方面,城市作为复杂的社会系统,需要进行高效、精准的管理,又需要为市民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而数字技术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手段和方式。通过云计算、物联网和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城市治理主体可以及时感知城市运行的状态,精准分析研判城市治理问题,有效提升城市治理效率和水平^③。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城市治理创新提供了条件。智慧城市不仅仅是对传统城市管理模式的创新,更是对城市治理、产业发展、公共服务供给的系统升级和发展。数字技术嵌入城市治理可以为居民供给更便捷、高效的公共服务,培育多元的产业生态,构建开放、包容的城市治理体系^④。城市治理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耦合,不仅促进了智

① 国家图书馆研究院:《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第 5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国家图书馆学刊》2024 年第 2 期。

② 张霆:《智慧城市建设下提升居民媒介信息素养探析——数字时代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与提升居民媒介信息素养的耦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2 期。

③ 颜昌武:《智慧城市建设中的技术与智慧》,《浙江学刊》2023 年第 5 期。

④ 孙远太、陈力源、韩良良:《智慧城市建设提升民生保障水平的内在逻辑与路径优化》,《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 6 期。

慧城市建设的水平,而且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可以发现数字技术与城市治理的耦合发展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了有效的条件保障。

(二) 基于 TOE 模型的智慧城市建设分析框架

TOE 框架作为一种研究和综合分析企业采纳创新技术不同影响因素的模型,由纳茨基(Tornatzky)和弗莱舍(Fleischer)于1990年提出,现已广泛运用于组织的创新采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TOE 模型认为组织采纳创新技术受技术、组织、环境三大因素共同驱动,且具体条件变量无固定限制。智慧城市建设是在社会结构变迁、社会发展转型、社会风险不确定性加大等因素复合作用下的必然趋势。改革开放后,乡村呈现“乡土化解构”,而城市居民则趋近于“原子化”,人们独立性的增强迫切需要城市治理转型,为捕捉“原子化”个体的需求、规范“原子化”个体的行为,亟需采纳创新技术提高自身治理能力。Chang 研究发现影响创新采纳的决定性因素都可以归为技术、组织、环境三个维度^①。《2022 中国数字政府发展指数报告》显示我国各省份数字技术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整体呈现金字塔型分布结构。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技术、组织、环境“三驾马车”齐驱并行。基于此,本研究从技术、组织、环境三个维度检视智慧城市建设的影响因素和生成机理(见图1)。

技术层面中,智慧城市建设需要以数字资源整合平台和基础设施为依托,构建治理主体与数字技术协同的“智治”格局^②。智慧城市建设以数字基础设施为前提,这些基础设施本身的数据分析与资源整合优势能够提升城市治理的精细化水平,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最基本的条件支撑。数字化背景下,政府运用大数据、互联网、信息通信技术等数字基础设施为载体辅助履行职能,推动公共服务资源的精准配置^③。同时,运用数字服务平台解决基层治理的碎片化,实现跨部门协同办公已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基本思路^④。因此,在技术层面,本文选定数字基础设施与数字服务平台为条件变量。

组织层面中,组织在运用数字技术时会不断更新基层治理流程、优化组织网络由科层式向扁平式的组织结构转变。一方面,政府领导的注意力配置对政策执行起到了关键作用,通过高效统一的领导管理体系,能够有效解决部门壁垒问题,形成治理合力,保证政策落地^⑤。另一方面,基层对政策的响应也影响着基层治理成效。随着中央向地方放权,基层政府在关注度上表现出一种聚焦和衰退的双重趋势,正是这种对政策反应速度的不同,造成了基层政府治理效能高低不一^⑥。政策的执行成效受到政策执行者执行力度的直接影响。在组织维度上,本研究选定组织整合度与政策支撑程度为条件变量。

环境层面中,组织的生存和发展都与其所在的系统和社会环境直接关系,并需要与外部环境进行持续的资源交流^⑦。环境对于城市系统的运行模式以及系统内部各要素的交互效率具有一定的控

① Chang S. I., Hung S. Y., Yen D. C., et al., The Determinants of RFID Adoption in the Logistics Industry: A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Perspective, *Communication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ystems*, vol. 23, no. 1, 2008, p. 12.

② 马怀德:《基层治理数字化的重要意义及完善路径》,《浙江学刊》2023年第5期。

③ 沈费伟、叶温馨:《基层政府数字治理的运作逻辑、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基于“农事通”“社区通”“龙游通”数字治理平台的考察》,《管理学刊》2020年第6期。

④ 乔晗、李卓伦、黄朝椿:《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的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基于复杂经济系统管理视角的组态效应分析》,《外国经济与管理》2023年第1期。

⑤ 刘法杞、陈柏峰:《技术平台对科层体制的重塑及其治理效应》,《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⑥ 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视角》,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106页。

⑦ 陶克涛、张术丹、赵云辉:《什么决定了政府公共卫生治理绩效?——基于QCA方法的联动效应研究》,《管理世界》2021年第5期。

制力^①。从治理主体的角度来看,数字要素赋能城市治理的主要目标是满足民众多元化的公共服务需求。此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智慧城市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更高,则更有可能吸引专业人才、推动数字技术创新以及促进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条件保障。由此,在环境层面,选择数字公共服务需求与经济发展水平作为变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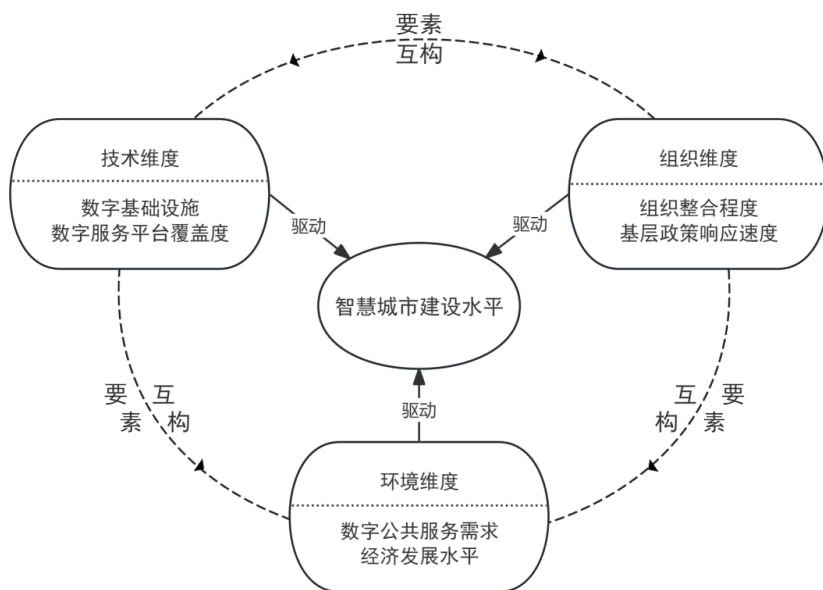


图1 智慧城市建设成效分析框架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定性比较分析(QCA)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由查尔斯·拉金等学者提出,是一种侧重于案例研究的理论整合研究方法。QCA方法是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QCA方法尝试突破传统个案分析,通过系统性地分析事件成因、内部要素间的联系及其可能的组合关系,旨在阐释不同条件变量如何以多样的组合形式作用于结果变量,从而加深对事件复杂因果关系的认识。

本文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进行研究,主要基于以下考量。首先,智慧城市建设受组织、技术、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这些因素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交织与因果关联,简单的线性相关分析难以充分解答本文的研究议题。采用整体性视角与组态分析的QCA为探究这种复杂因果关系提供了一条新途径,适合探讨智慧城市建设中存在的多因一果的复杂情况。其次,鉴于本研究所选案例数量不多,不宜采用适用于大样本的统计与回归分析方法。而QCA方法融合了定量与定性的分析优势,特别适用于中小规模样本的比较研究。最后,本研究中的条件变量已超越了简单的二分类隶属范畴,而fsQCA允许将变量的隶属度调整到完全不隶属与完全隶属之间的任意值,解决了部分隶属的问题。

^① 何君安、柴顺:《TOE框架下城市数字政府发展的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基于32座典型城市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公共治理研究》2023年第4期。

(二)案例来源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主要选取了 24 个典型案例,案例资料来源于各地方政府网站与汇编成册的案例集。案例的选取依据和原则主要包括四点。1. 案例的典型性。本研究所选取的案例均源自官方媒体的公开报道,是智慧城市建设领域的典型实例,且广受社会关注与认同。2. 案例的相似性原则。QCA 方法的应用要求所选案例在研究的相关维度上具备可比性。本研究所选取的案例在技术、环境、组织三个方面依据现有研究报告具有相对一致的标准,能够进行横向对比。3. 案例的多样性与异质性。本研究主要是对智慧城市建设的影响因素和生成机理进行分析,所选案例广泛分布于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多个省市,涵盖了基层党建、社区治理、基层执法等多个领域,确保了案例在类别、地区等方面的多样性和异质性要求。4. 案例的可获取性。本研究选取的案例均为成效显著且经过权威认证的智慧城市建设实例,其结果变量具有可观测性和易获取性。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媒体报道、学术论文、政策文本等渠道,形成案例支撑材料,最终形成如表 1 所示案例库。

表 1 案例选取表

编号	案例名称	编号	案例名称
1	北京“回天大脑”超大型社区社会治理实践	13	广东东莞数字生态建设美丽圩镇
2	北京海淀区“区块链+跨省通办”	14	江西南昌“社会治理大模型动态平台”
3	北京东城区加强“热线+网格”为民服务模式建设,推两网融合	15	四川成都青羊区:智慧赋能基层治理提升党建引领“微网实格”治理实效
4	北京密云区接诉即办智能平台	16	广东深圳龙华区“党建+科技+治理”基层治理
5	浙江台州探索建设青悦城“数字餐饮”共治管理街区	17	广东深圳宝安区网格化智慧管理工程
6	浙江杭州拱墅区石桥街道探索“数智”赋能基层治理打造流动人口“智慧公寓”	18	安徽合肥天鹅湖社区“11143”智慧社区建设体系
7	江苏徐州“精网微格”治理服务平台	19	贵州贵阳南明区花果园社区大脑暨城市治理项目
8	江苏苏州(苏州工业园区)“星骑士”平台赋能多元化社会治理	20	湖北武汉东湖高新区智慧综治中心
9	山东济南章丘区数字社会轻应用赋能中心	21	山东胶州社会治理网格化智慧工作平台
10	山东济南市历城区郭店街道办事处:智慧赋能、四级联动网格化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22	海南数智热线助力海南自贸港社会治理
11	山东烟台福山区全域全科网格化管理服务平台	23	河南许昌红色引擎激发基层治理活力,一网统管助力魏都全域全知
12	上海普陀区社情民意感知平台	24	山西太原万柏林智慧化赋能基层治理——“云”上施治“指尖”办事

(三)变量选取及其赋值

本研究基于 TOE (技术—组织—环境)理论分析框架,建构了一个整合性分析模型,涉及技术、组织、环境三个维度,共包括 6 个前因条件变量和 1 个结果变量。其中,技术维度包含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服务平台两个解释性变量,组织维度包含组织整合程度、政策支撑程度两个解释变量,环境维度涉及数字公共服务需求、经济发展水平两个解释变量,结果变量则聚焦于智慧城市建设水平。各变量均通过理论推导与实证检验进行了操作化定义与测量标度校准。

1. 条件变量

(1)技术因素: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服务平台

第一,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是智慧城市建设的技术基础,物联网主要通过网络连接来促进居民之间、房屋所有者与其他居民或管理层之间的资源共享和信息沟通,是最具直观感受的数

字基础设施。其中感应层作为物联网的基础组成部分,由多种感测器设备构成,例如监控摄像头、门禁读卡器、大气和水质监测传感器等。在万物互联的网络中,这些基础设施扮演着“神经末梢”的角色,为基层的物理和信息领域融合,实现数码化和网格化,从而构建起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互联互通提供坚实基础。借鉴已有研究,将物联网的感应层分为安防、消防、环卫、能源、物流五个方面^①。通过收集的材料对研究案例进行赋值,案例拥有 4 种及以上物联感应设施的赋值为 1,拥有 3 种物联感应设施的赋值为 0.5,拥有 3 种以下物联设施的赋值为 0。

第二,数字服务平台。数字服务平台是连接城市管理中心和居民之间的桥梁,同时与社区级的物联网系统联系密切。数字服务平台旨在实现多领域服务的精确部署,确保了数字产品和服务的安全集成,满足了市场对标准化、多样化及灵活性的需求^②。数字服务平台通过提供全场景的数字服务解决方案,旨在为居民带来更高品质的生活服务,并为社区治理主体提供强大的支持工具。数字服务平台按照功能分类分为社区管理功能、居民社交功能、便捷生活服务、教育培训功能四类。因此,本研究通过分析收集资料,对研究选取案例进行赋值,所在社区的数字服务平台拥有 3 种及以上功能的赋值为 1,拥有 2 种功能的社区赋值为 0.5,拥有 2 种以下功能的社区赋值为 0。

(2) 组织因素:组织整合程度、政策支撑程度

第一,智慧城市建设需设立一个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负责机构,以优化行政资源配置,发挥整体统筹作用,从而有力推动智慧城市建设进程^③。《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 2021—2022》中“组织领导”一级指标下设“组织保障”和“落实机制”两个二级指标可较好地反映组织的整合程度。因此采用“组织领导”得分来衡量智慧城市建设的地方政府不同类型组织的发展水平与完备程度,可较好地反映组织整合情况。根据该报告将案例样本描述性统计的上四分位数(75%)、中位数及下四分位数(25%)作为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的三个校准标准。

第二,政策支撑程度。本文借鉴现有文献的研究方法,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发布为时间分界点,通过计算各基层政府相关文件发布日期与《意见》发布日期之间的时间差,来衡量“政策支撑程度”这一条件变量,时间差越长,说明响应速度越慢^④。通过对案例进行综合比较并由高至低进行排序后,将其中排名 1—8 的案例赋值为 1,排名 9—16 的案例赋值为 0.5,排名 17—24 的案例赋值为 0。

(3) 环境维度:数字公共服务需求、经济发展水平

第一,本文利用政府官方统计年鉴,参考已有研究的测度方式,将移动互联网用户数与总人口数的比值作为评估公众数字服务需求的指标,比值越高,表明该市对数字公共服务的潜在需求越大^⑤。本指标数据取自各案例城市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1)》。在案例样本描述性统计中,我们将上四分位数(75%)、中位数和下四分位数(25%)分别设定为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的三个校准阈值。

① 范逢春、王彪、刘亚丽:《城市社区智慧治理有效性的驱动模式及其生成逻辑——基于 21 个智慧社区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电子政务》2024 年第 2 期。

② 傅柏勇、沈婷婷:《基于未来社区理念的社区数字化场景建设研究》,《建设科技》2023 年第 6 期。

③ 袁方成、罗家为:《十八大以来城乡基层治理的新方向、新格局与新路径》,《社会主义研究》2016 年第 1 期。

④ 容志、吴磊、李婕:《公共价值驱动的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基于“两张网”运行的观察》,《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1 期。

⑤ Ma L., Diffusion and Assimilation of Government Microblogging: Evidence from Chinese Cities, *Fud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no. 2, 2014, pp. 274–295.

第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采用案例所属行政区划 GDP 水平,该数据源自《城市统计年鉴(2021)》。在案例样本的描述性统计中,将上四分位数(75%)、中位数及下四分位数(25%)分别作为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的三个校准标准。

2. 结果变量

本研究将智慧城市建设水平作为结果变量。本文参照已有研究的设计思路构建智慧城市建设取得成效的三个指标,分别是“是否具有可推广性”“获得优秀案例奖项”和“治理效果显著”^①。“是否具有可推广性”是指智慧城市建设以其鲜明的示范性、广泛的代表性为标志,成为上级政府推广、同级政府借鉴以及媒体广泛报道的经验。这些案例由于其成功的可复制和可推广特性而受到关注。“获得优秀案例奖项”指是否在省级、国家级城市治理领域案例评选中获得奖项。“治理效果显著”指在智慧城市建设后获得了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较大的提升。基于此,本研究将 24 个案例中,符合三个指标中一个指标及以下的案例赋值为 0,符合三个指标中两个的案例赋值为 0.5,符合全部三个指标的案例赋值为 1。各变量详情见表 2。

表 2 变量赋值表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	数据来源
技术 维度	数字基础设施	所在社区拥有 4 种及以上物联感应设施的赋值为 1,拥有 3 种物联感应设施的赋值为 0.5,拥有 3 种以下物联设施的赋值为 0	新闻媒体报道、社区公众号等新闻媒介
	数字服务平台	所在社区的数字服务平台拥有 3 种及以上功能的赋值为 1,拥有 2 种功能的社区赋值为 0.5,拥有 2 种以下功能的社区赋值为 0	新闻媒体报道、社区公众号等新闻媒介
条件 变量	组织整合程度	完全隶属点: 80.39 不完全隶属点: 73.44 完全不隶属点: 69.38	《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 2021—2022》
	政策支撑程度速度	按照基层政策时间间隔长短进行排名,排名 1—8 的赋值为 1,排名 9—16 赋值为 0.5,排名 17—24 赋值为 0	各基层政府公众号、各省级政府门户网站
环境 维度	数字公共服务需求	完全隶属点: 1.80 不完全隶属点: 1.47 完全不隶属点: 1.23	各政府门户网站统计年鉴
	经济发展水平	完全隶属点: 2411.11 不完全隶属点: 1188.29 完全不隶属点: 546.08	各城市统计年鉴
结果 变量	智慧城市建设成效	符合“是否具有可推广性”“获得优秀案例奖项”“治理效果显著”其中一个条件及以下为 0,符合其中两个为 0.5,符合其中三个条件为 1	各政府门户网站及《2023 政法智能化建设创新案例及论文汇编》《全国城市数字治理创新案例》《全国社会治理创新案例》

四、智慧城市建设的实证结果分析

(一) 智慧城市建设的必要条件分析

根据 QCA 方法的标准步骤,首先进行单一因素的必要条件检验。当一致性结果超过 0.9 时,前因条件可视为结果发生的必备条件;若一致性结果超过 0.8,前因条件则可视为结果发生的足够条件^②。表 3 中关于高数字基层政府治理水平的必要条件分析显示,各条件变量的一致性均未达到 0.8

① 单菲菲、高敏娟:《社区治理绩效的内涵、框架与实现路径——基于 20 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20 年第 5 期。

② [美] 查尔斯 C. 拉金:《重新设计社会科学研究》,杜运周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 年,第 27 页。

的临界值,表明它们均不能单独作为解释智慧城市建设水平的必要或充分条件,需要从技术、组织、环境三个维度的相互作用去考虑智慧城市建设的影响因素和生成机理。这表明智慧城市建设具有一定复杂性和系统性,其并非单一条件作用的结果,而是复合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意味着智慧城市建设不仅仅需要关注技术层面的创新,还需要考虑组织结构的调整、政策环境的优化以及社会文化的适应等多方面因素。只有综合考虑技术、组织和环境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才能更全面地理解智慧城市建设的生成机理,为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表 3 必要条件分析

条件变量	一致性	覆盖度
高数字基础设施	0.572868	0.787008
非高数字基础设施	0.731008	0.645448
高数字服务平台覆盖度	0.533333	0.776524
非高数字服务平台覆盖度	0.770543	0.656539
高组织整合程度	0.631008	0.672727
非高组织整合程度	0.515504	0.558823
充分政策支撑	0.572868	0.648815
非充分政策支撑	0.541085	0.553529
高数字公共服务需求	0.643411	0.724891
非高数字公共服务需求	0.431783	0.443825
高经济发展水平	0.543488	0.616027
非高经济发展水平	0.510775	0.522149

(二) 智慧城市建设的多元生成机理

依据 QCA 研究方法要求并结合研究需要,将 Raw Consistency 的阈值设置为 0.8,案例频数为 1,同时设定 PRI Consistency 的阈值为 0.75,绘制出智慧城市建设的条件组态分析结果(见表 4)。可以发现,智慧城市建设的路径主要有 3 条。数据呈现了可能的条件组合以及各条件变量在组态路径中的相对重要性及各组态路径的解释能力。模型解的一致性为 0.806、覆盖度为 0.91,说明这 3 条组态下,有 80.6% 的智慧城市建设水平较高,且这些组态路径可以解释 91% 高水平智慧城市建设案例。根据各变量的实际分布,对三条组态路径进行了具体分析,并总结出三种生成机理。

表 4 高智慧城市基层治理的条件组态分析

Configuration	Solution		
	1	2	3
数字基础设施	●	⊗	⊗
数字服务平台覆盖度	●		⊗
组织整合程度	●	●	⊗
基层政策相应	⊗	●	●
数字公共服务需求	⊗	⊗	●
经济发展水平	●	●	⊗
Consistency	0.986577	1	0.795181
Raw coverage	0.517998	0.39245	0.173837
Unique coverage	0.0430202	0.306409	0.130816
Overall solution consistency		0.806376	
Overall solution coverage		0.910448	

注: ●或●表示该条件存在,⊗或⊗表示该条件不存在,●或⊗表示核心条件,●或⊗表示边缘条件,空白代表条件可存在也可不存在。

1. 技术驱动型: 数字基础设施 + 数字服务平台 + 组织整合 + 经济发展水平

研究发现良好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服务平台建设,并辅之有效的组织整合,可以有效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技术驱动型智慧城市以数字化平台为核心,通过整合城市数据、技术和服务资源,构建起统一、开放、智能的城市治理和服务体系。其核心在于利用平台化的技术架构打破传统“数据孤岛”,实现跨部门、跨领域的协同运作,以此提升城市治理效率和公共服务水平。技术驱动型智慧城市建设将先进的数字技术深度融入城市治理的各个环节,旨在提升城市运行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增强居民生活质量。这一建设模式不仅体现了数字技术对城市治理模式的深刻变革,也是实现城市智能化、精细化管理的有效途径。该路径能够解释 51.8% 的高水平智慧城市建设的案例,覆盖了北京、上海、深圳等智慧城市建设案例。以深圳宝安区“1+1+N”网格化智慧管理工程为例,借助深圳高数字基础设施的资源优势,依托宝安区智慧政法综合信息平台,建立各类队伍、资源管理台账,开发涵盖涉稳事件登记、线索核查、任务派遣等全流程的电子模型,形成覆盖全区的智慧维稳综合信息平台,保证数字服务平台覆盖的“全方位”和“全环节”。以政法、公安、司法、应急、信访等维稳核心部门为主力,有机融合综治中心治理服务、法律援助等服务资源,形成涵盖线索排查、干预引导、处置化解到跟踪服务的全能队伍,实现了跨部门、跨业务、跨层级的联动调度。

2. 权威主导型: 组织整合程度 + 政策支撑程度 + 财政资源禀赋

这条组态表明,政府拥有充足的财政资源,通过对行政部门的整合可以有效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由于该组态下的智慧城市建设主要是以组织整合程度、政策支撑程度和财政资源禀赋为核心条件,因此可以归结为权威主导型智慧城市建设模式。该模式主要以政府部门为核心推动力量,通过顶层设计、政策引导、资源整合等方式,系统性地推进城市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进而提升城市治理效能,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其核心在于强调政府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的规划、协调、监管和服务中的主导作用。这一路径能够解释 39.2% 的高水平智慧城市建设案例。在治理过程中,以国家为代表的公共权威应扮演元治理的角色^①。尽管社会和市场多方参与已成为社会治理的常态,但在“大政府、小社会”的社会架构下,党政部门仍然发挥主导作用,能够有效调配资源,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济南市章丘区数字社会轻应用赋能中心”为例,政府各职能部门与相关基层单位紧紧围绕国家、省、市关于数字城市建设的指示精神和战略部署,将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社会治理、民生服务、城市运行等领域,着力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城市运行态势、矛盾纠纷化解、社会治安防控等方面的数字化治理模式,搭建了数字城市轻应用赋能中心,有效提升了城市的智慧化水平。

3. 需求驱动型: 数字公共服务需求 + 政策支撑程度

需求驱动型智慧城市建设,其核心在于政策支撑与数字公共服务需求的相互作用。数字公共服务需求,不仅体现在公众对高效、便捷公共服务的期待,也为智慧城市建设明确了方向。政府部门在公共政策的支持下,能够及时响应公共服务需求,通过技术创新和流程优化,提升公共服务的数字化水平,进而提高服务效能和市民满意度。这种自下而上的智慧城市建设模式,不仅推动了数字技术

^① 鲍勃·杰索普、程浩:《治理与元治理:必要的反思性、必要的多样性和必要的反讽性》,《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5期。

与公共服务的深度融合,还有效激发了城市治理活力。该模式强调政府根据实际需求,灵活调整政策和服务方式,形成了一种以需求满足为导向、以快速响应为动力的智慧城市建设路径。这一路径能够解释 51.8% 的高水平智慧城市建设案例。以北京“回天大脑”超大型社会治理为例,“回天地区”是推进北京市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场域,也是城市治理的堵点、难点和要点。“回天大脑”聚焦镇街和社区层面在社区管理中存在的交通拥堵、医教不足、商业乏力等共性问题,进行了数字化回应。作为对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思想生动实践的回应,回天社区通过基层党建引领和基层部门主动到社区“报道”的方式,形成了基层凝聚治理的“大格局”,通过市级下沉、区级协调、社会提供三种途径,确保智慧城市建设数据的可靠性和鲜活性,从而实现了高水平智慧城市建设。

(三)组态路径的稳健性检验

本文为了验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采用了调整充分性一致性水平阈值和 PRI 一致性水平的方法进行了检验。具体而言,首先将充分性一致性水平的阈值从 0.80 提高到了 0.85,然后重新进行了分析,发现新的组态路径与表 4 中所示的结果保持一致。进而在保持充分性一致性水平为 0.80 不变的条件下,将 PRI 一致性水平的阈值从 0.75 提高到了 0.80,再次进行分析后,同样发现新的组态路径与表 4 中的结果相吻合。通过稳健性检验,可以确信本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稳健可靠的。

五、结论与建议

智慧城市建设作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优化营商环境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提高民众福利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本研究选取 24 个智慧城市建设案例作为分析样本,借助 fsQCA 条件组态分析方法,基于 TOE 框架,深入分析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影响因素与生成机理。主要有以下研究发现。第一,智慧城市建设的成效并非单一因素所能决定,而是多要素相互协同、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而言,技术层面包括数字基础设施与数字服务平台,组织层面涵盖组织整合与政策支持,环境层面则涉及数字公共服务需求及经济发展水平等,这些要素相互耦合、联动发展,共同推动智慧城市建设。这表明智慧城市建设是一个系统过程,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复合协同。第二,智慧城市建设的生成机理具有“殊途同归”的特征,可以归结为技术驱动型、权威主导型和需求驱动型。其中,技术驱动型智慧城市主要以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服务平台为核心,并辅之以有效的组织整合和良好的经济发展水平;权威主导型智慧城市则以组织整合、政策支撑和良好的财政资源禀赋为核心条件;需求驱动的智慧城市主要以数字公共服务需求和政策支撑为核心条件。可以发现,通过不同条件的等效替代,不同的要素组合适配后可以产生良好的智慧城市建设效果,实现高水平的智慧城市建设。

在上述研究结论的基础上,为了更好地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可以在以下方面重点推进。第一,不同城市需要“因地制宜”选择适合的智慧城市建设路径。智慧城市建设受到技术、组织、环境等多维度的协同影响,具有复杂性和系统性特征。因此,在制定智慧城市建设策略时,需要根据自身的资源配备和优势条件,选择符合各自城市特性的建设路径,以此实现资源要素的适配性配置和治理效能

的持续性提升。第二,构建要素协同机制,促进智慧城市全面发展。智慧城市建设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构建多因素协同驱动机制,实现技术、组织与环境的深度融合。在技术维度,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服务平台优化,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组织维度上,强化跨部门协作与政策协同,形成政策合力,确保智慧城市建设的有序推进。同时,在环境维度需要积极回应民众对数字公共服务的需求,结合经济发展水平,制定科学合理的智慧城市发展规划。第三,强化高素质数字人才和先进技术的协同支撑。高素质数字人才队伍是智慧城市建设的智力保障,需重点培养城市规划、信息技术、数据科学等领域的复合型数字化人才,以此满足智慧城市多维度建设发展需求。同时,先进数字技术是智慧城市建设的技術基础,需加大对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技术的研发投入和系统引入,构建完善的技术创新体系,以此为智慧城市建设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

责任编辑:侯德彤 尹婷婷

Research on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s of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A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Based on 24 Cases

Yang Xiuyong Teng Yunfei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61, China

Abstract: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is not only a vital component of modernizing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s and capabilities but also an intrinsic driver for enhancing urban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TOE framework, this study employs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to examine 24 typical cases of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in China, aiming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s of smart city development.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is jointly shaped by factors including digital infrastructure, digital service platforms, organizational integration, policy support, demand for digital public servic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s. No single factor alone constitute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s, which are characterized by "different paths, same destination",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types: technology-driven, authority-led, and demand-driven. Specifically, technology-driven smart cities prioritiz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service platforms, supplemented by effective organizational integration and robust economic development; authority-led smart cities rely on organizational integration, policy support, and strong fiscal resources; demand-driven smart cities focus on the demand for digital public services and policy support. To advance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tailored strategies should be adopted based on local conditions, synergistic mechanisms among key elements should be established, and the cultivation of high-quality digital talents should be prioritized.

Key words: smart city; TOE framework;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曹现强,男,1967年生,山东莒南人,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山东大学省委常委、副校长,青岛校区校长,国家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兼任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常务理事、全国公共管理本科教指委委员、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理事、政府战略与公共政策研究会副秘书长、山东省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山东省公共管理本科教指委主任委员等。先后以高级访问学者身份赴英国巴斯大学、美国克拉克大学、日本冈山大学交流访学,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主要从事国家治理、服务型政府建设与公共服务供给、城市治理与公共政策、公共部门绩效管理与绩效评估研究。主持“中国共产党城市治理理论与实践”“我国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与获得感提升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2项,“共享理念视域下的包容性城市治理研究”“市政公用事业的合作治理模式研究”等国家级、省部级以及横向委托课题60余项;出版《国家治理论纲》《合作治理:市政公用事业发展模式研究》等著作、教材10余部;于《中国行政管理》《公共管理学报》等专业权威期刊发表论文80余篇。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山东省教学成果奖特等奖、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山东大学“我心目中的好导师”等奖项。



王增福,男,1982年生,山东潍坊人,哲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青年拔尖人才,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兼任教育部高校思政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理事、山东省高校哲学教学研究会会长、山东沂蒙精神研究会副会长等。

主要从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研究。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与文化强国建设研究”、青年项目“麦克道尔哲学与新实用主义的叙事转换研究”以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等。出版《经验的概念化与第二自然——麦克道尔论心灵与世界关系的文本学研究》《麦克道尔哲学与新实用主义的叙事转换》等著作4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等重要报刊发表《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良好家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构建的多维审思》等学术论文50余篇,多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媒体转载或摘编。学术成果曾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三等奖及山东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三等奖各1项,本人获2022年度“山东学校思政课教师年度人物”称号。



来稿须知

《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是山东省教育厅主管、青岛大学主办、公开发行的社会科学类综合性学术期刊。我们将秉承学术办刊宗旨,立足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关注学科前沿问题和热点问题,注重学术创新。本刊开设了东方文化·中国智慧、新时代中国金融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特色栏目,同时辟有历史研究、政治学研究、经济研究、工商管理等传统栏目。

一、本刊面向国内外学者公开征稿,来稿应主题鲜明、内容详实、观点明确、资料翔实、论证充分、逻辑清晰、语言文字合乎规范,有独到创新,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或实践借鉴价值,字数 10000 字以上为宜。具体格式及参考文献注释规范见官网(<http://dflt.qdu.edu.cn>)。

二、为便于匿名审稿,来稿请在正文中隐去作者姓名、单位等有关信息。投稿时请注明作者简介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作者简介包括:姓名、籍贯、所在单位、职称、学历、学位、主要研究方向、通讯地址、联系电话和邮箱。并附上中英文题目、中英文摘要(含关键词)。基金项目请注明项目级别、项目名称和编号。以上内容请单独放在一页,置于正文前面。

三、本刊不收取任何形式的版面费、审稿费、通联费等任何名目的费用,一旦采用作者稿件,会支付相应的稿酬。

四、著作权使用声明。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中国知网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按作者说明处理。

五、本刊实行严格的双向匿名同行专家审稿制度。

六、作者文章一旦被录用发表,作者须拥有所投稿件的版权,并将其转让给本刊,版权包括本刊纸质出版、发行的权利,网络出版和文摘、转载和汇编的权利。

七、投稿方式:

本刊采用知网投审稿系统接受来稿,具体为 <https://dflt.cbpt.cnki.net/>。投审稿系统可从青岛大学期刊社官网(<https://qks.qdu.edu.cn/>)或《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官网(<http://dflt.qdu.edu.cn/>)直接进入。

八、稿件查询:

作者可登录本刊投审稿系统网站(<https://dflt.cbpt.cnki.net/>)通过“作者在线查稿”系统进行查询稿件处理情况。投稿后 2 个月内仍未收到编辑部刊用或修改通知,即视为退稿,作者可对稿件另行处理。

编辑部电话: 0532—85953730

联系邮箱: dflt@qdu.edu.cn